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3

隋唐五代卷

曹之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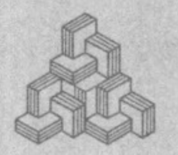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68-1785-1
9 787506 817851 >
定价：64.00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3

隋唐五代卷

曹之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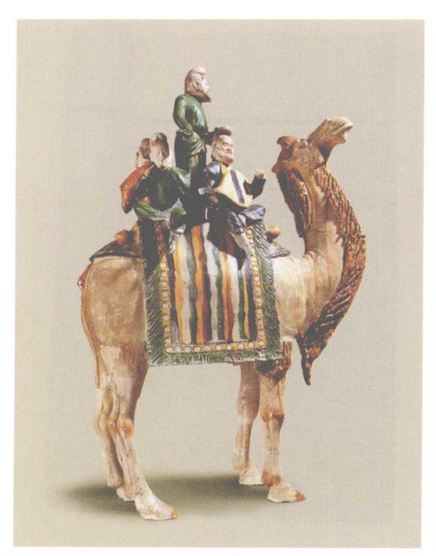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曹之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85-1

Ⅰ.中…　Ⅱ.曹…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隋唐时代③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五代（907~960）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203919号

责任编辑／柳　华　金　硕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31　彩页4
字　　数／447千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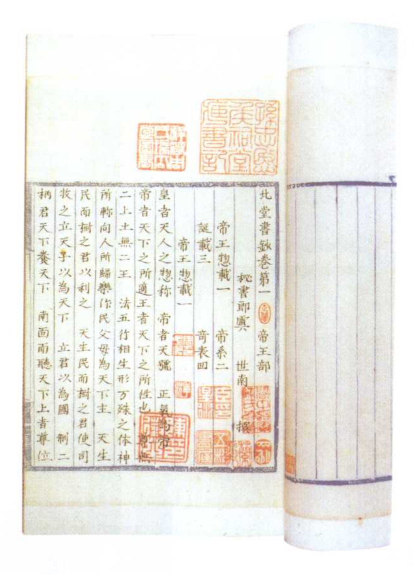




彩图1（左）
唐三彩

彩图2（右）
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像





北堂書鈔卷第一 帝王部
秘書郎虞 世南 撰
帝王惣載一 帝系二
誕載三 竒表四
帝王惣載一
皇者天人之惣称 帝者天號 正氣爲帝
帝者天下之所適王者天下之所往也 尊無
二上土無二王 法五行相生形万殊之体神
所嚮向人所歸樂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天生
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
牧之立天子以為天下 立君以為國 制二
柄君天下養天下 南面而聽天下上書尊位

彩图3（左）
壁画飞天

彩图4（右）
《北堂书钞》明抄本书影

彩图5（左）
《艺文类聚》宋严州刻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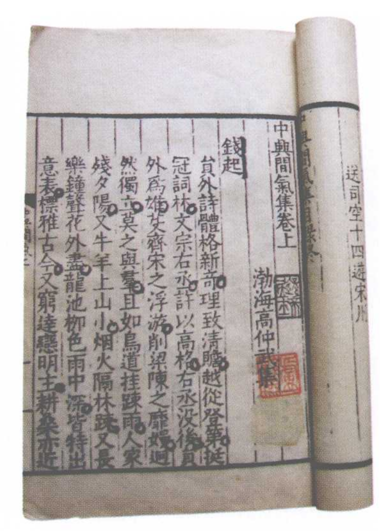
藝文類聚卷第八　歐陽詢

山部下　虎丘山　蒜山　石帆山　石鼓山　石門山
太平山　岷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上　總載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漢水　洛水

虎丘山

虎丘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吳越
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穿土爲川積壤爲丘發五郡之
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運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槨三重傾水銀爲池
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鴈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已三
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丘　王珣虎丘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
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彩图6（右）
《中兴间气集》四部丛刊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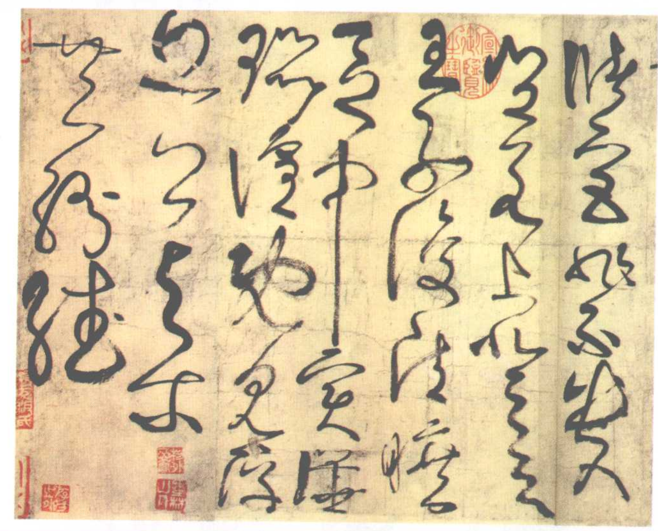
送司空十四遊宋州

中興間氣集卷上

渤海高仲武集

錢起

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越從登第挺
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
外爲雄芟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
然獨立莫之與羣且如鳥道挂疎雨人家
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疏又長
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
意表標雅古今又窮達懸明主耕桑亦近



彩图 7
张旭狂草



彩图 8
捶拓工具


凡欲讀經先念淨口業真言一遍
脩唎 脩唎 摩訶脩唎 脩脩唎 娑婆訶
奉請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衣持
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
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時長老須菩提在大
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

彩图9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
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
普勸志心供養受持
此五臺山中文殊師利大聖真儀變
現多般威靈叵測久成正覺不
捨大悲隱法界身示天人相與萬
菩薩住清涼山攝化有緣利益弘
廣思惟憶念增長吉祥禮敬稱揚
能滿諸願普勸四衆供養歸依當
來同證菩提妙果
文殊師利童真菩薩五字心真言
阿上囉跛左曩
文殊師利大威德法寶藏心陀羅尼
唵引阿味囉吽引佉左洛
對此像前隨分供養真心境專
注課持迴施有情同歸常樂

彩图10（左）
玄奘

彩图11（右）
五代刻《文殊师利菩萨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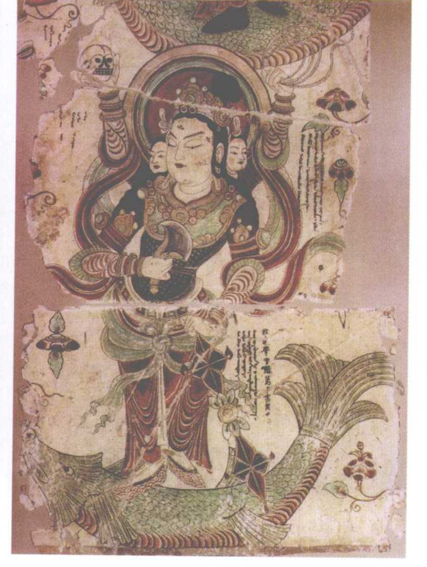


彩图12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彩图13
粟特文书信





彩图14（左）
回鹘文汉文合璧题款的供养人像

彩图15（右）
有回鹘文题款的明王像

编辑委员会

出版工作委员会

目录 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

第一章　隋代出版的历史背景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开皇三年（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至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杨广被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今江苏扬州），隋代灭亡，历时二帝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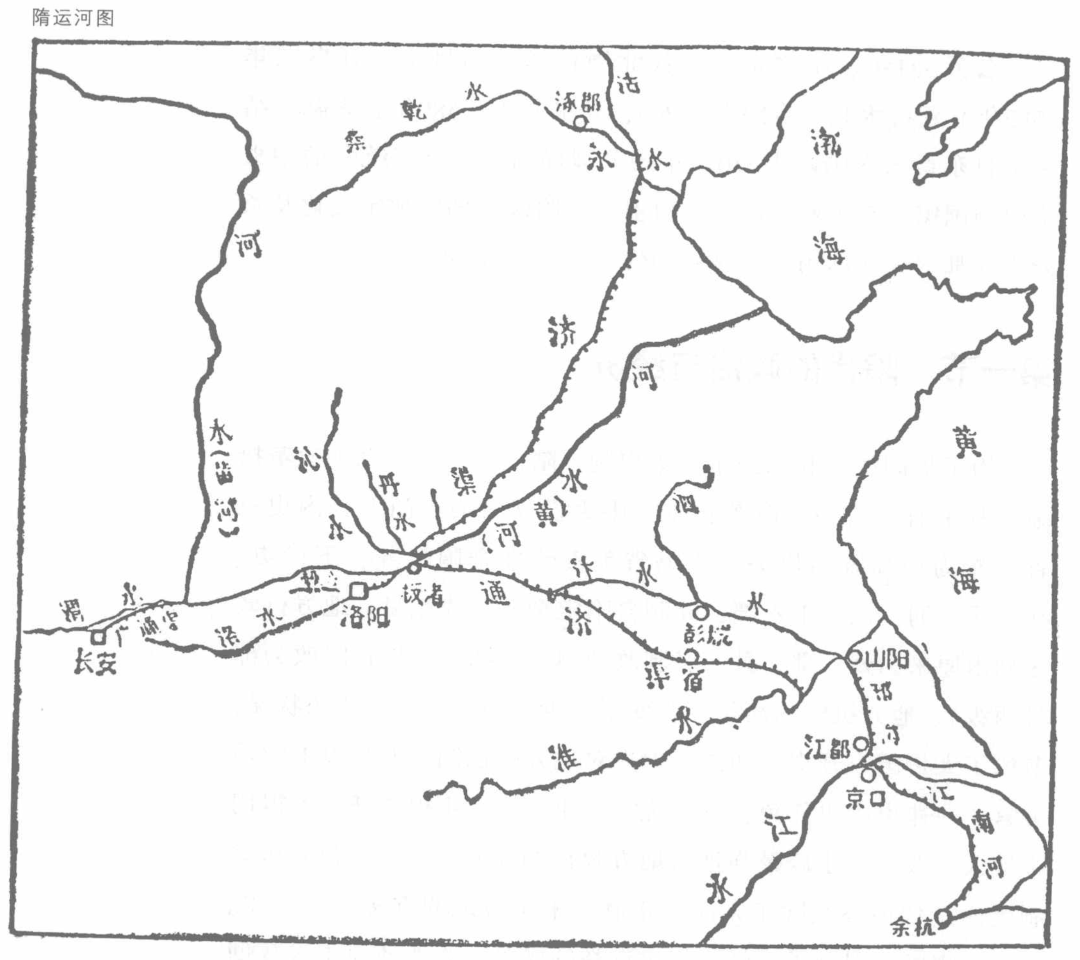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隋代的政治与经济

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制，隋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有：（一）改革官制。中央设立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统治机关。尚书省负责管理全国政务，下设吏、礼、兵、刑、民、工六部，此制自隋定型，历代相沿。地方行政区划由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炀帝时改为郡县两级）。地方机构的简化，改变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状况，节约了大量国家开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连任，不得用本地人，改变了士族豪强把持地方政权的局面。（二）建立科举制度。隋代最终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士族对选举的操纵，为普通地主参政创

造了有利条件。科举制度，亦为历代沿用。（三）改革兵制。隋文帝对北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进行改革，把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加强了主要用来镇压人民的封建武装力量。（四）均田减赋。隋文帝继续推行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并实行“轻税入官”的政策：“轻税”即适当减轻农民所交税额；“入官”即把税收上缴国库，而不交给地方豪强，这对增加国家收入大有好处。（五）统一钱币和度量衡。隋代之前，钱币混乱，严重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开皇五年（585年）“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1]。隋代规定：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一斗等于古斗三斗；一斤等于古秤三斤，增加了国家收

【1】[唐]魏征等：《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82年。

图1
隋运河图



入。顾炎武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1]（六）清理户籍。严格户口管理，凡有意隐瞒、漏报户口者，发配远方。开皇三年（583年）清查户口，有40万人查实为壮丁，有160多万人新编入户，也增加了国家收入。（七）修建大运河。隋炀帝时开通了贯穿东西南北的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连在一起，长达二三千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图1）。其目的有四：一在政治上，可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加强对南方人民的镇压；二在经济上，为了保证长安、洛阳等重要地区的物资供应，解决南粮北调问题；三在军事上，为了不断扩充领土，在东北部涿郡（今北京）建立据点，保证军需物资供应；四在生活上，为了满足个人穷奢极欲、观光旅游的需要（图2）。（八）加强了大陆同台湾的联系。早在隋代以前，大陆同台湾就有密切联系，汉代台湾叫"东鳀"、"夷州"，属于会稽郡管辖，据《后汉书·东夷传》："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据《后汉书·东夷传》："(夷州)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三国时，吴王孙权曾派大将卫温、诸葛直率兵万人，航行到夷洲。到了隋代，台湾叫"琉球"，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更加密切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1】[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1《权量》,商务印书馆,1935年。

图2
隋炀帝游江都图



由于上述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措施的实施，隋代（主要是前期）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到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户口滋盛，

【1】《隋书》卷24《食货志》。

【2】《隋书》卷29《地理志上》。

中外仓库，无不盈积”[1]。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洛阳兴洛仓仓城长达10余公里，内有300个大窖，每窖储谷8 000石。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纺织、瓷器、造船、造桥等技术都有了长足发展。河南、河北和四川是纺织业中心地区，四川“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2]。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是瓷器业中心地区，河南安阳、陕西西安出土的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隋代造船业也很发达，能造龙舟、浮景、翔螭、朱鸟、白虎等多种大船，其中“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船高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多个房间。隋代造桥技术也很高，河北宁晋县洨河上的安济桥(原属赵州，亦名赵州桥)，就是隋代工匠李春的杰作。此桥至今巍然屹立，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手工业中心，大业三年（607年），河北诸郡有300多户工匠迁至洛阳。

第二节　隋代的文化政策

隋代实行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总体上是三家鼎足而立。

一、重视儒学

隋代重视儒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尊重儒家及其经典。开皇六年（586年），隋文帝诏将汉代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3]，后因战乱而未果。开皇九年（589年）下诏说：“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4] 并亲自“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5]。隋文帝还赐给郑译《孝经》一部，并请经学家元善为之讲解《孝经》。为什么隋文帝对《孝经》如此感兴趣？苏威曾对文帝说：“臣先人每诫臣云，唯

【3】《隋书》卷32《经籍一》。

【4】《隋书》卷2《高祖下》。

【5】《隋书》卷75《儒林传·叙》。

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1] 文帝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学好《孝经》，可以“立身治国”，以孝劝忠，忠于其封建统治。

【1】《隋书》卷75《何妥传》。

第二，重视儒家人才。《隋书·儒林传·叙》云：

> 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

隋文帝甚至下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2]。开皇初，天下人才云集京师，其中有“六儒”、“二刘”、“五经库”等。“六儒”即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六人，俱为山东著名学者。“二刘”即刘焯和刘炫，二人少时即结盟为友，曾在藏书家刘智海家苦读十年，学识渊博。“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3]。刘炫曾自我介绍说：

【2】《隋书》卷75《房晖远传》。

【3】《隋书》卷75《刘焯传》。

> 《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4]

【4】《隋书》卷75《刘炫传》。

结果，吏部有关人员“竟不详试”，就录用为殿内将军[5]。“五经库”即房晖远，他出身于儒学世家，精《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经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先后担任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等职。

【5】《隋书》卷75《刘炫传》。

第三，大办儒学。尤其是在隋炀帝即位之后，“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6]。大业四年

【6】《隋书》卷75《儒林传·叙》。

(608年）下诏说：

> 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1]

【1】《隋书》卷3《炀帝上》。

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隋代儒学有了空前的繁荣。据《隋书·儒林传·叙》："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二、重视道教

隋朝重视道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道教符谶，为其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隋文帝所用第一个年号"开皇"，即源于道教，据《隋书·经籍志》：元始天尊，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2]。可见"开皇"本为道教一"劫"之始，表明一个新纪年的开始。隋文帝以此为号，说明他也把自己登基视为新纪元的开始。他也要像元始天尊那样，普度众生，开劫度人。隋文帝重用了不少精通符命的道士和儒士，据《隋书·来和传》：

【2】《隋书》卷35《经籍四》。

> 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董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祚，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同。

张宾是一个善于看相、精通历法的道士，"公当为天子"当是看相之后得出的结论。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曾经使用张宾编撰的历法。焦子顺也因"驱使鬼神"而受宠。开皇八年

(588年)，道士焦子顺“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顺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其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1]。著作郎王劭曾说杨坚“有龙颜戴干之表”，并说：

[1]［宋］王溥:《唐会要》卷50《五通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状如伞，圣主从此去。”及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2]

[2]《隋书》卷69《王劭传》。

此言显系谶语，杨坚为亳州刺史时，竟“亲至祠树之下”，以“圣主”自比，登基后对亳州老子祠倍加关注。隋炀帝也信奉道教，他在宫内建有专供经像的玄靖殿，殿内有惠日、法云二道场，通真、玉真二玄坛，还造有仿照仙山琼阁的“西苑”。他也重用道士，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3]，著名者有王远知、薛颐、马颐、蔡法涛、李法超、胡隐遥等。其中王远知是陶弘景的弟子。大业七年(611年)炀帝在涿郡临朔宫接见了他，亲执弟子之礼。

[3]《隋书》卷35《经籍四》。

第二，重视道观建设。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于都城建造道观36所，度道士2 000人。此外，还建立了玄都观、至真观、清都观、清虚观、三洞观，其中玄都观是隋朝道教学术的中心，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隋炀帝也很重视道观的建设。他迁洛阳之后，于城内外建造道观24所，度道士1 100人。大业九年(613年)，诏改天下佛寺为道场，改道观为玄坛，并置崇玄署，设令、丞等职，专门处理宗教事务。

三、重视佛教

隋文帝在尼姑庵里出生，并由尼姑抚养成人，在尼姑庵生活了



图3
隋文帝杨坚

13年，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图3）。隋代重视佛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度僧造像。隋文帝刚刚即位，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据《法苑珠林》、《历代三宝记》等书统计，隋文帝时度僧23万人，造像106 580躯；隋炀帝时度僧6 200人，修旧像101 000躯，造新像3 850躯。

第二，慷慨施舍。隋文帝与僧昙崇交谊甚笃，并拜其为师，自称师儿，皇后自称师女，并为昙崇所在寺院施绢14 000匹、布5 000匹、绫200匹、锦12张、上等好米100石；皇后亦施钱5 000贯等。

第三，大建佛寺。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诏建大兴城、大兴殿、大兴门、大兴县、大兴园、大兴善寺等。大兴善寺属于国寺，有120名菩萨僧迁住其中，不少人担任僧官，如僧猛任隋大统、昙迁任昭玄大统，昙延任昭玄统。大兴善寺左右了隋朝的佛教政策，是隋代佛教政策的策源地。隋炀帝早在任晋王时，就修建了四道场，其中慧日、法云是两个佛寺。这两个佛寺，集中了智脱、法澄、智矩、吉藏、慧觉、慧乘、法安、法称等名僧。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炀帝立为太子，在京师修建日严寺，更是名僧云集，盛极一时。据统计，隋代38年，建寺3 985所。

第四，众多学问僧及传教僧的产生。所谓“学问僧”，就是以研究佛学擅长的僧人。开皇十二年（592年）建立的“五众”制度为学问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五众”即大论众、讲论众、讲律众、涅槃众、十地众五种，每众各敕任众主一人。众主都是佛学权威。法彦、宝袭曾被任命为大论众主，慧迁为十地众主。所谓“传教僧”就是主要从事佛教传播的僧人。“二十五众”就是由25名高僧组成的传教团体，开皇十二年（592年）第一次敕选“二十五众”。其成员多为大兴善寺的住僧，“二十五众”专门策划佛教的传教工作，其经费由政府提供。“五众”和“二十

五众”实则佛教义学，是集研究、教育、传教为一体的佛教组织，它对佛学理论的深化和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大建舍利塔。仁寿元年（601年）六月十二日敕建舍利塔，全国建塔30座。仁寿二年（602年）四月八日第二次建塔，全国建塔51座。仁寿四年（604年）四月八日，全国30个州同时建塔。舍利塔的建造，完善了隋代的佛教政策，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六，开展留学僧教育。隋炀帝时，留学僧教育由鸿胪寺四方馆负责。大业四年（608年），净业主管蕃僧教育；大业九年（613年），静藏主管东蕃僧教育；大业十年（614年）灵润主管三韩僧教育。日本派遣的遣隋使中，就有僧侣数十人来华留学。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圣德太子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带了数十名僧人来华学习；大业四年（608年）又选派僧旻、惠隐、广齐等跟随小野妹子来华学习。新罗于隋初曾派僧人智明、圆光、昙育、惠文等来华学习，并先后学成回国。

隋代实行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顺应历史潮流，是历史的必然。隋文帝自幼佞佛，无论从客观上或从个人感情上他都不可能轻视佛教，但他又不能排斥儒学和道教。虽然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儒术独尊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但是儒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深深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统治者想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能抛开儒学。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带有鲜明的中国色彩，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统治者想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同样不能抛开道教。隋代有人主张废除佛、道二教，王通坚决不同意，他说：“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以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王通高度评价汉代司马谈关于“九流”的论述：“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也就是说“九流”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弊，不可废其一。王通读过《洪范说义》之后，明确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观点[1]。所谓“三教可一”，不是三教合一，而是三教一一存在下去，不可替代。作为一代名儒，王通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当然希望三教

【1】[隋]王通：《中说·周公》，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合一而为儒，但他冷静地分析了客观形势，认识到儒学本身的局限性，审时度势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反映了儒、道、释鼎足而三的客观要求，是很了不起的。

第三节　隋代的学术与出版概述

国家的统一、政治的改革、经济的繁荣、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促进了隋代学术和出版的发展。

一、隋代的学术

传统的天文、历法和数学，在隋代有了较大进步。开皇二十年（600年），著名学者刘焯制订的《皇极历》，最早提出了“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的公式，并测定岁差为75年差一度，已经接近准确值，当时欧洲还在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据。丹元子把周天各星的步位，编成七言长歌，名为《步天歌》，文字浅近，广为流传，对普及天文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耿询发明的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观察天象相当准确。隋代的其他天文学家刘孝孙、庾季才、庾质、卢太翼、萧吉等，都为天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隋代医学名家辈出，许智藏、许澄、甄权、巢元方等是其代表人物。大业六年（610年）由太医博士巢元方编著的《诸病源候论》五十卷，是中国古代医学历史上第一部详论疾病分类和病因、病理的著作。书中记载的人工流产、肠吻合、血管结扎、拔牙等外科手术，在世界外科手术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甄权擅长针灸，有一位病人患风痹之疾，手不能拉弓，甄权一针而愈。

隋代文学也有较大发展。早在南北朝时，南北文风不同：南方文学讲究词藻和声律；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和实用。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该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表文华艳而被治罪[1]。但到隋代后期，因隋

【1】《隋书》卷66《李谔传》。

炀帝的提倡，南方文学最终还是占据统治地位。文才秀美，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条件之一。杜正藏《文章体式》号称“文轨”，成为人们学习南方文学的标准教材。

隋代在绘画、音乐等艺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隋代著名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孙尚子、尉迟跋质等。展子虔善画人物、车马、楼阁和山水，其《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能于咫尺之中，备千里之趣，被称为山水画的始祖。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是宗教画家，善作佛寺壁画。尉迟跋质本为于阗人，善画西域人物。隋代清商署是专门管理宫廷乐歌的机构。炀帝时，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其中只有清乐是汉族旧曲，其余均来自西域或周边国家，极大地丰富了隋代音乐的内容。隋代的音乐家有牛弘、郑译、万宝常等。

隋代还进行过四次古籍整理工作：第一次是在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听从牛弘的建议，广开献书之路，书积如山，萧该、何妥、刘焯、郑译等一大批专家参与了整理工作；第二次是在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后，秘书丞姚察主持了这次整理工作；第三次是在开皇十七年（597年），秘书丞许善心领导了这次整理工作；第四次是在开皇二十年（600年），著名学者王劭参与了这次整理工作。这些整理活动，对隋代官方藏书的保护和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就整体而言，隋代的学术成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像陆法言《切韵》这样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并不太多，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群龙无首，学术界缺乏能够左右形势的权威性人物。隋代虽然统一了全国的领土，但在短时期内完成学术界的统一却是不容易的。整个学术界缺乏一种向心力，众多学者犹如散兵游勇，各行其是，甚或互不服气，互相拆台。正如《隋书·经籍志·经部后叙》所说：“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雠对，遂有芟角、反

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隋书》中有不少关于学者勾心斗角的记载：（一）元善、何妥之争。元善讲《春秋》，何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1]；（二）何妥、苏威之争。苏威引用先人家训，提出“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的观点，何妥以为苏威“不诚不孝”。开皇十二年（592年）二人主考文学，又发生争执，“更相诃诋”，关系更加紧张[2]。（三）何妥、苏夔之争。苏夔参议钟律，“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议，朝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最后苏威、卢恺、薛道衡等“皆坐得罪”[3]。（四）王颏、元善之争。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颏与相论难，词义锋起，善往往见屈”[4]。（五）诸葛颍、柳䛒之争。诸葛颍学识渊博，而“性褊急，与柳䛒每相忿阋，帝屡责怒之，而犹不止”[5]。（六）虞绰、诸葛颍之争。著作郎诸葛颍“以学业倖于帝，绰每轻侮之，由是有隙”[6]。（七）王胄、诸葛颍之争。王胄自恃才大，“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颍所嫉，屡谮之于帝”[7]。

第二，儒士待遇较低，甚为衣食奔走之不暇。隋代前期虽然实行儒、道、佛并重的文化政策，但在佛教势力风靡海内的情况下，儒学的地位每况愈下，隋代名士李士谦曾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8]他形象地把佛、道、儒的实际地位比做日、月、星三大天体。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隋炀帝“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9]。开皇初，文帝从山东征召的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六儒”，“朝廷不之贵”，或病死，或被诛，或被遣还乡里，最后只剩下马光一人[10]。整个隋代，儒士清贫的例子举不胜举。著名学者刘炫一生穷困潦倒，晚年在一个饥寒交迫的黑夜，默默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详第二章第二节）。著名学者刘焯在民间教书，“不行束脩者，未尝有所教诲”[11]，恐怕也与经济困难有关。经学家王孝籍在秘书省工作多年，“而不免输税”[12]。孙万寿甚至因“衣冠不整”，而流放江南，为什么“衣冠不

【1】《隋书》卷75《元善传》。

【2】《隋书》卷75《何妥传》。

【3】《隋书》卷75《何妥传》。

【4】《隋书》卷76《王頍传》。

【5】《隋书》卷76《诸葛颍传》。

【6】《隋书》卷76《虞绰传》。

【7】《隋书》卷76《王胄传》。

【8】《隋书》卷77《李士谦传》。

【9】《隋书》卷75《儒林传·叙》。

【10】《隋书》卷75《马光传》。

【11】《隋书》卷75《刘焯传》。

【12】《隋书》卷75《王孝籍传》。

整”？当与经济条件有关[1]。音乐家万宝常贫病交加，“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饥馁，无人赡遗，竟饿而死。将死也，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时论哀之”[2]。著名文学家李文博在秘书省校书，“守道居贫”，薛道衡“知其贫，每延于家，给以资费”[3]。

【1】《隋书》卷76《孙万寿传》。

【2】《隋书》卷78《万宝常传》。

【3】《隋书》卷58《李文博传》。

以上多例表明，隋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确实很差。《隋书·儒林传·叙》在分析汉魏硕学“多清通”、隋代巨儒“必鄙俗”的原因时说：

> 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

二、隋代的出版

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虽然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隋代与雕版印刷的发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图书编撰方面，秘书省作为官方的修书机构，加强了组织建设，编撰了不少礼乐、历史、地理、法律方面的著作。书目、类书的编撰成绩斐然，现存我国古代最早的类书《北堂书钞》就是隋代编撰的。唐代编撰的《隋书·经籍志》也是以隋代书目为蓝本编成的。为了推动佛经翻译工作，隋代建立了永久性国立译场，这在佛经翻译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隋人编撰的佛教著作有一千余卷。费长房编《历代三宝记》，在中国目录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代民间图书编撰也很活跃，涌现了刘焯、刘炫、王通、李文博等不少图书编撰家。

在图书出版方面，秘书省既是官方的图书收藏机构，也是官方的图书出版机构。官方重视出版管理工作，优先出版儒家经典和宗教著作。官方拥有大量书手，可考官方规模较大的抄书活动

至少有四次，佛经的抄写尤其繁荣，其抄经总数远远高出儒家经典的抄写数量。官方严禁出版和编撰国史和图谶著作。官方初步建立的书价制度，对民间和唐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用他人著作应当交付稿费，虽然尚未形成制度，但是在社会上早已形成共识。像魏晋南北朝一样，经生仍然是民间抄书的重要力量，他们为图书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流通”一词始见于汉代，班固撰《汉书·董仲舒传》云：“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到了隋代，“流通”一词已广泛应用，如敦煌写经《大般涅槃经》卷十六题记云：“维大隋大业二年（606年），岁次丙寅，比丘释善藏奉为亡妣张夫人，敬造此经，流通供养。”[1] 又如《佛名经》愿文云：“岁次甲寅（即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癸巳朔，敬造《佛名经》一部，流通在世。”[2] 隋代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总结了图书流通历史，提出了“五厄”之说，还提出了“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的图书征集实施办法。这次征集活动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图书流通活动。隋代交通发达，为图书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了购买之外，献书、颁赐、诏藏、借阅等都是隋代图书的流通手段。隋代流行最广的图书有五经、《汉书》、小学、图谶、佛经等。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隋代图书的流通总数为14 466部、89 666卷。

【1】《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因劫经录》2598,商务印书馆,1983年。

【2】黄征等:《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

第二章　隋代图书编撰

隋代图书编撰以官修为主，民间次之。经过北朝魏太武帝、周武帝排佛之后，佛经损失惨重。隋代建国之后，采取种种措施，振兴佛学，佛典的翻译和编撰取得很大成绩。

第一节　隋代的官修书

隋代官方重视修书，内府设有修书机构。隋文帝和隋炀帝在修书方面均有所作为。

一、隋代修书机构

隋代官方修书的机构设在秘书省，也就是说，隋代秘书省除了藏书之外，兼事修书。隋文帝时，秘书省有秘书监、秘书丞各一人，秘书郎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录事二人。下领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有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有令、丞各二人，司历二人，监侯四人，其历、天文、漏刻、视祲，各有博士及生员。秘书监为正三品；秘书丞为正五品；著作郎为从五品；秘书郎、著作佐郎为正七品；太史令为从七品；校书郎为正九品；正字、司历、监侯为从九品[1]。隋炀帝时略有变化：

【1】《隋书》卷28《百官下》。

秘书省降监为从二品，增置少监一人（从四品）。增著作郎阶为正五品，减校书郎为十人。改太史局为监，进令阶为从五品，又减丞为一人。置司辰师八人，增置监候为十人。其后又改监、少监为令、少令。增秘书郎为从五品，加置佐郎四人（从六品），以贰郎之职。降著作郎阶为从五品。又置儒林郎十人（正七品），掌明经待问，唯诏所使。文林郎二十人（从八品），掌撰录文史，检讨旧事。此二郎皆上在藩已来直司学士。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

为了便于比较，将上述内容列表如下[1]：

表1　隋代秘书省职官表

官名		隋文帝		隋炀帝	
		人数	品秩	人数	品秩
秘书省	秘书监	1	正三品	1	从二品
	秘书丞	1	正五品	1	正五品
	秘书少监			1	从四品
	秘书郎	4	正七品	4	从五品
	秘书佐郎			4	从六品
	校书郎	12	正九品	10	正九品
	正字	4	从九品	4	从九品
	录事	2		2	
著作局	著作郎	2	从五品	2	从五品
	著作佐郎	8	正七品	12	从六品
	儒林郎			10	正七品
	文林郎			20	从八品
	校书郎	2	正九品	40	从九品
	正字	2	从九品	2	正九品
	楷书郎			20	从九品

【1】隋炀帝时，“太史局”易名“太史监”；“秘书监”、“秘书少监”分别易名为“秘书令”、“秘书少令”。又隋文帝时，著作郎为“从五品”；而隋炀帝时著作郎仍为“从五品”，《隋书·百官下》却说隋炀帝时“降著作郎阶”。

续表

官名		隋文帝		隋炀帝	
		人数	品秩	人数	品秩
太史局	太史令	2	从七品	2	从五品
	太史丞	2	正九品	1	正九品
	司历	2	从九品	2	从九品
	监侯	4	从九品	10	从九品
	司辰师			8	

二、隋文帝时官修书

隋文帝时，官方组织编撰了四部国家书目和一些历史、礼乐、法律、军事著作。

《开皇四年四部目录》是隋文帝时第一部官修书目。隋文帝重视国家藏书，先后任命著名学者牛弘、姚察、许善心等在秘书省担任领导职务。开国之初，国家秘书省只有15 000卷（不含复本），而且其中多有残缺，阴阳、医方、图谱等书残缺尤多。秘书监牛弘深以为忧，开皇三年（583年）因上表请开献书之路，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搜访遗书，不久秘书省书积如山，不少学者参与了校勘工作。据记载，开皇初，萧该“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1]；刘焯“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2]；郑译、卢贲、苏夔、萧吉等奉诏“并讨论坟籍”[3]。可见萧该、何妥、刘焯、郑译、卢贲、苏夔、萧吉等均参与校勘之役。如上所言，当时秘书省有监、丞各1人，郎中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秘书省兼管的著作局有郎2人、佐郎8人、校书郎2人，二者共计34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参加了校勘活动。经过校勘之后，国家藏书逐渐完备。牛弘等预修的《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就是这次图书整理的丰硕成果。

【1】《隋书》卷75《萧该传》。

【2】《隋书》卷75《刘焯传》。

【3】《隋书》卷78《万宝常传》。

《开皇九年四部目录》是隋文帝时第二部官修书目。南北朝时，陈朝偏据东南一隅，重视典籍收藏。江总《皇太子太学讲

碑》称其“建藏书之策，开献书之路”，“外史所掌，广内所司，靡不饰以铅椠，雕以缃素”[1]。开皇九年（589年），在平陈过程中，隋军完好地保护并接收了陈朝的所有藏书，并编有一个接受陈朝图书的目录。在编目过程中，对这批图书进行了整理，发现不少图书有残缺现象。当时，姚察“诏授秘书丞”[2]，正在秘书省担任领导职务。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姚察博览群书，“尤好研核古今，是正文字”[3]，当为考辨“残缺”作出了重要贡献。《开皇九年四部目录》（《隋书·经籍志》误作《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就是这次图书整理的丰硕成果。

《七林》是隋文帝时第三部官修书目，开皇十七年（597年），许善心（生平详本章第二节）担任秘书丞的职务，据《隋书·许善心传》：“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可惜《七林》今已失传，但据阮孝绪《七录》，《七林》亦当分为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佛法、仙道等七个大类，每类之前有总叙，每书之下有内容提要和分类说明，是一部解题目录。李文博（生平详本章第二节）是一位人品、学问俱佳的学者。陆从典，字由仪，吴郡吴人，博览群书，尤精班固《汉书》，历仕陈、隋二朝，于隋任著作佐郎。从“奏追”二字可知，李文博、陆从典等十余人已早在秘书省从事校勘工作，《七林》正是他们整理图书的结晶。过去，人们把《七林》当作私修目录是不妥的。许善心时任秘书省领导职务，虽然在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私修毕竟是两回事，因为《七林》著录的图书是“秘阁图籍”，而非私藏；预修者有李文博、陆从典等“十许人”，而非许善心一人。

《开皇二十年书目》是隋文帝时第四部官修书目。王劭为这次编目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劭（生平详本章第二节）在秘书省工作“将二十年”，其“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4]。《读书记》当是王劭整理图书的忠实记录。

【1】[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11《全隋文》，中华书局，1958年。

【2】[唐]姚思廉：《陈书》卷27《姚察传》，中华书局，1972年。

【3】《陈书》卷27《姚察传》。

【4】《隋书》卷69《王劭传》。

以上四部官修书目对隋代前期官方藏书的保管和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书目之外，官修书还有历史、礼乐、法令、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正得失。隋文帝把史书的著作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严禁私人修史，王劭因为在家私修《齐书》，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弹劾，“上怒，遣使收其书”[1]，文帝读过之后，还比较满意，才没有深究其罪，反而把王劭留在秘书省继续修史，一干就是20多年，最后撰成《隋书》八十卷。先后协助王劭修史者有刘焯、刘炫、王孝籍、侯白、杜台卿、辛德源等。不过《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2]。中国古代有后朝修前朝正史的优良传统，隋朝也不例外。隋文帝鉴于“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3]，遂令魏澹重新撰写《魏史》，澹书分为12纪、78传，加上史论、义例和目录，共计92卷，文帝读后，非常满意。为了建立和完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隋文帝也很重视礼乐的编撰工作，五礼共修两次：第一次在开皇元年（581年），太常卿牛弘说：

> 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4]

这段话说明三个问题：一是礼书的重要性。修定礼书“可以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二是礼书“事归元首”，必须官修。王俭“私撰仪注，多违古法”；三是礼书长期没有修定，礼俗混乱，必须制定礼书，“革兹俗弊”。隋文帝同意牛弘的建议，诏令牛弘、

【1】《隋书》卷69《王劭传》。

【2】《隋书》卷69《王劭传》。

【3】《隋书》卷58《魏澹传》。

【4】《隋书》卷8《礼仪三》。

辛彦之、刘焯、刘炫、崔赜、明克让等，撰成《仪礼》百卷，该书以东齐《仪注》为主要依据，个别地方也吸收了王俭著作的长处。开皇三年（583年）表上，诏颁天下，遵照执行。第二次在仁寿二年（602年）闰十月。隋文帝令“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1]。开皇初，郑译、牛弘、姚察、何妥、许善心、辛彦之、房晖远、崔赜、明克让、刘臻、虞世基等也曾奉诏正定乐章，郑译撰《乐府声调》六卷，何妥撰《乐要》一卷等。为了加强法制，以法治国，隋文帝也重视法令的编撰和修定工作，开皇元年（581年），诏令高颎、杨素、常明、韩濬、李谔、柳雄亮等“更定新律”，成《隋律》十二卷，奏上之[2]。又因“宪章踳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撰成《隋开皇令》三十卷，预修者有苏威、房晖远等，其中苏威用力尤多[3]。隋文帝本人喜欢军事著作，曾撰《新授兵书》三十卷。开皇初，还令刘祐“撰兵书十卷，名曰《金韬》”，隋文帝十分赞赏[4]。开皇五年（585年），诏令李德林（生平详本章第二节）撰录旧时所作文翰，编为《霸朝杂集》五卷，文帝读过后，对李德林说：“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必令公贵与国始终。”[5]隋文帝严禁图谶，开皇十三年（593年）年二月丁酉下诏云：“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6]但他本人却对图谶喜好有加，一再怂恿臣下编撰有关图书。如王劭就曾“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上，诏颁天下[7]。以上就是隋文帝时官修书的大概情况。

【1】《隋书》卷2《高祖下》。

【2】《隋书》卷25《刑法》。

【3】《隋书》卷41《苏威传》。

【4】《隋书》卷78《刘祐传》。

【5】《隋书》卷42《李德林传》。

【6】《隋书》卷2《高祖下》。

【7】《隋书》卷69《王劭传》。

三、隋炀帝时官修书

隋炀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民怨沸腾（图4）。但他重视图书事业，颇有作为，史称

"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1]。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

隋炀帝重视图书编撰工作。早在藩邸，就开始了编撰活动。称帝之后，编撰活动更加频繁。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2《隋纪六·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


图4
隋炀帝杨广

> 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

由此可知，隋炀帝时的官修书有三个特点：一是时间长，近二十年"未尝暂停"；二是内容丰富，各类图书，应有尽有，甚至包括一些休闲娱乐性图书；三是数量多，多达"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书著录，隋炀帝组织文人编撰的官修书有《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法华玄宗》二十卷、《长洲玉镜》四百卷、《魏书》、《北堂书钞》一百七十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灵异记》十卷、《东征记》、《水饰图经》、《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宝台四法藏目录》一百卷、《隋大业律》十一卷、《隋大业令》三十卷、《淮南王食经并目》一百六十五卷、《相马经》六十卷、《种植法》七十七卷、《桂苑珠丛》一百卷、《四海类聚方》二千六百卷、《四海类聚单要方》三百卷，等等。

《西域图记》、《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等属于地理著作。《西域图记》三卷，裴矩撰。裴矩（生平详本章第二节），在炀帝时掌外交事，"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

[1]《隋书》卷67《裴矩传》。

[2]《隋书》卷33《经籍二》。

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1]，因撰是书奏之，炀帝大悦，赐物五百段。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2]。其中，《区宇图志》为虞世基撰。虞世基，字茂世，会稽余姚人，博学多才，曾任陈、隋二朝官职。炀帝时，由柳䛒推荐，专典机密，参掌朝政。因"世"、"基"二字皆犯唐讳，故《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虞茂撰"。预修者还有窦威、崔祖濬、虞绰、陆敬、袁郎、杜宝等。崔祖濬，即崔赜，博陵安平人。七岁能属文。开皇间，任校书郎等职，后从晋王杨广，晋邸文翰，多出其手。及杨广称帝，任起居舍人等职。据《隋书·崔赜传》，大业五年（609年），崔祖濬"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据此，则许善心亦预修之。又据《旧唐书·姚思廉传》："炀帝又令（思廉）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则姚思廉亦参预其事。姚思廉，字简之，万年人。姚察之子，少时从父习汉史，传其家学，历仕隋、唐二朝。《诸州图经集》为郎茂撰。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著名学者，善属文。炀帝时，任尚书左丞等职，后"撰《州郡图经》（即《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奏之，赐帛三万段，以书付秘府"[3]。

[3]《旧唐书》卷73《姚思廉传》。

《长洲玉镜》、《编珠》和《北堂书钞》等属于综合性类书，《长洲玉镜》是秘书学士虞绰和柳䛒、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和王曹等奉诏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长洲"为内府苑名，炀帝曾有"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的诗句[4]，该书的编撰地点就在长洲苑，该书始编于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二年（606年）六月成书。全书以《华林遍略》为蓝本，但内容多有所增，且无重出之弊。据宋晁载之《续谈助》卷四，炀帝对柳䛒说：

[4]《隋书》卷76《诸葛颍传》。

> 此书源本出自《华林遍略》，然无复可加，事当典要。其卷虽少，其事乃多于《遍略》。柳䛒对炀帝说：

“梁主以隐士刘孝标撰《类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梁主心不伏，即敕华林园学士七百余人，人撰一卷，其事数倍多于《类苑》。今文籍又遍富梁朝，是以取事多于《遍略》。然梁朝学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序剑者尽录为剑事，序溪者亦取为溪事，撰玉者亦编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如《玉镜》则不然。”

隋炀帝同意柳䛒的说法。关于《长洲玉镜》的卷数，《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二百三十八卷”，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三十八卷”，后误。《编珠》四卷，杜公瞻撰。杜公瞻，著名学者杜台卿之子，博陵曲阳人，大业间任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少好学，有家风，卒于安阳令”[1]。他在大业七年（611年）该书自序中说：“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爰令微臣编录。”《编珠》的体例是“隶事为对，下注出处”[2]。隶对朱书，出处墨书，即杜氏自序所谓“其朱书者故实，墨书者正义。”“故实”即隶对，“正义”即出处。故实二、三、四字不等；出处不一而足。《编珠》原本四卷，今存两卷。《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图5）。撰者虞世

【1】《隋书》卷58《杜公赡传》。

【2】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隋代重要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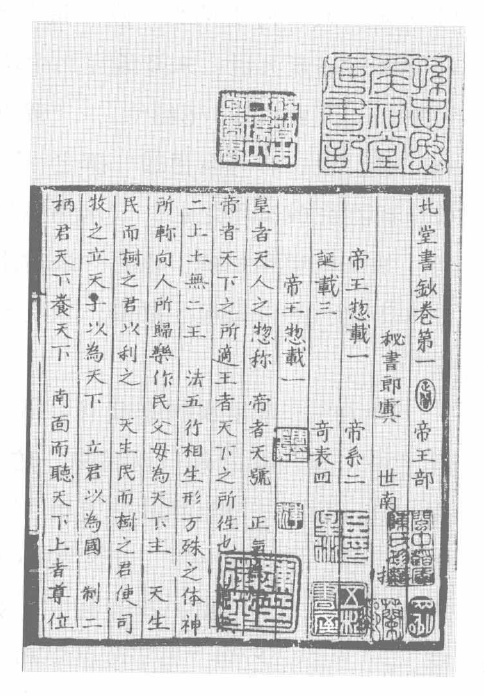

北堂書鈔卷第一 帝王部
秘書郎虞世南撰
帝王揔載一 帝系二
誕載三 奇表四
帝王揔載一
皇者天人之揔称 帝者天號 正氣
帝者天下之所適王者天下之所往也
二上土無二王 法五行相生形万殊之体神
所輈向人所歸樂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天生
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
牧之立天子以為天下 立君以為國 制二
柄君天下養天下 南面而聽天下上者尊位

图5
《北堂书钞》明抄本书影

南生当隋唐之际，此书是其在大业间任秘书郎时所撰，据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记载："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传于世。"书中避隋讳，"坚"作"牢"、"固"、"劳"、"至"、"刚"等，"广"作"阔"、"大"、"博"、"开"等。全书共173卷，分为80部、801类。每类先以大字摘抄群书字句，后以双行小字注明书名和原文。引书除文集外，约八百多种。清严可均说："(北堂书钞）所钞之书，皆三代、汉、魏，迄于宋、齐。其最晚者沈约《宋书》、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后魏书》，其诗、赋、颂则颜、谢、鲍为最晚，陈、隋只字不钞。"[1] 所引各书多已亡佚，弥足珍贵。

【1】[清]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

《江都集礼》，炀帝为晋王时，令潘徽等撰。潘徽，字伯彦，吴郡人，精于《诗》、《礼》，尤精"三史"。先在秦王杨俊府任学士，俊死，复至晋王杨广府任博士。该书"芟芜刈楚，振领题纲，去其繁杂，撮其指要"[2]，是一部关于三礼的集大成性著作。《魏书》是一部断代体史书。大业间，炀帝诏潘徽"与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到大业二年（606年）杨素去世，未及编完而中辍[3]。《灵异记》，许善心、崔祖濬撰。大业九年（613年），"帝尝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敕善心与崔祖濬"撰之[4]。《东征记》是崔祖濬奉诏而作，时在征伐高丽之后。《水饰图经》，大业十二年（616年）三月，学士杜宝奉诏撰，该书"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为之，间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5]。

【2】《隋书》卷76《潘徽传》。

【3】《隋书》卷76《潘徽传》。

【4】《隋书》卷58《许善心传》。

【5】[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三月》，中华书局，1987年。

隋炀帝非常重视国家藏书。早在开皇八年（568年）伐陈时，晋王杨广任行军元帅。既破陈，仿汉萧何破秦例，资财无所取，仅"令（裴）矩与高颎收陈图籍"[6]，为补充隋代国家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杨广称帝后，更加关心国家藏书，扩大了秘书省的人员编制，制定了严格的借阅制度，虞绰因为私以禁内兵书借杨玄感，而"甚衔之"[7]。为了收藏字画，炀帝还专门建立了特藏书库

【6】《隋书》卷67《裴矩传》。

【7】《隋书》卷76《虞绰传》。

"妙楷台"和"宝迹台"[1]。当然，为了皇帝本人读书的方便，还专门建立了设有地下机关的高级阅览室，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一卷，秘书监柳䛒为该目的编撰作出了重要贡献。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叙》。

限于篇幅，隋炀帝时其他官修书不再一一介绍。

第二节　隋代私人图书编撰

隋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私人图书编撰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兹据《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等书，举例如表2：

表2　隋代私人图书编撰家略表

姓　名	生卒年	字	籍　贯	著作举例
李德林	531—590	公辅	博陵安平	《霸朝杂集》等
郑　译	540—591	正义	荥阳开封	《乐府声调》等
刘　臻	527—598	宣挚	相	文集等
庾季才	516—603	权奕	新野	《灵台秘苑》、《垂象志》等
辛彦之			陇西狄道	《坟典》、《六官》、《五经异义》等
萧　该			兰陵	《汉书音义》、《文选音义》等
宇文恺	555—612	安乐	朔方夏州	《东都图记》、《明堂图议》等
刘　炫	约564—613	光伯	河间景城	《论语述义》、《五经正名》等
刘　焯	544—610	士元	信都昌亭	《稽极》、《五经述议》等
牛　弘	545—610	里仁	安定鹑觚	《隋朝仪礼》、《周史》等
杜台卿		少山	博陵曲阳	《齐纪》、《玉烛宝典》等
魏　澹		彦深	下曲阳	《魏史》、《词林集》等
王　劭		君懋	太原晋阳	《隋书》、《读书记》等
何　妥		栖凤	西域	《周易讲疏》、《封禅书》等
许善心	558—618	务本	北新城	《梁史》等
潘　徽		伯彦	吴郡	《江都集礼》、《韵纂》等
李文博			博陵	《治道集》等
崔　赜	548—616	祖璿	博陵安平	《洽闻志》、《八代四科志》等
张　冲		叔玄	吴郡	《春秋略》、《孝经义》等

续表

姓　名	生卒年	字	籍　贯	著作举例
诸葛颍		汉	丹阳建康	《幸江都道里记》、《洛阳古今记》等
虞　绰		士裕	会稽余姚	《类集》等
萧　吉		文休		《金海》、《宅经》、《葬经》等
临孝恭			京兆	《百怪书》、《禄命书》等
刘　祐			荥阳	《金韬》、《阴策》等
裴　矩	？—627	弘大	河东闻喜	《西域图记》、《开业平陈记》等
褚　辉		高明	吴郡	《礼疏》等
顾　彪		仲文	余杭	《尚书疏》、《今文尚书音》等
鲁世达			余杭	《毛诗章句义疏》等
杜正藏		为善	邺	《文章体式》等
刘善经			河间	《酬德传》、《诸刘谱》等
王　通	584—617	仲淹	绛州龙门	《文中子》等
陆法言		词	临漳	《切韵》等
张胄玄			渤海蓨	《玄历术》等
辛德源		孝基	陇西狄道	《集注春秋三传》、《政训》等
柳　䛒		顾言	襄阳	《晋王北伐记》等
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等
万宝常	约556—595			《乐谱》等

下面重点介绍刘臻、李德林、刘焯、宇文恺、刘炫、王通、许善心、魏澹、李文博、陆法言、辛德源、王劭、虞绰、裴矩等人的图书编撰情况。

刘臻，字宣挚，相人，著名史学家，历任梁、周、隋诸朝。精于《汉书》和《后汉书》，时称“汉圣”，有集十卷行于世。据《隋书·刘臻传》：

> 臻无吏干，又性恍惚，耽悦经史，终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有刘讷者，亦任仪同，俱为太子学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寻讷，谓

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臻还家，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门，臻尚未悟，谓至讷家。乃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此汝亦来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顾盼，久之乃悟。叱从者曰："汝大无意，吾欲造刘讷耳。"

可见骑在马上还在思考问题，连回到家里都不知道。好学深思，正是他成为"汉圣"的原因所在。张之洞《辅轩语》云：

史学亦以专精一种：览虽宜博，欲求精熟则亦贵专攻。但能精熟一二种足矣。隋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汉圣"；唐范祖禹熟唐事，著《唐鉴》，人称"唐鉴公"；国朝马骕熟三代事，撰《绎史》，人称"马三代"。此古人为史学之法也。

李德林（531—590)，字公辅，博陵安平人。自幼好学，15岁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遂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德林少孤，无字，著名史学家魏收赏识其才能，对他说："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此字卿。"李德林历任北齐、周、隋三朝，助杨坚篡周，官内史令。开皇九年（589年）贬湖州刺史，死于任所。李德林"少有才名，重以贵显，凡制文章，动行于世"[1]。有《霸朝杂集》、《齐史》（未成)、文集八十卷等。

【1】《隋书》卷42《李德林传》。

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少时与刘炫在藏书家刘智海家闭户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2]。又师从名师，学《毛诗》于刘轨思，学《左传》于郭懋当，学《礼》于熊安生。长期在秘书省、国子监任职，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晚年受谤，免职还乡，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

【2】《隋书》卷75《刘焯传》。

宇文恺（555—612)，朔方夏州人，著名建筑家。隋文帝建

新都，担任副监；隋炀帝迁都洛阳，担任东都副监、将作大臣、工部尚书等职，为宫廷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所制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技巧灵活，豪华奢侈。有《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等。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这里举行。为了恢复古代明堂建制，宇文恺博览群书，研究了各种版本，他说：

> 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1]

【1】《隋书》卷68《宇文恺传》。

刘炫（约564—613），字光伯，河间景城人。隋代著名学者，与刘焯并称“二刘”。一生四经磨难：一是历职内史、门下、秘书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后因毛遂自荐，才弄了个“殿内将军”的官职；二是牛弘奏请悬赏购书时，因家境贫困，遂伪造书百余卷，取赏而去，有人告发。“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三是诏令屈事蜀王杨秀，迟迟不去，“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每天手执兵器去当门卫；四是蜀王被废后，曾有转机，与诸儒修定五礼、律令等，后因级别太低，终因“品卑去任”，又回到老家。大业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其生徒每多参加农民起义。地方官知道他和不少义军将领是师徒关系，“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是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2]，终年68岁。刘炫少时曾与好友刘焯闭户读书十年，“博览典诰，窥涉古今”。卑贱者最聪明，尽管刘炫一生历经坎坷，但他以古籍整理为己任，作出了突出贡献。其著作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春秋规过》三卷、《论语章

【2】《隋书》卷75《刘炫传》。

句》二十卷等。直到死前，他还念念不忘古籍整理，以“业无传人”而遗恨，他说：

> 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1]

【1】《隋书》卷75《刘炫传》。

刘炫是一位值得同情、值得歌颂的人物，他的遭遇是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生活的缩影。

王通（584—617），字仲淹，绛州龙门人。曾上隋文帝《太平策》，为朝臣疑异，返归乡里。其后屡召不应，聚徒河汾间，以教授为务。其徒多至千人，时称“河汾门下”。他根据全国统一的形势，提出儒、佛、道“三教可一”的主张（详第一章第二节），其著作大都散佚，今存《文中子》十卷。

许善心（558—618），字务本，北新城人，隋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富藏书，博涉经史。15岁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深为著名学者徐陵所器重，号称“神童”。历仕陈、隋二朝。大业十四年（618年）叛将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屈于压力，文武百官尽皆朝贺，唯独善心不至，其侄急劝其往，泣言利害，善心坚拒之。叛匪将善心捆绑至堂，宇文化及惜其才，立令松绑放人，善心了无谢意，扭头就走。宇文化及望其背影，大怒，以为无情无义，重命将其捉回，骂道：“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其党一拥而上，将善心活活打死，终年61岁。其母范氏时年九十有二，抚柩自慰，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遂绝食十余日而死。许善心著有《梁史》、《灵异记》、《方物志》、《七林》等。《梁史》的撰写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其父许亨在梁代草创阶段。这个阶段，“《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可惜书稿在梁末动乱

中亡佚。第二阶段为其父许亨在陈代重撰阶段。这个阶段，其父“诏为史官，补阙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第三阶段为许善心在陈末续撰阶段，许善心“愿油素采访，门庭记录，俯励弱才，仰成先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致此书延时，未即成续”。至陈末兵火，先父所撰百卷旧稿又多所焚毁，“止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第四阶段为许善心续成阶段。入隋以后，许善心“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1]。

【1】《隋书》卷58《许善心传》。

魏澹，字彦深，钜鹿下曲阳人。十五而孤，专精好学，博涉经史。文帝时，历仕散骑常侍、著作郎等职，有《笑苑》、《词林集》、《魏史》等著作。其中《魏史》与魏收《魏书》多有不同，纠正了纪传体史书“人无善恶，皆为立论”的弊病，“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2]。

【2】《隋书》卷58《魏澹传》。

李文博，博陵人，好学不倦，经史、诸子无不博洽，尤明历代治乱得失，他在秘书内省工作期间，“典校坟籍，守道居贫，晏如也。虽衣食乏绝，而清操逾厉，不妄通宾客，恒以礼法自处，侪辈莫不敬惮焉”。当时显官虞世基子年方十八，也在秘书省工作，每日盛装华服，无所用心，文博批评他说：“昔贾谊当此之年，议论何事？君今徒事仪容，故何为者？”其贞介鲠直如此。有《治道集》十卷，大行于世[3]。

【3】《隋书》卷58《李文博传》。

陆法言，名词，字法言，以字行，魏郡临漳人。他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陆爽藏书甚丰，开皇间任太子洗马。陆法言敏学有家风，是隋代著名音韵学家。文帝初，陆法言与刘臻、颜之推、卢思道、魏彦渊、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讨论音韵，由陆法言作了笔录。接着陆法言用了十多年时间博览群书，校订了讨论稿，仁寿元年（601年）编成《切韵》五卷。该书是唐宋韵书的始祖，是古代音韵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辛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人。沈静好学，博览群书。隋文帝时由秘书监牛弘推荐，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他刻意著书立说，利用业余时间撰《集注春秋三传》三十卷、注扬子《法言》

二十三卷、《政训》二十卷、《内训》二十卷。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历经北齐、周、隋三朝，隋任著作郎、秘书监等职，有《皇隋灵感志》三十卷、《齐志》二十卷、《平贼记》三卷、《隋书》八十卷、《俗语难字》一卷、《朱氏家传》二卷、《读书记》三十卷、《舍利感应记》三卷等。其中，《皇隋灵感志》投隋文帝之所好，多集民间歌谣，征引图谶、符命和佛经编成。《隋书》、《齐志》、《平贼记》等史书，或记事怪诞不经，或辞义繁杂，或文词鄙野，不为世人所重。王劭笃好经史，脑不离思，甚至达到“忘餐”的地步，“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噉。劭弗之觉，唯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闭目，伺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其专固如此”[1]。

【1】《隋书》卷69《王劭传》。

虞绰，字士裕，会稽余姚人。博学有才，尤工草隶，历仕陈、隋二朝。大业初，任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虞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玄门宝海》、《金海》、《淮南王食经》、《四海类聚单要方》、《桂苑珠丛》、《帝王养生要方》等十余部。因与炀帝倖臣诸葛颍关系紧张而失宠。加上与杨玄感关系密切，私自把禁内兵书借给杨玄感，与炀帝关系更加疏远。后杨玄感反隋兵败，籍没其家。虞绰逃亡，潜渡江，变姓名，自称吴卓，隐居信安令辛大德处。一年之后，终被人所识破，坐斩江都，时年54岁。

裴矩（？—627），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历仕周、隋、唐等朝，撰《西域图记》三卷、《隋开业平陈记》十二卷、《高丽风俗》一卷、《邺都故事》十卷等。史书对其评论说：

> 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2]

【2】《隋书》卷67《裴矩传》。

第三节　隋代佛经的翻译与编撰

北朝魏太武帝、周武帝排佛之后，“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弟子，减之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1]，佛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对佛教怀有深厚感情的隋文帝上台之后，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采取了不少措施，弘扬佛教。让我们从佛经的翻译、佛教著作的编撰和佛经目录的编撰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1】[唐]道宣:《续高僧传·静蔼传》,清光绪间刊本。

一、佛经的翻译

隋代重视佛经翻译工作，据《开元释教录》卷七统计，隋代译经64部、301卷。

著名翻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毗尼多流支、达摩阇那、彦琮等。那连提耶舍（490—589），原在北齐译经，隋朝建立后，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寺专事译经。从开皇二年（582年）到开皇五年（585年），共译《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阇那崛多（527—604），原在北周译经，开皇四年（584年），文帝遣使请他入住大兴善寺专事译经。从开皇五年（585年）到仁寿末年，共译《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等，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等，二者共计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达摩笈多（？—619），开皇十年（590年）云游至瓜洲，后受聘至长安，先后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从事译经活动。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译《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九部、四十六卷。另外，毗尼多流支译有《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等；达磨阇那译有《业报差别经》等。彦琮（557—610）初名道江，历齐、周诸朝。精通梵文，开皇十二年（592年）奉召入住长安大兴善寺，后至洛阳上林园，

协助达摩阇那、达摩笈多从事译经工作。他认真总结译经的得失，提出“八备”之说：一是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是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三是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四是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五是禁袍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六是沉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衒；七是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八是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1]。以上八条从思想素质到文化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全唐文》卷903，《辨正论》，中华书局，1983年。

总而言之，隋代虽然时间不长，译经不多，但同早期佛经翻译比较，有三大变化：（一）译者的变化。早期佛经翻译的译者往往只懂梵文或汉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能深解其义，融会贯通。到了隋代，译者往往兼通梵文和汉文，译文更加接近原著，语言更加精练。（二）底本的变化。早期佛经翻译往往以胡本（于阗本、龟兹本、月支本等）为据，梵本较少。到了隋代，随着东西交流的频繁，大量梵本传入中土。因而隋代佛经翻译多据梵本，而且不一而足。语有疑似之处，住往参酌众本，择善而从。译文更加准确。例如行矩因南朝宋慧简译《药师本愿经》文辞杂糅，故用开皇十七年（597年）初得本和大业二年（606年）复得两本，进行校勘，斟酌去取，最后译成定本。（三）译场的变化。隋代以前已经出现封建帝王主持的译场，例如姚秦的逍遥园，北凉的闲豫宫，梁代的寿光殿、华林园、占云馆和宝云殿，北魏的内殿译场等，都是临时性的。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洛阳上林园译场则是一个永久性译场。著名佛经翻译家达摩笈多、彦琮、法行、明则、费长房等都在这里从事过译经活动。虽然上林园时间不长，随着隋代灭亡而终止活动，仅仅译经七部，但是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永久性国立译场的建立，这还是第一次。唐、宋诸朝相沿不改，对于推动佛经的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佛教著作的编撰

隋代佛教著作的编撰非常繁荣。开皇六年（586年）法经撰《众经目录》著录5 310卷，而大业间智果撰《众经目录》著录6 189卷，比前者多出1 127卷，这个数字当为隋代佛教著作的总数。

隋代佛教著作种类繁多。概言之，有注疏、论著、汇编等。注疏即固有佛经的注解，又有科文、文句、义疏、述记、玄义、集注之别。科文即专分一经之章节者；文句即随文解释字句者，如智𫖮撰《法华经文句》；义疏即随文解释义理者，如智𫖮撰《观音义疏》；述记即师授弟记者；玄义即总论一经大义者，如智𫖮撰《法华经玄义》；集注即汇集前人注疏者。论著即脱离固有佛经，阐发个人思想者，其中有通论、专论之别。通论即全面论述个人思想者；专论即专门论述某一内容者。专论的内容很复杂，或专论佛性，如法上撰《佛性论》二卷；或专论因果，如徐同卿撰《通命论》二卷；或专论翻译，如彦琮撰《辨正论》、灵裕撰《僧尼制》等；或专论仪式，如彦琮撰《唱导法》等。还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论著，如行矩撰《彦琮行记》、智猛撰《慧远法师行状》、曹毗撰《真谛别传》，法论撰《名僧传》、灵裕撰《光师弟子十德记》等属于僧人传记；侯白撰《旌异记》、彦琮撰《善财童子诸知识录》、王劭撰《仁寿舍利瑞记》和《灵异记》、灵裕撰《寺破报应记》、净辨撰《感应传》等属于感应传。彦琮撰《大隋西国传》属于地理著作，据《续高僧传》：

> （彦琮沙门）游履具历名邦，见闻陈述事逾前传，因著《大隋西国记》一部凡十篇，本传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盛列山河国邑人物。

汇编即汇集同类内容于一书，俾便研究或翻检。如《大集

经》六十卷、彦琮撰《内典文会集》和《众经法式》、智果撰《香城甘露》五百卷、僧琨撰《论场》三十一卷等均属此类作品。

隋代著名佛教著作编撰者有智觊、信行、吉藏等。智觊(538—597)，号德安，中国天台宗的的开山祖师。本姓陈，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十八岁出家，从慧思受业。陈太建七年（575年）入天台。建草庵，讲经九年，因称“天台大师”。又因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曾赐号“智者”，又称为“智者大师”。开皇十五年（595年）圆寂，终年六十岁。他融合当时南北佛教的特点，强调“止”“观”并重，提出“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观点，有《法华经玄义》二十卷、《法华经文句》二十卷、《观音玄义》二卷、《观音义疏》二卷、《金光明经玄义》二卷、《金光明经文句》六卷、《维摩经玄疏》六卷、《维摩经疏》二十八卷（后三卷灌顶续补）、《四教义》十二卷、《三观义》二卷等数十种。信行（540—594)，俗姓王，魏郡（今河南安阳）人，三阶教的创始人。十七岁出家于相州法藏寺。受戒后，博涉经论，重视行持。开皇十四年（594年）圆寂于京师真寂寺，终年55岁。其著作有《三阶佛法》四卷、《对根起行法》一卷、《大乘无尽藏法》、《七阶佛名经》等。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国人，生于金陵。陈末动乱时，避居会稽嘉祥寺，一意讲经著书，僧徒如云。后入住晋王杨广慧日道场，备受宠敬。开皇十九年（599年)，赴京师长安日严寺讲法，声名远播，人称“嘉祥大师”。隋亡后，唐高祖李渊召见天下名僧，吉藏名列十位大德之一。武德六年（623年）卒，终年75岁。一生勤于笔耕，计有著作四十多种，今传《中论疏》、《百论疏义》、《十二门论疏》、《三论玄义》、《金光明经疏》、《无量寿经疏》、《观无量寿经义疏》、《金刚经义疏》、《法华经义疏》、《百论疏》等26种，他是“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

三、佛经目录的编撰

隋代编写的佛经目录有法经等撰《众经目录》七卷、费长房

撰《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彦琮撰《众经目录》五卷、智果撰《众经目录》、《宝台四法藏目录》一百卷等。

《众经目录》七卷撰于开皇十四年（594年）。大兴善寺沙门法经等二十大德预修其目。据沙门法经《上文帝书进呈众经目录》云："去年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须撰《众经目录》，经等谨即修撰，总计众经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别录六卷、总录一卷，缮写始竟，谨用进呈。"[1]此之2 257部、5 310卷，当不含复本，是当时的佛经总数。

[1]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23，中华书局，1988年。

《历代三宝记》撰于开皇十七年（597年），著者费长房，四川成都人，初曾出家为僧，后周武帝废佛而还俗。隋代兴佛，仍服白衣，受诏入大兴善寺译场，任翻经学士，开皇间，笔受之经有《大方等日藏经》、《力庄严三昧经》、《佛本行集经》、《善思童子经》、《移识经》、《观察诸法行经》等七部七十八卷。开皇十七年（59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奏《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其总目序云：

> 后汉之始，方届脂那，帝世交参，十有六代。翻彼域语，作此方言，相承迄今五百余祀，《古》、《旧》二录，条目残亡。土行、道安，创维其缺。尔来间有，祖述不同，各纪一方，互存所见，三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靡所遵承，兼值毁焚，绝无依据。赖我皇帝维地柱天，澄静二仪，廓清六合，庭来万国，化摄九州。异出遗文，莫不皆萃。臣幸有遇，属此休时，忝预译经，禀受佛语。执笔暇隙，寝食敢忘。十余年来，询访旧老，搜讨方获。虽粗缉缀，犹虑未周，广博寻求，敬俟来俊。

此序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佛经的历史。自东汉佛教传入东土以来，就开始了佛经翻译工作。500多年来，佛经目录"条目残亡"。齐、周、陈诸朝虽然也翻译了一些佛经，但是"弗刊录目，

靡所遵承。兼值毁焚，绝无依据”。二是佛经的现状。隋朝建立以后，佛教兴盛，“异出遗文，莫不皆萃”。三是编目过程。时间长达“十余年”，十余年如一日“寝食敢忘”、“询访旧老”、“广博寻求”。可见费长房为编此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历代三宝记》分为帝年、代录、入藏目三部分。第一至三卷为“帝年”，是佛教史迹和出经年表。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佛经年表。《隋书·经籍志》著录《历代三宝记》三卷，当指“帝年”部分。第四至十二卷为“代录”，为各代译经记录。每代首载序言，说明当代政治情况及其与佛教的关系。重点说明译者和述者，考其译时、译场、部帙、卷数、笔受、同经异名、次第、诸家著录等，还有译者小传。译者以生年为序，译经以卷数多寡为序，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译者传记独立于目录之外，此则融目录、传记为一体，既见译者生平和宗派，又见译经源流和得失，堪称佛经翻译史之滥觞。唐代《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均仿其例。第十三至十四卷为“入藏目”，是隋朝现存佛经的收藏分类目录。第十三卷为大乘，分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有译、无译二项。第十四卷为小乘。《历代三宝记》取材既广，讹误在所难免。例如“帝年”中，周代无悼王、哀王、思王等；“代录”中，失译经多有遗漏；“入藏目”中收有疑伪之经等。当然，就整体而言，瑕不掩玉，该目不愧是佛教目录的划时代著作，姚名达曾经指出：

> 其特色在兼有考年、分代、入藏三体，既能包罗古今存佚，纤悉无遗；对于翻译时代，尤为详尽；又能简择重要经论，择集入藏。僧祐而后，始见此人。[1]

[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上海书店，1984年。

另一《众经目录》为大业中智果奉敕撰。智果，会稽人，博学工书。炀帝在藩，甚悦之，出则同乘，食则同案。咏唱谈论，无不欢洽。大业间，隋炀帝令其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分为十一大部：“经”分大乘、小乘、杂经、疑经四部；

“律”和“论”各分为大、小、中三部；“记”部著录当时行事之作[1]。

《宝台四法藏目录》一百卷亦编于炀帝大业中。据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

> 平陈之日，道俗无高。而东南愚民，余熸相煽，爰受庙略，重清海滨，役不劳师。以时宁复，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2]

说明该目所录佛经都是在平陈过程中，“随方收聚”而来。宝台四藏，共计十万卷，则每藏25 000卷，《宝台四法藏目录》当是25 000卷佛经的总目录。

第四节　隋代图书编撰的特点

隋代著作知多少？让我们作一个粗略的估计。《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中著录了不少隋代著作，但并不完全。《旧唐志·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多补其阙。例如《旧唐志》著录的刘焯撰《尚书义疏》二十卷和顾彪撰《古文尚书音义》五卷，《隋志》经部书类不见著录；《旧唐志》著录的苏夔《乐志》十卷和《新唐志》著录的郑译撰《乐府歌辞》八卷，《隋志》经部乐类也不见著录，因此，要了解隋代著作全貌，必须参照三目综合研究，兹将三目著录的隋代著作列表如下：

[1]《隋书》卷35《经籍四》。

[2]《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7。

表 3　隋代著作统计表

类别		隋志	旧唐志	新唐志
经部	易	1	1	1
	书	5	4	5
	诗	5	2	2
	礼	1	3	2
	乐	4	3	4
	春秋	2	3	1
	孝经	1	1	1
	论语	4	1	1
	谶纬		1	
	经解			1
	小学	3	4	5
	总计	26	23	23
史部	正史	4	6	7
	编年	1	1	1
	杂史	2		
	旧事	2		
	杂史		1(故事)	1
	起居注			1
	杂传	2	1	3
	目录		3	2
	谱录	4	1(谱牒)	
	地理	12	5	3
	刑法	4	3	3
	仪注	1	2	
	总计	32	24	21
子部	儒家		3	3
	杂家	6(含类书)	4	2
	类书		3(类事)	3
	小说	1	2	2
	兵书	3	3	3
	天文	1	1	1
	历数	3	5(历算)	6(历算)
	五行	6	2	2
	医方	4	3(医术)	5(医术)
	农家		2	2
	杂艺		2	2
	释家			1
	总计	24	30	32
集部	别集	11	16	11
	总集	2	3	1
	总计	13	19	12

《隋志》著录隋代著作95种，《旧唐志》著录隋代著作96种，《新唐志》著录隋代著作88种。去其重复，共得隋代著作140余种。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与实际情况相比，多有遗漏。但是这是目前我们所能得知的唯一数据，也是我们研究隋代图书编撰特点的唯一数据。根据以上数据，可知隋代图书编撰有如下特点：

第一，数量不多，传世精品更少。原因何在？一是隋代时间短暂；二是因为知识分子地位不高，生活贫穷；三是因为没有造就学术权威（详第一章第三节）。

第二，官修书较多。《江都集礼》、《长洲玉镜》、《北堂书钞》、《区宇图志》、《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玄门宝海》、《淮南王食经并目》、《桂苑珠丛》、《四海类聚方》、《四海类聚单要方》等百卷以上大书均由官方修成。为什么官修书如此之多呢？这与皇帝重视有关。隋文帝早期重视文化教育，注意网罗各种人才。隋炀帝本人有

较高的文化素养，史书称其“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1]。炀帝尤喜写诗，与著名文人牛弘、柳䛒、王胄、庾自直等往还甚密，多所唱和。牛弘在炀帝时任光禄大夫等职。早在东宫时，炀帝“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称帝后，赐诗尤多[2]。柳䛒，字顾言，河东人，好读书，善属文。炀帝为晋王时，“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䛒为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䛒已后，文体遂变”[3]。王胄，字承基，琅邪临沂人。大业初，任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炀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4]。庾自直，颍川人。大业初，任著作佐郎，“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5]。在众多文人的影响下，炀帝的诗文水平提高颇多。其可考著作有《炀帝集》五十五卷、《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二仪簿经》一卷等。炀帝曾经非常自负地对侍臣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6] 此言虽有自夸之嫌，但也确也反映了炀帝博学多才的客观存在。隋炀帝重视各类人才，“网罗百氏，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赜无隐而不探，事有难而必综”[7]。开皇二十年（600年），炀帝在藩邸时，已开始招贤纳士，“征天下历算之士，咸集于东宫”[8]，还“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9]。其中征用虞世南的故事尤其感人。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著名学者、书法家。曾师从南北朝著名学者顾野王，十余年如一日“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炀帝在藩邸时，久闻其名，“与秦王俊辟书交至，以母老固辞，晋王令使者追之”[10]，再次演绎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动人故事，其思贤若渴、握发吐哺之状，于此可见。隋炀帝即位后，又“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11]。所用儒士除了上文已论及的潘徽、柳䛒、虞世南、庾自直、王曹、陆从典、褚亮、欧阳询、杨素、虞世基、窦威、崔祖璿、虞绰、陆敬、袁郎、杜宝、许善心、姚思廉，郎茂、诸葛颍、王胄、牛弘等之外，还有包

【1】《隋书》卷3《炀帝纪》。
【2】《隋书》卷49《牛弘传》。
【3】《隋书》卷58《柳䛒传》。
【4】《隋书》卷76《王胄传》。
【5】《隋书》卷76《庾自直传》。
【6】《资治通鉴》卷182《隋纪六》。
【7】《隋书》卷76《潘徽传》。
【8】《隋书》卷18《律历下》。
【9】《隋书》卷58《柳䛒传》。
【10】《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
【11】《隋书》卷75《褚辉传》。

恺、刘焯、刘炫、褚辉、顾彪、鲁世达、杜正玄、杜正藏、萧吉等。众多贤才协助隋炀帝为图书编撰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内容全面。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书目、地理、类书和历书尤其令人瞩目。隋文帝从开皇四年（584年）到开皇二十年（600年）的17年中，就四次编撰国家藏书目录，这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是不多见的。隋炀帝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编修志书，是我国古代国家明令修志的最早记载，可知当时各个州郡均有志书，虞世基等《区宇图志》、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等就是各地志书的汇编。《隋书·史部·地理类》著录图书12种，数量之多，居各类之冠。至于隋代类书之多，前已论述，此不赘。隋代官方也很重视历书的编撰工作。开国之初，诏令张宾、刘晖、董琳、刘祐、马显等十数人“议造新历，令太常卿卢贲监之”，开皇四年（584年）二月，历成奏上，颁行天下，是谓《张宾历》。宾历既行，刘孝孙、刘焯、张胄玄等并称其失，文帝亲自召见张胄玄，“令参定新术”。刘焯见胄玄倍受恩宠，很不服气，则增损刘孝孙历，更名《七曜新术》奏上，未行。开皇十七年（597年），张胄玄编成新历奏上。文帝诏杨素等“校其短长”，两种意见针锋相对，难分高下，最后张胄玄得到文帝的支持，诏“付有司施行”，是谓《胄玄历》。开皇二十年（600年），文帝“以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详著日长之候。太子征天下历算之士，咸集于东宫。刘焯以太子新立，复增修其书，名曰《皇极历》”，并列举六条理由，驳《胄玄历》之失，且著《稽极》，考证历书同异。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即位，著作郎王劭、诸葛颍力荐刘焯，诏“下其书与胄玄参校”，胄玄力诋刘焯之非，孰是孰非，难以裁决，最后不了了之。大业四年（608年）因《胄玄历》，所载日食无验，炀帝亲自接见刘焯，“欲行其历”，张胄玄等又提出反对意见，加上刘焯病死，《皇极历》终未颁行[1]。以上情况表明，隋代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历书编撰工作，从编撰人选、论证工作到颁行，都亲自过问。可以看出，隋代历书编撰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明争暗斗的过程。

【1】《隋书》卷17《律历中》。

第三章 隋代图书的出版和流通

隋代出版在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直接关系到印刷术的发明。隋代的出版管理也很严格，谶纬图书遭到毁灭性打击。牛弘的广开献书之路表对于隋代的图书流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隋代图书的出版

隋代图书出版的方式均由人工抄写。我们拟从隋代官方抄书、隋代民间抄书、隋代佛经抄写等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隋代官方出版

秘书省不仅是隋代的修书机构，也是隋代的官方出版机构。隋代大规模的抄书活动约有五次：

第一次是开皇三年（583年）。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根据牛弘的建议，派员到各地搜访图书，“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所谓“校写”，就是先校勘，后抄写。根据“一二年间，篇籍稍备”的记载来看，这次抄写的图书数量是很多的[1]。

第二次是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后。据《隋书·经籍志一·总叙》：

【1】《隋书》卷49《牛弘传》。

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颓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

这就是说，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后，秘书省依据“古本”陈书为底本，“补续残缺”，由书法家韦霈、杜颓等又抄写了正副二本，抄书总数共计“三万余卷”。

第三次是在开皇十七年（597年），许善心编写《七林》时。许善心“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1]。按照一般程序“正定经史错谬”之后，都要重抄一遍。这次抄书数量有多少？据《隋书·许善心传》，当时“秘阁图籍尚多淆乱”，说明错乱之书不是少数，而是很多。“十许人”参加整理，也说明数量之多。

【1】《隋书》卷58《许善心传》。

第四次是在开皇二十年（600年）。王劭等在编写《开皇二十年书目》时，按照“校写”图书的习惯做法，当也抄写了不少图书。

第五次是在隋炀帝即位之后，这次抄书活动规模之大，远非前四次所可比。据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六·隋炀帝大业十一年》：

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剪华净，宝轴锦褾。

可知这次抄书活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抄写正御本37 000卷；第二步是抄写五十副本。一套副本的卷数是37 000卷，五十套副本的卷数则是185万卷。抄本的装订也很讲究，正本“装剪华净，

宝轴锦褾”；副本按内容分为三类：“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1]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叙》。

除了以上带有突击性质的抄写活动外，抄书也是官方日常工作之一，各种官修书的定本需要人工抄写，官方颁发的律令、历书等更需要抄写大量复本。隋朝官方书手极多。开皇八年（588年）三月戊寅为了攻打陈国展开政治攻势，作为舆论准备，隋朝“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2]。这个诏书共计780字。“三十万纸”犹今之30万份传单。兵贵神速，此诏书是对陈国的宣战书，犹如最后通牒，绝不允许旷日持久地抄下去。假定每位书手每天抄写2份（按：清编《四库全书》时，规定每人每天抄写1 000字），则30万份，4 900个书手共需抄写31天。如果时间紧迫，限令半月抄完，则30万份，共需书手9 800人，可见隋代官方抄书人员极多，工作量极大。

【2】《资治通鉴》卷176《陈纪十·长城公祯明二年》。

综上所述可知，隋代官方出版有如下特点：第一，图书出版与古籍整理相结合。每一次古籍整理之后，都要进行抄书活动。所抄之书的内容准确无误。第二，官方出版时间长、投资多、内容广、规模大，在国家图书出版中占主导地位。第三，讲究形式美。力戒“纸墨不精”、书法“拙恶”，专请“天下工书之士”抄写。图书装潢使用“宝轴锦褾”。

二、隋代民间出版

隋代民间抄书数量之多，无法估计。让我们以学校教育为例加以说明。

隋代建国之初，隋文帝重视学校教育，隋代中央官办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和算学五种，统归国子寺（后易名国子监）管理，据《隋书·百官下》，各校的教师、学生人数如表4：

表4　隋代学校师生人数表

学校名称	教师人数		学生人数
	博　士	助　教	
国子学	5	5	140
太　学	5	5	360
四门学	5	5	360
书　学	2	2	40
算　学	2	2	80
总　计	19	19	980

由此可知，隋代中央官学有教师38人、学生980人。据《隋书·地理志》，开皇五年（585年），隋代于全国置190郡、1 255县。若郡、县地方官学平均每校以50人计，则全国共有学生近6万人。这6万套教材当由人工抄写而成。除了官学之外，隋代还有不少私学，例如何妥任龙州刺史时，“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1]；刘焯也当过民间教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2]。刘炫伪造《连山易》后，“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3]；包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4]；王孝籍“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终于家”[5]；房晖远初以教书为业，“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6]；曹宪，“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7]；王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8]。可见隋代民间私学也很发达，同样需要抄写大量教材。

隋代可考藏书家有刘智海、陆爽、许善心、张琚等。刘智海，武强交津桥人，家中“素多坟籍”，著名学者刘焯、刘炫曾在其家借读十年[9]。陆爽，字开明，临漳人，有书“数千卷”[10]。许善心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11]。张琚，河东人，博通群经，“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12]。以上藏书家的藏书大多是民间抄写的。

隋代手工抄写诗歌、历书、法书之例屡见不鲜。例如孙万寿

【1】《隋书》卷75《何妥传》。

【2】《隋书》卷75《刘焯传》。

【3】《隋书》卷75《刘炫传》。

【4】《隋书》卷75《包恺传》。

【5】《隋书》卷75《王孝籍传》。

【6】《隋书》卷75《房晖远传》。

【7】《旧唐书》卷189上《曹宪传》。

【8】《新唐书》卷196《王通传》。

【9】《隋书》卷75《刘焯传》。

【10】《隋书》卷58《陆爽传》。

【11】《隋书》卷58《许善心传》。

【12】《隋书》卷77《张文诩传》。

的赠友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孙万寿，字仙期，信都武强人。14岁时就从经学大师熊安生研习五经，略通大义，兼治子史，善属文，深为著名学者李德林所推重。隋初，因人推荐，引为文学侍从。后因不修边幅、衣冠不整而流配江南，从军，管理文书。郁郁寡欢，其赠友诗以贾谊、屈原自比，抒发了他“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的苦闷心情。此诗传至京师，“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1]。可见当时该诗流传甚广，抄颂极多。

【1】《隋书》卷76《孙万寿传》。

开皇五年（585年）张胄玄所撰历书“在乡阳流布，散写甚多”[2]，为了不误农时，历书抄写量之多，可想而知。

【2】《隋书》卷18《律历下》。

隋代有不少书法爱好者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往往大量临写名人法书，例如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长期临写王羲之书《千字文》（图6），后“择八百本散在浙东”[3]。其临写总数当有数千本。

【3】[宋]桑世昌：《兰亭考》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印本。

图6
隋智永书《千字文》

从文献记载看，隋代图书有不少同书异本，据阳休之《陶潜集序录》：

> 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次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

子。[1]

[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9。

可知隋代《陶潜集》有四个版本：八卷无序本、六卷本、八卷萧统本和十卷阳休之本。隋代流行的《妙法莲华经》有三个译本，即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十卷本、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本和阇那崛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本。阇那崛多撰《添品妙法莲华经序》说明了竺法护译本和鸠摩罗什译本的区别：

> 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验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缺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及。

据智昇《开元释教录》著录，隋代佛经一经多译之例甚多，如《大方等大集贤护经》有五卷本和六卷本，《善敬经》又有《善恭敬经》、《善恭经师经》两种译本。同书异本的客观存在，也说明隋代每种图书的抄本往往不一而足。

三、隋代佛经出版

隋代抄写佛经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刚即位，就一改魏太武帝、周武帝的排佛政策，“废像遗经，悉令雕撰”[2]，并迫不及待“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3]。《一切经》即后之《大藏经》，是所有佛

[2]［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隋书》卷35《经籍四》。

经的总集，有数千卷之多。隋初，全国有两百余州，其中“大都邑”不下数十，如果每个“大都邑”都写经一部，其卷帙之富，可想而知。再加上秘阁所藏，其总数“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未为虚言。据统计，到开皇三年（583年），全国已写经46部、132 086卷（平均每部2 871卷），还整理故经3 853部[1]。如每部以2 871卷计，则故经3 853部，共有11 061 963卷，加上新写的132 086卷，共计11 194 049卷，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1】[唐]法琳：《辨正论》卷3。

隋炀帝也很重视佛经抄写工作。早在藩邸，炀帝就慷慨施物施金，抄写佛经。据沙门智顗《答谢晋王施物书》：开皇初，炀帝曾施纸2 000张，以供抄经之用。开皇九年（589年）在平陈过程中，隋炀帝除了保护一般图书之外，也很重视佛经的收集、整理和抄写工作，如前所言，宝台四藏共有佛经十万卷，这十万卷佛经多为隋代抄写。炀帝登位后，仍然重视佛经抄写工作，据统计，炀帝时总共抄经612藏、29 172部[2]。这里所谓“藏”，即上文之“部”，如每部以2 871卷计，则抄经总数为1 757 052卷。

【2】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中华书局，1983年。

隋代私人抄经之例也屡见不鲜，兹据有关资料，将《敦煌遗书》著录的隋代抄经者举例如表5（其中“出处栏”，“斯”代表《斯坦因劫经录》；“伯”代表《伯希和劫经录》；“天博”代表天津市博物馆；“愿文集”代表黄征、吴伟编《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下同）：

表5　隋代私人抄经例表

抄写者（供养人）	抄写内容	抄写时间	出　处
庆　义	大比丘弥沙塞戒本	开皇元年（581年）	
赵　昇	大般涅槃经卷4	开皇八年（588年）8月3日	斯3518
李思贤	大智论卷50	开皇十三年（593年）4月8日	斯4954
净通师等	十地论法云地卷10之12	开皇十四年（594年）4月25日	伯2086
何孝聪	大方等大集经	开皇十五年（595年）	
袁敬姿	华严经卷47	开皇十七年（597年）4月1日	斯4520

续 表

抄写者(供养人)	抄写内容	抄写时间	出 处
氾仲妃	大般涅槃经卷 36	开皇十八年(598 年)4 月 8 日	斯 2791
索 显	仁王经	开皇二十年(600 年)2 月 15 日	愿文集 9859
张 才	中阿含经卷 8	仁寿二年(602 年)12 月 20 日	斯 3548
令狐妃仁	大通方广经卷上	仁寿三年(603 年)2 月 14 日	斯 4553
楹维珍	优婆塞戒经卷 11	仁寿四年(604 年)4 月 8 日	伯 2276
释善藏	大般涅槃经卷 16	大业二年(606 年)	斯 2598
苏七宝	大智度经论卷 91	大业三年(607 年)3 月 15 日	伯 2138
慧 休	大般涅槃经卷 17	大业四年(608 年)2 月 15 日	天博 12
王 海	大般涅槃经卷 8	大业四年(608 年)4 月 15 日	伯 2205
王 俦	老子变化经	大业八年(612 年)8 月 14 日	斯 2295
刘圆净	佛说金刚般若经	大业十二年(616 年)7 月 23 日	斯 2605
张佛果	佛说妙好宝车经	大业十三年(617 年)	愿文集 9879
尼法藏	妙法莲华经卷 5	大业十三年(617 年)	伯 2334

其中袁敬姿另抄《华严经》卷四、卷七、卷九、卷十四、卷十五、卷三十、卷三十三、卷三十七、卷四十九、均有愿文；楹维珍另抄《优婆塞戒经》卷二（二份）、卷六、卷十，均有愿文；苏七宝另抄《大智度经论》卷二、卷三十九、卷九十五，均有愿文；慧休另抄《大般涅槃经》卷十一、卷十三、卷十五、卷十九、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均有愿文；王海另抄《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二和《妙法莲华经》卷三，均有愿文。

第二节　隋代出版的管理

隋代官方重视图书事业，以为“为国之本，莫此攸先”。具体目标是“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1]。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图书必须完备无缺。民间有的，国家必须有；民间无的，国家也要有。为了达此目标，有一系列重要措施：

【1】《隋书》卷49《牛弘传》。

第一，重视出版机构的组织建设。据记载：

> 大业十一年春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隋制：秘书省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炀）帝增少监一人，减校书郎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为四人，文林郎二十人，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凡百一十七人），并以学士补之。[2]

【2】《资治通鉴》卷182《隋纪六》。

这就是说，原来秘书省只有37人，扩充后增加到117人，是原来的三倍多。不仅如此，秘书省人员的素质大大提高，“以学士补之”，即增补人员必须是很有学问的人，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那种“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用人制度[3]。

【3】《隋书》卷33《经籍二》。

第二，重视儒家经典著作的出版。隋代统治者重视儒家经典，儒家经典大量抄写，例如《周易》王肃、王弼注“盛行”于世[4]。《周礼》郑玄注“立于国学”[5]，抄本之多，可想而知；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亦大行于世。《孝经》一书，“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6]，抄本也非常多。另外，《论语》郑玄注亦“盛于人间”[7]。

【4】《隋书》卷32《经籍一·后叙》。

【5】《隋书》卷32《经籍一》。

【6】《隋书》卷32《经籍一》。

【7】《隋书》卷32《经籍一》。

第三，重视宗教著作的出版。重视佛经的出版，已详上文。隋炀帝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讲经内容，“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余众经，

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1]。《隋书·经籍志一·总叙》说：“(炀帝) 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可见隋炀帝在编撰佛经的同时，也曾集中一批学者编撰、抄写道经，编撰道经目录。《隋书·经籍志》著录道经377部、1 216卷，其中包括经戒301部、908卷；饵服46部、167卷；房中13部、38卷；符箓17部、103卷。

【1】《隋书》卷35《经籍四》。

第四，严禁出版伪书。据《隋书·刘炫传》：

> 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

可见当时法律规定，出版伪书者，处以极刑。刘炫因为大赦，才免一死。当然，刘炫作为隋朝一代宗师，靠编造伪书养生，也是不对的。

第五，严禁出版私撰国史和图谶著作。学者王劭“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后来因为隋文帝“览而悦之”[2]，才免受处分。开皇十三年(593年) 二月，隋文帝下诏:“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3] 开皇十三年 (593年) 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4]；隋炀帝即位之后，“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5]。什么是谶纬？“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的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它把自然界的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看作社会安危的决定原因，为封建统治说教。由于隋代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谶纬著作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6]。《隋书·经籍志》仅仅著录十三部、九十二卷，没有一种是隋人著作。

【2】《隋书》卷69《王劭传》。

【3】《隋书》卷2《高祖下》。

【4】《隋书》卷2《高祖下》。

【5】《隋书》卷32《经籍一》。

【6】《隋书》卷32《经籍一》。

第六，使用他人著作应当交付稿费，已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据《隋书·郑译传》：

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城皋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列傳第三 鄭譯 一三七

图7
《隋书》关于“润笔”的记载

上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图7）。

这里“润笔”即今之稿费，这是“润笔”一词在古代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李德林奉炀帝命撰写诏书，付出了一定的劳动，理应得到一定的报酬。不过，支付稿费者应是隋炀帝而不是郑译，高颎要求郑译支付稿酬是不合理的。这说明当时虽说有稿费一事，但尚未形成制度，一些具体规定还不明确，在执行时往往带有随意性。当然，作为郑译，升官是件喜事，拿几个钱表示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这笔钱绝对不是稿费，这是应该弄清的。李德林历仕北齐、周、隋诸朝，北齐天统中，袁聿修出任信州刺史，颇有政声，“州民郑播宗等七百余人请为立碑，敛缣布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纪功德。府省为奏，敕报许之”[1]。可见李德林为撰写袁聿修功德碑，曾拿到“稿费”数百匹缣布。作为周、隋的著名文臣，李德林拿到的“稿费”当是很多的。

第七，初步建立书价制度。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接受牛弘的建议，广开献书之路，“每书一卷，赏绢一匹”，这是隋代首次官定书价[2]。这次官定书价对隋、唐二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唐代书价仍然如此。

第八，在筹措出版经费方面，开皇元年（581年）官方提出“计口出钱”的集资方案。所谓“计口出钱”，即抄写佛经的费用

【1】[唐]李百药：《北齐书》卷42《袁聿修传》，中华书局，1972年。

【2】《隋书》卷32《经籍志一·总叙》。

落实到千家万户，按人口分摊抄写佛经的费用。这种集资出版的方法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第一次。

第三节　牛弘与隋代图书流通

牛弘（545—610），字里仁，安定鹑觚（今甘肃泾川北）人，历仕周、隋二朝：于周袭封临泾公，历任威烈将军、仪同三司等职；于隋历任秘书监、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右光禄大夫等职。大业六年（610年）从幸江都，病死，终年66岁。牛弘性宽厚，博闻好学，擅长文学，精通律令、礼仪，荣宠冠代，而车服卑俭，讷于言而敏于行，隋世旧臣，始终信任，且身居要职，唯牛弘一人而已。有《牛奇章集》等。

开皇三年（583年），牛弘任秘书监时，提出广开献书之路的主张，他上表说：

>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
>
> 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

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钜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

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

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监，少垂照察。[1]

【1】《隋书》卷49《牛弘传》。

此表主要论述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图书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性。他以尧、舜、武王等为例，说明图书是"弘宣教导，博通古今"的重要工具，有国有家者当"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为国之本，莫此攸先"。第二，总结了历代图书流通史上的惨痛教训。收藏图书是流通图书的前提，没有图书收藏，也就没有图书流通。如果图书大量焚毁，也就失去了图书流通的物质基础。牛弘所谓"五厄"，实则中国图书流通史上的五次大灾难：一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王坟籍，扫地皆尽"；二厄是在西汉王莽末年，"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三厄是东汉末年，先是汉献帝迁移都城，"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接着"西京大乱，一时燔荡"；四厄是西晋末年，"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

失坠”；五厄是周师攻占郢都江陵，梁元帝萧绎将七万多卷图书，“悉焚之于外城”。表文历数“五厄”之后说：隋初御书单本，包括残帙在内，只有15 000多卷，和梁代目录相比，“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医方、图谱方面的图书，“弥复为少”，有些图书甚至“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第三，隋代具备聚书的有利条件，应当肩负历史重任。自孔子至隋代的千余年间，霸王递起，中华分裂，“欲崇儒业，时或未可”。到了隋代，则具备了聚书的条件：从时代而言，“兴集之期，属膺圣世”。隋代“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从地域而言，隋代疆域“近于三王”；从人口而言，隋代人口“盛于两汉”，堪称天时、地利、人和，“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更待何时！第四，提出了聚书的具体办法。士民复杂，官方很难弄清民间图书收藏情况。有些人珍爱私人藏书，根本不愿意把图书献给官方，鉴于上述情况，提出“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的实施办法。把“明诏”和“购赏”结合起来，即一方面诏令全民献书，另一方面悬赏购书。

隋文帝采纳了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还主。”[1] 可见整个献书过程分为遣使、搜访、奖励、校写、还主五个步骤。第一步是遣使，即中央派人分赴各地。这显然是沿用了汉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的做法[2]。第二步是搜访。“搜”即搜查，“访”即询问。“搜”则严厉，“访”则平和。刚柔相济，宽严结合。可以想见，这些使者手中肯定有一份阙书目录，否则他们怎么判断是否“异本”呢？第三步是奖励。献书一卷、奖绢一匹的价格还是很高的，因为这不是购书，而是借书。第四步是校写，即先校勘，后抄写。这仍然是沿用了汉代刘向编目的做法。第五步是还主，即书归原主。说明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巧取豪夺，大得人心。这次献书活动持续了三四年之久。是图书自下而上的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图书流通活动。

牛弘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文献学家和出版家。其请广开献书之路表虽然文字不多，但在中国文献史上和中国出版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牛弘第一次高度评价了文献的重要作用，第一次全

【1】《隋书》卷32《经籍一·总叙》。

【2】《隋书》卷49《牛弘传》。

面系统地总结了古代文献出版、流通的历史。这些论述，对于文献学理论具有奠基的意义。牛弘还指出了隋代肩负的历史重任，提出了隋代聚书的具体措施，其请广开献书之路表也是指导隋代图书出版流通的纲领性文献。牛弘的请广开献书之路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牛弘之后，唐代魏征、封演等，宋代洪迈、周密等，明代丘浚、胡应麟、陆深等，近人陈登原、祝文白、张舜徽等都曾论述过历代图书之“厄”。研究图书流通遂成一门专学，而牛弘实开此学之先，功莫大焉。

第四节　隋代图书流通

在牛弘广开献书之路表的推动下，隋代图书流通取得了显著成绩，隋代图书流布中外。让我们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国内图书流通

图书流通与交通运输关系密切。没有交通运输，就没有图书流通。隋代国内交通发达。国内交通堪称四通八达，“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1]。广通渠把大兴城和潼关紧紧连在一起，300里之中，官私“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泝不停”[2]。大运河贯穿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区，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隋代的交通大动脉。隋代商业也很发达。长安、洛阳、丹阳（今南京）、江都（今扬州）、京口（今镇江）、蜀郡（今成都）等都是隋代的商贸中心。长安有都会、利人二市。洛阳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丰都周围8里，通12门，有120行、3 000余肆；通远靠通济渠，周围6里，通20门，商旅云集，舟船数以万计。丹阳“市廛列肆，埒于二京”[3]。江都和京口在运河和长江的汇合点，商业也很繁荣。蜀郡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4]。交通的便利，为图书流通提供了运输的通道；商业的繁荣，为图书流通提供了交易市场。

【1】《隋书》卷24《食货志》。

【2】《隋书》卷24《食货志》。

【3】《隋书》卷31《地理下》。

【4】《隋书》卷29《地理上》。

《隋书》中有不少图书"行于世"的记载，例如：

辛彦之撰《坟典》、《六官》、《祝文》、《礼要》、《新礼》、《五经异义》等"并行于世"[1]。

何妥撰《周易讲疏》、《孝经义疏》、《庄子义疏》等"并行于世"[2]。

刘焯撰《稽极》、《历书》、《五经述议》等"并行于世"[3]。

刘炫撰《论语述议》、《春秋攻昧》、《五经正名》、《孝经述议》、《春秋述议》、《尚书述议》、《毛诗述议》、《注诗序》、《算术》等"并行于世"[4]。

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行于世"[5]。

刘臻有集十卷"行于世"[6]。

诸葛颖撰《銮驾北巡记》、《幸江都道里记》、《洛阳古今记》、《马名录》等"并行于世"[7]。

孙万寿有集十卷"行于世"[8]。

庾自直有文集十卷"行于世"[9]。

刘善经撰《酬德传》、《诸刘谱》、《四声指归》等"行于世"[10]。

庾季才撰《灵台秘苑》、《垂象志》、《地形志》"并行于世"[11]。

耿询撰《鸟情占》"行于世"[12]。

萧吉撰《金海》、《相经要录》、《宅经》、《葬经》、《乐谱》、《相手版要诀》、《太一立成》等"并行于世"[13]。

临孝恭撰《欹器图》、《地动铜仪经》、《九宫五墓》、《遁甲月令》、《元辰经》、《元辰厄》、《百怪书》、《禄命书》、《九宫龟经》、《太一式经》、《孔子马头易卜书》等"并行于世"[14]。

刘祐撰《阴策》、《观台飞候》、《玄象要记》、《律历术文》、《婚姻志》、《产乳志》、《式经》、《四时立成法》、《安历志》、《归正易》等"并于于世"[15]。

牛弘撰《五礼》"行于当世"[16]。

宇文弼撰《尚书》、《孝经注》"行于时"[17]。

【1】《隋书》卷75《辛彦之传》。
【2】《隋书》卷75《何妥传》。
【3】《隋书》卷75《刘焯传》。
【4】《隋书》卷75《刘炫传》。
【5】《隋书》卷75《鲁世达传》。
【6】《隋书》卷76《刘臻传》。
【7】《隋书》卷76《诸葛颖传》。
【8】《隋书》卷76《孙万寿传》。
【9】《隋书》卷76《庾自直传》。
【10】《隋书》卷76《刘善经传》。
【11】《隋书》卷78《庾季才传》。
【12】《隋书》卷78《耿询传》。
【13】《隋书》卷78《萧吉传》。
【14】《隋书》卷78《临孝恭传》。
【15】《隋书》卷78《刘祐传》。
【16】《隋书》卷49《牛弘传》。
【17】《隋书》卷56《宇文弼传》。

卢思道有集30卷“行于时”[1]。

薛道衡有集70卷“行于世”[2]。

魏澹有文集30卷“行于世”[3]。

宇文恺撰《东都图记》、《明堂图议》、《释疑》等“见行于世”[4]。

侯白撰《旌异记》“行于世”[5]。

杜台卿撰《齐记》、文集15卷“并行于世”[6]

柳䛒撰《晋王北伐记》、文集10卷“行于世”[7]。

李文博撰《治道集》“大行于世”[8]。

鲍宏有集10卷，“行于世”[9]。

所谓“行于世”，就是图书流通于社会；李文博撰《治道集》“大行于世”，就是非常畅销，人争购买。辛彦之、何妥、刘焯、刘炫、诸葛颖、庾季木、萧吉、临孝恭、刘祐等人的著作“并行于世”，就是说，这些人的著作都很畅销，读者都非常欢迎，下面就来谈谈畅销书问题。

二、畅销书

隋代畅销书可考者有“五经”、《孝经》、《汉书》、识字课本、图谶、佛经等。

隋时“五经”指《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五部书，这五部书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几乎家置一册。《隋书》中有不少学者研习“五经”的记载，例如元善“性好学，遂通涉五经”[10]；包恺之兄包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11]；房晖远精五经，太常卿牛弘称其为“五经库”[12]；王孝籍，博览群书，“遍治五经”[13]；王颊“遂通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14]；孙万寿，十四岁“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15]。“经书”之中，《三礼》、《左氏传》尤为热门。精通“三礼”者有褚辉、刘炫、张文诩、杨汪、明克让、于仲文等；精通“左氏传”者有元善、杨汪、薛道衡等。《孝经》在隋代虽非经书，但也很盛行，这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关。隋文帝曾多次颁赐《孝经》给臣民，并延请经学家为之讲解。

[1]《隋书》卷57《卢思道传》。

[2]《隋书》卷58《薛道衡传》。

[3]《隋书》卷58《魏澹传》。

[4]《隋书》卷68《宇文恺传》。

[5]《隋书》卷58《侯白传》。

[6]《隋书》卷58《杜台卿传》。

[7]《隋书》卷58《柳䛒传》。

[8]《隋书》卷58《李文博传》。

[9]《隋书》卷66《鲍宏传》。

[10]《隋书》卷75《元善传》。

[11]《隋书》卷75《包恺传》。

[12]《隋书》卷75《房晖远传》。

[13]《隋书》卷75《王孝籍传》。

[14]《隋书》卷76《王颊传》。

[15]《隋书》卷76《孙万寿传》。

班固《汉书》在隋代也很盛行，研读者甚多，萧该、包恺、刘臻、张冲、潘徽、杨汪、于仲文、阎毗等都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其中尤“以萧、包二人为宗匠”[1]，萧该撰《汉书音义》十二卷，包恺撰《汉书音》十二卷。刘臻因为“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2]。识字课本是供儿童读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汉史游《急就章》、蔡邕《劝学》、晋郭璞注《三苍》、束皙《发蒙记》、顾恺之《启蒙记》、梁周兴嗣《千字文》等。这些书均因教育需求而普及。

【1】《隋书》卷75《包恺传》。

【2】《隋书》卷76《刘臻传》。

图谶是宣扬符命占验的图书。隋代一再发布禁毁图谶的诏令，此举本身就说明隋代图谶众多，官方屡禁不止。当时精于图谶的学者很多。据史书记载，房晖远治五经之外，“兼善图纬”[3]；马光“图书谶纬，莫不毕览”[4]；诸葛颍研习《周易》、《图纬》等，“颇得其要”[5]；王劭一再“上表言符命”，论证杨坚有“龙颜戴干之表”，并“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信约符命，捃摭佛经”，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6]。许善心因隋炀帝“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受诏与崔赜撰《灵异记》十卷[7]。

【3】《隋书》卷75《房晖远传》。

【4】《隋书》卷75《马光传》。

【5】《隋书》卷76《诸葛颍传》。

【6】《隋书》卷69《王劭传》。

【7】《隋书》卷58《许善心传》。

随着佛教的繁荣，佛经在隋代广为流通，不少善男信女抄经、施经的目的就在于流通供养、大造功德。“流通供养”一语经常出现在施主的愿文中，如前引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云：“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大业十三年（617年）张佛果抄《宝车经》题记云：“大业十三年，佛弟子张佛果为刘士章善友知识敬造《宝车经》一卷，流通读诵，讲说修行。”[8] 各地佛寺的藏经阁中，收有大量施主供奉的佛经，这些佛经广为流通，为弘扬佛教发挥了重大作用。

【8】黄征等：《敦煌愿文集》，879页。

三、对外图书流通

隋代中外交流频繁。对外交通有水陆二途：就水路而言，可达南洋、日本诸国；就陆路而言，有北道、中道、南道三条道路通往西域。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常骏等出使赤土国，据《隋书·南蛮传》：

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

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一带。这是我国历史上官方开展丝绸外交的最早记载。不久，首都洛阳还举行过一次变相的商品交易会，有不少外国人参加。据《隋书》记载，井邑、真腊、婆利、高昌、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米国、史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等曾于隋大业中遣使“贡方物”。日本曾四次遣使来隋，并有13个学士来华留学。这些人来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购求书籍”。有些留学生一住就是20多年，学成之后，满载而归。由于隋代时间不长，加上文献无征，隋代图书流入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随着对外交流的繁荣，隋代图书流向国外的数量是不少的。日人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阳成天皇贞观末年至元庆六年之间，相当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至中和四年（884年）。该目著录的一些汉籍当有不少是隋代传入的。

当然，对外交流是双向的，在汉籍传入外国的同时，也有不少外国图书流入中国。例如第二章第三节所谈隋代翻译的佛经，当是由印度传入的。另外，《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医学、天文、历数著作等，也有一些是从国外传入的。

第四章　唐代出版的历史背景

公元617年，李渊带兵攻克长安。次年，隋代灭亡，李渊在关中称帝，国号唐。907年为后梁朱温所灭，共历20帝、290年。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学术进步，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第一节　唐代政治和经济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幅员最为辽阔的朝代之一。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今东北三省及其以东以北地区），西至安西（今新疆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南至日南（今越南广治一带），北至安加拉河、贝加尔湖一带。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唐代政治制度在因袭隋代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中央机构仍然采用“三省六部”制，和隋代的区别在于唐代扩大了宰相名额，并设立了政事堂。这样品秩较低的官吏，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级别一变而为宰相，与中书令、侍中等在政事堂平起平坐，参政议政。这既有利于反映整个地主阶级的意志，也有利于加强皇帝的权力。在法制方面《唐律疏议》因袭隋律而成，是我

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以及亚洲各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实行的府兵制比隋代更加完备。关中设置军府261个，拥兵26万，约占唐代军府和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这对于京都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况且，“兵散于府，将归于朝”[1]，中央牢牢掌握兵权，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唐代科举考试在隋代基础上有更大发展。科举考试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即通过常规性考试选拔人才，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科目有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进士等，其中，进士科备受关注。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临时性考试，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辅助手段，考试科目、考试时间、录取人数因时而异。通过科举考试，国家网罗了大批人才。唐代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中央设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各州县也有学校。各类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1】《新唐书》卷50《兵志》。

唐朝初年，国民经济因为战乱受到重创，黄河下游“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2]，甚至直到贞观间，河北、河南、山东三地的户数还不足70万，仅占隋大业间的七分之一。为了扭转上述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唐代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均田制”、“租庸调制”。“均田制”规定：田多人少的“宽乡”，每个18岁以上的男子可分田100亩，其中20亩叫“永业田”，归农民自己所有；80亩叫“口分田”，农民死后归还国家。田少人多的“狭乡”，每个18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只给40亩。均田制虽然并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它把荒芜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租庸调制”规定：壮年男子每人每年交租粟两万，调绢二丈，服徭役20天。不愿服徭役者，可以绢代役，一天徭役折绢三尺，这叫“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每年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30天，“租庸调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由于措施得力，唐代经济迅速恢复。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水利工程的总和才有158项，而唐代水利工程

【2】[唐]吴兢：《贞观政要》卷2《直谏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多达254项。众多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宝间全国约有1 300万至1 400万户，人口多达7 000万人，超过了汉代。唐代垦荒面积多达850万顷。天宝八年（749年）官仓储粮9 900万石。正如杜甫在《忆昔》诗中所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1]

【1】［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20，中华书局，1960年。

唐代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中央官办手工业是为宫廷服务的，分由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进行管理。地方官府也有织绵、兵器等作坊。唐代民间私营手工业最为繁荣，各行各业无所不有，其中，纺织、冶铸、陶瓷等尤为发达。纺织业遍布全国各地，丝纺、麻纺、棉纺等都有较大发展，花色品种争奇斗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染色印花技术如染缬、夹缬、蜡缬、绞缬等已经广泛运用。唐代前期，北方的河南、河北是全国的纺织业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绢、定州（今河北定县）绫，闻名天下。唐代后期，南方的纺织业紧跟而上，益州（今成都）生产的蜀锦名扬全国。包括冶铁、冶铜、冶锡、冶银等在内的冶铸业也很发达。唐代前期全国有铁、铜、锡、银等冶炼场所168处；唐代后期大量增加。唐宣宗时，冶铁场所一次就增77处。唐代金属铸造技术也很精湛。武则天当政时，用铁铜铸造的天枢，高达105尺，天枢上还有直径三丈的腾云承露盘，四条高约一丈的直立神龙捧着火珠。天枢下面的铁山，周长170尺，铜制蟠龙、麒麟环绕铁山。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旧址窖藏中，发现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在加工过程中，已经使用了切削、抛光、焊接、刻凿等工艺，还使用了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说明当时的技术水平已经很高。唐代陶瓷生产也有很大发展。河北邢州窑和四川大邑生产的白瓷、越州生产的青瓷、昌南

（今江西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和青瓷都很著名。唐代还出现了用黄、绿、白、赭、蓝等彩釉制成的陶瓷，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唐三彩”。唐三彩中的人、马、骆驼等色彩鲜明、造型生动，是我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图8）。



图8
唐三彩

总而言之，唐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唐代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唐代的文化政策

唐代的文化政策，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国内外文化开放政策；二是道、儒、释并重的政策。当然，后者也与文化开放政策密切相关。

一、国内文化开放政策

国内的开放政策表现在很多方面，让我们从言论开放、人才开放、诗歌开放等方面加以说明。

所谓“言论开放”，就是说人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畅所欲言。唐代出现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狄仁杰、张九龄、颜真卿、陆贽、元稹、白居易等不少直言敢谏的诤臣。其中魏征尤其著名，魏征在唐太宗面前不顾个人安危，犯颜进谏，虽然有时唐太宗实在难以忍受，但最后还是纳谏，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赏赐和重用。他说：“(魏征一言)，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1] 魏征死后，罢朝五日，百官赴丧，并令陪葬昭陵，亲制碑文，他说：

>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2]

【1】《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唐太宗贞观三年十月》。

【2】《旧唐书》卷71《魏征传》。

魏征一生谏议凡二百余事，前后上疏数十万言。

所谓“人才开放”，就是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唐太宗重用的人才中，不少人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魏征曾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职，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不少，但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一变而为唐太宗，不计前嫌，照样录用魏征为谏议大夫；贞观二年（628年），迁尚书右丞；贞观四年（630年）升为侍中；贞观十年（636年）拜为特进，知门下省事。后又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拜太子太师。还有的人曾在王世充手下任职，有的人曾是李建成政治集团的成员，有的人参加过农民起义，有的人出身低微，但是只要是人才，唐太宗照用不误。武则天在用人方面也很开放，鼓励各级官吏推荐人才，还允许毛遂自荐。她在洛阳铸了四个铜匦，其中一个叫“延恩”，自荐者可以把自著诗文投进去。经过专家评议后，只要有水平，很快就可以提升。普通地

主出身的狄仁杰，高宗时任大理丞，曾在一年内处理一万七千多人的积案。武则天执政后，曾两度提为宰相，为治理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写过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出言不逊，对武则天进行人身攻击。当武则天看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句时，对骆宾王的文笔极为赞赏，并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1]

【1】[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骆宾王》，中华书局，1965年。

所谓“诗歌开放”，是说诗歌创作无所忌讳，传播手段多种多样。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但是唐代文字狱却不多。唐代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不必回避现实，可以直叙胸怀，尽情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宋洪迈曾说：

>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终篇皆是。……今之诗人不敢尔也。[2]

【2】[宋]洪迈:《容斋续笔》卷2《唐诗无讳避》，商务印书馆，1959年。

用文字狱时代的标准去衡量唐诗，实属胆大包天，罪该万死。但是唐代诗人却平安无事，照样做他的诗人，当他的官。这说明唐代统治者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泱泱大国的开放气度和博大胸怀，对国家前途充满自信，绝不相信几首诗会动摇甚至推翻他的统治，任凭诗人去想象，去发泄。唐诗传播也很开放，传播手段很多，有赐赠传播、抄写传播、配乐传播、题壁传播等。名诗往往不胫而走天下，家弦户诵。例如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就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3]。多种开放的传播方式，正是唐诗分外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唐]元稹:《元稹集》卷51《白氏长庆集序》，中华书局，1982年。

二、国外文化开放政策

对外开放，也是唐代的一贯政策。早在唐初，唐高祖就确立了对外睦邻友好政策，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在给高丽王高建武的信中说：

> 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祇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远循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埸，岂非盛美。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1]

【1】《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可见“绥柔万国”、“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共弘仁恕之道”是唐初对外政策的基石，历代帝王都继承了唐高祖这一既定方针。贞观五年（631年）正月十三日，唐太宗曾对高昌王文泰谈到人生之乐，其一即“六合大同，万方咸庆”[2]；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同侍臣总结了五条对外关系的成功之道，其一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3] 唐高宗亦对邻国实行“抚育”、“柔服”的方针[4]。唐玄宗对外交往的基本方针是“开怀纳戎，张袖延狄”[5]，主张对周边国家“润之以时雨，炤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6]。

【2】《唐会要》卷28《蒐狩》。

【3】《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

【4】[清]董诰等：《全唐文》卷12《分立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步真为继往绝可汗诏》，中华书局，1998年。

【5】《全唐文》卷27《安置降蕃诏》。

【6】《全唐文》卷26《放还诸蕃宿卫》。

为了迎接八方来客，唐代政府设置了一系列分工明确的外事机构。这些机构可分为四个大类：（一）外事主管机构。三省六部除主管国内政务之外，也主管外事工作。其中，中书省和门下省负责起草、审议有关外交的诏令，参加皇帝接见外宾的各种活

动，接受外宾递交的各种文书。中书省负责外事工作的具体人员是中书侍郎和通事舍人，门下省负责外事工作的具体人员是侍中。尚书省下设六部二十四司。其中礼部的礼宾司负责外事礼仪，主客司负责外事政令；户部的金部郎中和员外郎负责对外宾客的赏赐；兵部的职方司负责外国地理、四夷归化等工作；刑部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负责海关检查；工部的虞部郎中和员外郎负责外宾的薪炭供应等。（二）外事接待机构。这类机构具体负责外宾接待事宜，其中包括鸿胪寺、四方馆、礼宾院等。鸿胪寺又叫司文寺、司宾寺等，下设典客署和司仪署，前者负责外事接待，后者负责凶丧之仪。四方馆是专门接待周边国家来宾的机构，其职责除了接待来宾之外，还负责双边互市、贸易工作。后来随着鸿胪寺地位的提高，四方馆仅仅成为向外宾提供休息、住宿服务的场所。礼宾院是天宝以后新设的外事接待机构，它取代了鸿胪寺的部分职能。（三）外贸管理机构。这类机构有互市监、市舶司等。互市监主要负责西北边境地区与外国商人的互市贸易，归边境地区政府领导，但行政关系隶属中央的少府监。市舶司主要负责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事务，行政关系亦属少府监。（四）侨民管理机构。唐代侨民聚居之地称为“蕃坊”，管理侨民的机构因称“蕃长司”。唐代蕃坊主要分布在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城市。蕃长司主要负责引进外商来华贸易，管理蕃坊内部的日常事务。综上所述，可知唐代的管理体制已形成对外开放的格局，为对外开放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交通方面，国内已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图9）。唐代海外交通也相当发达。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云：

> 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1]

【1】转引自方亚光：《唐代对外开放初探·唐代社会对外开放的交通条件》，黄山书社，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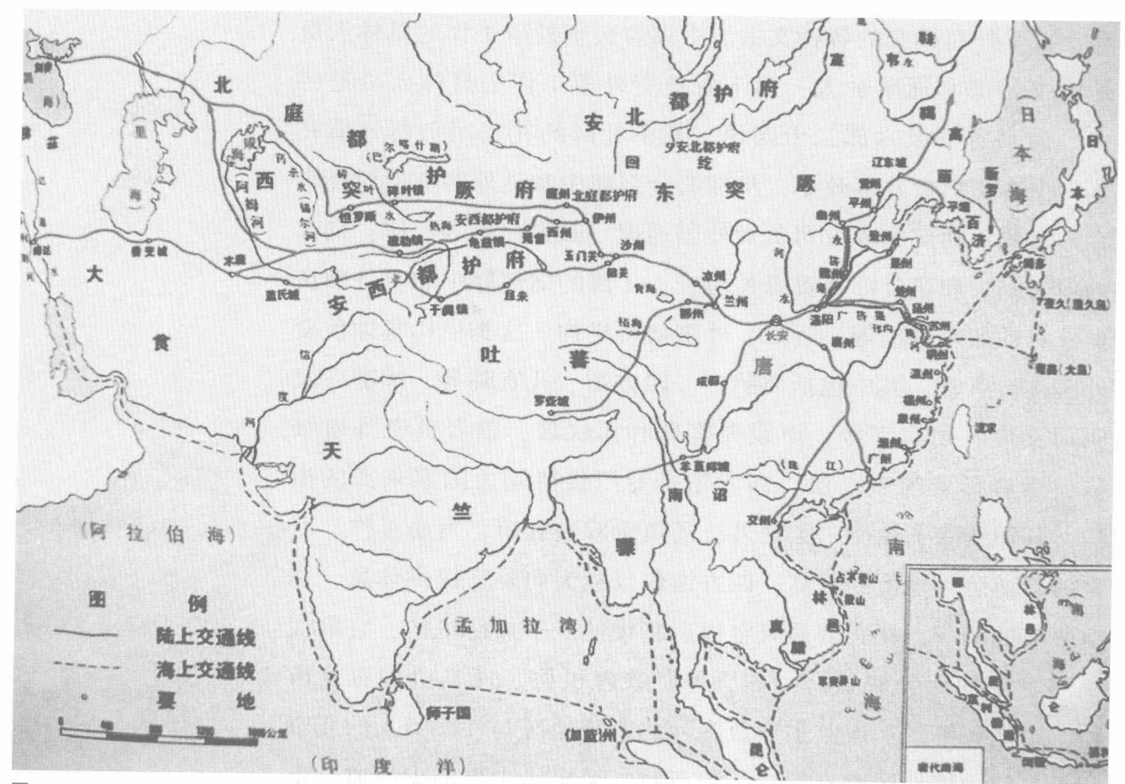


图9
唐代交通图

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通西域道”均属陆上丝绸之路（图10）；其余三条属海上丝绸之路。以上七条道路是就整体而言，如果再具体一些，当不止七条道路，例如“安西入西域道”就有如下四条：一是天山北路，即从玉门出发，经由高昌、阿耆尼、屈支、天山、大清池、铁门等地到达印度；二是天山南路，即从玉门出发，经由于阗、羯盘陀、葱岭等地到达印度；三是从玉门出发，经由高昌、焉耆、疏勒、于阗、葱岭等地到达印度；四是吐蕃道，即经由西藏、尼泊尔到达印度[1]。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直至波斯湾。《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七·下》详细记载了这条航线。

【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隋唐传译之情形》。

由于唐代营造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优越环境，中外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让我们以遣唐使、外国留学生、来华外商为例加以说明。遣唐使目的各异，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文化的。尽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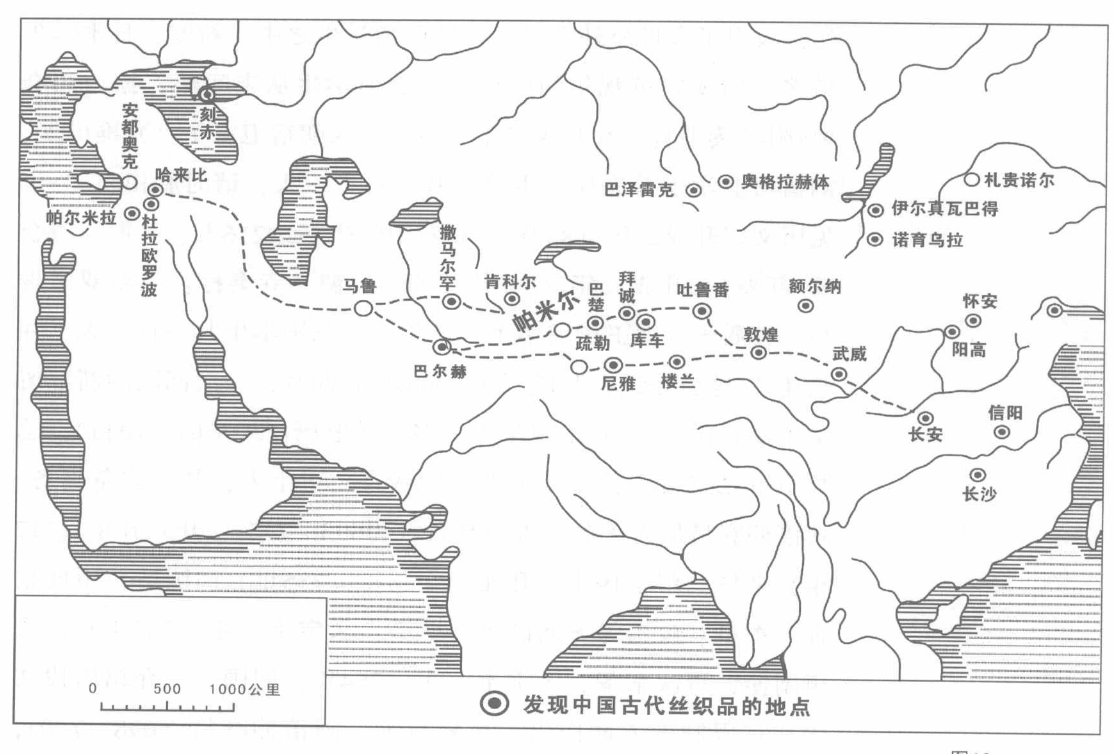


图10
丝绸之路示意图

此，他们都是沟通中外的友好使者。据方亚光《唐代对外开放初探》（黄山书社1998年版）统计，各国派遣唐使次数如下：高丽21次，百济20次，新罗104次，日本19次（此据日本文献记载，中国文献记载了31次）、林邑（今越南）37次，盘盘（今马来西亚）4次，真腊（今柬埔寨）15次，诃陵（今爪哇）13次，堕和罗（今泰国湄南河流域）8次，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5次，泥婆罗（今尼泊尔）2次，五天竺（今印度）26次，罽宾（今阿富汗）21次，康（撒马尔汗一带）32次，安（布哈拉附近）18次，石（塔什干境内）20次，宁远（费尔干纳境内）25次，勃律（克什米尔及巴基斯坦）15次，吐火罗（今阿富汗）80次，波斯（今伊朗）35次，拂菻（东罗马帝国）6次，大食（阿拉伯）37次。其中新罗遣唐使最多。唐诗中有不少为新罗使送行的诗歌。例如孟郊《奉同朝贤送新罗使》、张籍《送新罗使》、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马戴《送朴山人归新罗》、贯休《送人归新罗》等。大唐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

达，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在外国留学生之中，新罗、日本学生最多。唐太宗贞观年间以后，新罗留学生从未间断，据《唐会要·附学读书》："(开成二年）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可见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新罗留学生多达216人。又据《唐会要·新罗》，开成五年（840年）四月，鸿胪寺奏称："新罗国告哀，其质子（即王子留学生）及年满后归国学生共一百五人，并放还。"这就是说，开成五年（840年）四月，一次回国的新罗留学生就有105人。日本留学生大多是随遣唐使来华的（图11），总数不下二三百人，至今可考名姓者有二三十人，其中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最为著名。吉备真备（约693—775），开元五年（717年）来华，留学19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国后，历任教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重要职务。天宝十一年（752年）任遣唐副使，再次来华，天宝十三年（754年）回国，在介绍唐代文化和官服制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阿倍仲麻吕（698—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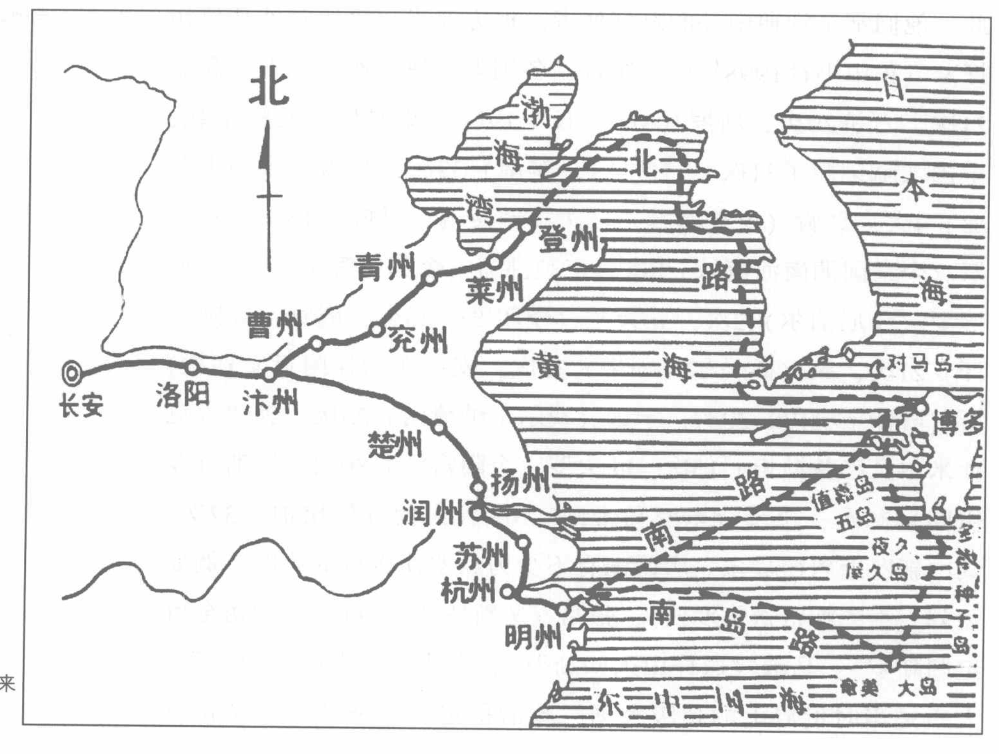


图11
日本遣唐使来华线路图

汉名晁衡（或朝衡），开元五年（717年）与吉备真备一起来华，学成之后，留在唐朝做官，担任司经局校书，从三品秘书监等职，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晚年回国，遇险而未果，重回京都长安，历任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兼安南节度使等职，直至大历五年（770年）老死中国，在中国共生活了54年。由于交通便利，外国商人蜂拥而至，唐代诗文中，所谓"商胡"、"胡商"、"胡贾"、"蕃商"、"海商"等称呼指的就是外国商人。外国商人主要分布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其中，都城长安最多，约有200多家，经营范围涉及香药、珠宝、饮食、服装等。不少外商特别善于鉴别珠宝，珠宝业几为外商垄断。外商经营的饮食业把麻饼、毕罗、三勒浆酒等引进中国。遍布各大都市繁华地段的胡人酒店、芳香扑鼻的葡萄酒、充满异国情调的胡乐、翩翩起舞的胡姬，把人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使不少文人流连忘返。

内外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唐代出版事业的繁荣。

三、道、儒、释并重的文化政策

道、儒、释并重也是唐代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体现了大唐帝国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胸怀大度的开放政策。

唐初尊奉道教，完全出于政治需要，为皇权神授制造舆论。唐代皇姓为"李"，据说李唐宗室为少数民族北魏拓跋氏之后。这在当时重视门第的社会环境中，显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们需要攀龙附凤，和一个汉族的名门望族拉上关系，改变自己的身份，提高唐代宗室的地位，最后终于抬出了老子李耳，以为"李氏出自（太上）老君，故崇道教"[1]，并制造了多次太上老君"显圣"的神话，为唐代政权的建立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在李唐享国的289年中，尽管道教的地位时有浮沉，但就整体而言，唐代历朝皇帝都以老子后代自诩，重视道教的发展。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尊崇老子及其《道德经》。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

【1】[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1《道教》，中华书局，1958年。

（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给复一年。

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1]。唐高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上元二年（675年）开始加试《老子》。仪凤三年（678年）又下诏说：“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2] 唐玄宗时，是唐代道教最兴盛的时期。开元时，中央专门建立崇玄馆，培养生徒。唐玄宗还多次拜谒玄元庙，并一再为玄元皇帝追加尊号：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二月七日，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唐玄宗还大量绘制玄元皇帝图像分置天下。唐玄宗还亲自注疏《老子》，颁行全国，诏令“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3]。唐文宗的崇道活动也比较突出。开成五年（840年）二月，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为降圣节，休假一日”[4]，从此这一天成为纪念老子诞辰的节日，在全国推行。（二）尊崇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吴筠、叶法善、赵归真、杜光庭等道士，或封以官爵，或尊为国师，或赐予钱物、奴婢、谥、号等，关怀备至。其中赏赐之例尤多，例如：天宝二载（743年），唐玄宗赐两京宫内道士“近城庄园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5]。天宝十载（751年），太清宫道士“各赐物三十段，陪位道士共赐五百段”[6]。会昌四年（844年），武宗幸长发安街金仙观，“赐绢一千匹”，后幸左街兴唐观，“又赐千匹”[7]。中和三年（883年），僖宗赐道士李无为等“缣帛三百匹”，“又赐钱二百贯”[8]。（三）大建宫观。例如太宗建府观、太受观；高宗建东明观、太一观；中宗敕天下州郡并建景龙观；睿宗建景云观、玉

【1】《旧唐书》卷5《高宗下》。

【2】《旧唐书》卷24《礼仪四》。

【3】《龙角山记·唐明皇再诏下太上老君观》。

【4】［前蜀］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5】［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78《追尊先天太皇德明兴盛皇帝等制》，商务印书馆，1958年。

【6】《唐大诏令集》卷68《天宝十年南郊赦》。

【7】［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8】［前蜀］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真观；玄宗建启圣宫、紫微宫、天宝观、玉芝观、金仙观、阳台观、福唐观等，敕诸道并建开元观；代宗建宝应观；德宗建玄英观；宪宗建兴唐观；敬宗建延唐观等。

唐朝建国伊始，就很重视儒学。让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唐代诸帝大多重视儒学。武德元年（618年）首先恢复各级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1]。武德二年（619年）诏令国子监建周公庙、孔子庙各一座，按时举行祭祀活动，并博求孔子后裔，予以封爵。唐高祖还亲自到国子学聆听诸生讲解经义。唐太宗李世民早在秦王府时，就创建了文学馆，以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在宫内轮流值班，与之讨论儒家经典，有时甚至讨论到半夜。即位后，更加重视儒学，据《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唐太宗还诏令孔颖达等撰定《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定名为《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并作为朝廷科举考试的依据。唐高宗于乾封元年（666年）追赠孔子为太师，修缮孔子庙堂及学馆。唐玄宗也很重视儒学，他说：“宏我王化，在乎师儒。能发明此道，启迪含灵，则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2] 他追谥

[1]《资治通鉴·唐纪一》。

[2]《唐会要》卷35《褒崇先圣》。

孔子为文宣王，并封赠孔门弟子颜渊等为公、侯、伯，予以旌德褒扬。唐玄宗特别重视《孝经》，亲自为之注解，颁于中外。安史之乱后，虽然唐代儒学失去了贞观、开元时的辉煌，但后期诸帝还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代宗、文宗、昭宗等都很重视儒学。代宗认为“志于求理，尤重儒术。先王设孝，敢不底行”[1]；文宗令“国子选名儒，置五经博士各一人”[2]；昭宗认为：“有国之规，无先学校；理官之要，莫尚儒宗。”[3] （二）科举考试重视儒学。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以经书为主，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童子科规定，十岁以下儿童，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与官，七通者与出身[4]。裴耀卿，八岁参加童子科考试，考试《毛诗》、《尚书》、《论语》，合格而及第。刘晏七岁与试童子科，及第后，授秘书省正字，10岁时受到唐玄宗的接见。

[1]《唐大诏令集》卷105《崇太学诏》。

[2]《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

[3]《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

[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

就整体而言，唐代最高统治者是重视佛教的。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开始，由国家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年），译师凡26人。唐高宗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为了给母亲求福，下令修建大慈恩寺，度僧300余人，请50位高僧入住慈恩寺，为玄奘译经提供了各种方便。由于官方的支持，佛教在唐代的传播迅猛异常，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中外僧人交往频繁，来华僧人可分两类：一类为弘法而来；一类为求法而来。前者来自天竺、中亚西域等地；后者来自日本、新罗等地。根据文献记载，天竺、中亚僧人东来者不下五六十人，他们对佛经的流传和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来华僧人约有百余人，其中辩正、惠施、智通、智藏、最澄、空海、圆仁、圆载、圆珍、普照等比较著名。与此同时，为了寻求佛经正本，唐代僧人西行求法者也屡见不鲜，由于西行人数众多，印度境内甚至出现了华人佛寺。（二）佛寺众多，随着佛教的盛行，佛寺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地。可考京都长安佛寺有81所，

可考敦煌佛寺也有数十所，唐代全国佛寺多至5 335所[1]。（三）诵经者多，道宣《续高僧传·读诵篇》列举事例颇多，如唐释慧达“诵《法华》盈万遍”；唐释守素“诵《法华经》三万七千部”等。（四）造像多。据杨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著录唐代造像995尊，其数量之多，远轶前代。敦煌石窟保存至今的唐代造像有1 442尊。另外，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天水麦积山、历城千佛崖等地也有不少唐代造像。（五）唐代士大夫普遍崇佛。萧瑀采用十多家注疏为《法华经》作注，他的家族中有20人出家，其兄萧璟一生诵《法华经》一万遍，雇人抄写《法华经》1 000多部，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八称“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王维、王缙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2]。王维又有《叹白发》诗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白居易于太和六年（832年）斥六七十万巨资修香山寺。萧颖士、李华、段成式、柳宗元、刘禹锡等深研佛理，于志宁、来济、许敬宗、杜正伦、李义府、徐坚、苏晋、陆象先、郭元振、张说、魏知古、孟简、刘伯刍等都曾参与佛经翻译活动。《全唐诗》共收诗歌48 900多首，而文人所写的佛理诗就有2 700首，加上僧人诗2 500首，共计5 200首，占全书收诗总数的十分之一强。

总之，唐代实行道、儒、释并重的文化政策，尽管在某一时期可能有所偏重，但就整体而言，道、儒、释并重是唐代文化政策的主旋律。

【1】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隋唐佛寺群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旧唐书》卷190下《王维传》。

第三节　唐代学术与文化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唐代学术、文化的繁荣，让我们从经学、史学、艺术、科学等方面加以说明。

一、经学、史学与文学

由于唐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唐代学者在考订经文、解释经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考订经文方面，唐太宗贞观间颜师古考订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撰《五经》定本颁行全国。唐太宗开成间，郑覃以"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1]，刻成著名的《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共有114石，650 252字，今存陕西省博物馆。在解释经义方面，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有了标准读本。《五经正义》的影响可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提并论，二者在经学历史上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当然，唐代也有一些儒生敢于摆脱《五经正义》的束缚，解放思想，自由解经，开了后世疑经的先河，对宋学的出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旧唐书》卷173《郑覃传》。

唐代史学也有较大的成就。在二十四部正史之中，《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八部是唐代编撰的。史馆的建立，为官修史书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刘知几撰《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史学理论名著。该书充满批判的精神，对过去的史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的评论，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见解，在中国史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杜佑撰《通典》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载典章制度的政书，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开创了典章制度分类专史的先例。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是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它详细记载了各郡县的地理沿革、户口、物产、山川、古迹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樊绰撰《蛮书》是研究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文献。

唐代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古文、传奇小说、变文等方面。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涌现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王之涣、王昌龄、岑参、孟浩然、高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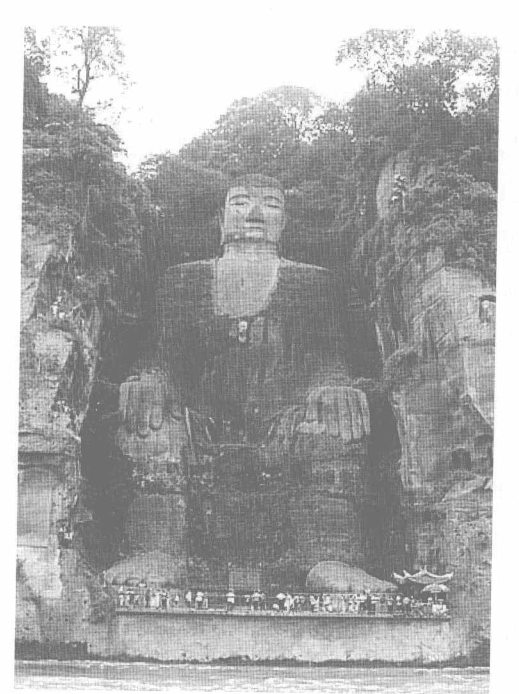
一大批著名诗人。其中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尤其著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诗歌创作推向炉火纯青的境地。唐代古文运动，是一场改革文风、改革文学语言的运动，它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主张以自由质朴、注重内容、言之有物的新散文文体，取代六朝以来走入形式主义死胡同的骈文。陈子昂是这个运动的奠基者，韩愈则是这个运动的主将。韩愈用新散文体写出了三百多篇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散文，从理论到实践上，为人们作出了榜样。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虽然不及韩愈，但也写出了四百多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散文。唐代中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传奇小说的产生。传奇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在语言、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都与六朝志怪小说不同，它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脱离萌芽状态，逐渐发育成形，传奇小说的代表作有陈鸿《长恨歌传》、元稹《莺莺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蒋防《霍小玉传》、沈既济《枕中记》等。变文是唐代产生的一种说唱体文学作品。佛教在对普通人宣传教义时，往往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这种讲唱形式，叫做“俗讲”。俗讲的文字底本，就叫变文。这种形式生动活泼，广泛流行。其内容从最初的佛教故事发展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人物传记等。变文在《敦煌遗书》中多有发现。

图12
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像

二、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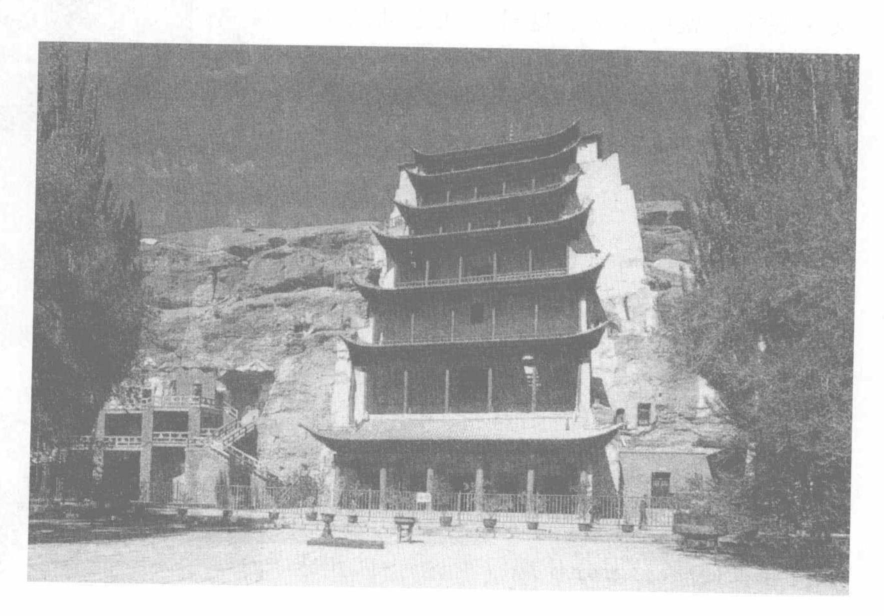
唐代雕塑、绘画、书法、乐舞等文艺形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唐代雕塑艺术以洛阳龙门、四川乐山、昭陵六骏、敦煌千佛洞等为代表。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十分壮观（图12）。四川乐


图13
乐山大佛

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石佛像（图13）。表现唐太宗屡立战功之骏马的昭陵六骏浮雕，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石刻珍品。敦煌千佛洞是世界罕见的艺术宝库。现存492个窟洞中，唐窟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泥塑佛像栩栩如生，与壁画完美结合，相映成趣（图14，图15）。唐代涌现出不少著名雕塑家，杨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雕塑技术高，被人誉为“塑圣”，与“画圣”吴道子齐名。他还把自己的雕塑经验写成《塑诀》一书，对塑像技术进行全面的总结，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本关于雕塑理论的书籍，可惜今已失传。

唐代绘画有很大成就，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画家，可考者有四百多人。唐初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是著名的人物故事画家。阎立本一生作画很多，流传至今者有《历代帝王图》、《步辇图》、《萧翼赚兰亭图》等。盛唐的吴道子擅长佛道画，在长安、洛阳的寺观里，就有他画的壁画三百多间，人


图14
敦煌石室

物形神俱备，呼之欲出。李思训擅长山水画，他往往采用工笔画法，细致入微。晚唐的周昉擅长仕女画，这些仕女画反映了贵族夫人的奢侈生活。唐朝还有不少擅长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擅长画鹤，曹霸、韩干擅长画马（图16），戴嵩、韩滉擅长画牛。所谓“韩马戴牛”指的就是韩干和戴嵩。



图15
壁画飞天

唐代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欧体骨气险劲，法度严整，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体刚柔相济，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初唐书法继承了“二王”书体的风格，但缺乏创新意识。而盛唐的颜真卿大胆创新，独具一格，号称“颜体”，颜体把篆、隶、行、楷四体笔法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颜真卿书迹今传七十多种。其中《千福寺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争座位贴》、《东方朔画赞碑》等最为著名。盛唐书法家怀素的草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是古典浪漫主义的书法艺术珍品。唐代后期书法家以柳公权最为著名。他集诸家书体的优点于一身，自成一体，号称“柳体”。代表作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等。

唐代兼取国内外乐舞之长，创造了风格多样、优美和谐的唐代乐舞。唐初沿用了隋代的九部乐，太宗即位后，定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乐队演奏时有坐、立两种姿势：坐在堂上演奏者，称为坐部伎，较尊贵；站在堂下演奏者，称为立部



图16
韩干画马

伎，比较低贱。唐代著名音乐家有李隆基、曹保、米嘉荣、李龟年等。李隆基即唐玄宗，他酷爱音乐，精通多种乐器。宫中专门设置梨园，开展音乐歌舞活动。梨园子弟多达三百余人，都是从太常乐工中精选出来的，由唐玄宗亲自指挥排练，培养出大批优秀的音乐舞蹈人才，李龟年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李龟年能歌善舞，又能作曲，创作出《霓裳羽衣曲》、《紫云回》、《凌波曲》等许多著名乐曲，深为唐玄宗所赏识。唐代舞蹈分为健舞、软舞两种：健舞舞姿雄健；软舞舞姿柔软。

三、科学技术

唐代在数学、天文、历法、医学、建筑、印刷术等科学技术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数学方面，唐代专门在国子监内设立“算”学，科举中

设有“明算科”，培养数学人才。王孝通撰《辑古算经》，第一次运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是一部高深的数学著作。李淳风审定并注解了《九章算经》、《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图17）、《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辑古算经》、《缀术》等十部数学著作，这十部书成为国家的法定教本。

在天文方面，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制造的黄道游仪，发现了恒量位移的现象。这个重大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提出的恒星自行的观点要早1 000年。一行还发明了一种名叫“复矩图”的仪器，他用这种仪器测量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结果虽然不准确，但是运用科学方法测量子午线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比外国要早90年。一行和梁令瓒还制造了浑天铜仪，它既能表示天体的运动，又能指示时间，是后来天文钟的前身。

图17
李淳风注《五曹算经》宋汀洲刻本书影

在历法方面，唐代历法更换十次，其中《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是三部最有价值的历法。傅仁均撰《戊寅历》，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颁行。李淳风撰《麟德历》，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颁行。开元十五年（727年）一行撰《大衍历》吸收中外历法之长，是当时最进步的一部历法。其后历代历法一遵其式，直到明末采用西方历法编历后才有所改变，可见《大衍历》在中国历法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唐代医学也有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科较细，已有体疗（内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针灸、按摩

等科，医疗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二是名医、名著辈出。孙思邈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他重视医德，对特效药物很有研究，人称“药王”。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和《千金翼方》三十卷。二书内容丰富，对于瘿病（甲状腺肿大）、脚气等病的治疗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他在研究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对火药的发明作出一定贡献。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苏敬等人编撰的《唐本草》五十三卷，收集药物844种，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比西欧最早的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要早835年。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四十卷，记载单方6 900多个，是一部综合性医学著作。

第四节　唐代出版概述

唐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划时代转变时期。人工抄写是唐代以前图书出版的主要方式，印刷术的发明是一场出版领域生产力的伟大革命，它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图书编撰方面，从官方到民间，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史馆和集贤殿书院是官方修书的重要机构。史馆的最终形成和完善，为官方修书奠定了组织基础。史馆监修制的形成和完善，是唐代官方图书编撰成熟的标志，它开了当今主编负责制的先河。史馆专修实录、国史、正史等历史著作。集贤殿书院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它在藏书、校书、参政的同时，也编撰了一些图书。唐代官修书的内容十分丰富。经书如《五经正义》、《今文尚书》、《毛诗草木虫鱼图》、《礼记月令》、《礼记字例异同》、《春秋纂要》、《春秋加减》等；正史如南北朝诸史、《隋书》、《晋书》等；实录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中宗实录》、《玄宗实录》、《德宗实录》等；地理著作如《西域国志》、《括地志》等；礼书如《大唐仪礼》、

《永徽五礼》、《开元礼》等；医书如《新修本草》等；法律著作如《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贞观律》、《贞律令》、《永徽律疏》、《永徽令》、《垂拱式》、《垂拱格》、《开元令》、《开元详定格》、《大中刑法统类》等；诗集如《骆宾王集》、《王右丞集》等；类书如《艺文类聚》、《文思博要》、《三教珠英》、《初学记》等。唐代民间编撰别集、总集最多。别集如吕才编《东皋子集》，王士源编《孟浩然集》，魏颢编《李翰林集》，李阳冰编《李白草堂集》，白居易编《白氏文集》，刘禹锡编《河东先生集》和《吕和叔文集》，裴延翰编《樊川文集》，元结、李贺、李群玉、孙樵、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颜真卿、刘禹锡、郑谷等都自编过别集。总集如孙季良编《正声集》、元结编《箧中集》、殷璠编《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编《国秀集》、令狐楚编《御览诗》、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姚合编《极玄集》、韦庄编《又玄集》等。著名图书编撰家有魏征、颜师古、李延寿、吴兢、韦述、刘知几、杜佑、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其中刘知几、白居易在图书编撰方面成绩最大。白居易是著名文学家，他在76年的漫长生涯中，从未间断图书编撰活动，他的传世意识、精品意识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刘知几是著名史学家，所撰《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史评名著，也是中国图书编撰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唐代以前的史书编撰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于繁荣图书编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图书出版方面，唐代一方面仍然采用传统方法，即人工抄写的方法出版图书，另一方面又开始采用雕版印刷刻印图书。唐代官方出版机构有史馆、集贤院、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司经局等。官方组织的大规模抄书活动至少有六次。官方抄书具有数量多、校勘精、纸墨精、装潢精、书法美等优点。民间抄书著名者有李袭誉、李大亮、王元感、王绍宗、韦述、柳仲郢、皇甫湜、孟郊、张参、杜牧、李商隐、吴彩鸾、陆龟蒙等。因为唐代雕版印刷尚属初创时期，可考印刷品还不太多，内容以佛经、字书、历书、阴阳杂书为主。唐代出版地区分布较广，中心地区是

长安、洛阳、成都、扬州、杭州、绍兴、敦煌等地。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加强对图书市场的管理，维护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官方也在诏令或法令条文中对图书出版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严禁民间出版天文、图谶、兵书、占卜、历书、相书、私史、天书等。文人索取“稿费”，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景观。

在图书流通方面，由于长安、洛阳、成都、扬州、绍兴、敦煌等书业中心的形成，加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图书流通无远不至。图书流通的方式有颁赐流通、献书流通、借阅流通、市场流通等。其中市场流通是一种主要的流通方式，著名诗人王建、杜甫、刘禹锡、张籍、杜荀鹤等都有参与图书贸易活动的记载。唐代可考书商有吴彩鸾、王绍宗、孙仲容、孙盈、刘翌、齐光等。儒家经书、《史记》、《汉书》、《老子》、《庄子》、《文选》、诗集等是唐代的畅销书。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对外交通的便利条件，使得大量图书流布日本、朝鲜等国，图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总而言之，唐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出版理论、出版组织，或是出版方式、出版规模等，都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五章　唐代的官修书

唐代官方重视修书，史馆的建立，监修制的完善，集贤院的众多人才，丰富的国家藏书，为官方大规模修书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官修书之多，史无前例。

第一节　唐代修书机构

唐代武德殿、秘书省、国子监、翰林学士院、弘文馆、史馆、集贤殿书院等都有修书活动的记载，武德殿修有《东殿新书》等；秘书省修有《唐秘阁书目》等；国子监修有《春秋加减》等；翰林学士院修有《前代君臣事迹》、《元和辨谤略》等；弘文馆修有《景龙文馆记》等。比较而言，史馆和集贤殿书院是最主要的官方修书机构。

一、史馆

史馆修史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以前，修史的主管部门是秘书省著作局。唐太宗继承皇位之后，鉴于武德间萧瑀等修史迟迟未能成书的教训，决定单独组建史馆。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1]。为什么史馆置于禁中呢？

【1】《旧唐书》卷43《职官二》。

【1】《旧唐书》卷98《李元纮传》。

【2】《唐会要》卷63《史馆上·史馆移置》。

【3】[唐]刘知几:《史通》卷11《史官建置》,中华书局,1961年。

【4】[清]董诰等:《全唐文》卷13《简择史官诏》。

【5】[宋]王谠:《唐语林》卷4。

【6】《唐语林》卷1。

【7】《旧唐书》卷149《蒋乂传》。

"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1]。这就是说，一示重视，二示神秘。开元十五年（727年）三月一日，宰相李林甫监修国史，"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谏议大夫尹愔遂奏移中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2]。史馆环境幽雅，生活条件优裕，"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3]。

关于史馆的编制情况，据《旧唐书·职官二》，有"史官，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潢直一人，熟纸匠六人"。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修讫则罢。监修是史馆的最高长官，非宰相莫属。修撰由他官兼领史职者担任，直馆由未在宫廷任职、初入史馆者担任。唐高宗曾就史官选择一事下诏说：

>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继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漏泄史事。自今以后，宜遣史司于史官内简择堪任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4]

史官在唐代被看作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职业。高宗时薛元超以不能预修国史为终生憾事之一，他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5] 唐代后期，沈既济、沈传师父子递居史官之职，沈既济预修《建中实录》，沈传师预修《宪宗实录》，一时"荣之"，传为美谈[6]。尤为甚者，蒋乂及其子蒋係、蒋伸、蒋偕，其孙蒋兆，三代四人跻身史馆，踵修国史，实旷古未闻，因有"蒋氏日历"之美誉[7]。

史馆的职能是"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

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1]。为了保证修史工作的正常进行，史馆制定了许多必要的制度，例如原始材料的申报、文武百官的谥法、实录的内容、立传人选的确定，等等。关于原始材料的申报，其具体分工是：祥瑞由礼部录送；天文祥异，由太史验报；蕃国朝贡，由鸿胪勘报；蕃夷入寇及来降，由中书、兵部同报；音律曲调，由太常寺具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由户部即报；诸色封建，由司府勘报；文武大官任免，由吏部、兵部分报；刺史、县令善政，由本州录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由州县录送；文武大官死亡，由司、州报知；公主百官定谥，由所在部门将行状、谥议并送；诸王来朝，由宗正寺勘报。关于实录的内容，也有许多具体规定，唐代实录中多载密疏，名臣李德裕曾提议说：

【1】《旧唐书》卷43《职官二》。

> 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向后所载群臣奏议，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记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奉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矣。[2]

【2】［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1《修史体例》，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印本。

关于原始材料的申报时间也有明确规定：“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3] 这就是说，在京单位，每季报送一次；外地单位，每年报送一次。如果史馆掌握的材料与有关单位上报的材料不一致，则“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4]。在申报的众多原始材料中，百官定谥所据“行状”往往颂扬备至，夸饰成风，元和十四年（819年）4月，史官李翺奏云：

【3】《唐会要》卷63《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4】《唐会要》卷63《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 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佞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

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惟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记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1]

【1】《唐会要》卷64《史馆下》。

李翱建议，凡行状不实者，不得受谥，宪宗然其奏。关于立传人选的确定也很慎重，永贞元年（805年）九月，监修路随说：

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胜数乎！[2]

【2】《唐会要》卷64《史馆下》。

顺宗永贞间，元韶曾任河阳三城节度使，节度使官高权重，总揽数州军事，但由于元韶政绩平平，因此仅记卒年而已，今存《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无元韶之传。

修史需要大量资料，史馆重视图书资料的收藏工作，多次征购遗书。“安史之乱”，史馆藏书蒙受重大损失，史臣于休烈上奏说：

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官书，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赏绢十匹。[3]

【3】《全唐文》卷365《请搜访国史奏》。

史官韦述在“安史之乱”中曾陷贼手，并授伪官。后三司议罪，流放渝州，因不堪折磨，绝食而死。但其在“安史之乱”中保护国史有功，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奖功补过，仍赠右散骑常侍[1]。

唐代史馆的建立，进一步表明民间私修国史是非法的，唐代郑虔因私修国史而坐谪十年，据记载:“郑虔，天宝初协律，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人有窃窥其稿草，上书告虔私修国史，虔遽焚之，由是贬谪十余年。”[2] 唐代史馆的建立，为官修史书奠定了组织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史馆修史历代相传，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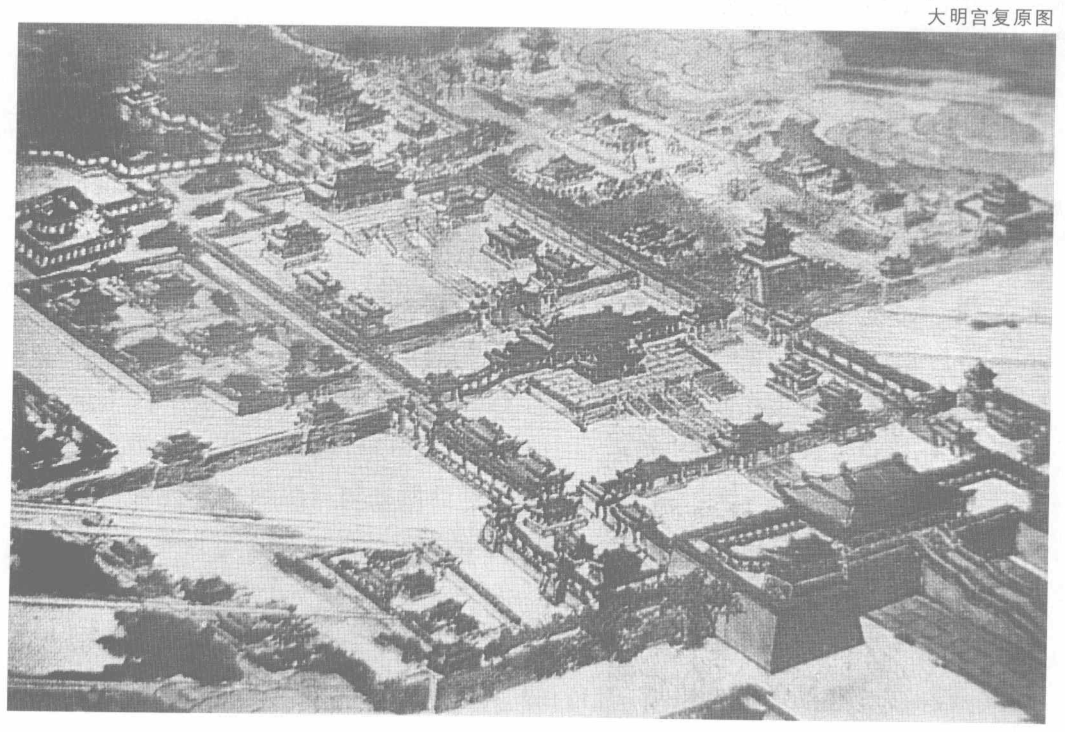
【1】《旧唐书》卷102《韦述传》。

【2】《唐语林》卷2。

二、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以下简称集贤院）原为皇帝读书而设，只是一个藏书的地方。唐代两京城建布局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图18)。宫城是皇帝起居之地；皇城是政府行政衙门所在地；外

图18
大明宫复原图



廓城是市区。秘书省作为管理国家藏书的行政机构位于皇城之中，皇城距宫城较远，皇帝读书多有不便。为了方便皇帝读书，于是宫城才专门设置了集贤院，正如唐韩愈所说："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1] 集贤院由乾元殿书院、丽正修书院逐步发展而来。乾元殿书院是最早的内府藏书处，开元五年（717年）至开元八年（720年），褚无量在此主持校写图书和编目工作。开元六年（718年）十二月，乾元殿书院更名丽正修书院。开元八年（720年）正月，褚无量去世，元行冲接替他的工作。开元九年（721年）编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张说主管丽正修书院的工作。张说任职以后，除了继续校写图书外，尤其重视图书编撰活动。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张说、徐坚、韦述、康子元、侯行果等修成《封禅仪注》，玄宗在集仙殿设宴招待有关人员，并说："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并下诏说："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2]

【1】[唐]韩愈：《昌黎先生集》卷21《送郑十校理序》，中国书店，1991年。

【2】《唐会要》卷64《史馆下·集贤院》。

乾元殿书院原在东都洛阳宫城乾元殿内，仅此一处。丽正殿修书院有两处：一在东都洛阳宫城丽正殿，开元十年（722年）三月，该院迁至"明福门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一在西京长安大明宫"光顺门大街之西，命妇院北，本命妇院之地"[3]。丽正修书院改为集贤院后，分置四处：一为东都洛阳丽正殿旧址；二为西京长安丽正殿旧址；三为西京长安兴庆宫，据王应麟《玉海》卷167引韦述《集贤注记》："兴庆宫院，二十四年驾在东都，张九龄遣魏光禄先入京造此院。"四为临潼温泉华清宫。据《玉海》卷167引《集贤注记》："华清宫集贤院，二十八年造，在宫北横街之西，西邻羽林仗院。"前两处集贤院因早年建置，藏书已备，后两处集贤院的藏书是由东都（太平公主宅）集贤院调拨而来，据《玉海》卷52引《集贤注记》："开元二十四年，驾还西京，敕集贤掌书籍，三分留一贮东都。"这就是说，东都集贤院藏书有三套复本，一套留在东都，其余两套调至西京兴庆宫集贤院和

【3】[唐]韦述：《集贤注记》，转引自王应麟《玉海》卷52《艺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华清宫集贤院。不过，华清宫集贤院藏书的调拨时间要晚一些，只能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华清宫集贤院建成之后。以上四处集贤院的规模大小不一：东都集贤院“东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大明宫集贤院“东西八十步，南北六十九步”；兴庆宫集贤院“东西二十三步，南北三十步”；华清宫集贤院“东西四十八步，南北五十步”[1]。这就是说，大明宫集贤院的面积比其他三处之总和还要大，大明宫集贤院可视为集贤院的总部，其他三处则是集贤院的分部。

集贤院的职能是“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2]。具体来说，集贤院有以下职能：（一）藏书。开元九年（721年），集贤院藏书81 990卷；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集贤院藏书多至89 000卷。（二）校书。开元八年（720年）春天，元行冲知院事，先后调集秘书学士20人来院参与校书工作。白居易《惜玉蕊花，有怀集贤王校书起》诗云：“集贤雠校无闲日，落尽瑶花君不知。”[3] 可见集贤院校书之勤。当然，校书人员的水平高下有别，著名文人韩愈之子韩昶“名父子也，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4]。金根车又叫器车、根车，秦汉时饰之以金，以为乘舆，故名。韩昶因不谙出典，才闹出了笑话。（三）抄书（详本书第九章第二节）。（四）修书。开元九年（721年），元行冲等修《群书四部录》是集贤院修书的最早记载，以后历年递有修撰。（五）搜访遗书和人才。据韦述《集贤注记》、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应麟《玉海》等书记载，开元五年（717年）十二月，唐玄宗曾诏访遗书集于乾元殿；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张说知院事，张悱曾任图书括访异书使；广德二年（764年）七月甲辰，因“安史之乱”，集贤院图书损失严重，遂悬赏购书，一卷赏千钱。（六）参与国策制定工作。张

【1】《集贤注记》，转引自王应麟《玉海》卷52《艺文》。

【2】《旧唐书》卷43《职官二》。

【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13，岳麓书社，1992年。

【4】［唐］李绰：《尚书故实》，丛书集成本。

说“专集贤文史之任，每遇军国大事，帝遣中使先访其可否”[1]。(七)草诏。集贤院学士有不少名臣大儒，多令草诏。不过，到翰林学士院建立之后，集贤院草诏始罢。以上数事之中，以藏书、校书、抄书、修书为主。

【1】[唐]李肇:《翰林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集贤院的编制情况，据《旧唐书·职官二》，有“集贤学士。学士知院事一人，副知院事一人，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检讨官，孔目官一人，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八人，书直、写御书一百人，搨书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实际上，以上编制常有变化。例如校理官为开元间置，到贞元八年(792年)六月十三日，罢校理官，而置校书4人，正字2人；元和二年(807年)七月，又罢校书和正字，恢复了校理官。写御书也有变化：开元七年(719年)有110人，贞元四年(788年)减10人给史馆；元和二年(807年)又减10人。另外，集贤院还有编录人员若干。蒋乂原为集贤院学士蒋将明之子，其父“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张镒见而奇之，乃署为集贤小职”[2]。蒋乂在集贤院“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3]。加上饱学多才，从而得到重用。

关于集贤院学士或校理的任命，可谓极一时之选。“常以宠丞相为大学士，其他学士则达官也。校理则用天下之名能文学者。苟在选，不计其秩次，惟所用之”[4]。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集贤院定名时，学士有张说、徐坚等4人，直学士有赵东曦、韦述等10人，侍讲学士康子元、侯行果等4人，共计18人，号称“十八学士”。陆坚曾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国家花费巨资供养，毫无益处，建议罢之，张说坚不同意，他说:“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何其隘哉”[5]，玄宗听从了张说的意见。由于官方重视集贤院的发展和建设，集贤院网罗了大批人才，据韦述《集贤注记》，从开元十

【2】《唐会要》卷64《史馆下·集贤院》。

【3】《旧唐书》卷149《蒋乂传》。

【4】《昌黎先生集》卷21《送郑十校理序》。

【5】《旧唐书》卷97《张说传》。然《旧唐书·张说传》称“陆坚”为“徐坚”,不确。张说驳论中有“今丽正书院”之语,可知当时尚未易名集贤院,时间当在开元十三年(725年)之前,据《旧唐书·徐坚传》和《新唐书·徐坚传》,开元十五年(725年)以前,徐坚曾任秘书监、左散骑常侍职,未曾担任中书舍人职。又据《新唐书·艺文二》之《六典》解题,开元十年(722年)陆坚任起居舍人职;据《新唐书·陆坚传》,开元十二年(724年)左右,任通事舍人职。可见张说驳论中所谓“中书舍人”者非陆坚莫属。又唐韦述《集贤注记》,于宋尚存,王应麟《玉海》中多有称引,《玉海》卷167《宫室·唐集贤殿书院》云:“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确证《旧唐书》“徐坚”之误。

三年（725年）四月到天宝十五年（756年）二月，“集贤院修撰、校理、待制及文学直等，总五十九人”；从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到天宝十四年（755年），“集贤院学士、直学士三十三人”[1]，这些人为图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玉海》卷48《艺文·集贤注记》。

三、监修制的形成

早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了监修官，北魏山伟等曾在修史局监修国史，北齐高隆之等曾在史馆监修《魏书》。但是监修制的最终形成当与唐代史馆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

什么是监修制？监修制就是官方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它有如下特点：一是资金、人员，甚至选题均由官方筹划；二是集体编写，人员多少不等，少则数十，多可逾千；三是发凡起例、撰写分工、定稿出版等由监修负责；四是书成卷端“止署官高一人名衔”[2]，其他预修者一概从略。如上所言，监修一般由宰相署名。当然，如果皇帝躬亲撰写，无论篇幅长短，则卷端仅题“御撰”。例如《晋书》，唐太宗只写了晋宣帝、晋武帝、陆机、王羲之等四篇论赞，发凡起例由敬播独创，预修者凡21人，因为唐太宗是最高统治者，卷端仅题“唐太宗御撰”。如果监修多次更换，“每阅数官，惟题经进一人，唐宋以来旧例也”[3]。也就是说，多次更换监修的官修书，卷端只署书成奏进的监修姓名，即最后一位监修的姓名。例如后晋《旧唐书》四易寒暑而成，监修官刘昫出任监修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他是书成奏进的最高长官，因此，卷端只题“后晋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昫撰”，而埋没了前任监修官赵莹和执笔者张昭远、贾纬、赵熙、吕绮、尹拙、郑受益、李为先、王伸、崔棁等人的功劳，唐代官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的做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

【3】《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

由于唐代修书众多，监修官也就不一而足。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举例如表6：

表 6　唐代监修官例表

姓　名	字	籍贯	任职时间	监修史书举例	出　处	
					旧唐书	新唐书
魏　征	玄成	馆陶	贞观间	《隋书》	卷 71	卷 97
长孙无忌	辅机	洛阳	永徽二年(651 年)	国史	卷 65	卷 105
来　济		江都	永徽二年(651 年)	《晋书》、国史	卷 80	卷 105
于志宁	仲谧	高陵	永徽二年(651 年)	《晋书》、国史	卷 78	卷 104
褚遂良	登善	钱塘	永徽三年(652 年)	国史	卷 80	卷 105
房　乔	玄龄	临淄	贞观间	《高祖实录》	卷 66	卷 96
许敬宗	延族	新城	显庆元年(656 年)	国史	卷 82	卷 223
郝处俊		安陆	咸亨四年(673 年)	国史	卷 84	卷 115
韦安石		万年	神龙元年(705 年)	国史	卷 92	卷 122
魏元忠		宋城	神龙二年(706 年)	《则天皇后实录》	卷 92	卷 122
陆象先			景云二年(711 年)	国史	卷 88	卷 116
刘幽求		武强	先天二年(713 年)	国史	卷 97	卷 121
张　说	道济	洛阳	开元间	国史	卷 97	卷 125
元　载		岐山	肃宗、代宗词	《玄宗实录》	卷 118	卷 145
李吉甫	弘宪	赵郡	元和五年(810 年)	《顺宗实录》	卷 148	卷 146
杜元颖			长庆元年(821 年)	《宪宗实录》	卷 163	卷 96
韦处厚	德载	京兆	宝历间	《元和实录》	卷 159	卷 142
路　随	南式	阳平	太和二年(828 年)	《穆宗实录》	卷 159	卷 142
贾　餗	子美	河南	太和九年(835 年)	国史	卷 169	卷 179
崔慎由	敬止	武城	太和十年(836 年)	国史	卷 177	卷 114
崔龟从	玄告	清河	开成五年(840 年)	《续唐历》	卷 176	卷 160
魏　谟	申之	巨鹿	会昌间	《文宗实录》	卷 176	卷 97
李让夷	达心	陇西	会昌间	《敬宗实录》	卷 176	卷 181
崔　铉	台硕	博陵	会昌间	《续会要》	卷 163	卷 160
曹　确	刚中	河南	咸通五年(864 年)	国史	卷 177	卷 181
韦保衡	蕴用	京兆	咸通十年(869 年)	《武宗实录》	卷 177	卷 184
徐彦若			龙纪元年(889 年)	国史	卷 179	卷 113
刘崇望	希徒	河南	大顺元年(890 年)	国史	卷 179	卷 90
杜让能			龙纪二年(890 年)	国史	卷 177	卷 96

如何评价史馆监修制度？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早在唐代景龙二年（708年），韦巨源等五人并居监修之职，刘知几愤然辞职，并列举五条理由断然否定监修制度。平心而论，唐代官修书确有一些问题：有的监修文化水平太低，徒有虚名，李林甫就是一个狡诈成性、不学无术的人，据《旧唐书·李林甫传》："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麞之庆。'客视之掩口。"人生男孩曰"弄璋"，连这样妇幼皆知的基本常识不懂，怎能肩负修史重任？有的监修官缺乏史德，例如许敬宗，虽然长期参与修史工作，但他记事阿曲、虚美隐恶，他"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1]。有的监修官忙于政务，无暇过问修书之事，问题成堆，无人解决。有的监修官不懂得修史的基本常识，主张不写传主真实籍贯，而写郡望，刘知几举例说："时修国史，予被配纂李义琰传。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2] 但是，不可否认，唐代官修书之中，也不乏好的，例如《晋书》、《隋书》等就一直受到人们的肯定。郑樵曾说：

>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皆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纪传。以颜、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也。[3]

总而言之，监修制，利大于弊，不可否定。监修制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在人事安排方面，便于调动人才。以政府的名义发出调令，孰敢不从？这样，史馆汇集了大批人才。元代马端临

【1】《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2】《史通》卷5《邑里》。

【3】［宋］郑樵：《通志·校雠略》。

完全同意郑樵的上述议论，并有所发挥，他说：

> 观《隋志》所以该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淆乱，岂易贯穿？而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能通达今，而不明天之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纪传；而以十志付之（于）志宁、（李）淳风辈，所以粲然具举。[1]

【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人才荟萃，“各当其才”，确为史馆监修制的一大优点。第二，在物资供应方面，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权有势，宰相任监修官极便调拨财力、物力，为史馆修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在图书资料方面，史馆可以充分利用国家藏书和档案资料，甚至可以政府的名义向各地征集图书资料，为史馆修书奠定了学术基础。私撰虽然责任心强，文笔一致，但个人的见闻、财力、物力、精力毕竟有限，加上资料缺乏，确有许多不便之处。再说人浮于事、虚美隐恶、互相推诿等，并非史馆的固有弊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不是不可克服的痼疾。历代修书的实践证明，监修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修书制度，它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历朝官修书

唐代官修书以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四朝为盛。太宗时的《五经正义》、南北朝诸史和《艺文类聚》，高宗时的《太宗实录》、《永徽律疏》、《新修本草》和《文馆词林》，武周时的《三教珠英》，玄宗时的《高宗实录》、《唐六典》和《初学记》，都很著名。

一、唐代初期

唐代初期含高祖、太宗二朝。高祖武德间可考官修书有法律

书《武德律》十二卷、《武德式》十四卷、《武德令》三十一卷和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等(图19)。前三书由尚书左仆射裴寂、右仆射萧瑀、大理卿崔善为、给事中王敬业、中书舍人刘林甫、颜师古、王孝达、泾州别驾靖延、太常丞丁孝乌、隋大理丞房轴、天策上将府参军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机等奉诏撰定，武德七年（624年）表上。唐初法律因隋律增损而成，较隋律有所宽松。《艺文类聚》一百卷，欧阳询、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裴矩、陈叔达等奉诏编撰（图20)。欧阳询序云：



图19
唐高祖李渊

> 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有用。

可见该书的体例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在此之前，汇“文”而为总集，聚“事”而为类书，判若两途。《艺文类聚》合二为一，极便读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艺文类聚》引文比较完整，成为后世辑佚的宝库。当然此书也有不足，如山部“五岳”缺少泰山和恒山；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只有北齐等。此书约成于武德七年（624年)。高祖时还组织编写了南北朝诸史和《隋书》，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转引高祖诏文：

图20
《艺文类聚》宋严州刻本书影



藝文類聚卷第八　歐陽詢　撰
山部下　虎丘山　蒜山　石帆山　石鼓山　石門山
太平山　岷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上　總載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漢水　洛水
虎丘山
虎丘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　吳越
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穿土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
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摙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槨三重傾水銀為池
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鳬鴈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已三
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　王珣虎丘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
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陳]張正見從永陽王遊虎丘山詩曰滄波壯鬱島洛邑鎮崇芒未若
茲山麗岧嶢擅水鄉地靈侔少室塗艱像太行重巖標虎據九曲
繞羊腸溜深澗無底風幽谷自涼寶沉餘玉氣劍隱絕星光白雲多

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图21
唐太宗李世民



萧瑀等受诏以后，因故未果。

唐太宗（图21）贞观年间是唐代官方修书的极盛时期。修书内容包括经、史、法律、类书等。经书如《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等；史书如南北朝诸史、隋史、《晋书》、《氏族志》、《括地志》、《高祖实录》、《贞观实录》、《大唐仪礼》等；法律书如《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贞观留司格》等；类书如《文思博要》等。"五经"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五部经书的总称。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颜师古（581—645），名籀，字师古，以字行。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之孙，唐代著名训诂学家。他充分利用秘书省所藏图书进行校勘，一字一句皆有所据，校出了大量错误。然而，书成之后，诸儒"皆共非之"，颜师古舌战群儒，力排众议，"诸儒莫不叹服"[1]。贞观七年（633年），《五经定本》诏颁天下。"五经"除了正文之外，义疏也存在不少问题。

【1】《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

经学自汉至唐几经变革，门户纷争。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唐

代对经书注解作了统一化的工作，《五经正义》就是其代表作。所谓“正义”，就是正定之义，即排众说而定一尊。《五经正义》的编撰人员如表7：

表7 《五经正义》编撰人员表

书 名	卷 数	预修者	复 审
周易正义	16	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谈，于志宁等。	苏德融、赵弘智
尚书正义	20	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	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
毛诗正义	40	孔颖达、王德韶、齐威等。	赵乾叶、贾普曜、赵弘智等
礼记正义	70	孔颖达、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等。	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赵弘智
春秋正义	36	孔颖达、杨士勋、朱长才等。	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隋德素

其中《尚书正义》还聘请长孙无忌、李反、于志宁、张行成、高季铺、褚遂良、柳奭、谷那律、刘伯庄、贾公彦、范义頵、齐威、柳士宣、孔志约、赵君赞、薛伯珍、史士弘、郑祖玄、周玄达、李玄植、王真儒、王德韶、隋德素等20多位专家三审定稿。《五经正义》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天下，成为全国唯一的经学标准答案。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从此怒目相向的经学门户之争便暂告结束。《五经正义》的影响可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提并论，二者在经学历史上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五经正义》举一家而废百家，并没有对前人义疏作出全面总结，后人多有微词。

南北朝诸史及隋史始修于贞观三年（629年），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

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

可见这次修史有明确分工：魏征在撰写隋史的同时，和房玄龄"总监"诸史，负责全面工作；令狐德棻在撰写周史的同时，"总知类会"诸史，负责协调诸史内容和编撰体例；李百药、姚思廉有家学传统，继其先父遗志，分别撰写齐史、梁史和陈史。这种合理的分工，保证了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上各书除了《五代史志》成于永徽元年（650年）之外，其他各书均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合称《五代史》。后来又把《五代史》分为《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五种单行本，《五代史志》三十卷，不可再分，就放在《隋书》之中。《晋书》始修于贞观十八年（644年），据《旧唐书·房玄龄传》：

（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

《晋书》一百三十卷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修成。撰写者除了以上数人之外，尚有崔行功、辛丘驭、刘引之、阳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共计21人。唐太宗于万机之暇，亲自写了晋宣帝、晋武帝、陆机和王羲之四篇论赞，故卷端原题"唐太宗御撰"。

为了提高皇族新贵的地位，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势

力，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按照“不论往昔、只取今日”的原则，撰《氏族志》一百卷。编撰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征集天下谱牒。贞观八年（634年）高士廉进呈全国85郡、398姓的谱牒。第二步是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进行整理工作，条其源流，存真去伪。第三步是第其甲乙，褒贤贬奸，把忠于唐朝者和危害唐朝者加以区别。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后，唐太宗即诏颁天下。定稿的《氏族志》共收293姓，比贞观八年（634年）的征集稿减少105姓，可见高士廉等在考订、甄别方面用力甚勤。《氏族志》对唐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继者不一而足。仕唐官至五品者皆能荣升士流，名载高册。欧阳修《集古录》卷二指出：

> 唐世谱牒尤备，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轻薄，婚姻附托，邀求货赂，君子患之。

唐代谱学名家“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等[1]。

《括地志》撰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濮恭王李泰“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撰次。卫尉供帐，光禄给食，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泰悟其过，欲速成，乃分道计州，缮缉疏录，凡五百五十篇，历四期成”[2]。

实录是一种编年体史书，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南朝萧梁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三卷和谢昊《梁皇帝实录》五卷是我国古代两部最早的实录，均已失传。唐代《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由敬播、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撰写。《太宗实录》分两次写成：第一次从贞观元年（627年）写到贞观十四年（640年），凡20卷；第二次从贞观十五年（641年）写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凡40卷，到高宗永徽间完成。

《大唐仪礼》一百卷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修成，预修者有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

【1】[唐]柳芳：《姓系论》，《全唐文》卷372。

【2】《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

达、于志宁等。该书内容以吉、宾、军、嘉、凶、国恤为序，其中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共计一百三十篇。

太宗时所修《贞观律》等法律图书皆由房玄龄、长孙无忌、裴弘献等奉诏撰定，凡《律》500条、《令》1 546条、《格》700条。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著为《留司格》。《文思博要》1 200卷，于贞观十六年（642年）修成，预修者有高士廉、房玄龄、魏征等16人，该书包举甚广，片言只语，搜寻无遗，正如序言所说："笼缃素则一字必包，举残缺则片言靡弃。"可惜这部大书在南宋时已经失传。

二、高宗、武周时期

唐高宗时期，官方修书也很多。修书内容主要包括史书、法律书、医书、类书等。

史书如《太宗实录》、《武德贞观两朝史》、《永徽五礼》、《西域国志》、《后汉书注》等；法律书如《永徽律》、《永徽式》、《永徽律式本》、《永徽令》、《永徽散颁天下格》、《永徽留本司行格》、《永徽律疏》等；医书如《本草》；类书如《文馆词林》、《累璧》、《东殿新书》、《瑶山玉彩》等。《武德贞观两朝史》由长孙无忌、令狐德棻于显庆元年（656年）编成表上，"无忌以监领功，赐物二千段，封其子润为金城县子"[1]。《永徽五礼》一百三十卷，凡299篇，由长孙无忌、许敬宗、李义府、刘祥道、许圉师、韦琨、萧楚材、孔志约等于显庆三年（658年）修成表上。与《大唐仪礼》相比，削去国恤部分，认为豫凶事不是一般臣子所宜讨论的。西域是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的总称，唐高宗曾遣使分赴康国、吐火罗等地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编为《西域国志》，于显庆三年（658年）表上。《后汉书注》由章怀太子李贤招集学者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同完成。其特点是重于训诂而略于事实。由于成于众手，水平也参差不齐。

[1]《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永徽律》十二卷、《永徽式》十四卷、《永徽令》三十卷，《永徽散颁天下格》七卷、《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等由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宇文节、柳奭、段宝玄、令狐德棻、高敬言、刘燕客、赵文格、李友益、张行实、王文瑞、元绍、贾敏行、李敬玄、源直心、李文礼等20人奉诏撰定，永徽三年（652年）表上。《永徽律》是唐朝具有代表性的法典。《永徽律疏》三十卷由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唐临、段宝玄、刘燕客、贾敏行等奉诏撰定，永徽四年（653年）表上。《永徽律疏》附于律文之后，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它不仅统一了唐代法律，而且阐明了封建法律的许多原则，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留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永徽留本司格后》十一卷由刘仁轨、戴至德、张文瓘、李敬玄、郝处俊、来恒、高智周、李义琰、裴行俭、马载、萧德昭、裴炎、李义琛、张楚金、卢律师等15人奉诏撰定，仪凤二年（677年）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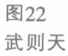
《本草》二十一卷、《本草药图》二十卷、《本草图经》七卷等书总称《新修本草》。该书修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反、长孙无忌、辛茂将、许敬宗、孔志约、许孝崇、胡子象、蒋季璋、蔺复珪、许弘直、巢孝俭、蒋季瑜、吴嗣宗、蒋义方、蒋季琬、许弘、蒋茂昌、吕才、贾文通、李淳风、吴师哲、颜仁楚、苏敬、于志宁等奉诏撰定。据《新唐书·于志宁传》，高宗问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于志宁回答说："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諂之，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新修本草》图文并茂，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早在唐代开元十九年（731年），日本就出现了该书的传抄本，是日本官方指定的医生必读书。

继唐初类书《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之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许敬宗等奉诏编定《文馆词林》一千卷，龙朔元年（661年）诏许敬宗、李义府等编成《东殿新书》二百卷，《东殿新书》摘抄《史记》、《晋书》等书而成，高宗亲为制序。

龙朔三年（663年）诏许敬宗等人编成《瑶山玉彩》，据《旧唐书·高宗诸子》：

> 龙朔元年，命中书令、太子宾客许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

武周时期可考的官修书有《留司格》、《武后字海》、《武后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凤楼新城》、《孝子列女传》、《内轨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范》、《三教珠英》等。《留司格》由裴居道、岑长倩、韦方质、袁智弘、王守慎等五人奉诏撰写，垂拱元年（685年）表上，武后制序（图22）。《武后玄览》和《武后字海》由范履冰、周思茂、元万顷、胡楚宾、苗神客等人编成，据《旧唐书·元万顷传》：


图22
武则天



> 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与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咸预其选，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

《三教珠英》是一部1 300卷的大型类书，它是在《文思博要》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为了编好这部大书，天下文士网罗甚多，其中有李峤、崔湜、阎朝隐、徐彦伯、张说、沈佺

期、宋之问、富嘉谟、乔侃、员半千、薛曜、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王适、徐坚、尹元凯、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常元旦、杨齐哲、蒋凤等。

唐中宗神龙间修有《删垂拱式》、《散颁格》、《则天皇后实录》、《高宗后修实录》等。睿宗太极间修有《太极格》等。

三、玄宗之后

唐玄宗时期，官修了《开元礼》、《姓族系录》、《群书四部录》、《御刊定礼记月令》、《唐六典》、《开元礼》、《开元起居注》、《高宗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今上实录》、《开元实录》等大量史书（图23）。《姓族系录》是在《氏族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中宗时尝令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刘宪等修订，“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继而卒，乃迁为外职。至先天初，（柳）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1]。《群书四部录》200卷于开元九年（721年）编成，据《旧唐书·元行冲传》：



图23
唐玄宗李隆基

【1】《旧唐书》卷189下《柳冲传》。

> 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鄠县尉毋煚、栎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岁余书成，奏上之。

《唐六典》于开元十年（722年）始修，先后预修者有张说、徐坚、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萧嵩、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陆善经、李林甫、苑咸等。开元二十六年

（738年）编成，全书凡30卷，分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部。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

>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唯《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上毋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像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1]

《开元礼》因《大唐仪礼》、《永徽五礼》而成。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嵒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就此事于集贤院展开讨论，最后张说奏曰："《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2] 该书由贾登、张烜、施敬本、李锐、王仲丘、陆善经、洪孝昌分撰，萧嵩总其成。起居注是左史、右史所记帝王言行之书。《开元起居注》卷帙浩繁，长达3 682卷，可惜早已亡佚。

除了史书之外，还有不少法律书和类书，法律书如《开元前格》、《开元后格》、《开元式》、《开元令》、《格后长行敕》、《开元新格》等，类书如《格式律令事类》、《初学记》等。《开元前格》由姚崇、卢怀慎、李乂、苏颋等于开元三年（715年）编成表上；《开元后格》、《开元令》、《开元式》等由宋璟、卢从愿等于开元七年（719年）编成表上；《格后长行敕》由裴光庭、萧嵩等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编成表上。这些法律著作对于以法治国起了重要作用。《格式律令事类》是法律方面的专科类书。《初学记》是开元间编撰的一部类书（图24），该书三十卷，张说、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奉诏编撰，据刘肃《大唐新语》卷九："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

【1】毋煚开元间任集贤学士，据《新唐书》卷58《艺文二》之《唐六典》解题，可知预修该书者正当其人。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大唐新语》作"毋婴"，误。

【2】《新唐书》卷58《艺文二》。

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可见该书是为辅导太子学习而编。其编例集中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类书的优点，包括叙事、事对、文选三个部分：叙事即汇录有关事件；事对即将有关事件浓缩为对偶词语，两两相对，以便选用；文选即汇抄有关诗、赋、赞、铭等。闻一多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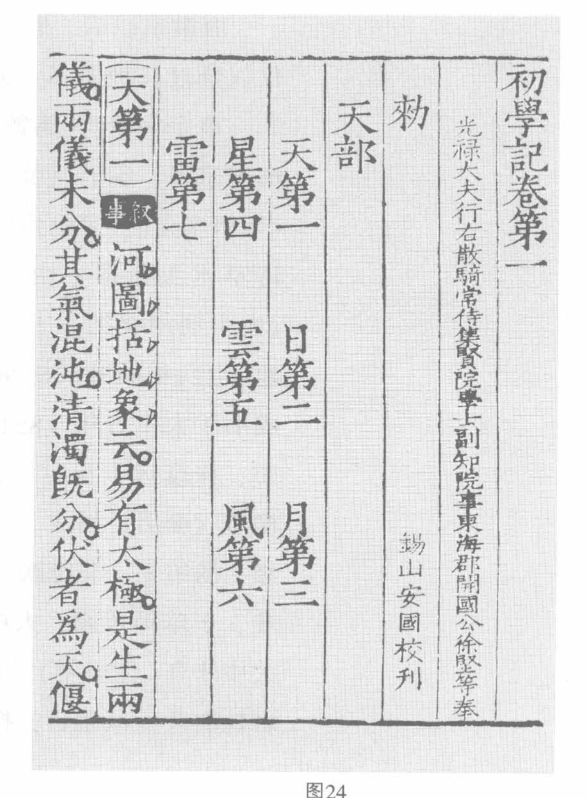

初學記卷第一
光禄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
敕　錫山安國校刊
天部
天第一　日第二　月第三
星第四　雲第五　風第六
雷第七
天第一　叙事　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

图24
《初学记》明安国刻本书影

> 《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这部书的体裁，看起来很有趣，每一项题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1]

[1] 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另外，开元间还官修了《今文尚书》、《开元文字音义》两部书。《今文尚书》修于集贤院。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以《洪范》篇“无偏无颇”声不协，诏改为“无偏无陂”。天宝三年（744年），又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为今文[2]。《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集贤院奉诏编撰，该书序云：“古文字惟《说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备所遗缺，首定隶书，次存篆字，凡三百三十部，合为三十卷。”后诏依该书改撰诸经音义，具体分工是吕证改撰《春秋音义》，郑钦说改撰《毛诗音义》，甘晖和卫包改撰《庄子音义》。

[2]《新唐书》卷57《艺文一》。

唐肃宗以后，官方修书逐渐衰落，除了例行编修实录之外，仅仅修过几种图书。据记载，唐代宗宝应间，编有《玄宗实录》和《肃宗实录》；唐德宗时，编有《建中实录》和《代宗实录》；唐宪宗时，编有《德宗实录》和《顺宗实录》；唐武宗时，编有《敬宗实录》；唐懿宗时，编有《续唐历》、《续会要》等。《毛诗草木虫鱼图》由杨嗣复、张次宗奉诏编绘，开成中奏上。《大中刑律统类》于大中五年（851年）四月编成，该书是李唐建国224年的刑法汇编，全书共分646门、2 165条。《续唐历》成书于大中五年（851年）七月，崔龟从监修，韦澳、蒋偕、李荀、张彦远、崔瑄等五人预修。该书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接续柳芳《唐历》而成。《续会要》接续苏冕《会要》而成，崔铉监修，杨绍复、裴德融、崔瑑、薛逢、郑言、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预修，大中七年（853年）成书。唐代重视科举，从大中十年（856年）以后，每年都要编写《登科记》，详记及第者姓名及所试题目，据宋王谠《唐语林》卷四：

> 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颢表曰："自武德以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郎赵璘，采访诸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仰所司逐年编次。

以上就是唐代官修书的大概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官修书约有106种，远轶前代。

第三节 唐代官修书的特点

唐代官修书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有如下特点：

第一，目的明确。官修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巩固政权服务，

官修史书尤其如此。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云："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 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也说："彰善瘅恶，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惩凶，备百王之令典。"[2]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征上疏说："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3] 很明显，其修史目的就是以史为鉴。

【1】《唐大诏令集》卷81。

【2】《唐大诏令集》卷81。

【3】《贞观政要》卷8《刑法》。

第二，史馆的建立和监修制的形成，为官修书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作为一个专门的修书机构，史馆在人才录用、岗位责任、经费开支等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制度都能保证修书工作的正常进行。在人才录用方面，严格把关，不得滥竽充数。唐高宗专门发布过有关诏令，甚至楷书手的选用都很严格，据元和十二年（817年）六月史馆奏："当馆楷书手，准元敕，同集贤例，五考足放选。今选务集贤年数仍旧，当馆更加三年，同弘文馆例，八年放选。"[4] 唐代许多著名学者都在史馆工作过，并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房玄龄曾先后预修《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五代史》等；令狐德棻曾先后预修《太宗实录》、《晋书》、《五代史》等。在岗位责任方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亭长是负责安全的；典书、掌固是负责史料收发和保管工作的；修撰、校理是负责修书的；楷书手、熟纸匠和装潢直是负责抄书、装订工作的；监修负责全面工作。在经费开支方面，史馆开支已纳入国家预算，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史馆的经费开支主要包括购书费、修撰费、材料费、抄校费等。购书费包括采购图书、采集原始资料等费用；修撰费即日常修书费用；材料费包括纸、墨等费用；抄校费包括抄书、校书等费用。

【4】《唐会要》卷64《史馆下》。

第三，就时间而言，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四朝修书最多。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与这些皇帝重视图书事业有关。他们在万机之暇，躬亲著书。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二十日，唐

太宗"撰《帝范》十三篇赐皇太子"。据《新唐书·艺文志》，唐太宗有《太宗集》四十卷、《辇上图》等著作；唐高宗有《高宗集》八十六卷、《御铨定汉书》八十七卷等著作；武后有《垂拱格》、《紫宸礼要》、《乐书要录》、《训记杂载》等著作；玄宗有《周易大衍论》、《孝经制旨》、《注道德经》、《开元广济方》、《太一枢会赋》等著作。不少官修书从选题到成书，皇帝亲自过问，唐太宗甚至亲自参与了《晋书》的撰写工作。这些皇帝重视国家藏书，诏令私人著作藏入内府之例屡见不鲜。

第四，就内容而言，四部皆备，其中实录、法律、类书等最多，均已形成系列。从唐代开始，每一个皇帝死后，继位者必敕史臣撰修实录，沿为定例，兹据《新唐书·艺文志》，唐修实录如表8：

表8　唐代实录编撰表

书　名	卷数	监修者	预修者	备　注
高祖实录	20	房玄龄	敬播	许敬宗删改
太宗实录	20	房玄龄	敬播、顾胤等	
高宗实录	30		许敬宗	
则天皇后实录	20		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	刘知几、吴兢删正
中宗实录	20		吴兢	
睿宗实录	5		吴兢	
玄宗实录	100	元　载	令狐峘	
肃宗实录	30	元　载		
代宗实录	40		令狐峘	
德宗实录	50	裴　垍	蒋乂、樊绅、林宝、韦处厚、	独孤郁
顺宗实录	5	李吉甫	韩愈、沈传师、宇文籍	
宪宗实录	40	杜元颖、韦处厚	路随	沈传师、郑澣、宇文籍、蒋係、李汉、陈夷行、苏景胤
穆宗实录	20	路随	苏景胤、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	

续表

书　名	卷数	监修者	预修者	备　注
敬宗实录	10	李让夷	陈商、郑亚	
文宗实录	40	魏謩	卢耽、蒋偕、王沨、卢告、牛丛	
武宗实录	30	韦保衡		

唐代统治者重视立法工作，律、令、格、式四类法典的编撰相当频繁，兹据《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刑法志》举例如表9：

表9　唐代法典编撰表

序号	时　间	编　者	书　名
1	高祖武德七年(624年)	裴寂等	《武德律》、《武德式》、《武德令》
2	太宗贞观初	房玄龄等	《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留司格》
3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	长孙无忌等	《永徽律》、《永徽令》、《散颁天下格》、《留本行司格》、《永徽式》、《永徽式本》
4	高宗永徽四年(653年)	长孙无忌等	《永徽律疏》
5	高宗仪凤二年(677年)	刘仁轨等	《永徽留本司格后》
6	武后垂拱元年(685年)	裴居道等	《垂拱式》、《垂拱格》、《垂拱新格》、《垂拱散颁格》、《垂拱留司格》
7	中宗神龙元年(705年)	韦安石等	《神龙散颁格》、《神龙留司格》、《神龙式》
8	睿宗太极元年(712年)	岑羲等	《太极格》、《太极式》
9	玄宗开元三年(715年)	姚崇等	《开元前格》、《开元式》
10	玄宗开元七年(719年)	宋璟等	《开元后格》、《开元令》、《开元式》
11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	裴光庭等	《格后长行敕》
12	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	李林甫等	《开元新格》、《格式律令事类》
13	宪宗元和间	权德舆等	《元和格敕》、《元和删定制敕》
14	文宗太和七年(833年)	谢登等	《太和格后敕》
15	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狄兼謩等	《开成详定格》
16	宣宗大中间	刘瑑等	《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大中刑律统类》

《新唐书·刑法志》指出：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以上法律著作对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官方也很重视类书的编撰，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开列唐代类书如表10：

表10　唐代类书编撰表

书　名	卷　数	预修者	成书时间
艺文类聚	100	欧阳询、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	约武德七年（624年）
文思博要	1 200（另目录12卷）	高士廉、房玄龄、魏征、杨师道、岑文本、颜相时、朱子奢、刘伯庄、马嘉运、许敬宗、崔行功、吕才、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司马宅相、张大素等	贞观十五年（641年）
文馆词林	1 000	许敬宗、刘伯庄等	
东殿新书	200	许敬宗、李义府等	龙朔元年（661年）
累　璧	400（另目录4卷）	许敬宗等	龙朔元年（661年）
瑶山玉彩	500	许敬宗、孟利贞、郭瑜、顾胤、董思恭等	龙朔二年（662年）
碧玉芳林	450	孟利贞等	
芳林要览	300	许敬宗、顾胤、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涛、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等	
策　府	582	张大素	
玄　览	100	武后等	

续表

书名	卷数	预修者	成书时间
三教珠英（开元初易名《海内珠英》）	1 300（另目录13卷）	张昌宗、李峤、崔湜、阎朝隐、徐彦伯、张说、沈佺期、宋之问、富嘉谟、乔侃、员半千、薛曜等	
玄宗事类	130		
初学记	30	张说、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	开元中
十九部书语类	10	是光乂（后赐姓齐）	开元末
文府	20	徐坚、贺知章、赵冬曦	开元间

第五，书成奏上御览，进书表言成书经过，备列预修者官职姓名。进书表多为官样文章，不乏吹捧今上皇帝之词。如获恩准，预修者照例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报赏。报赏内容包括赐物、晋级、封爵、发给钤有御印的奖励证书等。这些报赏可视为今之“稿费”，说明最高统治者尊重编撰者的辛勤劳动，是对编撰者辛勤劳动的认可。例如武德七年（624年），欧阳询等修成《艺文类聚》二百卷，“赐帛二百段”[1]；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撰《梁书》、《陈书》成，“赐彩绢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2]；贞观十年（636年），令狐德棻预修《周史》有功，“赐绢四百匹”[3]；贞观十一年（637年），孔颖达等编《五礼》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4]；令狐德棻等撰《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5]。

【1】《旧唐书》卷189上《欧阳询传》。

【2】《旧唐书》卷73《姚思廉传》。

【3】《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4】《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

【5】《唐会要》卷36《修撰》。

第六章　唐代私人图书编撰（上）

在官方修书的带动下，唐代私人图书编撰活动非常繁荣，刘知几《史通》的产生，在图书编撰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图书内容方面，别集的编撰尤其引人注目。白居易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勤于编撰别集的人，其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节　刘知几及其《史通》

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所著《史通》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中国图书编撰史上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

一、刘知几其人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人。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从他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出生，至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历时19年。孩提时代，其父刘藏器使学《古文尚书》，因“其辞艰琐，难为讽读”，屡遭捶楚[1]。后改学《春秋左氏传》，进步甚快，不到12岁已能讲诵。接着，刘知几又遍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历代实录等重要史书，到了17岁，已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

【1】《史通》卷10《自叙》。

概”[1]。在读书过程中，尤能独立思考，发现了不少问题，例如班固《汉书》的《古今人表》没有西汉人物；谢沈《后汉书》没有汉末更始帝刘玄本纪。时人以为“童子何知”，不该“轻议前哲”[2]。后读张衡、范晔的文集，果以“二史为非”。如此“暗合于古人者”，不可胜数[3]。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为刘知几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史通》卷10《自叙》。

【2】《史通》卷10《自叙》。

【3】《史通》卷10《自叙》。

第二时期为出任获嘉主簿时期。这个时期从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至武后圣历二年（699年），历时19年。永隆元年（680年），刘知几刚刚20岁，就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任获嘉主簿，掌管文书，参预机要。虽然他对主簿一职并无多大兴趣，但他还是恪尽职守，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曾两次上疏、两次上表，对国家大事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由于他性情直爽，不善逢迎，升迁无望。在获嘉一干就是19年，度过了三分之一的青春年华。武则天当政时期，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酷吏盛行，人人自危。刘知几曾写《思慎赋》以自诫。在学术方面，刘知几此时已颇有文名，但他“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4]，决心把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方向。为此，他在从政之暇，继续博览群书，或借于公，或借于私，“恣情披阅”[5]。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获嘉生活的19年，他终于没有给我们留下传世佳作。

【4】《史通》卷10《自叙》。

【5】《史通》卷10《自叙》。

第三时期为京都任职时期。这个时期从武后圣历二年（699年）至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历时22年。圣历二年（699年）刚满39岁的刘知几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他被调至京都担任右补阙及定王府仓曹的职务，开始了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时期。由于才华出众，不久就去参加《三教珠英》的撰写工作。长安二年（702年）升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的职务，很快又担任左史，撰写起居注，长安四年（704年），担任凤阁舍人之职；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担任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等职；景龙二年（708年）任修文馆学士；景龙三年（709年）任秘书少监，修史如故；开元二年（714年）任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辉煌经历[6]，终于使刘知几

【6】《史通》卷10《自叙》。

能够在史学方面脱颖而出。除了《三教珠英》之外，他先后参预了《睿宗实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姓族系录》等官书的编撰工作。从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开始，刘知几“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1]，而成《史通》一书。可见《史通》的撰写过程可分两步：第一步是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下笔不休，遂盈筐箧”；第二步是进行统稿工作，“区分类聚，编而次之”。《史通》从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撰写，至中宗景龙四年（709年）成书，历时八年。

【1】《史通·原序》。

第四时期为贬职安州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年时间。开元九年（721年），长子刘贶因事流放，刘知几以为不公，找有关方面论理，玄宗大怒，因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溘然长逝，终年61岁。死后数年，玄宗敕河南府派人到他家抄录《史通》以进，读后大为赞赏，追赠汲郡太守，寻又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成功之作。刘知几成功的原因何在？

第一，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从祖刘胤之是著名史学家，与李百药、令狐德棻等一起修史，封阳城县男；父亲刘藏器学识渊博，在经学、文学方面造诣较高。刘知几和刘知柔、刘知章、刘居简、刘贲、刘含章等兄弟六人（含堂兄弟3人）均登进士第，以文学知名。其中，刘知柔官至工部尚书，封彭城侯；刘居简曾任太原令；刘贲曾任太平令。据《新唐书·刘子玄传》:“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号其乡曰高阳，里曰居巢。”“高阳”、“居巢”是两个极为光彩的荣誉称号。据说上古的时候，一个部族首领高阳氏的八个儿子个个德才兼备，后人因以“高阳”形容某家子弟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居巢”传说是一个古帝王居住的风水宝地，西楚霸王项羽的亚父范增就是居巢人。

第二，众多友朋帮助了他。刘知几在京都期间，结识了徐坚、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一批知心朋友。这些友朋人品高尚，博学多才，对他影响很大。其中，徐坚（659—729），字元固，湖州长城人，著名学者，历仕给事中、黄门侍郎、太子詹事、集贤院学士等职，曾与刘知几共事多年，刘知几在谈到他和徐坚等的关系时说："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1] 可见二人心心相印，推心置腹。朱敬则（635—709），字少连，亳州永城人，唐代大臣，著名史学家。历仕洹水尉、右补阙、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等职。对武后弊政直言敢谏，精通史学，除预修国史外，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事，著《十代兴亡论》等。他比刘知几大26岁，堪称"忘年交"。刘允济（约650—约710），洛州巩人，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弱冠举进士，历仕著作佐郎、著作郎、凤阁舍人、青州长史等职。早年诗文与王勃齐名。后与刘知几等参加国史修撰工作，有《鲁后春秋》等著作。薛谦光（647—719），精于文学和史学，与徐坚、刘知几齐名，交谊甚笃，有《四时记》等著作。元行冲（653—729），名儋，以字行，河南洛阳人，举进士，历仕太常少卿、弘文殿学士等职。博学多才，尤精音律及诂训，有《魏典》、《群书四录》等著作。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人，历仕右补阙、起居郎、水部郎中等职，参与修史30多年，直书不讳，文字简明，受到人们的称赞。尝与刘知几等同修《则天实录》，有《梁史》、《齐史》、《周史》、《陈史》、《隋史》、《贞观政要》等著作，其中《贞观政要》影响最大。裴怀古（约650—710），寿州寿春人，历仕祠部员外郎、相州刺史、幽州都督、左威卫大将军等职。

【1】《史通》卷10《自叙》。

第三，史馆的遭遇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刘知几虽然在史馆任职有年，但他处处碰壁，不能贯彻自己的史学思想。中宗

神龙元年（705年）重撰《则天实录》，刘知几和徐坚、吴兢等人参与其中，监修官每“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常常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1]，《史通》的写作正好为他畅所欲言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史通》正是这样一部发愤之作。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刘勰《文心雕龙》等书为例，说明诡说盛行、善恶难分的结果必然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出现总结性的著作。刘知几颇为自信，把写作《史通》当作历史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当作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史通》卷10《自叙》。

《史通》写成之后，能否流传后世？能否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刘知几十分关心。他把自己同汉代扬雄加以对比，认为二人有四同、一不同。四同是：（一）二人早年均爱好文学，晚年改行；（二）扬雄写《太玄经》和自己写《史通》，“悠悠尘俗，共以为愚”；（三）扬雄撰《解嘲》，回击时人对《法言》的指责；自己撰《释蒙》，回答时人对《史通》的否定；（四）二人的名声晚年均不如早年。一不同是：扬雄《太玄经》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其书必传，后来著名学者张衡、陆绩等均高度评价此书[2]。而《史通》一书，虽然当代学者徐坚、朱敬则等加以肯定，徐坚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3]但是后来会不会出现类似张衡、陆绩那样的人就很难说了。刘知几比较悲观，他担心数百年后，此书会“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想到这里，他“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4]。这说明刘知几不仅发愤著书，而且具有强烈的传世意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史通》卷10《自叙》。

【3】《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

【4】《史通》卷10《自叙》。

实践证明，刘知几的担心是多余的。后世除了明于慎行等少数人否定该书之外，宋黄庭坚、明张之象、清章学诚等大多数学者均给以高度评价。《史通》问世1 300年后的今天，学术界更是形成一股《史通》热，《史通》成为一部流芳百代的史学名著。

二、《史通》与史书编撰

《史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史学的众多问题，“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1]。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内篇包括39篇文章，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佚；外篇包括13篇文章。全书共52篇，存49篇。让我们从史书编撰的角度分析一下《史通》的内容。

【1】《史通》卷10《自叙》。

第一，强调了史书的社会功用。他在《曲笔》篇中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在《直书》篇中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就是说，史书记载功过得失，可使“贼臣逆子”遗臭万年；可使好人好事流芳千载。《史官建置》篇又说：史书可“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段话对史书的功用作了总结性的说明：一是“生人之急务”，可使活着的人不断加强修养，“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二是“国家之要道”，史书可“劝善惩恶”使国家长盛不衰。

第二，历数史官源流，论述了史官应该具备的重要素质。关于史官源流，《史官建置》篇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西汉“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兰台、东观是东汉史官修书的地方。三国“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晋代隶属秘书省的著作郎“谓

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后，“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北魏初期没有专门设置史官，后来，“始于秘书置著作局”。北齐、周至隋代，“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唐朝建立后，“别置史馆，通籍禁门”。不少人“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词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刘知几在《核才》篇中列举大量事例，说明真正能够做到“刊勒一家，弥纶一代”的史官是不多见的，“史才之难，其难甚矣”。他在《辩职》篇中认为监修史书更难，“斯乃尤之尤者”，唐代监修官大多为“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他们不辨善恶，“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刘知几在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才”、“学”、“识”的“三长”标准[1]。

【1】《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

第三，关于史书体例，《史通》提出“六家”、“二体”之说。《史通·六家》云：

>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

这六种史书体例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和《汉书》家。由于《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于是乃有“二体”说。“二体”即指断代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刘知几所谓“正史”即指以上“二体”。史书体例除了正史之外，还有杂史，《史通·杂述》云：

> 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

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虽然刘知几所说的“六家”、“二体”及十种“杂史”并不能完全包括所有史书体例，但基本上是唐代以前史书体例的总结。在史书体例之中，《史通》对于纪传体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类目言之甚详：

（一）关于本纪，《史通·本纪》云：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刘知几对《史记》称项羽为“本纪”极为不满，“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

（二）关于世家，《史通·世家》云：世家就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的意思。刘知几对《史记》称陈胜为“世家”亦大不满：“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三）关于列传，《史通·列传》说明了列传常用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若陈余、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另一种是“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

（四）关于表历，《史通·表历》云：

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这说明了刘知几反对列表。然而，《史通·杂说上·诸汉史》又说：

>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这说明刘知几赞成列表。为什么会出现前后矛盾的内容呢？因为《史通》各篇写非一时，没有进行认真的汇编、整理工作。

（五）关于书志，《史通·书志》对历代正史的《书》、《志》多所批评："大抵《志》之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间则有妄入编次，虚张部帙，而积习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刘知几批评《汉书·艺文志》说：

> 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

他批评《魏书·释老志》说："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他批评《隋书》《天文》、《经籍》二志说：

> 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他尤其反对《艺文志》：

>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

刘知几认为：

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六）关于论赞，《史通·论赞》认为司马迁《史记》的论赞“淡泊无味”；陈寿《三国志》的论赞“偄缓不切”；班固《汉书》的论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荀悦《汉纪》的论赞“义理虽长，失在繁富”。汉代以后各书的论赞“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另外，《史通·序例》还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篇序和凡例。

第四，关于史书内容。刘知几在《书事》篇中指出：史书的内容应有“五志”、“三科”。关于“五志”，他引用汉代荀悦的话说：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除了“五志”之外，刘知几又补充了“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他进一步解释说：“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总而言之，刘知几认为，史书内容要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全貌，忠实记录军国大事和各种制度，表彰对历史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功臣和贤才，鞭挞逆潮流而动的历史罪人。还要记载能够宣扬封建道德的忠臣孝子、贞妇和各种怪异现象。他认为，修写符瑞、详记朝觐、虚衔备载、赘录世官，是史书内容的四大弊

病。到了唐朝仍然是“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好的史书应该是“简而且详，疏而不漏”。

第五，关于史书编撰的具体方法，《史通》也多有论述，兹分别介绍如下：

（一）主张叙事、言论分开，不要在叙事时夹杂文章、书奏。据《史通·载言》：

> 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可见刘知几反对言、事杂书，是因为言、事杂书切断了事情发展的脉络，令读者“有所懵然”。

（二）关于选材问题。《史通·采撰》首先论述了博取题材的重要性：

>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接着又谈到题材的复杂性：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或“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或“讹言难信，传闻多失”；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面对如此复杂

的题材，绝对不可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应严加选择。

（三）关于史书的详略问题。《史通·烦省》说：春秋各国“闭境相拒，关梁不通”，信息闭塞，《春秋》“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西汉“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所以，西汉史书倍增于《春秋》。到了东汉，“作者弥众”，“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所以，东汉史书又多于西汉。可见，详近略远是写史的必然趋势，“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评论史书，不要把详略当做最终目的，“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四）关于标题问题。《史通·题目》云：“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篇章标题应与内容相合，例如《史记》皇后传以“外戚”作为篇名，就与内容不合。标题用字应以简明为要，如列传标题，一个单独成篇者，具列姓名，如《司马相如传》等；一篇多人者，唯书姓相同者，可结定其数，如“二袁”、“四张”、“二公孙”等。但是，到了范晔《后汉书》，便在题目中全录姓名，其附出人物，亦用细字列其名于主题之下。魏收《魏书》尤为琐碎，“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这些内容既已详述于传内，又重标于篇首，造成不必要的重复。

（五）关于断限问题。断限就是划分历史阶段的意思。刘知几《史通·断限》所谓“断限”就是划清朝代与朝代之间的界限。作为断代史书，只应记本朝史实，不得超越这个朝代的界限。如果是一国之史，则不应超越本国的界限。他认为《汉书》、《隋书》等并未严守这个纪律，《汉书》是西汉史书，而“表志所录，乃尽牺年”，《隋书》是隋代史书，“则仰包梁代”。刘知几认为“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

（六）关于叙事问题。《史通·叙事》云：“夫史之称美者，以

叙事为先。”刘知几在此讲了史书的文风问题，他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叙事必须“简要”，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有些史书“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叙事文不在多而在精，“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钧，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第二，叙事主张“用晦”。晦和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用晦”决不是故意隐约其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而是“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怎样才能达到“用晦”呢？“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清，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第三，叙事不可妄饰。所谓“妄饰”，即指那些不切实际的虚浮之词。刘知几列举了许多妄饰之例，例如诸子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妄饰”的结果是“刻鹄不成，反类于鹜”。

（七）关于人物语言问题。刘知几主张把当时的口语如实写在史书中，只有这样，才能“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史通·言语》指出有些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有些作者“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这些做法应当加以纠正。

（八）关于书法问题。史书的书法有直书、曲笔两种：直书则明文严词，不避权贵；曲笔则文过饰非，取媚当道。刘知几认为史书应当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1]。《史通·直书》赞扬了那些仗义执言

[1]《史通·曲笔》。

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并分析了他们以身殉职的原因："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史通·曲笔》批评了那些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人，并指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既然如此，"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他呼吁："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以上就是《史通》的主要内容。如此全面系统地论述史书编撰的种种问题，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尚属首次，它说明唐代图书编撰已经达到新的水平。综观全书，《史通》有两大特点：一是刘知几的通识观。为什么书名《史通》呢？刘知几在《史通·自序》中说："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自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刘知几虽然没有对"通"字作出明确解释，但不言而喻，通者，融会贯通也。班固等《白虎通》是统一汉代经学纷争之后产生的一部权威性著作；司马迁《史记》更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名著。显然，刘知几《史通》也是一部熔古今左右为一炉的不朽之作。从纵向看，刘知几研究了从远古到唐玄宗开元间3 000多年的史学史；从横向来看，刘知几研究了唐代史学界面临的种种问题，他把微观和宏观结合在一起，既具体而微研究了一个个史家和著作，又高瞻远瞩，指出了3 000年史学的走向。据统计，刘知几在《史通》中，共列举史家265人、史书249部，其中，先秦两汉史家43人、史书60部；魏晋十六国史家94人、史书87部；南北朝史家79人、史书80部；隋唐史家49人、史书22部[1]。《史通》就是在评论众家、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写成的。二是刘知几的怀疑批判精神。刘知几在《疑古》篇中对《尚书》、《论语》二书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中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在《杂说》和《暗惑》篇中对唐玄宗以前的多种纪传体史书提出批评；在《五行志错误》篇

【1】赵俊等：《刘知几评传·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中，对班固《汉书·五行志》提出批评；在《五行志杂驳》篇中，对春秋时代五行记载的得失进行评论。凡此种种，刘知几对全书涉及的265位史家和249部史书都进行了批评，无一幸免。然而，刘知几的批评大多是客观的，并非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做法。例如他虽然指出了《春秋》的12条缺点，但他对《春秋》还是推崇的；他虽然极力称赞《左传》，但在《杂说》中又多次批评《左传》。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刘知几"抑马扬班"或是"抑班扬马"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既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班固的历史地位，又毫不留情地指出其不足，似不存在"抑"谁"扬"谁的问题。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刘知几关于史书编撰的论述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例如他批评司马迁《史记》不该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为"世家"便是一例。刘知几"对'世家'的理解，是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综合产物，这同司马迁把'世家'作为记载诸侯或某些虽非诸侯但确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人物的历史篇目，是迥然不同的。在怎样看待陈涉和《陈涉世家》这个问题上，刘知几和司马迁的分歧在于：刘知几只着眼于陈涉的子嗣、家世，司马迁则瞩目于陈涉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刘知几是把陈涉作为孤立的个人看待，司马迁则把陈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考察"[1]。显然，二者的史识是不同的。另外，《史通》关于《艺文志》等问题的论述，亦非确论。

【1】瞿林东：《读〈史通〉札记》，《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

第二节　唐代别集的编撰

唐代别集数量极多，不少人参与了编撰活动，兹就别集编撰可考者举例如表11[2]：

【2】本表资料出自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出处"栏"初盛"代表该书"初盛唐卷"；"中"代表该书"中唐卷"；"晚"代表该书"晚唐卷"。

表 11　唐代别集编撰例表

书　名	卷数	著　者	编　者	编辑时间	出　处
东皋子集	5	王　绩	吕　才	贞观十八年(644 年)后	初盛 p106
王勃集		王　勃	王勮、王勔	约在嗣圣元年(984 年)	初盛 p292
宋之问集	10	宋之问	武平一	先天元年(712 年)后	初盛 p493
崔液集	10	崔　液	裴耀卿	开元二年(714 年)后	初盛 p513
权若讷集	30	权若讷	权德舆	开元十六年(728 年)	初盛 p639
孟浩然集	4	孟浩然	王士源	天宝四年(745 年)	初盛 p792
孟浩然集	4	孟浩然	韦　縚	天宝九年(750 年)	初盛 p841
巴陵诗集		贾　至	贾　至	宝应元年(762 年)	中 p113
草堂集	20	李　白	李阳冰	宝应元年(762 年)	中 p111
卢象集	12	卢　象	卢元符	广德元年(763 年)	中 p125
文　编	10	元　结	元　结	大历二年(767 年)	中 p188
庐陵集	10	颜真卿	颜真卿	大历三年(768 年)	中 p197
毘陵集	20	李　中	梁　肃	大历十二年(777 年)	中 p309
皇甫冉诗集	3	皇甫冉	皇甫曾	大历六年(771 年)后	中 p236
临川集	10	颜真卿	左辅元	大历六年(771 年)	中 p235
杜甫小集	6	杜　甫	樊　晃	大历六年(771 年)	中 p238
崔沔集	29	崔　沔	崔祐甫	大历七年(772 年)	中 p252
李华中集	20	李　华	李　羔	大历八年(773 年)	中 p265
吴兴集	10	颜真卿	颜真卿	大历十二年(777 年)	中 p311
独孤及集		独孤及	梁　肃	大历十二年(777 年)后	中 p309
寒山子集	3	寒　山	徐灵府	大历间(766—779 年)	中 p294
李翰前集	30	李　翰	李　翰	建中元年(780 年)前后	中 p348
宗玄集	30	吴　筠	王　颜	贞元十八年(802 年)	中 p588
权德舆集	50	权德舆	权　宪	元和十三年(818 年)后	中 p781
刘商诗集	10	刘　商	武元衡	元和二年(807 年)前后	中 p651
使东川集	1	元　稹	白行简	元和四年(809 年)	中 p664
元稹集	20	元　稹	元　稹	元和七年(812 年)	中 p708
澈上人文集	10	(释)灵澈	秀　峰	元和十一年(816 年)后	中 p763
河东先生集	30	柳宗元	刘禹锡	元和十四年(819 年)	中 p796

续表

书 名	卷数	著 者	编 者	编辑时间	出 处
元稹集	5	元 稹	元 稹	元和十四年(819 年)	中 p799
吕和叔文集	10	吕 温	刘禹锡	元和十五年(820 年)	中 p812
韩愈文集		韩 愈	李 汉	长庆四年(824 年)	中 p860
周贺诗集	1	周 贺	周 贺	会昌六年(846 年)前	晚 p198
顾况集	20	顾 况	顾非熊	太和二年(828 年)	晚 p27
白郎中集		白行简	白居易	太和二年(828 年)	晚 p287
刘氏集略	40	刘禹锡	刘禹锡	太和七年(833 年)	晚 p97
李绛集	20	李 绛	刘禹锡	太和七年(833 年)	晚 p7
漆奁集	130	令狐楚	令狐綯	开成二年(837 年)后	晚 p150
追昔游诗	3	李 绅	李 绅	开成三年(838 年)	晚 p160
文泉子集	10	刘 蜕	刘 蜕	会昌二年(842 年)	晚 p207
会昌一品集	15	李德裕	李德裕	大中元年(847 年)	晚 p281
樊南四六甲集	20	李商隐	李商隐	大中元年(847 年)	晚 p283
樊川集		杜 牧	裴延翰	大中六年(852 年)	晚 p391
乌丝栏诗		许 浑	许 浑	大中四年(850 年)	晚 p322
欧阳詹文集	10	欧阳詹	李贻孙	大中六年(852 年)	晚 p346
樊南乙集		李商隐	李商隐	大中七年(853 年)	晚 p365
李群玉集	3	李群玉	李群玉	大中八年(854 年)	晚 p374
笠泽丛书		陆龟蒙	陆龟蒙	乾符六年(879 年)	晚 p676
周朴诗集	2	周 朴	林 嵩	广明元年(880 年)后	晚 p674
孙可之集	10	孙 樵	孙 樵	中和四年(884 年)	晚 p749
一鸣集	30	司空图	司空图	光启三年(887 年)	自序
李观集	3	李 观	陆希声	大顺元年(890 年)	晚 p810
唐风集	3	杜荀鹤	顾 云	景福元年(892 年)	晚 p827
东浮集	10	崔道融	崔道融	乾宁二年(895 年)	晚 p864
玄英先生诗集	10	方 干	杨弇、杨郃	乾宁三年(896 年)	晚 p769
云台编	3	郑 谷	郑 谷	乾宁四年(897 年)	晚 p896
舟中录	20	钱 珝	钱 珝	光化三年(900 年)	晚 p919
李翰林集		李 白	魏 颢	天宝十五年(756 年)	初盛 p902
陶翰集	1	陶 翰	綦毋通	天宝十三年(754 年)后	初盛 p917

下面重点介绍魏颢、颜真卿、李贺、韩愈、元稹、白居易（见下节）、刘禹锡、杜牧等人的别集编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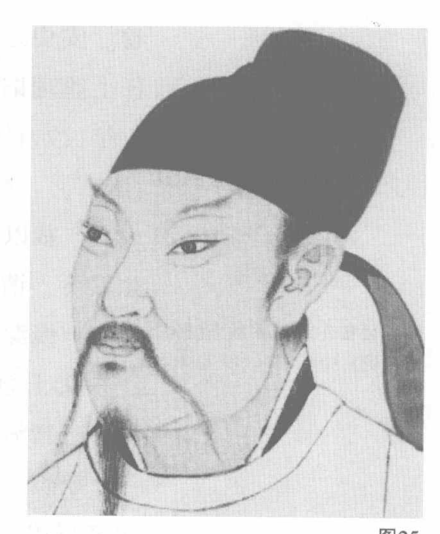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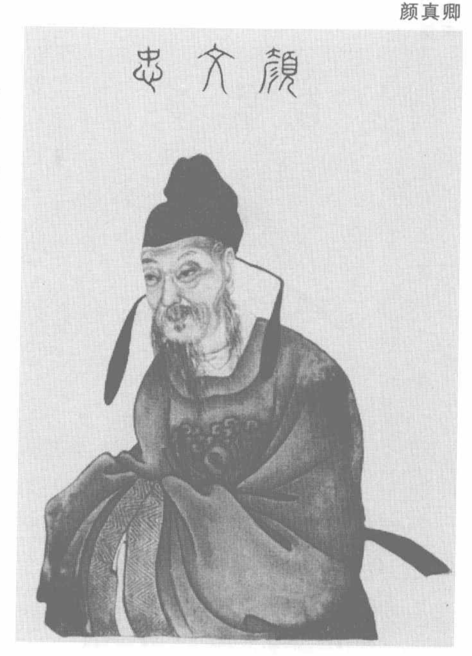


图25
李白

魏颢（亦名万），王屋山（今河南济源）人，事迹未详。他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诗集的第一个编辑者。魏颢仰慕李白（图25），不远千里追踪李白，从北方一直追到南方。二人在广陵相遇后，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李白《送王屋山人魏颢还王屋》诗云："东游汴河水，访我三千里。"魏颢《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云："一长复一少，相见如兄弟。"李白见其忠厚诚恳，认为日后必有所成，对他十分相信，除了让他照看孩子明月奴之外，还把全部诗稿托付给他，要他编辑成集。唐肃宗上元中，魏颢果然考中进士，并把李白诗作结集为《李翰林集》，他在序中写道："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这是李白诗集的祖本。其后又有李阳冰本和范传正本。以上三个本子早已荡然无存，今传李白诗集是宋人编辑的。

图26
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琅玡临沂人。唐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图26）。开元进士，历仕平原太守、吉州别驾、抚州刺史、湖州刺史等职。颜真卿在从政之暇，念念不忘别集编撰：大历二年（767年），任吉州别驾时编《庐陵集》十卷，时年59岁；大历六年（771年）任抚州刺史时，令左辅元编《临川集》十卷，时年63岁；大历十二年（777年）任湖州刺史时，编《吴兴集》十卷，时年68岁。另外，还有《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礼乐集》十卷，《颜氏家谱》一卷，《历古创置仪》一卷等。其中《韵海镜源》初编于天宝十二载（753年），至安史之乱时，修成200

卷。安史之乱时，中辍数十年。大历四年（769年）在抚州刺史任上重理旧业，与左辅元、姜如璧等增而广之，为500卷。大历六年（771年）在湖州刺史任上修订全书，定为360卷。该书“据《法言》、《切韵》次其字，按经史及诸子语据音韵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类编；又按《仓雅》及《说文》、《玉篇》等，其义各注其下，谓之字脚。韵海者，以牢笼经史之语，以韵次之，其多如海；镜源者，八体之本，究形声之义，故曰镜源”[1]。预修者有江东文士萧存、陆士修、裴澄、陆羽、顾祭、朱弁、李萧、汤涉、释智海、释皎然等数十人。可惜该书早已失传。

【1】《颜鲁公文集》附殷亮《鲁公行状》，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图27）。父名晋肃，因避家讳不得应进士第，只担任过品秩低微的奉礼郎，后弃官还乡。早岁工诗，见知于韩愈、皇甫湜，死年仅27岁，有《昌谷集》。其友沈子明回忆说：“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2] 可知李贺诗集由李贺本人委托其友沈子明编成。而据唐张固《幽闲鼓吹》卷一：

【2】［唐］杜牧：《李长吉歌诗·序》。

图27
李贺



>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为笔砚之旧，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得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

这段记载虽然不足凭信，但它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唐人重视别集编撰，身后常有别集编撰之举。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

孟县）人，著名文学家（图28）。贞元进士，历仕监察御史、潮州刺史、吏部侍郎等职，仕途多艰。韩愈自幼刻苦学习，每天背诵几百字到几千字的文章。出仕后，仍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一刻也没有停止读书学习。博览群书为其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韩愈认为著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他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韩愈青壮年时，在文坛上已负盛名，好友劝他早早著书，他谢绝了，他说:“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2] 另外，韩愈关于“不平则鸣”的思想，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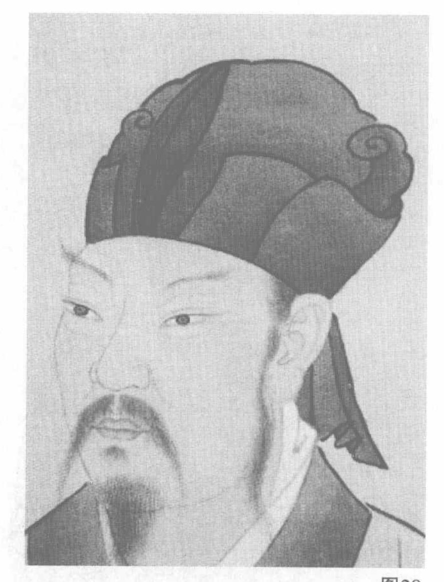


图28 韩愈

【1】《昌黎先生集》卷12《进学解》。

【2】《昌黎先生集》卷14《答张籍书》。

>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这就是说，声音之产生是“不得其平”的结果，一个人如果历经磨难，就会“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许多传世之作，都是这样产生的。韩愈的著作有《论语笔

解》、《顺宗实录》、《昌黎杂说》、《昌黎诗钞》、《韩子粹言》、《韩昌黎尺牍》等，以上著作均收入《昌黎先生集》。



图29
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图29）。唐代著名诗人，历仕监察御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与白居易友善，人称“元白”。元白诗风行海内，影响甚大。元稹在别集编撰方面有三个特点：第一，结集次数较多。纵观元稹一生，其诗文至少有三次结集：第一次在元和七年（812年）至十年（815年）。在通州司马任所应好友之请，集诗八百余首，分为二十卷。他说：“适值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僻好仆诗章，谓为能解，欲得尽取观览，仆因撰成卷轴。”[1] 第二次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编古体歌体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共五卷。据《旧唐书·元稹传》：宰相令狐楚谓稹曰：“尝览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之久矣。请出其所有，以豁予怀。”可见这次结集是应宰相令狐楚之请而进行的。第三次在长庆元年（821年），自编杂诗十卷，奉旨上献穆宗。此外，长庆四年（824年），元稹还为好友白居易编《白氏长庆集》。第二，传世意识较重。他和白居易俱无嗣子，深以为忧。在《郡务稍简，因得整比旧诗，并连缀焚削封章，繁委箧笥，仅逾百轴，偶成自叹，因寄乐天》一诗中说：

【1】《元稹集》卷30《叙诗寄乐天书》。

> 近来章奏小年诗，一种成空尽可悲。
> 书得眼昏朱似碧，用来心破发如丝。
> 催身易老缘多事，报主深恩在几时？
> 天遣两家无嗣子，欲将文集与它谁？[2]

【2】《元稹集》卷22。

这首诗的核心是一个“悲”字，“悲”什么呢？—悲“报主

深恩在几时”；二悲“欲将文集与它谁”，也就是说，文集无人可托，无人可传。然而，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又是那样高兴，高兴什么呢？

>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元稹为作品“流传之广”而高兴，一悲一喜，正好反映了元稹浓重的传世观念。第三，重视编撰方法。他在元和七年（812年）第一次结集时，将诗歌分为古讽、乐讽、律诗、律讽、艳诗等10类，长庆四年（824年）编《白氏长庆集》，将白居易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等类别。他对序言的撰写方法也有研究。他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至于乐天之官秩景行，与予之交分浅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书。”可见他认为书序的重点应在图书本身之评介，而不在于作者之“官秩景行”和与写序者的“交分浅深”。

图30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图30）。贞元进士，历仕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郎州司马、礼部侍郎、苏州刺史等职。还曾担任太子宾客职，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谊甚笃，人称“刘柳”；

与白居易唱和甚多，人称“刘白”。有《刘禹锡集》。刘禹锡对于图书编撰的贡献有三：

第一，积极参与图书编撰活动，其编撰别集数量之多，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少见的。兹开列刘禹锡编撰的别集书目如下：

（一）元和十五年（820年）编吕温《吕衡州集》十卷。其《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云：“（吕温）四十而没，后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遗草来谒，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1]

【1】《刘禹锡集》卷19，中华书局，1990年。

（二）长庆四年（824年）编成《柳宗元集》三十卷于夔州。据其《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

> 谪佐永州，居十年，诏书征，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某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某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2]

【2】《刘禹锡集》卷19。

（三）太和七年（833年）编已作为《刘氏集略说》，其序曰：

>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前年，蒙恩泽，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适晴，喜，躬晒书于庭，得已书四十通。逌尔自哂曰：“道不加益，乌用是空文为！真可供酱蒙药楮耳。”它日，子婿博陵崔生关言曰：“某也，向游京师，伟人多问丈人新书几何，且欲取去，而某应曰无有，辄愧起于颜间。今当复西，期有以弥愧者。”由是删取四之一为《集略》，以贻此郎，非敢行乎远也。[3]

【3】《刘禹锡集》卷20。

太和七年（833年）编《李绛集》二十卷。其《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云：

（死）后三年，嗣子前京兆府户曹掾璆、次子前监察御史里行项等，泣持遗草请编之。肇自从试有司，至于宰天下，词赋、诏诰、封章、启事、歌诗、赠饯、金石、飏功，凡四百余编，勒成二十卷。[1]

【1】《刘禹锡集》卷19。

（四）开成二年（837年）十一月编《令狐楚集》一百三十卷，据其《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

嗣子左补阙绹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长子太子左谕德弘分司东都，负其笥来谒，泣曰："先正司空与丈人为显交，撤悬之前五日，所赋诗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泽尚存。"言之呜咽长号，予为之恸，收泪而视，分当编次之。[2]

【2】《刘禹锡集》卷39。

此集当由令狐楚嗣子令狐绹初编，后由刘禹锡编定。

除了编撰以上别集之外，刘禹锡还编有《吴蜀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传信方》等。《吴蜀集》编于太和六年（832年），是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集，其《吴蜀集引》云：

长庆四年，余为历阳守，今丞相赵郡李公时镇南徐州，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尔后出处乖远，亦如邻封。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云。[3]

【3】《刘禹锡集》卷39。

《彭阳唱和集》编于太和七年（833年），是刘禹锡与令狐楚的唱和集，其《彭阳唱和集引》云：

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吴门，相去回远，而音徽如近，且有书来抵，曰："三川守白君编录与吾子赠答，缄缥囊以遗余，白君为词以冠其前，号曰《刘白集》。悠

悠思与所赋，亦盈于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诮？”于是缉缀，凡百有余篇，以《彭阳唱和集》为目，勒成两轴，尔后继赋，附于左方。[1]

【1】《刘禹锡集》卷39。

《汝洛集》编于开成元年（836年），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集，其《汝洛集引》曰：

太和八年，予自姑苏转临汝，乐天罢三川守，复以宾客分司东都。未几，有诏领冯翊，辞不拜职，授太子少傅分务，以遂其高。时予代君左冯。明年，予罢郡，以宾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欢。因而编之，命为《汝洛集》。[2]

【2】《刘禹锡集》卷39。

《传信方》编于元和十三年（818年），是一部药方汇编，其《传信方述》云：

余为连州四年，江华守河东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验方》十通为赠，其志在于拯物。予故申之以书。异日景晦复寄声相谢，且咨所以补前方之阙。医拯道贵广，庸可以学浅为辞！遂于箧中得已试者五十余方，用塞长者之问。皆有所自，故以《传信》为目云。[3]

【3】《刘禹锡集》卷39。

第二，热情撰写书序，向读者推荐好书。除了上文已引的《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刘氏集略说》、《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吴蜀集引》、《彭阳唱和集引》、《汝洛集引》、《传信方述》等序之外，还撰有《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韦处厚）集纪》、《澈上人文集纪》、《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卢象）集纪》、《董氏（董挺）集序》、《彭阳唱和集后引》等。刘禹锡把撰写书序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积极推荐名人名

作，新人新作。钜鹿魏生发奋著书二十年，成《兵要》十卷，然"孤鸣甚哀，卒无善听者"，简直失去了自信，后来，他想起了刘禹锡。刘禹锡"取书观之，始自黄帝伏蚩尤，终于隋氏平江南，语春秋、战国事最备，磅礴上下数千年间，其掯摭评议无遗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贵人，宜有虚己而乐闻者，子盍行乎！"[1] 刘禹锡热情地为此书写了序言，鼓励魏生将该书公布于世，魏生转忧为喜，看到了希望。

【1】《刘禹锡集》卷20《魏生兵要述》。

第三，编撰思想，多有可取。首先，刘禹锡重视图书的作用，他说：

> 呜乎！咫尺之管，文敏者执而运之，所如皆合。在藩耸万夫之观望，立朝贲群僚之颊舌，居内成大政之风霆。导畎浍于章奏，鼓洪澜于训诰。笔端肤寸，膏润天下。文章之用，极其至矣。[2]

【2】《刘禹锡集》卷19《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

"笔端肤寸，膏润天下"八字精辟地阐明了著书立说的作用，刘禹锡主张"道不加益"，不可著书，反对那种空话连篇、无病呻吟的著作。其次，刘禹锡提出"穷愁著书"的观点。它概括了古今著书的普遍现象，不平则鸣。当一个人处于逆境时，他就可能拿起笔来，奔走呼喊，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出现传世佳作。这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刘禹锡的传世思想很值得我们学习。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引用子婿的话，说明一个人没有著作传世，就会"愧起于颜间"；有了著作传世，就可以"弥愧"。当有人赠书给他，他以诗谢之："编蒲曾苦思，垂竹愧无名。"[3] 再一次表达了无书而"愧"、重视著作传世的思想。他和白居易曾动员南卓撰写《羯鼓录》："若吾友所谈，宜为文纪，不可全湮没也。"[4] "不可全湮没"的办法就是著作传世。

【3】《全唐诗》卷363。

【4】［唐］南卓：《羯鼓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图31）。太和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中书



图31
杜牧

舍人等职，有《樊川文集》。关于此集的结集过程，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言之甚详：

长安南下杜樊乡，郦（道）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杜佑）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杜牧）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耶！"明年冬，迁中书舍人，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发读书学文，率承导诱。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执太史笔，比四出守，其间余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稿醉墨，硕夥纤屑，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必获写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签目，比较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录、论、辨、碑、志、序、记、书、启、表、制，厘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

此序说明杜牧的传世意识极强，二十年如一日不远千里将诗文一一写示后人，并嘱为编集。为了对后人负责，"尽搜文章"，严加去取，删掉十分之七八，"才属留者十二三"，其精品意识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节　白居易与图书编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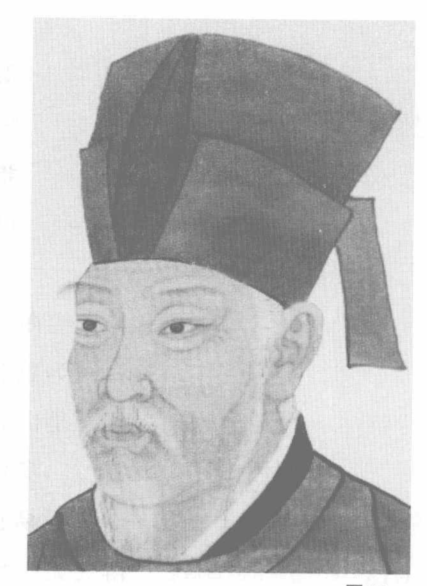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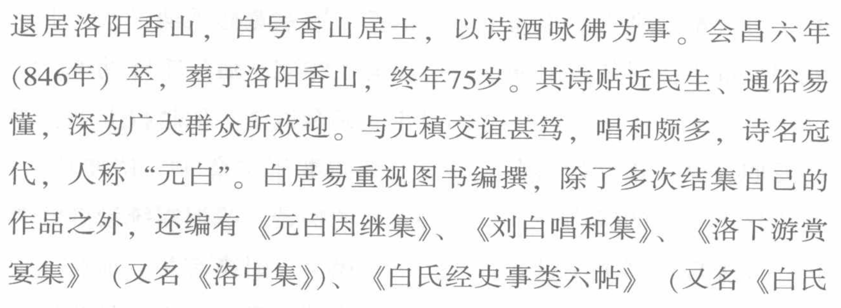


图32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曾祖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城东北），唐代著名诗人（图32）。自幼刻苦学习，“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1]。贞元间举进士，踏上仕途，历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翰林学士、左拾遗、左赞善大夫等职。元和十年（815年）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后来又担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太子少傅等职，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咏佛为事。会昌六年（846年）卒，葬于洛阳香山，终年75岁。其诗贴近民生、通俗易懂，深为广大群众所欢迎。与元稹交谊甚笃，唱和颇多，诗名冠代，人称“元白”。白居易重视图书编撰，除了多次结集自己的作品之外，还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等，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一、目的明确



目的明确，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一个特点。他的编撰目的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在《与元九书》中说：

>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1]《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诗合为事而作。

他在《寄唐生》诗中说：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他在《新乐府序》中说得更加明白："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确，面对现实、直言现实，是白居易前半生的一贯风格。在官场上，一般人"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而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时，却是"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1]。他曾上书请罢河北用兵，奏章数千言，都是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宪宗竟然采纳了。为上令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事上谏，甚至激怒了宪宗，后经李绛劝说，方才了事。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被杀，他越权上书，终于贬职，真可谓"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2]。诗如其人，在诗坛上，他的讽谕诗，或反映人民的疾苦，或揭露统治者的罪行，或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无一不与民生、时事有关。他在《观刈麦》诗中，反映了农民夏收割麦的痛苦生活。他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甚至"贫妇人"也要被迫抱子下田拾麦，"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因为"家田输税尽"，不这样就会被饿死。《卖炭翁》既表现了卖炭翁冬着寒衣、"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痛苦生活，又表现了"黄衣使者"的蛮横与无理，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强行拦截车辆，千余斤炭只给了"半匹红纱一丈绫"。他在《西凉伎》、《城盐州》等诗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当然，白居易的讽谕诗多写于45岁之前。贬职江州，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他的思想逐渐消沉起来，用大量

【1】《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2】《白居易集》卷28《与元九书》。

的闲适诗和伤感诗代替了讽谕诗。

二、连续不断

连续不断，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二个特点。所谓连续不断，就是说白居易从44岁开始，或编个人别集，或编诗友唱和集，或编类书，从未间断图书编撰活动。兹据可考资料，其图书编撰情况如表12：

表12　白居易图书编撰情况表

顺 序	编撰时间	书 名	卷 数	诗 数	编 者	年 龄
1	元和十年(815年)	书名不详	15	800	白居易	44
2	宝历二年(826年)	白氏长庆集	50	2 191	元稹、白居易	53
3	太和二年(828年)	白氏文集	60		白居易	57
4	太和二年(828年)	因继集	3	314	元稹、白居易	57
5	太和三年(829年)	刘白唱和集	2	138	白居易	58
6	太和八年(834年)	整理洛中诗		432	白居易	63
7	太和九年(835年)	白氏文集	50	2 964	白居易	64
8	开成元年(836年)	白氏文集	65	3 255	白居易	65
9	开成四年(839年)	白氏文集	67	3 487	白居易	68
10	开成五年(840年)	白氏洛中集	10	800	白居易	69
11	会昌五年(845年)	白氏文集	75	3 840	白居易	74

白居易别集的第一次编撰是在元和十年（815年）。据该年白居易《与元九书》："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这次编撰的是元和十年（815年）以前的作品，费时长达"数月"，地点是在九江，卷后有白居易题诗："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第二次编成的《白氏长庆集》由元稹主编，该集收录了元和十年（815年）至长庆二年（822年）之间八年的作品。白居易也参与了编撰工作，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该集的资料全部由白居易提供，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凡十五卷，约八百首。

异时相见，当尽致予执事。”可见包括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编撰的十五卷本在内的所有作品都交给了元稹，《白氏长庆集》是在白居易初步整理的基础上编成的。其次，《白氏长庆集》的分类也沿用了白居易亲自编撰的十五卷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

《白氏长庆集》也是这样分类编排的。第三次由白居易亲自编撰的《白氏文集》收录了长庆三年（823年）至太和二年（828年）间六年的作品，较《白氏长庆集》多出十卷，当时正在长安担任刑部侍郎的白居易身体欠佳，“目昏头白，衰也久矣”，甚至悲观地认为“由兹而后，宜其绝笔”[1]。太和二年（828年），57岁的白居易还与挚友元稹共同编撰了元白唱和总集《因继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经对元稹说：

[1]《白居易集》卷51《白氏文集后序》。

> 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诗集》。

可见元白唱和总集的编辑是元和十年（815年）由白居易首先提议，并为之命名，13年后的太和二年（828年），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变成了现实。不过，书名改为《因继集》。太和

三年（829年），58岁的白居易又编了他和刘禹锡的唱和总集《刘白唱和集》。白居易别集的第四次编撰是在太和八年（834年）七月十日，这次编撰是白居易在东都洛阳进行的。编撰内容包括太和三年（829年）至太和八年（834年）六年间的作品，共得诗歌432首。白居易别集的第五次编撰是在太和九年（835年）夏天。白居易当时已经64岁。编撰地点是在东都洛阳。编撰内容是太和二年（828年）至太和九年（835年）之间八年的作品。与太和二年（828年）本相比，卷数相同，仍然是六十卷，当时白居易把八年内的新作品按照内容附入太和二年（828年）本各类中。白居易别集的第六次编撰是在开成元年（836年）闰五月十二日。当时白居易已经65岁，正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之职。这次编撰的内容是从太和九年（835年）到开成元年（836年）两年间的作品，与太和九年（835年）本相比，多出5卷，增诗291首。据白居易《圣善寺白氏文集记》小注："元相公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可见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参加了这次编撰工作。白居易别集的第七次编撰是在开成四年（839年）二月，当时68岁的白居易仍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之职。这次编撰的内容是从开成二年（837年）到开成四年（839年）三年间的作品，与开成元年（836年）本相比，多出2卷，增诗232首。白居易别集的第八次编撰是在开成五年（840年）十一月二日。开成四年（839年）冬，白居易曾患风痺之疾，大病一场。这次编撰是在大病初愈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整理的是从太和三年（829年）至开成五年（840年）十二年间在洛阳所写的诗歌，共有800首，分为十卷。白居易别集的第九次编撰是在会昌五年（845年）五月一日。当时74岁的白居易早已退休，在洛阳香山家中安度晚年。这次编撰的内容是从开成四年（839年）至会昌五年（845年）七年间的作品。与开成四年（839年）相比，多出8卷，增诗353首。以上就是白氏文集的编撰情况。然据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后序》："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这里当然是对本人作品的编撰情况进行了一次简要的总

结，没有把60卷本、65卷本和67卷本包括进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似乎在50卷本和75卷本之间，还有一个70卷本。这个70卷本是何人何时何地编成的，尚待进一步研究。总而言之，从44岁到74岁的31年中，白居易连续不断地进行别集的编撰工作，其自编别集次数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三、传世意识

传世意识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三个特点。所谓“传世意识”，是说白居易在编撰图书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念念不忘后人，念念不忘传之久远。清朱彝尊说：

> 诗家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既属其友元微之排缵《长庆集》矣，而又自编后集，为之序，复为之记；既以集本付其从子外孙矣，而又分贮东林、南禅、圣善、香山诸寺。比于杜元凯砚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旷达，不应戚戚于年岁之逾迈，沾沾于官秩之迁除，计禄俸之损益。不知公之进退出处，系时事之否泰，恒恐后人论世者不得其详，故屡见之篇咏，斯则公之微意乎！[1]

【1】[清]朱彝尊：《曝书亭集·重刊白香山诗集序》。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确有不少“年岁诗”、“官秩诗”和“禄俸诗”。据宋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统计，其“年岁诗”和“官秩诗”有77处，如“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等。其“禄俸诗”有27处，如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任苏州刺史时，“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等。为什么白居易的诗歌常常“戚戚于年岁之逾迈，沾沾于官秩之迁除，计禄俸之损益”？当与白居易浓重的传世意识密切相关。白居易在写书或编书时，常常想到“后人论世者”，为了给“后人论世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使其“得其详”，因而才不厌其烦地将“年岁”、“官秩”、“俸禄”写入诗中。这种为后人着想的传世观念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白居易多次结集作品、多抄复本、分贮诸寺的“微意”所在。白居易的传世意识还可在其作品中找到大量证据，例如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诗云：“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这里祝愿“百代不湮沦”，担心“灭没人不闻”，也是白居易传世意识的体现。白居易的大量题壁诗也与传世观念有关。元稹和白居易的题壁诗在唐代是最多的，通过题壁，发表作品，流传于世。元和十二年（817年）冬，白居易将元稹诗百首题于屏风，因有《题诗屏风绝句》：“相忆采君诗作障，自书自勘不辞劳。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诗前有小序云：“前辈作事，多出偶然，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其中“定被人争写”“南中纸价高”，正是白居易传世意识的生动写照。序称“前辈作事，多出偶然”，则表明白氏题诗于屏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意为之，有意“为好事者所传”提供资料，有意为“异日”的九江文坛增添一个动人的故事。太和三年（829年）三月五日，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序云：

> 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

此虽戏言，但也看出白居易的传世意识，他把“播扬名声”、流芳百代当作一种幸福，并戏称元稹抢占了他的幸福，使他不能独领风骚。白居易晚年专门做了一个书柜，收藏自己的文集，因有《题文集柜》诗：

破柏做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
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大小三千篇。
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
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从“诚知终散失”这句诗来看，白居易对诗集的流传是比较悲观的。他悲观的原因有三：（一）唐代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发明，但是还没有普及，诗文流传多靠人工抄写。而人工抄写速度慢、复本少。尽管他的诗文集已经抄了几个复本，并分藏多处，但他仍然不放心。（二）无继承人。诗中提到的“邓伯道”，即晋代邓攸（字伯道）。据《晋书·邓攸传》，邓攸是西晋人，永嘉末被后赵石勒抓去，后趁机肩挑亲子和从子逃出虎口，备极艰险。度不能两全，以其弟早亡，特保全其从子，抛弃亲子而去，终无嗣。白居易同邓攸一样没有男孩，因以邓攸自比。在封建社会，只有男孩才是父母财产的法定继承人。既然白居易没有男孩，仅有一女，也就意味着没有继承人。想到这里，白居易很悲观。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是有女无男，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一首诗中说："各有文姬才稚齿，俱无通子继余尘。"[1] 同样表达了他对没有继承人的忧虑。（三）“世无王仲宣”，王仲宣即汉末文学家王粲（字仲宣）。与王粲同时有一位著名学者叫蔡邕，藏书万卷，后来发现王粲才华出众，把藏书全部转交王粲，王粲成了蔡邕藏书的继承人。这里，白居易又以蔡邕自比，以为世上没有王粲之类的才子可以托付文集，想到这里，也很悲观。不过，最后白居易还是自我解脱，用坚实的柏木做了一个书柜，用来收藏文集，将来让出嫁的女儿“留与外孙传”，也不失为一种流传方式。总而言之，从《题文集柜》这首诗来看，白居易的传世意识确实是很强的，为了别集的流传，他想了很多办法，做柏木书柜就是其中之一。

[1]《白居易集》卷53《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四、精品意识

精品意识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四个特点。真正的传世意识与精品意识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编撰者一旦有了传世意识，他就会为著作传世创造条件，就会本着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历史的重托，千方百计打造精品。白居易正是这样。他的作品总是反复推敲，一字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甚至经常念给老太太听，听不懂就反复修改，直到听懂为止。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曾说："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1] 白居易曾要求后人在编辑其作品时，把杂律诗全部删去，他说：

> 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2]

也就是说，他认为杂律诗都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作，为了"释恨佐欢"，"率然成章"，非其精品。可见白居易对于图书编撰的严谨态度。除了自己修改之外，白居易还往往请诗友帮助修改，他曾对元稹说：

> 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3]

这就是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著者本人在修改诗文的时候，往往"私于自是"，不辨良莠，常常兼收并蓄，不忍割爱，而请毫不姑息迁就的诤友参加修改，"讨论而削夺之"，最后才

【1】[清]袁枚:《随园诗话》卷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白居易集》卷28《与元九书》。

【3】《白居易集》卷28《与元九书》。

做到繁简得当，去粗取精。白居易一生有元稹、刘禹锡等许多诗友，一有新作，他们就互为交流唱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从而保证了诗文的质量。

在编撰方法上，白居易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白居易在编撰别集时，总是采用分类编排的方法，将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等类别。白居易所编类书《白氏六帖》更是分类编排的，据宋黄鉴《杨文公谈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钞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外，白居易在编撰文集时，也很重视序、记的撰写。除了《白氏长庆集》由元稹作序外，其余各集均由白居易亲自写序。他写的序有《因继集重序》、《刘白唱和集解》、《序洛诗》、《东林寺白氏文集》、《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香山白氏洛中集记》、《白氏集后记》等。这些序、记说明本书内容、编撰经过、编撰时间、编撰地点、卷数多少等，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白居易不愧是一位著名图书编撰家。他的著作之所以千古流传，与他的传世意识、精品意识等密不可分。

第七章　唐代私人图书编撰（下）

除了别集之外，总集和其他著作的编撰也很繁荣。最高统治者重视诗歌，诗歌自身的发展和浓重的文化氛围，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诗集之多，成为唐代图书编撰的一个亮点。

第一节　唐代私人总集的编撰

唐代私人总集编撰之盛，超过唐代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兹就影响较大者举例如表13：

表 13　唐代总集编撰例表

书　名	卷 数	编　者	编辑时间	出　处
搜玉小集		佚名		
奇章集		佚名		
存抚集	10	杜审言等	天授二年(691 年)	初盛 p325
珠英学士集	5	崔融	久视二年(701 年)前后	初盛 p389
集贤院壁记诗	2	张说等	开元十三年(725 年)	初盛 p604
正声集	3	孙季良	开元十七年(729 年)前后	初盛 p645
丹阳集		殷璠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左右	初盛 p717

续表

书 名	卷数	编 者	编辑时间	出 处
国秀集	3	芮挺章	天宝三载(744 年)	初盛 p787
河岳英灵集	2	殷璠	天宝十二载(753 年)	初盛 p895
海昏集		裴倩等	至德二年(757 年)	中 p35
箧中集		元结	上元元年(760 年)	中 p76
起予集		曹恩	大历间(766—779)	中 p340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	2	鲍防等	大历间(766—779)	中 p224
华阳唱和集	3	于邵等	大历间(766—779)	中 p341
中兴间气集		高仲武	大历十四年(779 年)	中 p333
丽文集	5	刘明素	兴元元年(784 年)	中 p404
二孙邻郡诗		李萼等	贞元三年(787 年)	中 p426
裴氏海昏集		裴 均	元和五年(810 年)	中 p679
御览诗		令狐楚	元和十二年(817 年)	中 p770
盛山唱和集		韦处厚	长庆二年(822 年)	中 p833
三州唱和集	3	崔玄亮等	长庆三年(823 年)	中 p848
南薰集		窦常	宝历元年(825 年)	中 p872
因继集		元稹、白居易	太和二年(828 年)	晚 p26
吴越唱和集		元稹等	太和三年(829 年)	晚 p43
刘白唱和集		白居易	太和三年(829 年)	晚 p32
大和通选	30	裴潾	大和七年(833 年)	中 p103
彭阳唱和集		刘禹锡、令狐楚	太和三年(829 年)	晚 p88
吴蜀集		刘禹锡、李德裕	太和七年(833 年)	晚 p88
断金集		令狐楚、李逢吉	太和九年(835 年)	晚 p114
极玄集		姚合	开成二年(837 年)前后	晚 p153
唐诗		李戡	开成二年(837 年)前	晚 p153
唐诗类选	20	顾陶	大中十年(856 年)	晚 400
汉上题襟集		段成式等	大中十三年(859 年)	晚 p434
松陵集	10	陆龟蒙	咸通十二年(871 年)	晚 p581
又玄集	3	韦庄	光化三年(900 年)	晚 p918

下面重点介绍崔融、元结、殷璠、芮挺章、令狐楚、高仲武、窦常、姚合、顾陶、李戡、韦庄等人的总集编撰情况。

崔融，齐州全节人。中宗在东宫，融为侍读，兼侍属文，东宫表疏，多出其手。武后临朝，历仕著作佐郎、凤阁舍人、婺州长史、司礼少卿、国事司业、兼修国史等职。曾以预修《则天实录》有功，封清河县子，赐物五百段。当时朝廷重要制作，多融为之。长安四年（704年），因与李峤、苏味道、王绍宗等预修《三教珠英》，将47位预修者的诗作编为《珠英学士集》。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十："唐武后朝诏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可见该书是以"官班为次"编成的。该书今存唐代诗人元希声、房元阳、杨齐哲、胡皓、乔备、李适、崔湜、王无竞、马吉甫等佚诗27首，并辑入《敦煌诗录》中。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一号聱叟、猗玗子），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诗人。天宝十二年（753年）进士，历仕著作郎、道州刺史等职。曾两次自编诗文集，号曰《文编》，其自序云：

> 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简，得以文史自娱，乃次第近作，合于旧编，凡二百三首，分为十卷，复命曰《文编》，示门人弟子，可传之于筐箧耳。叟之命称，则著于《自释》云，不录。时大历二年丁未仲冬也。

可见天宝十二年（753年）所编，为行卷之用；大历二年（767年）所编，为定稿。原稿已佚，明人辑有《元次山文集》。《箧中集》一卷是元结所编的唐人诗歌选集，该书汇集其亲友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的五言古诗24首，集前冠以乾元三年（760年）元结自序："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

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可见《箧中集》是为矫正“拘限声病”、“丧于雅正”之习俗而编。诗人“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其诗质朴淡泊，绝去雕饰，与时俗迥异。

殷璠，丹阳（今属江苏）人。举进士，约生活在开元、天宝间，编有《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三卷，选录盛唐诗人自常建至阎防24人的作品234首。这些诗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二年（753年）的40年间。书前《集论》云：“璠令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取半，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下逮。”也就是说，此集的选录标准是文质并重，入选作品既要具有建安文学的气骨，又要注意六朝以来盛行的音律和声调，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每家之下各加评语，如评王维诗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该书是我国最早的带有评语的总集，也是最早的一部盛唐诗选本。《丹阳集》已经失传，据清乾隆二年（1737年）重修《江南通志》卷192《艺文志·集部》：“《丹阳集》一卷，殷璠辑包融、储光羲等十八人诗。”

芮挺章，生平不详，诸书称为国子进士。天宝三年（744年）编《国秀集》三卷。该书共收录作者85人、作品218首。据书前楼颖序，此书是芮挺章根据秘书监陈公和国子司业苏公的建议，选录“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其选录标准片面强调可歌性和形式美，很少收录反映社会矛盾、风格豪放、气势磅礴的作品。李白、杜甫、岑参的作品竟没有入选，高适、李颀的作品虽然有收录，但并不是他们的代表作。书中还收录了编者芮挺章和作序者楼颖自己的作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

唐以前编辑总集以己作入选者，始见于王逸之录

《楚辞》，再见于徐陵之撰《玉台新咏》，挺章亦录己作三篇，盖仿其例。然文章论定，自有公评，要当待之天下后世，何必露才扬己，先自表章。虽有例可援，终不可为训。

令狐楚，字殼士，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贞元七年（791年）进士，历仕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山南西道节度使等职，有集百卷。所编《御览诗》（亦名《唐歌诗》、《元和御览》等）是我国古代比较著名的唐诗选本。全书收录大历至元和诗人30家的389首诗，于宪宗时奉敕编进。入选作品多五七言律诗、绝句，其中尤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为多，与元结《箧中集》专选古诗的标准恰恰相反。

高仲武，生平不详，自称渤海（今山东滨县）人。所编《中兴间气集》二卷收录唐代诗人26人诗134首。其自序云：

> 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郐以下，非所敢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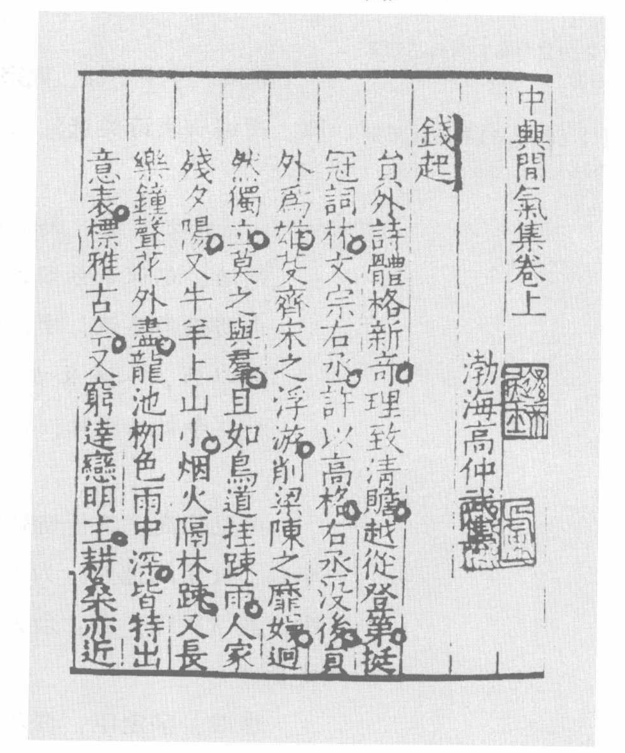

中興間氣集卷上　渤海高仲武集
錢起
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越從登第挺
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
外爲雄芟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
然獨立莫之與羣且如鳥道挂踈雨人家
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踈又長
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
意表標雅古今又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

图33
《中兴间气集》四部丛刊本书影

可见其选录标准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每人之下，皆有评语。评语中不乏精辟见解（图33）。

窦常，字中行，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大历进士。史称其“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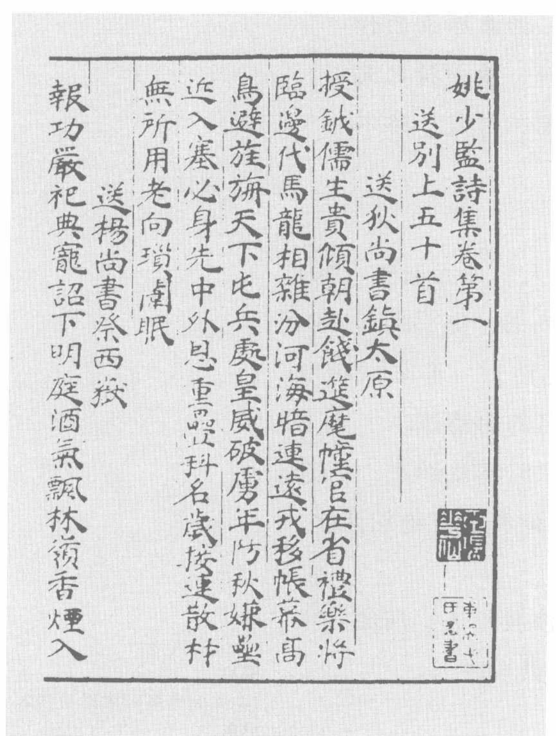

姚少監詩集卷第一
送別上五十首
送狄尚書鎮太原
授鉞儒生貴傾朝赴餞筵麾幢官在省禮樂將
臨邊代馬龍相雜汾河海暗連遠戎移帳幕高
鳥避旌旃天下屯兵處皇威破虜年防秋嫌壘
近入塞必身先中外恩重疊科名歲按遷散材
無所用老向瑣闈眠
送楊尚書祭西嶽
報功嚴祀典寵詔下明庭酒氣飄林嶺香煙入

图34
《姚少监诗集》四部丛刊本书影

年不出”[1]。后任水部员外郎、郎州刺史、国子祭酒等职。所编《南薰集》三卷，集韩翃至皎然30人诗360首，其自序云：“欲勒上、中、下，则近于褒贬；题一、二、三，则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宫、外台为目，人各系名系赞。”该书体例与《河岳英灵集》相仿。

姚合(775—854)，陕州峡石（今河南陕县）人。元和进士，历武功尉、监察御史、给事中、秘书监等职，其人与贾岛齐名，世称“姚贾”，有《姚少监诗集》(图34)。所编《极玄集》收录王维等21人诗100首，内容偏重描写个人情怀和流连风景之作。推崇钱起、郎士元的作品，而李白、杜甫、岑参、高适等人的作品则摒而不录。作者大多附有小传。

顾陶，生平不详，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进士，曾任太子校书郎。所编《唐诗类选》二十卷收录唐诗1 232首。其自序云：

> 诗之义也，大矣远矣，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政治，以讽谕系国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纪而无讳，闻之者伤惧而鉴诫，宁同嘲戏风月、取欢流俗而已哉……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

可见他高度评价诗歌的作用，也是第一位高度评价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的选家。为了编选此集，顾陶耗费了30年的心血和汗水，其《后序》云：“余为《类选》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觉老之将至。”

李戡，字定臣，晋陵阳羡（今江苏宜兴）人，自幼好学，而

[1]《旧唐书》卷155《窦常传》。

立之年尽通六经。太和六年（832年）进士，任平卢军节度巡官等职。后隐居故里山水间，以读书自娱。编有《唐诗》三卷。据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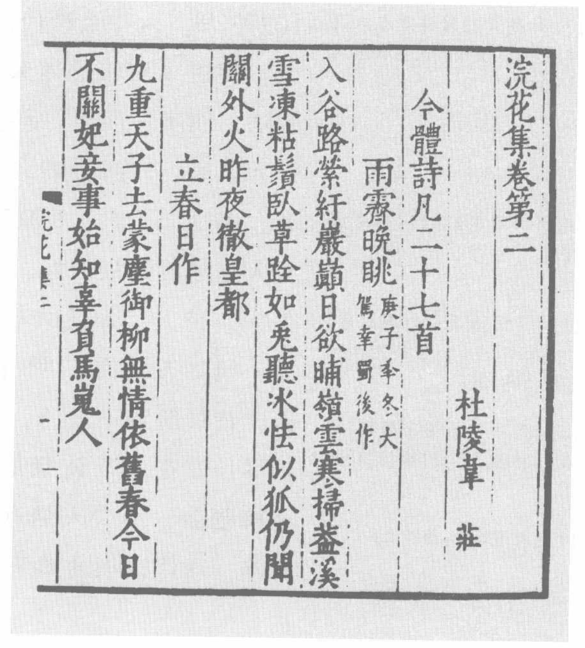
> 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已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1]

【1】《全唐文》卷755。

可见《唐诗》是针对元、白而编选的。该书今已失传。

韦庄(836—910)，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进士，后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唐末著名诗人，有《浣花集》（图35)。编有《又玄集》和《采玄集》。《又玄集》三卷为我国古代著名唐诗选本之一，全书收录唐代142人诗299首，其序云："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可见全书尽取"清词丽句"，淘汰率甚高，甚或百中取一。《采玄集》是《又玄集》之外的又一选本，据胡应麟《诗薮·杂编》："唐人自选诗，《英灵》、《国秀》诸集外……韦庄有《采玄集》一卷。"此书早已失传。

图35
《浣花集》四部丛刊本书影



浣花集卷第二

杜陵韋　莊

今體詩凡二十七首

雨霽晚眺 庚子年冬大駕幸蜀後作

入谷路縈紆巖巔日欲晡嶺雲寒掃蓋溪雪凍粘鬚臥草跧如兎聽冰怯似狐仍聞關外火昨夜徹皇都

立春日作

九重天子去蒙塵御柳無情依舊春今日不關妃妾事始知辜負馬嵬人

浣花集二

第二节　唐代诗集编撰的繁荣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代别集511家、556种、7 427卷；总集94家、99种、2 526卷。这个数字当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宋严羽称唐诗别集就有800家，他说："予尝见《方子通墓志》：'唐诗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则世不见有，惜哉！"[1] 明胡震亨称有691家，他说：

> 帝王八集、三百六卷；初唐一百五十二家、二千六百五十五卷；盛唐四十九家、五百六十卷；中唐一百六十四家、二千四百四十五卷；晚唐一百三十七家、七百六十九卷；闰唐一百四十三家、一千二百二十九卷；方外、宫闺三十八家、三百二十八卷。总计集六百九十一家、八千二百九十二卷。[2]

以上三个数字仍不免挂一漏万。唐人自编诗歌总集数量约有107种[3]。为什么唐代诗集的编撰如此繁荣呢？科举考试以诗试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代科举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其中投考进士者最多。顾炎武说："史言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4] 进士是很多文人追求的终极目标，"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5]。诗人孟郊屡试不第，心情特别痛苦，因作诗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6] 直到50岁才考中进士，喜不自胜，因作诗云："昔日龌龊不足诗，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7] 诗赋是天宝以后进士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金榜题名，不少人刻意写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歌创作的水平。此外，唐代诗集的繁荣，尚有以下原因：

【1】[宋]严羽：《沧浪诗话·考证》。

【2】[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30，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4】《日知录》卷17《出身授官》。

【5】[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6】[唐]孟郊：《孟东野集·落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7】《孟东野集·登科后》。

一、统治者重视诗歌

最高统治者重视诗歌、喜欢诗歌促进了唐代诗集的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诵诗。不少唐诗名句，唐代皇帝都能随口背出。如唐文宗于进士科考试时，“亲裁题目，及所司进所试，披览吟咏，终日忘倦”[1]。（二）赋诗。在《全唐诗》中，收有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后、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等人的著作，其中太宗诗最多，有69首。（三）赐诗。例如唐太宗有《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赐萧瑀》、《赐房玄龄》等作品。每逢盛宴，赐作尤多。例如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三月庚子，百僚宴于曲江亭，“上赋《上巳诗》一篇赐之”；贞元十年（794年）九月戊子，赐百僚九日宴，“上赋诗赐之”；贞元十七年（801年）二月癸巳，赐群臣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赐宴曲江诗》六韵赐之”；贞元十七年（801年）九月壬戌，群臣宴曲江，“上赋《九日赐宴曲江亭诗》六韵赐之”；贞元十八年（802年）九月癸亥，赐群臣宴于马璘山池，“上赋《九日赐宴诗》六韵赐之”[2]。（四）奖诗。对于著名诗人，唐代皇帝多所奖掖。当李群玉进诗后，宣宗赐以锦彩器物，并授以弘文馆校书郎之职。安史之乱时，王维以诗免罪，据《旧唐书·王维传》：“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五）对诗。唐太宗时，上官仪颇有诗名，时人称上官体。太宗常常与之唱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3]。唐中宗“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上官）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4]。唐睿宗第四子李范雅好诗文，

【1】《全唐诗》卷4《文宗皇帝》。

【2】《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3】《旧唐书》卷80《上官仪传》。

【4】《旧唐书》卷52《后妃传上》。

常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等人唱和。唐玄宗尤喜群臣唱和，有一次他到温泉宫，“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帝以(席)豫诗为工，手制褒美曰：‘览卿所进，实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1] 唐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制，即命朝臣毕和”，贞元四年（788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德宗赋诗后，群臣奉和，“上自考其诗，以（刘）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2]。贞元七年（791年）七月癸酉，“上幸章敬寺，赋诗九韵，皇太子与群臣毕和，题之寺壁”[3]。唐文宗赐宴曲江，群臣赋诗，据《旧唐书·裴度传》：

【1】《旧唐书》卷190中《席豫传》。

【2】《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

【3】《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 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赐度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仍赐御札曰：“朕诗集中欲得见卿唱和诗，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无心力，但异日进来……”御札及门，而度已薨，(开成) 四年三月四日也。

文宗亦喜联句，据《旧唐书·柳公权传》：

> 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

唐宣宗每逢宴会，总“与学士介和，公卿出镇，多赋诗饯行”[4]。（六）编诗。即敕编别集，据郄云卿《骆宾王文集序》：“文明中，予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遂致文集悉皆散失。后中宗朝，降敕搜访宾王诗笔，令云卿集焉。所载者即当日之遗漏，凡十卷。”可见《骆宾王文集》由郄

【4】《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云卿奉诏编辑（图36）。据《全唐诗·上官昭容传》："临淄王（即唐玄宗李隆基）兵起，（上官昭容）被诛，开元初裒次其文章，诏张说题篇，集二十卷。"可见上官昭容的诗作亦奉诏编辑。据《旧唐书·卢简辞传》：



图36
骆宾王

> 文宗好文，尤重纶诗，尝问侍臣曰："卢纶集几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对曰："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今员外郎简能、侍御史简辞是也。"即遣中使诣其家，令进文集，简能尽以所集五百篇上献，优诏嘉之。

可见卢纶诗集由纶子卢简能等奉诏呈上。据《旧唐书·王维传》：

> 代宗好文，尝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

图37
王维



可见王维诗集由其弟王缙奉诏编次（图37）。作为一个皇帝，万机之暇，还念念不忘诗集编辑，这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确为唐诗兴盛的重要原因，正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所说：

> 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

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琬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

二、诗歌自身的发展

诗歌自身的发展，促进了唐诗的繁荣。我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和《楚辞》，历代诗歌创作都从《诗经》和《楚辞》中汲取不少营养，并有所创新，唐代也不例外。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评论李白的诗风是“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自道作诗甘苦时说：“颇学阴何苦用心。”其中“庾开府”指北朝诗人庾信；“鲍参军”指南朝诗人鲍照；“阴”指陈朝诗人阴铿；“何”指梁朝诗人何逊。可见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都从前人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综观李唐诗歌，其继承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创作方法上，唐代诗歌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是从《诗经》之《风》开始的。汉魏六朝时期虽有一定发展，但是步子不大。而在唐代，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却有长足进展，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杰出代表。陈子昂《感遇》等诗，指斥时弊，风格高昂清峻，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杜甫继陈子昂之后，把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其诗歌大胆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广泛而尖锐地反映出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矛盾，显示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号称“诗史”。白居易不少讽谕诗尖锐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1]。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早在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中已有很高的水平，汉魏六朝时期有一定发展，而唐代李白、李贺等人对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继承尤为突出。李白的诗歌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色彩纷呈，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李白的诗歌中，常常可以看到犹如屈原《离骚》中的奇幻

[1]《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境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歌中，甚至大量使用“兮”字，明显地留下脱胎《楚辞》的痕迹。从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中可以看出《九歌·国殇》的影响。当然，在唐诗创作中，诗人往往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表现手法结合在一起，兼而用之。对于某一个诗人来说，不过有所偏重而已。

第二，古体诗的继承和发展。所谓“古体诗”指不拘对仗、平仄和用韵的一种诗歌，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诸体。古体诗产生较早，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唐代古体诗继承了汉魏六朝古体诗的传统，而多所发展。汉魏六朝古体诗以五言为主，而唐代古体诗则五言、七言并行，七言发展很快。古体诗中的歌行体在唐代也有较大发展，其用韵变化较多，或隔句用韵，或句句用韵，或二句换韵，或三句换韵，或四句换韵，不一而足。古体诗中的乐府诗原是乐府官署采集、创作的诗歌，后来泛指可以入乐的诗歌。唐代乐府诗沿用了汉魏六朝乐府的古题，既不能唱，更不能入乐。其内容有的与汉魏六朝乐府的古题大体一致，例如《出塞》是写边塞生活的，唐代杨炯、陈子昂、王之涣、王昌龄、王维、杜甫、张籍等都曾以此为题写诗，其中王昌龄《出塞》、杜甫《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最为著名；《将进酒》是写宴饮赋诗的，唐代李白、李贺等都曾以此为题写诗，给后人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桃花乱落如红雨”等名句；《折杨柳》是写伤春别离的，唐代卢照邻、杨炯、张九龄、李白、李端、孟郊、张祜、段成式、鱼玄机等都曾以此为题写诗；《战城南》是写战场伤亡的，唐代卢照邻、杨炯、李白、刘驾等都曾以此为题写诗，其中，李白的一首最为著名；《从军行》是写边塞情况和战士生活的，唐代骆宾王、杨炯、李颀、王昌龄、王维、李白、刘长卿、王建、张祜、顾况等都曾以此为题写诗，其中，李颀、王昌龄两首最为著名。另一类唐代乐府诗则是旧瓶装新酒，只沿用原来乐府诗的题目，而内容则与题目无关。如《丁督护歌》原写女子送别、怀人之事，而李白所写同名乐府诗则写人民为统治者长途搬运磐石的痛苦生活。唐代乐府诗除了上述沿用旧题者

外，还有一类是另拟新题，或称之为“新乐府”。新乐府的内容反映现实生活，讽刺朝政。新乐府始于唐初长孙无忌、刘希夷等，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所作《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都很著名。后来白居易、元稹等人对这种写作方法发扬光大，响应者越来越多，形成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所作50首，反映社会矛盾颇多，在当时较有现实意义，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第三，律诗的形成。律诗又叫今体诗、近体诗。同古体诗相比，其句数、字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早在南朝齐武帝时形成一种新的诗体，据《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该诗体要求严格按照“四声”、“八病”之说写诗。“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和正纽，要求写诗者避免“八病”。这种“声律论”经过诗人的长期创作实践，到了唐朝，随着音韵学、修辞学的发展，有了如下重大飞跃：一是对声律规则加以简化。把四声合并为平仄两个大类：平声就是四声中原有的平声，其发音特点是不升不降不促，读音可以延长，其调不变；仄声则包括上、去、入三声，其发音特点是或升或降或促，读音都不能延长，否则就会变调。“八病”经过淘汰以后，或取消，或简化，把消极的防范，变为积极的声律规定，最后终于形成了律诗。二是对律联规则加以发展。永明体诗歌解决了律句、律联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联与联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到唐代已经确定了如下规则：一联之中平仄不得失对，两联之间的平仄不得失粘。这样，联与联的关系自然就最终解决了。三是对用韵、篇章加以定型。永明体诗歌第一句一般不押韵，而唐代律诗则加以改变，以便增加律诗的格式。唐代律诗还对隔句用韵、一韵到底、押平声韵等问题作了必要的规定。在对偶句的运用上，还规定了数目和位置。在篇式上，确定了以四韵八句为主要形式。唐代律诗的形成对古体诗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些古体诗中往往掺杂了一些对仗工整的律句，例如高适《燕歌行》、白居易《长恨歌》都是这样。

三、社会风气

尊诗、写诗、诵诗、题诗、唱和等，已经形成社会风气。唐代举国上下尊敬诗人，诗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诗人孟浩然虽然终生不仕，然其诗才却受到人们的崇拜，甚至"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1]。王维"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为师友"[2]。姚合"名为诗，士多归重，（李）频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奖挹，以女妻之"[3]。唐代李白、杜甫，诗名颇著，据《新唐书·杜甫传》："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情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因为唐代重视诗歌、重视诗人，所以人竞写诗，写诗成为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唐代传诵诗歌的风气也很浓，诗人一旦成名，其作品往往争相传诵，例如李百药"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4]；乔知之"所作篇咏，时人多讽诵之"[5]；宋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6]；吴筠"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7]；刘太真"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8]；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9]；李益"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10]。唐代刚刚发明雕版印刷，尚缺乏大量印刷诗歌的能力。不少诗人为了"发表"作品，往往题诗于壁。题壁诗到处可见，正如项斯《赠姚合使君》一诗所说："官壁诗题尽，衙庭看鹤多。"元稹《骆口驿》诗云："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可见官壁、驿墙题诗之多，元稹甚至尽日"不离墙下"。寒山题壁诗最多，有600首，其《无题》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

【1】《新唐书》卷203《孟浩然传》。

【2】《旧唐书》卷190下《王维传》。

【3】《新唐书》卷203《李频传》。

【4】《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

【5】《旧唐书》卷190中《乔知之传》。

【6】《旧唐书》卷190中《宋之问传》。

【7】《旧唐书》卷192《吴筠传》。

【8】《旧唐书》卷137《刘太真传》。

【9】《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

【10】《新唐书》卷203《李益传》。

百首。”唐代诗友之间唱和之诗亦多。唱和诗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唐代唱和诗编成总集者有数十种（详本章第一节）。

总而言之，由于唐代尊诗、写诗、诵诗、题诗、唱和已成人们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人皆为之，到处可见，从而为诗集编撰奠定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以上就是唐代诗集繁荣的重要原因。当然，诗集编撰也有一个方法技术问题。就整个图书编撰史来看，唐代图书编撰已经逐渐成熟，书名命名、分卷方法、卷端署名等一些技术问题均已解决，这也为唐代诗集编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　唐代其他著作的编撰

除了别集、总集的编撰之外，唐代其他著作的编撰也很繁荣，兹以魏征、陆德明、颜师古、李延寿、孙思邈、李淳风、吴兢、韦述、一行、樊宗师、陆羽等为例，介绍其他著作的编撰情况。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人。唐初政治家、图书编撰家（图38）。历仕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预修《隋书》、《梁书》、《陈书》等史，主编《群书治要》、《诸王善恶录》、《类戴氏礼》、《祥瑞录》、《次礼记》、《列女传略》等书。《群书治要》的编撰原因有二：一是“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理，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二是现有类书，“《皇览》、《遍略》，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于是采摭群书，“爰自六经，迄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其选录标准是“其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金声玉振，腾实飞英，雅论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宏奖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遗，将以

图38
魏征



丕显皇极。至于母仪、嫔则、懿后、良妃，参徽猷于十乱，著深诫于辞辇，或倾城悊妇、亡国艳妻，候晨鸡以先鸣、待举烽而后笑者，时有所存，以备劝诫”。全书共收录古籍65种，约取其治国要言，简而又简。如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简编为一卷多；班固《汉书》一百二十卷，简编为八卷。《诸王善恶录》“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为善恶，各为一篇”[1]。《类戴氏礼》二十卷是整理戴圣《礼记》的产物，全书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为注解。魏征高度评价图书的重要作用，他在《群书治要序》中说：“窃惟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他在《隋书·经籍志一》序中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

[1]《全唐文》卷141《诸王善恶录序》。

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人，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图39）。历仕陈、隋、唐三朝，贞观三年（629年）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有《经典释文》、《老子疏》、《易疏》等著作。其《经典释文序》云：“余少爱坟典，留意艺文，虽志怀物外，而情存著述，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职司其忧，宁可视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帙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癸卯”即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年），则此书于陈已经写成，或开始撰写。因文献无征，不得其详。该书博采汉魏六朝音切230余家，又普采诸家训诂，考证各本异同，是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总结性著

图39 陆德明

陆德明像

作。不仅如此，该书序后的“条例”相当于后来的“凡例”，这是中国古籍编撰史上最早的“凡例”专篇之一，对研究古籍编撰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颜师古（581—645），名籀，雍州万年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唐代史学家、训诂学家。历仕隋、唐二朝，于唐任中书舍人、郴州刺史、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职。除了与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之外，还有《汉书注》、《急就章注》、《匡谬正俗》等著作。《汉书注》是历来《汉书》注解中最好的一种。《匡谬正俗》八卷，前四卷共50条，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共127条，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审。其子扬庭于永徽二年（651年）十二月八日表上，唐高宗敕云：“师古业综书林，誉高词苑，讨论经史，多所匡正。前件书发明故事，谅为博洽，宜令所司录一本付秘书阁。仍赐其子符玺郎扬庭绢五十匹。”[1]

【1】《全唐文》卷14《奖颜扬庭进父师古匡谬正俗敕》。

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人，唐代史学家。历任崇贤馆学士、符玺郎等职。他继承其父李大师的遗志，长期在史馆参与《隋书》、《五代史志》、《晋书》以及国史的编撰工作，独著《太宗政典》、《南史》、《北史》等。其中《南史》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记载了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至陈祯明三年（589年）170年的历史；《北史》一百卷，含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载了北朝魏登国元年（386年）至隋义宁二年（618年）233年的历史。据《北史·序传》其编撰过程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到贞观五年（631年），在史馆修史的余暇，“昼夜抄录”有关史料；第二阶段约从贞观八年（634年）到贞观十五年（631年），丁内忧守孝三年之后，到四川做官，将所得资料进行初步“编次”工作；第三阶段从贞观十五年（641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因令狐德棻的推荐，李延寿再次进入史馆，奉敕预修《晋书》。同时进一步“勘究”宋、齐、魏三代史料。第四阶段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奉敕预修《隋书》十志。同

时进一步“遍得披寻”有关资料，于杂史中发掘资料一千多卷。然后进行“连缀”、删削的工作，用了18年的时间。如果加上前三个阶段的十四、五年时间，从搜集资料到写完全书，共用了33年左右的时间。《南史》和《北史》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表达了作者主张南北统一的进步思想，在史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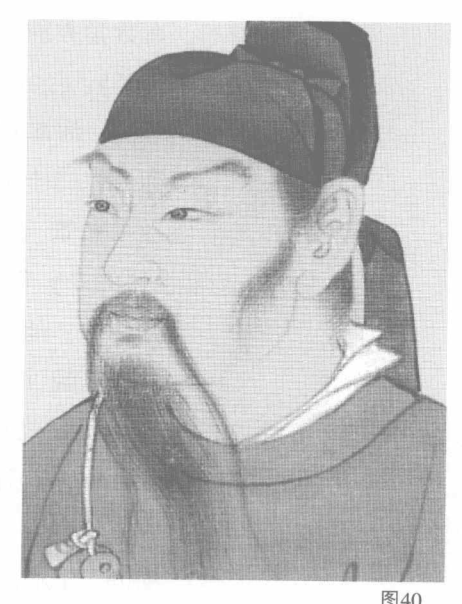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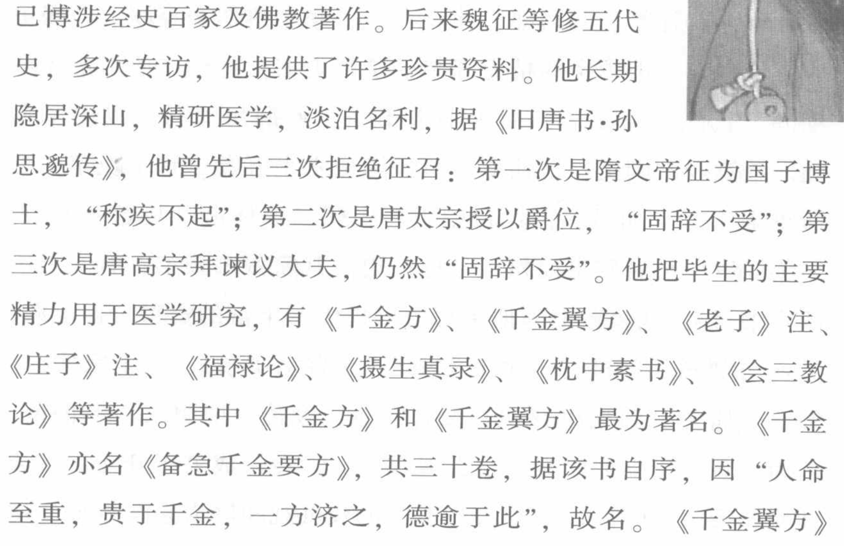


图40
孙思邈



孙思邈（约581—682），京兆华原人，唐初著名医学家（图40）。7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刚满20岁，已博涉经史百家及佛教著作。后来魏征等修五代史，多次专访，他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他长期隐居深山，精研医学，淡泊名利，据《旧唐书·孙思邈传》，他曾先后三次拒绝征召：第一次是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第二次是唐太宗授以爵位，“固辞不受”；第三次是唐高宗拜谏议大夫，仍然“固辞不受”。他把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医学研究，有《千金方》、《千金翼方》、《老子》注、《庄子》注、《福禄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等著作。其中《千金方》和《千金翼方》最为著名。《千金方》亦名《备急千金要方》，共三十卷，据该书自序，因“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名。《千金翼方》三十卷，是《千金方》的补充。二书共记药物800多种、单方5 300多个。这些药物和单方，均经过临床检验，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李淳风（602—670），岐州雍人，唐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自幼聪慧，博通群书，尤明天文历算。历仕太常博士、太史令、秘阁郎中等职。在天文方面，他改革了浑天仪，订正了傅仁钧《戊寅历》，预修《晋书》和《五代史》，撰写了其中的《天文》、《律历》和《五行》三志，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魏晋以来我国天文、律历、数学及气象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他编撰的《麟德历》比《戊寅历》更加精密，使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还东传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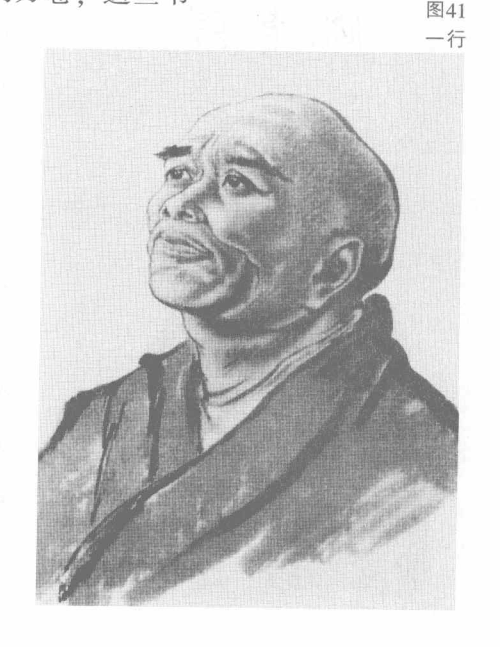
在数学方面，他主持编注了《九章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海岛算经》、《辑古算经》、《缀术》等十部数学著作，号称《算经十书》。此外，他还注解了贾思勰《齐民要术》，参与整理陶弘景《本草集注》等书。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等十多种著作，在唐代广泛流传。李淳风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愧是我国古代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和图书编撰家。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少有大志，博通经史。经魏元忠、朱敬则的推荐，诏直史馆，预修国史。历仕右补阙、起居郎、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等职。他居史职三十余年，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撰写史书，甚至在他丁忧还乡期间，仍然念念不忘。后因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竖修国史，遣使取其所撰国史六十五卷。到了晚年，步履维艰，背驼如弓，仍然希望担任史职，李林甫以其老而不用，终年80岁。吴兢叙事简核，号称良史。其家藏书颇丰，有《吴氏西斋书目》，众多藏书为他撰写史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记载，吴兢与刘知几等撰有《则天实录》、《睿宗实录》、《中宗实录》等。《唐史》和《唐春秋》没有完成，今传《旧唐书》的前部，多为吴兢《唐史》原文。《贞观政要》十卷，成书于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该书分为40类，记载贞观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奏疏以及政治设施等，是研究唐太宗李世民和初唐政治的重要著作。此外，还有《乐府古题解》、《太宗勋史》、《唐书备阙记》、《王藏论应象》、《兵家正史》等著作。

韦述（？—757），万年人，著名史学家。开元进士，历仕栎阳尉、起居舍人、国子司业、集贤学士、礼仪使、尚书工部侍郎等职。少时聪敏，笃志文学，记诵家中藏书2 000卷。在参加进士考试之前，颇喜著书，已开始撰写《唐春秋》。后在秘阁整理图书，利用业余时间专攻谱学，百氏源流，了如指掌，并根据柳冲《姓族系录》，另撰《开元谱》二十卷。韦述一生在书府40年，居

史职20年，著述颇丰。在他之前，令狐德棻、吴兢等虽然递相修撰国史，但终究未成一家之言。到了韦述任职时，始定类例，补遗续阙，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深为人们所称赞。此外，还有《唐职仪》、《唐春秋》、《集贤注记》、《高宗实录》、《御史台记》、《东封记》、《开元谱》、《两京新记》等二百余卷。安史之乱时，韦述陷入贼手，授以伪官，是其一生的一个污点。后三司议罪，流放渝州，不堪困辱，绝食而死。因其在两京陷落之际，独抱《国史》藏书于南山，免遭焚毁，以功补过，死后赠右散骑常侍。韦述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环境的熏陶。韦述的曾祖韦弘机，唐初任司农少卿，著《西征记》；韦述的父亲韦景骏，唐中宗时任肥乡令，颇有政声。韦景骏之姑子元行冲任洛州刺史，也是当时著名学者，常以数本图书自随，韦述常常入其书斋读书，废寝忘餐。元行冲与之交谈，经史百家，了如指掌，哪怕很细小的史实，韦述都讲得头头是道。元行冲又考试他的作文，韦述一挥而就。元行冲发现韦述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从而认真地培养他。元行冲的发现和培养，是韦述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丰富的藏书。早在孩提时，韦述家就有藏书两千卷，后来增至两万卷，这些书全部都经过韦述的校勘，堪称善本，即使御府藏书也比不上。在其藏书之中，除了常用图书之外，还有古今朝臣图、历代名画、法书、古碑、药方、古器、格式、钱谱、玺谱、名公尺牍等，应有尽有，为其著书提供了资料保证。第三，个人的努力，韦述自幼刻苦学习，立志高远。在秘阁工作期间，为了研究谱学，利用业余时间抄写柳冲《姓族系录》，晚上一直抄到深夜。这样坚持抄了一年，才抄完这部两百卷的大书。由于韦述一生手不释卷，嗜学著书，终于使他走向成功之路。

图41 一行



一行（683—727），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人，唐代高僧、天文学家（图41）。自幼聪敏，

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向博学道士尹崇借阅扬雄撰《太玄经》，数日便还，精晓其义，并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尹崇大惊，因为他学了几年都没有弄懂，没想到一行几天就精通了。后来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慕名而来，想和他交个朋友，一行赶紧避开，逃到嵩山，做了和尚。唐玄宗即位后，请他进京修改历法。同时参与佛经翻译工作。他很快翻译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开元十二年至十三年（724—725年）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出子午线的长度，在天文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元十五年（727年），在一行的主持下，前后经过六年的实测和研究，终于编成了《大衍历》（详第四章第四节）。同年，一行英年早逝，终年45岁。一行死后，唐玄宗撰书碑文于石，并出内库钱五十万，立塔于铜人之原。除了《大衍历》之外，一行还补撰其从祖太素《后魏书》中的《天文志》，还制造了一台表明日月星辰在空中运行和测定时间的水力运转浑天仪。

樊宗师（？—798），字绍述，河中人。历仕国子主簿、著作佐郎、金部郎中、绵州刺史等职。轻财重义，家财多散施于姻旧宾客。著作甚丰，计有《魁记公》、《樊子》、《春秋集传》、杂文297篇、杂铭220篇、诗719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291卷。因著文议论平正，绝无游谈无根之弊，曾得到韩愈的推荐。然其文奇涩难懂，一言一句，皆戛戛独造，时号涩体，所著《绛守居园池记》至不可句读。因此，其文大多散佚，流传至今者仅有清孙之马录编《樊绍述集注》两卷。

图42
陆羽



陆羽（733—804），字鸿渐，复州竟陵人（图42）。唐代著名茶学专家。貌丑陋，口吃而辩。其人生道路十分坎坷，先在寺院寄读，继而又卖唱学艺，闯荡江湖；后又跟河南太守李齐物等学过诗文。肃宗上元初年，陆羽隐居吴兴苕溪，闭门著书，他曾写过一首诗：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惟羡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来。[1]

[1]《全唐诗》卷308。

表现了他不慕权贵、自甘淡泊的高贵品格。陆羽一生著作甚丰，计有《君臣契》、《茶经》、《源解》、《南北人物志》、《茶记》、《顾渚山记》等，其中，《茶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茶叶专著。该书初稿写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大历十年（775年）定稿，历时11年。为了撰写《茶经》，他到茶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的朋友颜真卿、张志和、皎然等都是品茶名家，为其提供了大量资料。《茶经》在文献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为了表彰陆羽对于茶文化的重大贡献，后人尊称其为"茶神"。

杜佑（735—812），字君卿，万年人。唐代大臣、史学家。初以荫入仕，历任司法参军、工部郎中、苏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自幼喜欢史书，不好章句之学。即使身居要职，甚至担任宰相时，仍然坚持晚上挑灯夜读，无日或间。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著成《通典》二百卷。它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时限范围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至唐肃宗、唐代宗。内容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分类编撰极有条理。

除了上举图书编撰者外，还有不少例子，例如令狐德棻、王方庆、崔玄玮、王勃、郑处诲、王元感等。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历仕礼部侍郎、弘文馆学士等职，晚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2]；王方庆，雍州咸阳人，历仕洛州长史、并州长史等职，"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3]，计有《礼经正义》、《宝章集》、《尚书考功》、《尚书考功状绩簿》、《宫卿旧事》、《文贞公实录》、《南宫故事》、《王氏女记》、《王氏王嫔记》、《王氏家牒》、《三品官祔庙记》、《友悌录》、《九嵕山志》、《谏林》、《神仙后传》、《王氏神通记》、《续世

[2]《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3]《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

说新语》、《新本草》、《王氏神道铭》等。崔玄晔，博陵安平人，历仕天官侍郎、白州司马等职，晚年“唯笃志经籍，述作为事”，有《友义传》、《行己要范》、《训注文馆词林策》等多种著作行世[1]。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文章迈捷，下笔则成，尤好著书”，有《周易发挥》五卷、《次论》等书行世[2]。郑处诲，字延美，荥阳人。历仕越州刺史、汴州节度使等职，“勤于著述，撰集至多”[3]。王元感，濮州鄄城人。历仕崇贤馆学士、太子司议郎等职，有《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著作，学者称其著作为“五经之指南”[4]。

[1]《旧唐书》卷91《崔玄晔传》。

[2]《旧唐书》卷190上《王勃传》。

[3]《旧唐书》卷158《郑处诲传》。

[4]《旧唐书》卷189下《王元感传》。

唐代民间其他著作的编撰数量可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进行统计（详下节）。据笔者的统计结果，经部小学类著作最多，有31家、34部、2 164卷。史部除了官修的正史、起居注、实录之外，以杂史、谱牒、地理著作为多。杂史有79家、82部、927卷；谱牒有59家、62部、933卷；地理著作有59家、62部、935卷。子部除了官修类书之外，以释家、杂家为多。释家有138家、157部、1 056卷；杂家有38家、39部、966卷。集部别集、总集的编撰已如上言。在众多的私人著作中，陆德明《经典释文》、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玄奘《大唐西域记》、吴兢《贞观政要》、陆羽《茶经》、孙思邈《千金方》、李淳风《算经十书》等都是影响较大的传世之作。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看，刘知几《史通》是一部史书编撰的总结性著作，它标志着唐代史书编撰已经相当成熟。

第四节　唐代私人图书编撰的特点

唐代私人图书编撰是唐代图书编撰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私人图书编撰有民间明显的时代性和区域性，它是宋代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前奏。唐代以前（含唐代）的中国，北方中国过多承载了历史的灾难，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唐代后期，包括图书编撰在内的江南文化已经开始崛起。

一、数量众多

数量众多是唐代私人图书编撰的第一个特点。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统计如表14：

表14　唐代私人图书编撰数量表

部	类　别	家　数	部　数	卷　数	卷数不详部数
甲部经录	易	20	22	413	3
	书	7	7	66	2
	诗	5	6	93	
	礼	21	23	558	
	乐	23	25	112	
	春秋	28	31	451	1
	孝经	11	11	32	2
	论语	4	4	37	
	经解	12	12	165	
	小学	31	34	2 164	1
	小计	162	210	4 091	9
乙部史录	正史	36	50	2 894	1
	集史	2	4	360	
	编年	2	2	20	
	伪史	1	1	10	
	杂史	79	82	927	2
	起居注	3	3	3 725	
	实录	25	25	785	
	诏令	11	11	222	
	故事	21	21	107	
	职官	31	36	281	
	杂传记	73	75	663	4
	女训	12	14	317	
	仪注	53	57	871	3
	刑法	47	47	777	
	目录	13	13	314	
	谱牒	59	62	933	1
	地理	59	62	935	1
	小计	527	565	14 141	12

续表

部	类别	家数	部数	卷数	卷数不详部数
丙部子录	儒家	53	59	539	2
	道家	37	45	299	6
	神仙	94	101	260	1
	释家	138	157	1 056	2
	法家	3	4	35	1
	名家	4	4	24	
	纵横家	1	1	3	
	杂家	38	39	966	1
	农家	12	12	69	1
	小说家	81	84	333	1
	天文	12	13	189	
	历算	41	43	302	1
	兵书	46	47	248	1
	五行	63	46	220	1
	杂艺术	59	59	129	2
	类书	42	43	6 472	
	明堂经脉	9	9	75	
	医术	76	86	586	
	小计	809	852	11 805	20
丁部集录	别集	511	556	7 427	8
	总集	94	99	2 526	1
	文史	22	22	75	
	小计	627	677	10 028	9
总计		2 125	2 304	40 065	50

据此唐代著作总数当为2 125家、2 304部、40 065卷。实际上唐代著作数量当远远超出此数，这是因为《旧唐书·经籍志》主要著录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的藏书，唐代著作多有遗漏，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唐代著作多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所编撰。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都是非常重视图书编撰的皇帝，故唐代前期是图书编撰的兴盛时期，图书编撰数量远远超过唐代后期。《新唐书·艺文志》补入唐代著作25 227卷[1]，其实除了少数著作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

[1]《新唐书·艺文志·总序》。

前的著作之外，绝大多数属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到唐末天祐四年（907年）之间171年的著作。那么，从唐代建国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118年之间共有多少著作呢？如上所言，我们在对唐代前期图书编撰数量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这个时期图书编撰比较繁荣的客观存在。假定前期118年共有3万多卷著作，则李唐一代著作总数当有6万卷左右。在这6万卷左右的图书中间，别集、总集的数量最多。唐代文人生前或死后编撰别集，似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生前自编别集者如颜真卿、元稹、白居易、刘禹锡、陆龟蒙、李德裕、李群玉等，其中，颜真卿每官一地，就要编一个集子；白居易每隔几年就要结集一次。有的人生前没有编撰别集，死后往往由其亲属、朋友、门人、乡人等为其编撰。亲属编撰者如《王勃集》由王勃之兄王勮等编撰；《卢象集》由卢象孙卢元符编撰；《崔沔集》由崔沔子祐甫编撰；杜牧《樊川集》由杜牧外甥裴延翰编撰。友朋编撰者如《宋之问集》由宋之问友武平一编撰；《崔液集》由崔液友裴耀卿编撰；《白氏长庆集》由白居易友元稹编撰。门人编撰者如《韩愈文集》由韩愈门人李汉编撰；《澈上人文集》由释灵澈门人秀峰编撰。乡人编撰者如《孟浩然集》由孟浩然的同乡王士源编撰。总集之中，唱和总集最多。唱和是唐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宴游、送别等社交活动中唱和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每次唱和之后，都要把唱和诗汇编在一起。据《旧唐书·李适传》："睿宗时，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征至京师。及还，适赠诗，序其高雅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余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为了给司马承祯送行，竟有300多人互为唱和，真是盛况空前。李端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平日亦多唱和，据《新唐书·李端传》："（郭）暧尝进官，大集客，端赋诗最工，钱起曰：'素为之，请赋起姓。'端立献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赐帛百。"可见李端鹤立鸡群，不愧为唱和诗的高手。景龙四年（710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宗宴请张仁愿于桃花园，文人多有唱和，敕太常选20篇，编为《桃花

行》；开元二年（714年）诏祠龙池，公卿以下唱和诗多达130篇，太常考其尤佳者十首，编为《龙池篇乐章》；至德二年（757年），裴倩任洪州司马，与柳识、柳浑、萧定等有唱和之作96篇，编为《海昏集》二卷；大历间，鲍防在浙东任职，与严维、丘丹等37人多所唱和，编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元和五年（810年）裴均集其父裴倩当年避乱江西与柳浑等唱和诗为《裴氏海昏集》；长庆二年（822年），韦处厚守盛山，文人唱和者多人，因有《盛山唱和诗》之编；长庆三年（823年），白居易刺杭州，元稹刺越州，崔玄亮刺湖州，固有《三州唱和集》之编；它如《因继集》、《吴蜀集》、《断金集》、《汉上题襟集》、《松陵集》等均属唱和之作。总而言之，李唐一代唱和之事，无日不有；唱和之诗，无人不作；唱和之集，无处不在。只是由于时代久远，大量的唱和诗已经失传了。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序有两类：一是书序，一是赠序，书序为书而写，介绍内容、著者；赠序为人而写，多为临别赠言。实际上，不少赠序也是书序。唐人在为朋友送行时，多有唱和之作，不少赠序即这些唱和之作的序言。为什么唐代民间图书编撰数量众多呢？这与唐人的传世意识有关。开元元年（713年），张鷟因事下狱，生死未卜，仍然不忘别集编撰，他在《陈情表》中说：

> 臣忝朝班，幸蒙驱策，不了一使。罪应至死，自可钳口吞声，伏待刑书；灰身粉骨，甘从斧钺。岂可昆虫惜命，雀鼠贪生！区区微心，有所未尽。臣平生好学，颇爱文章，虽不逮于词人，滥流传于视草。近来撰集诗赋表记等若干卷，编集拟进，缮写未周，负谴明时，方从极典。恐士衡止息，华亭之唳不闻；嵇康顾影，广陵之音永绝。缺简零落，抱痛幽泉。昔司马迁请就腐刑，以终《史记》，汉武帝愍其至恳，矜而许之。伏愿陛下遂臣万请之心，宽臣百日之命，集录缮写，奉进阙庭。微愿获申，就死无恨。[1]

[1]《全唐文》卷172。

张鷟恳请唐玄宗能以汉代司马迁为例，“矜而许之”，“就死无恨”，传世意识之切，于此可见。著名诗人张籍在劝说韩愈著书时说：

> 天下至广，民事至众，岂可资一人之口而亲谕之者！近而不入则舍之，远而有可谕者，又岂可以家至而说之乎！故曰莫若为书，为书而知者，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传于后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为书，则为圣人之道奚传焉！士之壮也，或从事于要剧，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时之丧乱，皆不皇有所为，况有疾疚吉凶虞其间哉！是以君子汲汲于所欲为，恐终无所显于后，若皆待五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今执事虽参于戎府，当四海弭兵之际，优游无事，不以此时著书，而曰俟后，或有不及，曷可追乎！[1]

[1]《全唐文》卷684《上韩昌黎第二书》。

这段话同样表达了张籍强烈的传世意识，他认为著书可以“化乎天下”，可以“传于后世”，要及时著书立说，不必“待五六十而后有所为”。

二、区域性和时代性

区域性和时代性是唐私人图书编撰的第二个特征。现据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唐代文学丛考》），唐代人才分布如表15：

表 15　唐代人才分布表

类别＼人数＼地区		关中地区		山东地区		江南地区		
		关内	陇右	河南	河北	河东	江南	淮南
进士	前期	12	1	16	28	11	14	3
	后期	50	20	71	57	47	177	8

续表

人数 地区 类别		关中地区		山东地区		江南地区		
		关内	陇右	河南	河北	河东	江南	淮南
散文家	前期	117	8	75	72	47	40	10
	后期	140	21	121	138	79	130	11
诗人		226（京畿） 53（宗室）	27	200（京畿） 157（江南）	245	149	404（江南东） 159（江南）	60
总计		598	77	640	540	333	924	92

表中数字虽然不是图书数量，但是进士、散文家、诗人数量的多少当与图书数量同步，二者是正比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图书编撰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就地域性来说，山东地区是唐代图书编撰最为繁荣的地区，其次才是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就时代性来说，如果说唐代前期的排名先后为山东、关中、江南的话，那么到了唐代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江南由第三位跃居第二位。

三、编撰方法日趋成熟

唐代私人图书编撰的方法日趋成熟，是唐代民间图书编撰的第三个特征。这些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以别集、总集为例加以说明。

唐代别集编撰的方法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别集命名方法多样化。就整体而言，唐代别集以著者姓名命名者最多，如《魏征集》、《颜师古集》、《褚遂良集》、《张说集》、《高适集》、《王昌龄集》、《韩愈集》、《皇甫湜集》、《刘禹锡集》等。但也有用其他方法命名者：以号命名者如王绩《东皋子集》、卢照邻《幽忧子集》等；以地命名者如杨炯《盈川集》、杜牧《樊川集》、颜真卿《吴兴集》等。陆龟蒙自编《笠泽藂书》，笠泽是其写作地，“丛者，丛脞之书也”[1]。编撰时间先后不同的别

【1】《全唐文》卷800《笠泽藂书序》。

集，书名常用“前集”、“中集”、“后集”等字眼，如《李翰前集》、《李华中集》等，也有用年号命名者，如元稹编《白氏长庆集》，“长庆”就是唐穆宗的年号。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二）别集内容仅录诗文，其他专著概不入集。据《旧唐书·文苑传》：蔡允恭“有集十卷，又撰《后梁春秋》十卷”；郑世翼“文集多遗失，撰《交游传》，颇行于时”；杜易简“颇善著述，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代”。以上各例中，“集”或“文集”均与其他著作分别著录，说明其他著作均在别集之外。（三）序言、目录和附录已经成为别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读者阅读、研究别集提供了方便。唱和之作往往附录同人唱和之诗，如王维《王右丞集》附有钱起《酬王维春夜竹亭赠别》、储光羲《偶然作十首》等诗，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四）在诗文排列方面，既不分类，也不分体。万曼指出：“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等于明人刊行别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目。”[1]可见唐编别集在体例上与宋、明人编撰的唐集截然不同。宋编唐集按内容分为燕集、寄赠、送别、酬答等类；明编别集按形式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等类。当然，唐代也有少数别集分类之例，例如《白氏长庆集》就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等类别。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是内容和形式相结合，讽谕、闲适、感伤是以内容分类，杂律是以形式分类。

【1】万曼：《唐集叙录·韦苏州集》，中华书局，1980年。

唐代总集编撰的方法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总集附有作者小传。姚合编《极玄集》，除了僧灵一、法振、皎然、清江四人外，“其余则凡字及爵里与登科之年一一详载。观刘长卿名下注曰‘宝城人’，与《唐书》称河间人者不同。又皇甫曾注：‘天宝十二载进士。’皇甫冉注：‘天宝十五载进士。’以登科先后为次，置‘曾’于‘冉’之前，与诸书称兄弟同登进士者亦不同。知为合之原注，非后人抄撮诸书所增入。总集之兼具小传，

实自此始"[1]。其后，金元好问《中州集》、清官修《全唐诗》等皆仿其例。（二）总集附有作品评论。此例始于殷璠《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于作者"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钟嵘《诗品》之体。虽不显分次第，然篇数无多，而厘为上中下卷。其人不甚叙时代，毋以隐寓钟嵘三品之意乎！"[2]《中兴间气集》于作者之后"各有品题，拈其警句"[3]。其后，仿其例者有明顾起纶编《国雅品》等。唐人总集编撰的其他方法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1]《四库全书总目》卷188《极玄集》。

[2]《四库全书总目》卷188《河岳英灵集》。

[3]《四库全书总目》卷188《中兴间气集》。

四、著作权意识

著作权意识越来越强烈，是唐代私人图书编撰的第四个特征。唐人著作权意识主要表现在稿费的获取和著作权的保护两个方面。

著者获取稿费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唐代关于稿费的记载很多。随着碑刻的盛行，撰写碑文是稿费的重要来源。王勃、李邕、李华、王缙、韩愈、皇甫湜、柳公权、杜牧等都因此获取大量稿费。"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4]，"心织"、"笔耕"即指撰写碑文。李邕以碑颂擅名天下，获取稿费最多，据《旧唐书·李邕传》："邕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赞皇人李华晚年佞佛，著书不多，然"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他也只好姑妄为之。王维之弟王缙也写了不少碑文，"有送润笔者，误致王右丞（即王维）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5]可见王维对其弟的作法很有意见，嘲之曰"大作家"。韩愈也是中国历史上大发"稿费"财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6]看来韩愈的文价不是"一字千金"，而是"一字金山"。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后，诏韩愈撰《平淮西碑》；宪宗将石本颁赐有功人员，其中

[4]《唐才子传》卷1。

[5]《唐语林》卷5《补遗》。

[6]《刘禹锡集》卷40。

有个叫韩弘的人，寄绢500匹，对韩愈表示感谢。唐宪宗的国舅王用死后，韩愈为之撰碑，王用之子赠以带鞍衔的白马一匹及白玉腰带一条。有个叫刘叉的人，任侠能诗，曾慕名投奔韩愈门下，后来看不惯韩愈为死人大唱赞歌捞取稿费的积习，暗自拿着韩愈的"稿费"愤然离去，并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1]可见韩愈在"稿费"问题上的影响是很坏的。据《新唐书·皇甫湜传》："(裴)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皇甫)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可见皇甫湜在酬费问题上毫不含糊：不让他写，他以断交相威胁；请他写，还要讨价还价。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撰书碑文，所获稿费亦丰，"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版，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2]。可见柳公权虽然稿费"巨万"，但他本人并不看重金钱，多为"主藏竖"偷去。唐代诗人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也曾得到江西观察使许于泉给的稿费彩绢300匹。当然唐人也有为了捞取稿费不择手段者，据宋赵德麟《侯鲭录》卷六："唐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立可待也。'"马逢为了捞取稿费，竟然盼着人家死人，其人品之下可知。

[1]《容斋续笔》卷6《文字润笔》。

[2]《旧唐书》卷165《柳公权传》。

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唐人已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据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

> 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然终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写以传布。

白岑为了维护《发背方》的著作权，不畏权势，至死不肯相让，精神实在可佳。但药方关乎人命，编造假药方流传于世，也是不对的。又据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 熊执易类《九经》之义为《化统》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献，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写进，其妻薛氏虑坠失，至今藏于家。

熊执易撰《化统》五百卷，凝结了40年的心血和汗水，其妻视若拱璧，虑有坠失，不肯公布于众，同样反映了较强的维权意识。但是，她以珍藏作为维权的唯一手段，把维权同出版流通对立起来，也是片面的。唐人的维权意识具有普遍性，那些侵犯著作权的人往往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据记载：

> 唐张狗儿亦名怀庆，爱偷人文章，与冀州枣强尉。才士制述，多翻用之。时为之语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谅不诬也。[1]

[1]［唐］张鷟：《朝野佥载·补辑》，中华书局，1997年。

王昌龄，京兆长安（一说太原）人。开元进士，历仕江宁丞、龙标尉等职，著名边塞诗人，其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贞观进士，历仕弘文馆学士、秘书少监、中书郎等职，后为酷吏构陷而死。以文辞著称于世，在宫廷任职其间，诏敕多出其手。张怀庆"爱偷人文章"，剽窃王昌龄、郭正一的著作权，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编顺口溜嘲笑他。可见侵权行为在唐代是不得人心的。

第八章　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为世外桃源的芸芸众生带来了迷人的信息，为封闭的世界打开了八面来风的窗口。马克思指出：

>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

【1】〔德〕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

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培根指出：

> 这三种发明（指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已经在世界范围之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指印刷术）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指火药）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指南针）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2]

【2】〔英〕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

的确，印刷术“是科学复兴的手段”，是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杠杆”，其影响之大是“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无可比拟的。当然，印刷术的发明并非自天而降，它不是一朝一夕某人的突发奇想而产生，它的发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毋庸置疑，印刷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关于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研究方法，似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宏观定位”。即在社会需求、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进行坐标定位，大体确定发明雕版印刷的时间段；第二步是“层层进逼”。即在大体确定的“时间段”内，深挖细找，步步为营，最后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雕版印刷的发明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后的结论只能是一个较“宏观定位”更加具体的时间段，而不可能是某年某月某日；第二，文献挖掘是雕版印刷发明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文献挖掘应当紧扣“宏观定位”的“时间段”进行，并且结合特定的语言环境字斟句酌。

第一节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社会需求

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在社会迫切需求的条件下产生的。没有社会需求，就没有雕版印刷。社会需求包括著者需求、读者需求、抄书者需求、书商需求、藏书家需求、外交需求、佛教需求等方面，让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一、著者需求

雕版印刷与著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雕版印刷是复制图书的重要手段。然而，图书并非从天而降，而是著者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没有著者就没有图书；没有图书，发明雕版印刷就缺乏必要性。著者越多，书稿越多，靠人工抄写流传的机会就越少；流

传的机会越少，发明雕版印刷的呼声就越高，发明雕版印刷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国古代有“三不朽“之说，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著书就是“立言”。书写得好，著者就可以流芳百代，名垂青史。古人著书的目的大多是为了传之久远、永垂不朽。曹丕《典论·论文》指出：

>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忽。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认为著书立说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规劝人们“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忽”。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刘勰把人的躯体比作“草木”，把名声比作“金石”。人的躯体像草木那样脆弱易逝，而声名会像坚硬的金石那样世代相传。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声名流传下去，只有著书立说，别无选择。在传世思想的驱使下，著者人数不断增加，请看唐代以前历代著者数量表16：

表16　先秦至唐著者数量表

书　名	先秦	秦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总计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和《全唐诗》			58	39	196	427	87	2 200	3 00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唐文》	174	11	774	282	801	1 075	165	3 042	6 324
《中国丛书综录》	72	6	142	65	158	150	19	493	1 105

可见唐代著者人数为诸代（先秦至唐）之冠，唐诗作者占历代诗人总数的73%。当然，这也意味着唐代“出书难”的矛盾更加尖锐，就意味着更多的诗歌不能发表，意味着更多的图书不能出版。众多著者为了“发表”作品挖空心思，想了种种办法：唐求以诗瓢“发表”作品[1]；刘蜕以文冢“流传”作品[2]；陆龟蒙以佛像“流传”作品[3]。更多的人以题壁的方式“发表”作品。我国古代题壁诗始于两汉，盛于李唐。唐秭归县神女祠至长庆时已有题壁诗千余首。唐宪宗元和间，元稹、白居易的诗歌盛行一时，号为“元和体”，其诗题壁者到处可见。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白二人甚至亲为题壁，正如白居易《答微之》诗所说：“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白居易在旅途中，“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4]。唐末寒山题壁诗最多，约有600首。但是，题壁等办法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出书难”的矛盾，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再说，题壁诗大多属于即兴“小品”，还不是著者的拳头产品，因此，对作品一往情深的著者群体翘首以待一种高效率的图书制作方式，雕版印刷就是在“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呼唤中诞生的。

【1】［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07。

【2】《山堂肆考》卷127。

【3】《山堂肆考》卷127。

【4】《全唐诗》卷438。

二、读者需求

雕版印刷的发明与读者需求密切相关。读者需求量越大，读者呼声越高，雕版印刷发明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要弄清雕版印刷的起源，就必须调查一下古代的“读者信息”。“读者信息”的调查方法很多，而考察学校教育则是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学校是读者最集中的地方，课本人手一册，一个学生就是一个读者，学生是最大的读者群。教育越发达，学生越多，教材的需求量就越大，发明雕版印刷的紧迫感就越明显。

让我们考察一下历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早在先秦，我国已有了各类学校。春秋时期，随着诸子百家的出现，“学在官府”的制度全面崩溃，民间出现私学。孔子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教育家之一，《史记》说他有三千弟子。汉代自武帝之后，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学校教育发展很快。除了各级官学之外，民间私学多如牛毛，学生动至数千，甚至上万。魏晋南北朝时期，兵连祸接，学校教育受到严重破坏。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也曾重视教育。但到晚年，不喜儒术，学校遂废。炀帝即位，复兴学校，但是好景不长，隋末社会动荡，学校受到战火的严重干扰。唐代重视学校教育，早在唐初，唐高祖便下令建立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接着唐太宗继续采取措施，发展学校教育，增建校舍1 200间，太学、四门学扩大编制，学生猛增到3 260人。四方儒士纷纷负笈长安，甚至高丽、百济、新罗等周边国家的国王也把子弟送到唐朝来上学，学生最多时达到8 000多人。中央学校由国子监统一管辖的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由中央各行政部门分别管辖的有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医学等。地方官学如府学、州学、县学等分别由府、州、县等直接管辖。各类学校的课程也有区别。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授经学。经书包括正经、旁经两类，正经又分大经、中经、小经三类，各经包含的课程及学习时间如表17：

表17　唐代学校习经课程表

类别		书名	学习时间
正经	大经	《礼记》、《左传》	每种3年
	中经	《诗经》、《周礼》、《仪礼》	每种2年
	小经	《易》、《尚书》、《公羊》、《谷梁》	《易》2年，其他各一年半
旁经		《孝经》、《论语》	2种共1年

正经不必全学，可以选修。但选修也有规定：若选修两经，则大经、小经各一，或中经二种；选修三经，则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选修五经，则大经两种，中经、小经各一，兼通《孝经》、《论语》。算学学制7年，学生分两组：第一组学八门课，三年学《九章算术》和《海岛算经》；一年学《孙子算经》和《五曹算经》；一年学《张丘建算经》；一年学《夏侯阳算经》；一年学《周髀算经》和《五经算术》。第二组学两门课：四年学《缀术》；三年学《辑古算经》。另外，算学学生都要学《数学记遗》和《三等数》。书学学制六年：石经三体三年、《说文解字》二年、《学林》一年。此外，还要兼掌时务、《国语》、《三苍》、《尔雅》等，还要求学生每日习字一纸。崇玄学有《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课程。医学必修课有《本草》、《甲乙》、《脉经》等。唐代学校规模之大、学生之多、体制之完备，史无前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唐代设有360个州、1 557个县。若州学平均以40个学生计，县学平均以25个学生计，则州、县共有学生46 925人，如果加上中央各类官学和民办私学，则全国学生总数当不少于5万人。5万学生需要各类教材5万套，对于手工抄写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教材短缺，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读书难”的问题迫在眉睫，雕版印刷就是在响彻云霄的朗朗读书声中诞生的。

三、抄书者需求

抄书者可分两类：一类是专业抄工，这类人又叫经生、书手、楷书、佣书、赁书等；另一类是文人。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许多文人都抄过书。手工抄书效率实在太低。宋周煇撰《清波杂志》和《清波别志》，二书共计15卷、350页，明人姚咨抄写二书费时70余天，平均每天仅抄6页。清梁同书抄写梁萧统《文选》十六册，费时5年，清人蒋衡抄写《十三经》，费时12年，他在抄后跋语中说：

> 余矢志力书，计全经八十余万言。于是先其难者，以《春秋左传》二十万言始，凡五年讫工；继以《礼记》十万言，又二年；其余《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又五年，共历一纪乃毕。[1]

[1] [清]钱泰吉:《曝书杂记·蒋氏自跋十三经字册》。

由此可知其抄书进度如表18：

表 18　蒋衡抄经进度表

书　名	字　数	抄写时间	日抄字数
春秋左传	20 万	5 年	110 字
礼　记	10 万	2 年	137 字
其他各经	50 万	5 年	274 字
总　计	80 万	12 年	183 字

平均每天仅抄一二百字，何其慢也。写工的生活也十分贫苦，后梁贞明五年（919年）四月，敦煌郡金光寺学士郎安友盛抄《秦妇吟》有题识云:“今日写书了，合有五斗米。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2] 辛辛苦苦，连抄数日，仅能得到五斗米的报酬，要想得到高报酬，简直是不可能的，抄来抄去，到头来还是一身灾祸。又如后蜀广政十年（947年）八月九日抄《摩维诘经

[2]《斯坦因劫经录》0692。

讲经文》有题记云:“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祥院写此第二十卷文书,恰遇抵黑。书了,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这则题记说明经生的工作十分繁忙,从早上一直抄到天黑,为了糊口,他不得不这样做。天黑抄完之后,想返回遥远的家乡已经来不及。怎么办呢?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度过这漆黑的夜晚。这一夜,他也许露宿街头,也可能栖身破庙,经生的困苦生活于此可见。顾炎武曾经指出:

> 唐以前书卷,必事传写,甚至编韦续竹,裁蒲葺柳,而浮屠之言惟山花贝叶,缀集成文。学者于时,穷年笔札,不能聚其一,难矣![1]

【1】[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28。

纵观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抄书史,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唐代抄书规模尤大(详第九章第二节)。广大抄书者不安于现状,希望改变现状,雕版印刷正是在他们望眼欲穿的期待中诞生的。

四、书商需求

图书出版和书业贸易互为因果关系:书业贸易的繁荣,能够促进图书出版的繁荣;图书出版的繁荣,也能促进书业贸易的繁荣。图书出版的繁荣可以表现为管理、设备、出书品种、印数等方面。就拿印数来说,同种图书的印数越多,成本、书价就越低,读者负担就越轻,销售量就越大,书业贸易就越红火。反之,同种图书的印数越少,成本、书价就越高,读者负担就越重,销售量就越小,书业贸易就不景气。手工抄书图书品种和复本有限,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只有先进的图书制作方式,才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图书品种和复本。我国至迟在汉代已有书店。“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2],书肆就是书店,这是我国古代书店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这就是说,公元前一世纪,我国就有了书店,后代书店不断发展,隋唐时期书店已相当普遍。书市交

【2】[汉]扬雄:《法言·吾子》。

易活动所在皆是。唐代书业贸易空前繁荣，已经形成长安、洛阳、成都、扬州、绍兴、敦煌等书业贸易中心，可考书商有数十人之多，书商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开架售书者有之，特技表演者有之，拘而送公者有之（详见第十一章）。由于货源短缺，不少书商被迫亲自动手抄书，边抄边卖。在货源不足的情况下从事书业贸易活动，实属不易。广大书商希望有一天社会能为他们提供取之不竭的书源，雕版印刷正是在广大书商喧嚣的叫卖场中诞生的。唐代书商的大量出现，刺激并孕育了雕版印刷的发明。后来的事实证明：书商的确是雕版印刷的最早受益者之一。当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刚刚印出第一批图书的时候，书商们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图书推向市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有不少书商，密切注意图书制作的新动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接过这种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刻印了大量民间常用书籍。这些可敬可爱的书商为印刷术的发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藏书家需求

欧阳修《集古录序》说："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这就是说，对于收藏而言，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好之"，二是"有力"。有力者，有钱也。有钱才能买书。藏书家获取图书的手段，除了借抄、赠送之外，大多是买来的。在众多藏书家中，除了少数人经济并不富裕之外，大多属于小康之家，甚或富家大族，"有力"不成问题。逛书肆是大多数藏书家的业余爱好。但是，有些图书可以买到，有些图书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因为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制作全靠人工抄写，一部书要成年累月地抄，图书品种和复本极为有限，远远满足不了藏书家的需要。人们常常责备古代藏书家是"封闭型的"，的确，不少藏书家秘不示人，这从藏书印文字可见一斑。明钱谷有印云：

> 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

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何其愚。

古代藏书家为什么“秘不示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私有制社会长期养成的积习之外，恐怕也与得书不易有关。钱谷“百志寻书”，寻书之苦，可想而知。清藏书家陈鳣有印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费辛苦”恐怕也是实话。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爱护不异隋侯珠”呢？物以稀为贵，图书数量太少自然就会珍之贵之。藏书家越多，对图书的需求量就越大，藏书就越是困难，发明雕版印刷的愿望就越强烈。先秦至唐私人藏书家的人数如表19[1]：

[1] 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藏书家需求雕版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表19 先秦至唐藏书家数量表

朝代	可考藏书家数	藏书数量		
		可考藏数者	万卷以下	万卷以上
先秦	3	2	2	0
汉	7	1	0	1
三国	8	3	2	1
晋	7	4	4	0
南北朝	59	33	21	12
隋	3	2	1	1
唐	87	30	8	22
总计	174	75	38	37

唐代私人藏书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数多，占历代（先秦至唐）藏书家总数的50%；二是藏书量大，藏书万卷者约占可考藏书家总数的73%；三是“秘不示人”之风自唐始。藏书家杜暹告诫子孙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藏书家杜兼告诫子孙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类似这样的家训，在古代私人藏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珍秘之风自唐而始？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书源短缺，得书不易。藏书家寄希望于图书制作方式的革

命，雕版印刷就是在藏书家充满希望的目光中产生的。

六、外交需求

图书贸易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交流越是频繁，图书的需求量越大；需求量越大，发明雕版印刷的呼声就越高。

早在先秦，中国就开始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通往西方的道路，中国的特产丝绸就已经运往古希腊等地，中国的兵器、马具和动物纹饰艺术已传至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进一步开辟了通往西方的道路，汉使先后到过安息、身毒、条支等国。“身毒”又叫天竺，就是印度，中印交往尤其频繁。北魏时，天竺遣使朝贡达17次之多。唐代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鼎盛时期。季羡林曾经指出唐代中印交往的两个特点：

> 第一，交流频繁程度是颇为惊人的，有时候年年都有往来，甚至一年数次。有的时候有点间隔，也不过几年的功夫。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第二，交流的内容并不限于宗教，政治（外交）、经济、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几乎都有。[1]

[1]《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

在中印交往的过程中，除了印刷术、造纸术、罗盘、火药先后流入印度之外，也有不少中国图书流入印度。

除了陆路之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开辟了通往东亚、南亚、西亚、非洲各国的水上航线。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中国典籍已经传到日本列岛，据日本现存最早的文献《古事记·应神天皇》记载：

> 天皇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迩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

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和迩吉师是文首等的祖先。（按：《千字文》当是一个疏漏，因为《千字文》成书晚于此时。）

在以上引文中，《论语》是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的。其实，由中土直接传入日本的书籍也是有的。中日交往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期，中日两国已开始友好往来，三国时中日交流逐渐增多。为此，《三国志·魏书》专门设立了《倭人传》。南北朝时，中日交往更多，刘宋60余年之中，倭使朝贡13次之多。萧梁时，佛教也由中国传入日本。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又有大批华人移居日本，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唐代诗人留下大量讴歌中日友好往来的诗篇，这些诗歌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手足之情。另外，通过南海航线，中国和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国的交往也很频繁。中国船队在三国时已经到达非洲。隋唐时期，中外交流之频繁史无前例。

以上是先秦至唐中外交流的简单历史。由此可见，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至唐代而极盛。在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外国更需要中国，更需要中国的文化，更需要中国的图书。图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既然如此，手工抄书远远满足不了这种如饥似渴的外交需求，雕版印刷正是在丝绸之路的马蹄声和遣唐使船头的风浪声中诞生的。

七、佛教需求

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写经也是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尼法信》记载：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值，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燃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

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

为了抄写佛经，又是洗澡，又是换衣，又是燃香，甚至连呼吸都不得随便。七卷佛经，抄了八年。诚则诚矣，然抄经速度实在太慢。对于那些想造大功大德的佛教信徒来说，很难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佛教信徒期待着高效率图书制作方式的诞生，佛教信徒呼唤雕版印刷。可见佛教兴衰与雕版印刷密切相关：佛教越兴盛，写经越多；写经越多，发明雕版印刷的呼声就越高。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支国国王派使者伊存到西汉都城长安，把佛经传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土的最早记载。汉明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承认佛教的皇帝。终汉一代，由于佛教刚刚传入中土，影响还不大。晋代佛教有了较大发展。洛阳、建业、凉州、长安、庐山是晋代佛教的五大传播中心，竺法护、道安、支遁、慧远、法显、僧肇等为晋代著名僧人。据《大唐内典录》著录，西晋译经451部、717卷，东晋十六国译经487部、1 805卷。南北朝时，佛教空前繁荣。最高统治者和文人学士大多笃信佛教。梁武帝萧衍佞佛之甚，在古代封建帝王之中是少有的。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仅建康一地就有寺院500余所、僧尼10余万人。随着佛教的盛行，造像活动极为频繁，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是北魏时开始开凿的。南北朝的佛经翻译也很活跃。《开元释教录》著录有668部、1 439卷。隋代也很重视佛教。如前所言，隋文帝时，全国修建佛寺四五千所，度僧数十万人，写经132 086卷，整理故经3 853部。唐代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崇佛高潮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伪造的《大云经》，说其夺取政权符合弥勒的授意，并将《大云经》颁行天下，令长安、洛阳以及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还亲自主持了《华严经》80卷的翻译工作。第二次崇佛高潮是在唐肃宗、唐代宗时期。唐肃宗召集100多个和尚入宫，朝夕诵经，以求保佑。代宗甚至任用元载、

王缙、杜鸿渐三个佛教徒为相。第三次崇佛高潮是在唐懿宗时。凤翔法门寺珍藏一块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的手指骨，因被尊为佛门圣物。懿宗即位后，危机四伏，国势江河日下，为了乞求高佛保佑，继唐玄宗之后，耗资动众，重新举行迎佛骨的活动。唐代士大夫普遍崇佛，写经、刻经、铸佛、建寺、施财、饭僧等无所不为，设斋诵经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萧瑀一生诵《法华经》一万余遍。王维不为华服，不食荤血，每日饭僧十数人。《全唐诗》共收诗歌48 900多首，而文人所写的佛理诗就有2 700首，加上僧人诗2 500首，二者合计5 200多首，占全书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唐代总共翻译佛经372部、2 159卷。唐代佛经除了天台宗之外又新增慈恩宗、律宗、贤首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为了大造“功德”，唐代写经之例比比皆是（详第十章第四节）。人们喜欢抄经，但是抄经确实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他们迫切希望早日改变人工抄写的传统方法，雕版印刷就是在这种迫不及待的希冀中诞生的。

第二节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物质基础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万事万物，雕版印刷也不例外。雕版印刷需要木材、刀具、刷具、纸、笔、墨等物品。其中，木材包括梨木、枣木、梓木、黄杨、银杏等，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理细密，易于奏刀。刀具包括锯子、刨刀、铲刀、凿刀、雕刀等，锯子把木材锯成木板；刨刀用以刨平板面，铲刀用以挖改错字，凿刀用以剔空打洞，雕刀用以刻字。刷具包括各种大小型号的棕刷，用以上墨和刷印纸张。木材、刀具、刷具三类物品所在皆是，价廉易得，因而对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影响不大，姑置勿论。比较而言，对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具有决定意义者只有纸、笔、墨三类物品。

一、雕版印刷的承印物——纸

纸是文字载体，是承印物。作为雕版印刷的承印物，必须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一）有一定的平滑度。因为版面是平的，承印物也必须平，否则二者就不能紧贴在一起；（二）有一定的吸墨性。印刷的实质，从工艺角度看，就是油墨向承印物上的转移。要想顺利地完成这种"转移"，除了墨本身的性能之外，承印物本身也当有一定的吸墨性，必须"两厢情愿"；（三）承印物体积要小，便于存放。雕版印刷效率高，如果承印物体积大，那么印刷物将会堆积如山，充塞宇宙；（四）承印物要有足够的数量。雕版印刷比起人工抄写，速度大幅度加快，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承印物作为后盾，就会"吃不饱"，甚至停工待料；（五）承印物要价廉易得。如果承印物价格昂贵，远远超出了出版者和广大读者的承受能力，得之不易，雕版印刷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自从文字发明之后，载体几经变易，由甲骨而金石，由金石而竹帛。用上述五个条件衡量，甲骨、金、石、竹、帛等都不适宜作为雕版印刷的承印物，最佳的承印物非纸张莫属。但是，纸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纸是什么时候普及的？什么时候才能生产雕版印刷用纸？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纸张的发明、发展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表明，早在西汉已经出现了纸张。东汉蔡伦作为一位宫廷造纸的组织者，他对造纸技术的贡献至少有两点：第一，改进了造纸技术。西汉古纸多用麻类纤维作为原料，而蔡侯纸的原料除了麻头之外还有树皮、破布、渔网等。这就为纸张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第二，对于造纸技术的普及也有一定贡献。蔡侯纸制成之后，"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1]。但是，就整体而言，汉代文字载体仍以竹帛为主，纸张远远没有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纸张已经作为最佳文字载体走进千家万户。尽管南北朝时期，纸张已经普及，但是由于需求量大，造纸和用纸没有同步发展，纸张的缺口仍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78《蔡伦传》。

【1】《南史》卷43《萧晔传》。

【2】《南史》卷11《后妃上》。

【3】《北史》卷43《邢劭传》。

然很大。南齐高帝萧道成早年“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1]，方伯尚且如此，遑论平民。南齐沈驎士用纸背抄书，也说明得纸之难。谢庄作哀策文，“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2]，邢劭“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3]。以上数例说明当时纸张供不应求。

唐代是古代造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纸张的大量需求刺激了造纸业，造纸地区不断扩大，造纸数量不断增加，纸张品种不断增多。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通典·食货志》等书记载，陕西的长安、凤翔、洋县，四川的成都、广都，安徽的宣州（含宣城、泾县、南陵、太平、宁国、旌德等）、池州、歙县等，浙江的杭州（含余杭、富阳）、衢州、婺州、越州（含嵊县）、睦州，广东的韶州、罗州、广州，江西的江州、信州、临州，江苏的常州、扬州，湖南的衡州，山西的蒲州，河南的洛州，河北的巨鹿，湖北的均州，甘肃的武威、敦煌，新疆的吐鲁番等地均生产纸张。各地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较而言，陕西、四川、安徽、浙江造纸尤多，是全国的四大造纸中心。关于唐纸数量之多，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历代书画家之多寡与载体变易密切相关。甲骨、金石、竹帛作为载体，或坚、或贵、或狭小、或难得，实在不易写字作画。所以，汉代之前的书画家寥寥可数。纸张作为载体，尽去上述弊病，独擅其美，书画家如鱼得水，挥毫自如，人才彬彬而出。考察一代书画家之多少，可知纸的应用情况。尽管历代书画家尚无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无论任何一部书画家辞典，唐代书画家人数均独占鳌头，请看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辞海》、薛锋等编《简明美术辞典》等书的统计结果如表20：

表 20　先秦至唐画家、书法家人数表

书　名	类别	先秦	秦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辞海	书法家			6	2	4	5	1	14
	画　家				1	3	3	1	24
简明美术辞典	书法家		4	23	6	6	5	1	23
	画　家			10	5	15	32	4	72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书法家	14	5	76	43	155	215	25	500
	画　家	6	2	9	8	20	84	23	357
书史会要	书法家	21	5	72	44	190	200	20	401

通过此表，似可得出结论：唐代纸张盛行，史无前例。当然，影响书画家人数多寡的因素可能很多，但不能不承认，纸张的广泛应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纵观造纸历史可知：汉代刚刚发明纸张，纸张平滑度、吸墨性等各种功能都很难满足雕版印刷的要求，文字载体仍以竹帛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越来越多，最后达到普及。但由于用户大增，供不应求。纸张至唐而大盛。无论纸张的数量和质量都能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唐纸为雕版印刷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二、雕版印刷的工具——毛笔

雕版印刷的第一步工作是"写样"。所谓"写样"，就是把文稿誊写在一种极薄的纸上，然后再把文字移置于木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毛笔，就无法写样。毛笔质量的关键在于笔毫，笔毫要有尖、齐、圆、健"四德"："尖"指毛笔尖而有锋；"齐"指毛笔发开之后，笔毫长短一致；"圆"指整个笔毫周身饱满；"健"指笔毫富有弹性。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曾说：

> 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要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齐则波切有凭，管小则运动有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1]

【1】[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巴蜀书社，1986年。

这里对笔管、笔毫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以上要求对于雕版印刷“写样”所需毛笔同样是适用的。毛笔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什么时候的毛笔最能适应“写样”的需要？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毛笔的制作历史。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彩色花纹，当是用毛笔之类的工具描绘出来的。这些笔可能不像样子，但它却是我国最早的毛笔。商代甲骨文中已有“笔”字。周代毛笔使用已经相当普遍。秦将蒙恬曾对毛笔加以改进，后人因有“蒙恬制笔”的传说。汉代制笔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兔毫成为制笔的主要材料之一，除了兔毫之外，还有羊毫、狼毫、鸡毛、鼠须、鹿毫等。羊毫不如兔毫劲健，但材料易得，价格低廉，而且吸水性能较强，蓄墨也多。笔毫大而言之，可分硬毫、软毫两类：硬毫笔力遒劲，但寿命不长；软毫笔力柔软，寿命较长。汉代出现一种“兼毫笔”，即把硬毫、软毫合在一起制成笔头，一般多以兔毫、羊毫为原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汉代制笔技术，出现了不少制笔专家，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笔法》和王羲之《笔经》中还详细总结了制笔方法。隋唐时期的毛笔制造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随着书法艺术的繁荣，毛笔的需求量大量增加，单是隋代智永一人就用过十瓮笔头。唐代官方抄书卷帙浩繁，需要大量毛笔，政府各部门都配备有专门制笔、修笔的笔匠。就民间而言，唐代宣州的“紫毫笔”最负盛名。随着中日交往的频繁，唐代毛笔还飘洋过海，传到日本。唐德宗贞元二年（804年），日本高僧空海来华学习，把“二王”的书法艺术和文具制作方法带回日本，所著《执笔法》、《使笔法》二书是日本最早研究笔艺的专著。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还保藏着唐笔多支。

总而言之，古代毛笔的生产在汉魏六朝时期已经相当成熟。隋唐时期制笔数量之多、名牌笔之产生、专业笔匠的大量出现、毛笔东传日本等，标志着隋唐毛笔制作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完全能够适应雕版印刷“写样”的需要，为雕版印刷的发明

创造了一个条件。

三、雕版印刷的颜料——墨

墨是雕版印刷不可缺少的物质。没有墨，版面的文字、图像就无法显现在纸上。现代金属版印刷所用的墨一般包括颜料、连接料和附加剂三种成分。颜料决定油墨的颜色、着色力、干燥性、遮盖力等；连接料是使油墨成为流体的原料，是使颜料等牢固附着于纸的媒介物；附加剂是指那些用以改变和提高油墨印刷适性的物质。古代雕版印刷用墨的成分虽然不像现代金属版印刷所用油墨那样复杂，但它同样包括颜料、连接料和附加剂三种成分。松烟等是颜料，动物胶是连接料，麝香等是附加剂。雕版印刷用墨必须具有粘着性、遮盖性、光泽性、永久性等。所谓"粘着性"就是具有较强的粘着纸的能力，如果粘不上纸，就不能用。所谓"遮盖性"，就是具有遮盖纸色的能力，如果连白纸都盖不住，同样也不能用。所谓"光泽性"，就是说墨色带有光泽，而不是黑糊糊一片，面目可憎。所谓"永久性"，就是墨色经久不变，永不褪色。墨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什么时候的墨最能适应雕版印刷的要求？让我们回顾一下制墨的历史。

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先秦的"墨刑"就是一种在面上刺字，以墨涅染的刑法。有关专家对殷墟甲骨进行考证，确认有些甲骨文是墨和朱砂写的。秦汉时期是石墨、烟墨并用的时期(图43)。石墨在使用时要以研石将其磨成细粉，再兑水稀释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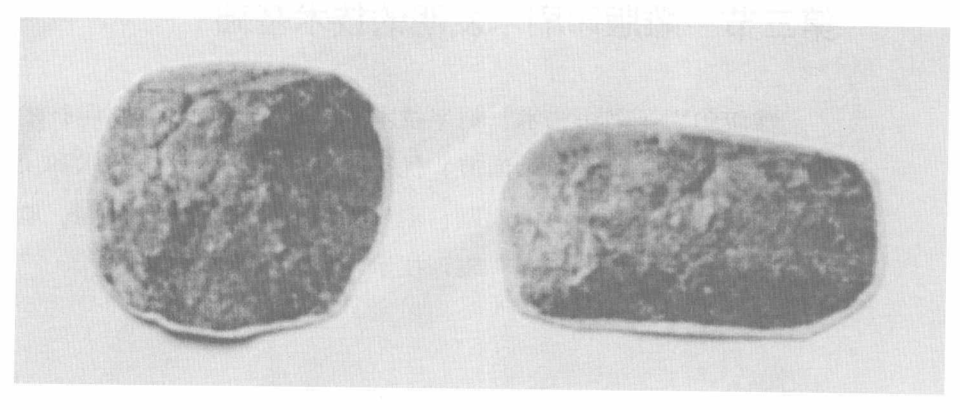


图43
东汉残墨

墨汁。烟墨是用松树不完全燃烧形成的松烟制成的。松木含油脂较多，因此，用松烟制成的墨最佳。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墨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韦诞不仅是制笔专家，也是制墨专家，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详细记载了韦诞的制墨配方，这在制墨史上还是第一次。唐代制墨业发展更快，制墨地还由陕西、江西扩大到山西、河北等地。唐代制墨名家有李阳冰、祖敏、王君德、奚鼎、奚鼐、奚超、李慥等数十人。大历二年（767年）李阳冰制巨墨一挺，堪称"墨王"，据元陆友《墨史》卷上：

> 宋元符间，襄阳米芾游京师于相国寺罗汉院，僧寿许见阳冰供御墨一巨挺，其制如碑，高逾尺而厚二寸，面夔犀文，坚泽如玉，有篆款曰"文华阁"。中穴一窍，下画泰卦于麒麟之上，幕篆六字曰"翠霞"、曰"臣李阳冰"。左行书"大历二年二月造，得旨降入翻经院"。

如果没有高超的制墨技术，这样的巨墨是很难造出来的。出于抄书、办公的需要，唐代官方贮墨甚丰，每到一定时间就给政府各个部门颁发纸、墨等办公用品，据《新唐书·艺文志·叙》，唐代内府每月给集贤院颁发的墨就有336挺。众多官府机关用墨之多，可想而知。总之，唐代制墨地域之广、名家之多、技术之精，是史无前例的。这也为雕版印刷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基础

雕版印刷是书法艺术、刻字技术、反文阳刻技术、刷印技术和装订技术（详第九章第四节）优化组合的产物。书法艺术和反文阳刻技术解决"字"的问题，刻字技术解决"刻"的问题，刷印技术解决"印"的问题，装订技术解决散落不齐的问题。

一、印刷字体——楷体的形成

发明印刷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制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印刷术。当代印刷常用字体有宋体、楷体、仿宋体、黑体等。诸体风格各异：宋体端方正直，比较庄重；楷体流利自然，比较活泼；仿宋体纤细秀丽，比较轻巧；黑体粗犷厚实，比较雄浑。到底采用什么字体，文稿在付排之前，编辑们都要精心选择一番。同理，古代雕版印刷也有一个选择字体的问题。早在4 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汉字。物换斗移，4 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使用汉字，其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文字史上是仅见的。汉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刷，几经改易，由甲骨而金文，由金文而大篆，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书，由隶书而草书，由草书而楷书，由楷书而行书，变得愈来愈美，愈来愈具有艺术魅力。一般地说，雕版印刷大多使用楷体。截止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印刷品全部都是楷体。为什么不使用别的字体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汉字的演变历史，比较一下各种字体的特点。

甲骨文是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盛行于商代后期。甲骨文是汉字发展史上已经形成体系的古文字，它的点画结构已具有均衡、对称、稳定等特征。它标志着汉字结构已由对客观事物的简单模拟而发展成为有艺术造型因素的形体，从而为汉字书写升华为书法艺术在形式上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说，甲骨文有如下特征：（一）由于刀刻不易刻出圆笔，甲骨文的笔画直而粗，锋芒明显，转折处均为方形，整个字形显得瘦劲挺拔。（二）三不定：一字是正写、反写、横写，方向不定；象形字图形繁简不定；会意字的表意成分多少不定。“三不定”的结果，造成大量异体字。（三）直行书写。（四）布局疏密不一。

金文是指青铜器上的文字，又叫钟鼎文。金文盛行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字体凝重，用笔方正，有竖行而无横行，与商代甲骨文区别不大。西周后期的青铜器铭文日趋

成熟，用笔方整一变而为圆润，结体紧密、稳定，全篇章法纵有行、横有距。在用笔、结体、章法等方面已构成书法艺术的初步格局。春秋时期，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青铜器的形制、花纹、铭文也受到很大影响，金文出现装饰化、艺术化倾向，这是文字书写向书法艺术迈出的重要一步。

大篆又叫籀文，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它有两个特点：（一）结构繁复，在一个字里同一偏旁往往重复出现。（二）笔道匀称，结构整齐。石鼓文就是大篆的一种。

小篆由大篆演变而来，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规定全国通行的标准字体。小篆有四个特点：（一）形体固定，一个字一般只有一个写法；（二）偏旁位置固定，不得随意变换；（三）偏旁符号固定，不得随意增减；（四）字形简化，在书写的线条化和文字的符号化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隶书是由小篆演变而成的一种简化字体，通行于汉代。其字形扁阔，笔画平直，横画蚕头燕尾，完全摆脱了象形文字的遗意，更具造型艺术的特征。和小篆相比，隶书的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分解小篆弯弯曲曲的线条，把曲笔变为直笔；（二）合并部首，用同一部首代替原来各不相同的部首，如“春”、“秦”、“泰”、“奉”、“奏”五字原来上部写法并不相同，隶书变为相同的写法。（三）有些字省去了某些部分，如“屈”字，原字上“尾”下“出”，隶书则省去“尾”字之“毛”。（四）有些字用简单的部分代替了复杂的部分，如“晋”字原来上部为两个“至”字，隶书变简单了。总而言之，汉字由篆而隶，是从复杂到简单、从书写不便到书写方便的变化过程，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草书是一种书写简捷的字体（图44）。草书有章草、今草两类。章草带有隶书遗意，一个个字分开来写，间或露出波磔。章草有两个优点：一是笔画简单，它往往省去一个字的某些部分，如“時”省去右上之“土”。有些本来并不相同的偏旁，草书变得非常相似，如“系”、“月”、“车”等。二是笔画交待得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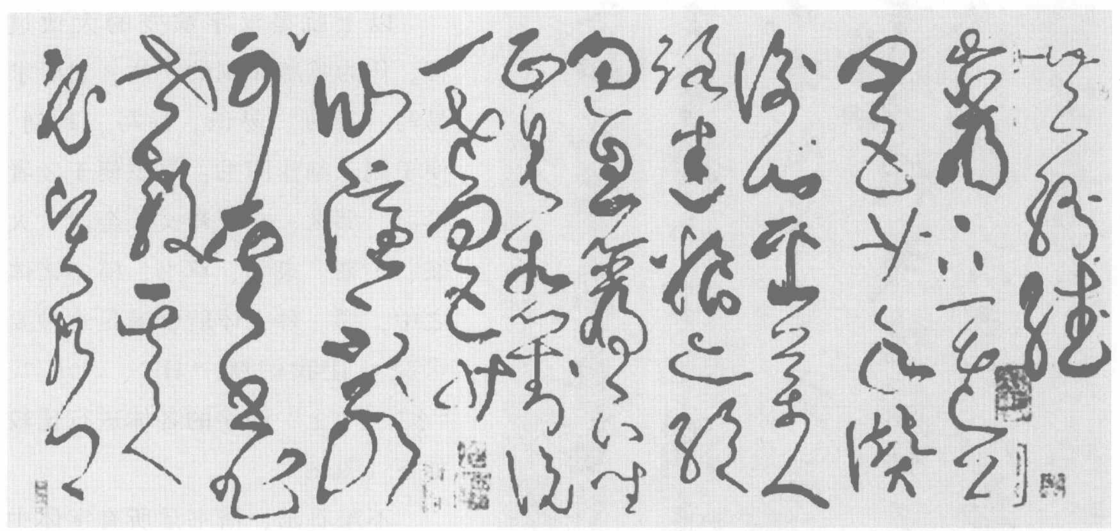


图44
张旭狂草

清楚。它的缺点是字形结构和小篆、隶、楷等大相径庭，难于记识。草书发展到东晋形成今草，连笔多是今草的显著特征。今草往往把许多字连在一起，用一笔写成。

楷书又叫正书、真书。“楷书”之名始于唐代。“楷”是模范、法式的意思。顾名思义，楷书就是供人们学习模仿的标准字体。楷书是汉字由象形文字向表意文字过渡的最后阶段。它的出现，标志着汉字向书法艺术的成熟迈出关键的一步。楷书的基本特征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一丝不苟。它和隶书的区别是形体由扁而方，横和撇的末尾不再上挑，点由长变为圆形。楷书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南北朝的魏碑体属于楷书的一大流派。楷书至唐而极盛。唐代重视书法，书法优秀甚至是升官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为了培养书法人才，官方还专门设有书法专科学校。唐代书法家不可胜数。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说：“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史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往往胜于今之士大夫。”

在草书、楷书之后，还有行书。草书写得快，但苦于认读；楷书易认，但书写较慢。行书取二体之长，补二体之短，可以说是楷书之草化，草书之楷化（图45）。

以上就是汉字演变的大致过程。作为雕版印刷的字体，它要求易写、易刻、易识。易写、易刻，便于刻工制作图书；易识便于读者学习。那么，在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诸体之中，哪一种字体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呢？让我们就“日”、“月”、“水”、“土”四字的各体进行比较如下（图46）：

不难看出，楷书是所有字体中最易写、易刻、易识的一种。作为印刷字体，楷书是适宜的。楷书虽然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但它发展到唐代才最后成熟，它为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又创造了一个条件。

图45
王羲之《兰亭集序》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草书	楷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日	日	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月	月	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水	[illegible]	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土	土	土

图46
书体比较表

二、石刻与刻字技术

刻字技术与石刻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一部石刻史就是一部刻字技术发展史。石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整个华夏大地犹如一座宏伟的石刻博物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古代石刻的遗迹。石刻和雕版印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尽管石刻以石为雕刻对象，雕版印刷主要以木作为雕刻对象，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刀作为工具进行工作的。刀法之高下，决定其艺术成就的生命力。石刻早出，雕版印刷后起，雕版印刷借鉴了石刻的刻字技术。

历代石刻源远流长。先秦及秦代石刻可考者有石鼓文，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西汉石刻不多，据施蛰存《汉碑目录》著录，只有22种。东汉石刻渐多。《水经注》著录的270余种碑刻中，有120余种属于东汉石刻。东汉石刻之中，以《熹平石经》最负盛名。三国石刻可考者有36种，其中以魏“正始石经”最著名。晋代碑禁甚严，石刻不多。据郑樵《通志·金石略》，可考南北朝石刻有156种，其中北朝136种，南朝20种。隋代石刻有73种。著名的“房山石经”就刻于隋代（图47）。唐代石刻是石刻史的黄金时代。《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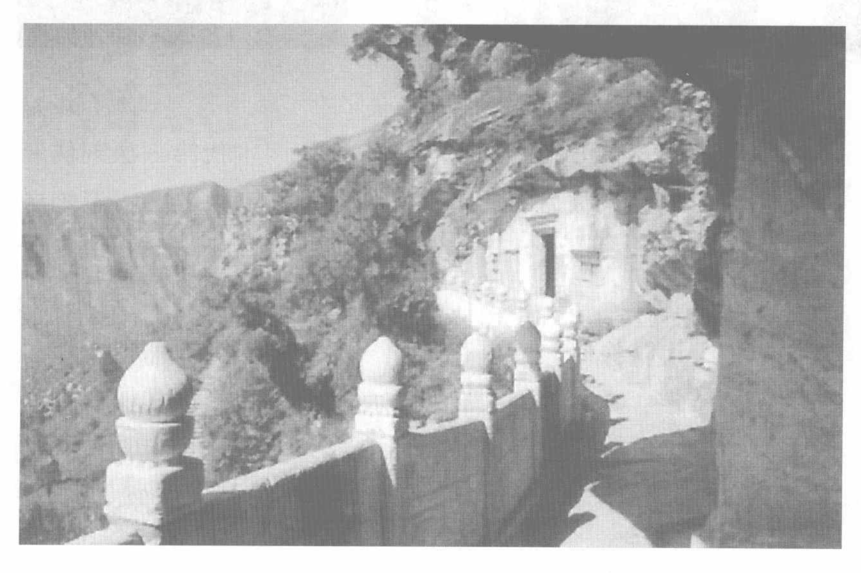


图47
房山石经

志·金石略》著录唐代石刻1 000多种。和汉碑相比，唐碑高大，一般高200厘米左右、宽140厘米左右，加上精雕细刻的碑额和碑座，一座唐碑本身就是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唐碑的书法水平很高，李邕、欧阳询（图48）、颜真卿（图49）、柳公权（图50）、褚遂良等著名书法家都在碑石上留下了他们的手迹。一些文人因



图48（左）
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

图49（中）
颜真卿书《多宝塔碑》

图50（右）
柳公权书《玄秘塔碑》

撰碑文而发财。唐代碑刻中，规模最大的作品当属《开成石经》。该经刻于唐开成年间（836—840年），是我国古代第三次刻儒经于石。唐代刻工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据曾毅公《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著录，历代可考刻工人数如下：汉代11人、三国4人、南北朝13人、隋朝5人。唐则192人，约为唐代以前刻工总和的6倍。尽管以上数字，只是一个挂一漏万的数字，亦可略窥历代刻工的概貌。众多刻工用他们精巧的双手把雕刻艺术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笔者曾对杨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著录的造像、题字、

诗词、杂刻、经幢等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1：

表21　两汉至唐石刻数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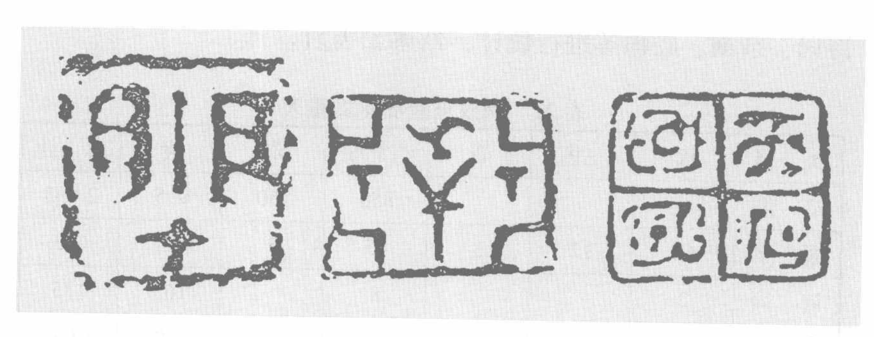
类　别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总　计
造　像				850	250	995	2 095
题　字	68	12	3	45	5	500	633
诗　词	2			8		165	175
杂　刻	340	45	22	154	76	1 400	2 037
经　幢				44	16	600	660
总　计	410	57	25	1 101	347	3 660	5 600

可见唐代石刻数目遥遥领先，非它代所企及。唐代炉火纯青的刻字技术正是从这一碑一石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为雕版印刷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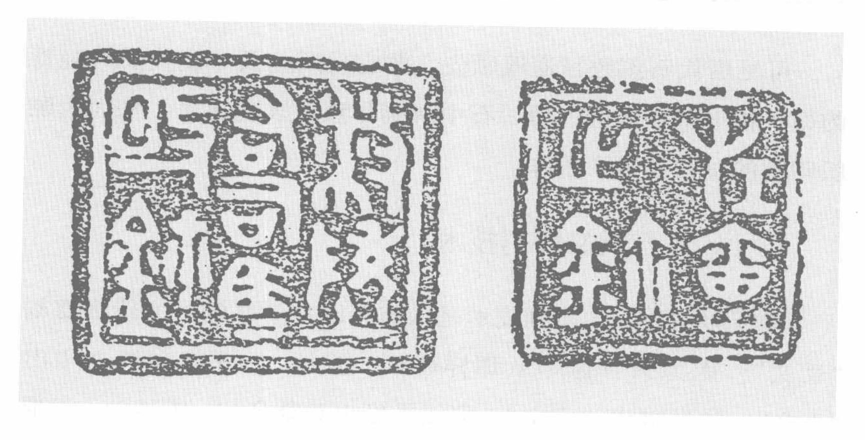
三、印章与反文阳刻技术

雕版印刷的反文阳刻技术是从雕刻印章学来的。为什么要刻“反文”？因为只有像印章那样雕刻“反文”，才能在纸上印出“正文”。如果雕成“正文”，那么在纸上只能印出“反文”，就难以认读了。为什么要“阳刻”？因为只有像印章那样雕刻阳字(即笔画凸起的字，也称阳文)，才能在纸上显出白纸黑（或其他颜色）字。没有反文阳刻，就没有雕版印刷。反文阳刻的雕字方法是从印章本身受到直接的启发，因而探索雕版印刷的起源，有必要研究一下印章的发展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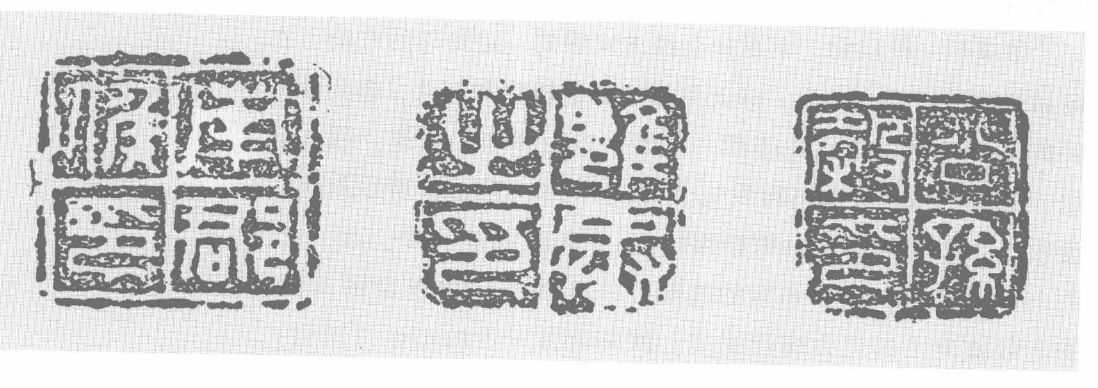
印章是一种信物。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商品的安全转移和存放，需要有一种凭证，这种凭证就是印章。正如刘熙《释名》所说：“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又说：“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印章有玺、印、章、宝、图书、关防等名称。印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 700年前的商代，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方商代铜玺，就是流芳千古的杰作（图51）。


图51
商玺

周代印玺以青铜质为主，文字用当时流行的籀书（图52）。战国时期，“物勒工名”式的印章很多，手工业者常把印章钤印在所


图52
周玺

制器物上。春秋战国印章大小不一，一般私印一至二厘米见方，官印通常二至三厘米见方。先秦印章的数量相当可观，仅罗福颐《古玺汇编》就收录有5 708方。秦印的特点是有边栏界格，字体多小篆，笔意多取圆势，带有先秦大篆的风格（图53）。汉代印

图53
秦印


章不用边栏界格，字体由小篆演变为缪篆，篆法平直方正，近似隶书，浑厚古朴，外朴内巧（图54）。汉代印章多白文，因为它是钤在封泥上的。当时纸张刚刚发明，文字载体以简牍为主，在成束包札的简牍外表，缄之以绳，封之以泥，钤之以印。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就可以防止私拆往来文书，达到保密的目的。钤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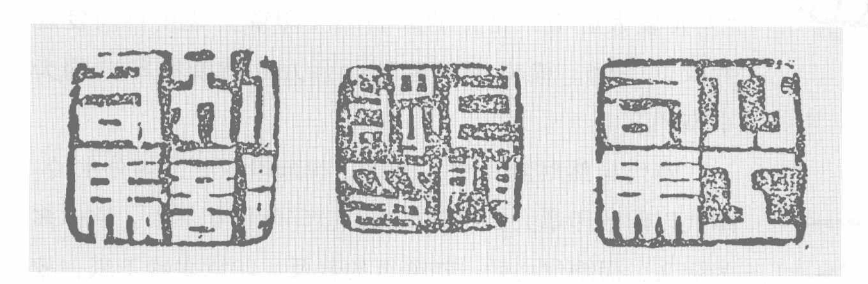


图54
汉印

封泥上的阴文印章，翻阴为阳，更加醒目，极易识别。

魏晋南北朝官印式样一遵汉制，而文字风格渐趋单薄。这是魏晋南北朝人多习真草、不善篆隶而造成的。这个时期，研究古文字的人不多，因为不谙六书之法，印章中往往杂参隶楷，无章法可言。魏晋南北朝传世官印数量也不少，因为这个时期，官印作为装饰品随身佩带，离职后佩带回家，无须转交，死后殉葬。南北朝官印已有小型白文改为大型朱文，它标志着纸张的普及以及简牍、印泥的废止。例如1993年8月咸阳出土的“天元皇太后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图55）。“天元皇太后”为北周武帝宇





图55
北周“天元皇太后玺”

文邕的皇后阿史那氏。武帝去世后，宣帝宇文赟尊其后“皇太后”。大象元年（579年），周宣帝传位给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称太后为“天元皇太后”。“天元皇太后玺”当为北周大象元年（579年）至大象二年（580年）所用。该印用纯金制成，阳文、獬豸纽，印台边长4.45厘米，宽4.55厘米，高1.95厘米。但是，像“天元皇太后玺”这样的大型阳文印章，截止目前发现者仅此一例。而专家认定的10余方北朝晚期印章均为小型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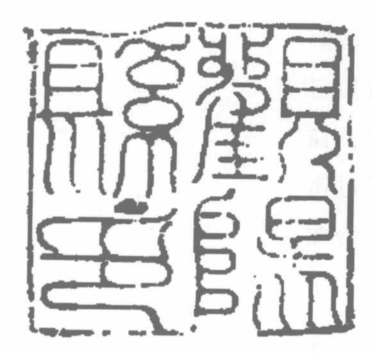


图56
隋“观阳县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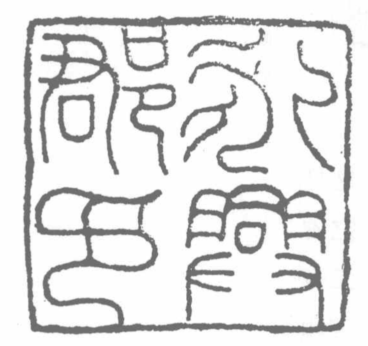


图57
隋“永兴郡印”

隋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它是我国印章史上的分水岭：隋代以前的印章大多钤于封泥，故印章面积不大，字体多为阴文，而隋代之后，随着纸的普及，印章多钤于纸，故印章面积不断扩大，字体多为阳文。截止目前，专家认可的隋印有“观阳县印”（图56）、“永兴郡印”（图57）等，总数不超过十方，这些印章统为大型阳文。唐代鉴藏印大量出现，集贤殿官书有“贞观”、“开元”、“集贤”、“秘阁”、“翰林”、“元和”等印章。唐代私人藏书家李泌、刘禹锡、白居易、皮日休等都有自己的印章。专家认可的唐代官印有“中书省之印”、“安西都护府之印”、“蒲类州之印”、“西州之印”、“天山县之印”、“高昌县之印”、“天门军之印”（图58）等，总数有30方左右。这些印章均为阳文。

以上就是先秦至唐的印章简史。可见早在先秦已经出现印章。汉印承前启后，是印学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但是由于纸张尚未普及，直到南北朝以前，印章因钤于印泥而多呈阴文，印章面积也比较小。这就是说，南北朝以前的阴文印章，对于雕版印刷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南北朝以后，随着纸张的普及，印章面积不断扩大，字体大多变为阳文。这些阳文印章后来终于成为发明雕版印刷的一个技术因素。

四、拓印与刷印技术

捺印、印染和拓印都是图文复制技术。捺印有两大缺点：一是印文容量小，不能连篇累牍地复制文字；二是捺印用力不匀，其复制品颜色深浅不一。印染主要用于复制丝织品上的各种图案，一般不用于文字复制。比较而言，三者之中，拓印对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影响最大（图59）。雕版印刷也是一种文字复制技术。雕版印刷是由于拓印的直接启示而产生的：（一）拓本“黑底白字”，不便阅读。雕版印刷借鉴了拓印的反面教训，采用反文阳刻印刷，印本“白底黑字”，极便阅览。（二）雕版印刷的大面积版面是由拓印大面积碑版的启示而产生的，从而解决了印章面积小、容字少的问题。（三）雕版印刷的刷印方法是由拓印刷纸、扑墨的启示而产生的，从而解决了按捺印章压力不匀、印色不均等问题。总而言之，没有拓印就没有雕版印刷。要弄清雕版印刷的起源，必须首先弄清拓印的起源，这是发明雕版印刷技术的关键所在。

拓印在唐代已经出现。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从文献记载看，唐代已有拓本。韦应物《石鼓歌》云：“令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很明显，“既击既扫”是拓本的制作方法；“黑白分”是拓本的外观形式。天宝间，李齐古曾将《孝经》拓本献给唐玄宗，其《进御注〈孝经〉表》云：“谨



图58–1
“中书省之印”



图58–2
“蒲类州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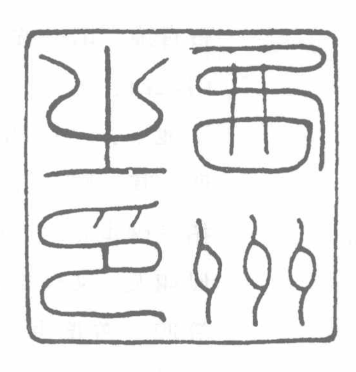


图58–3
“西州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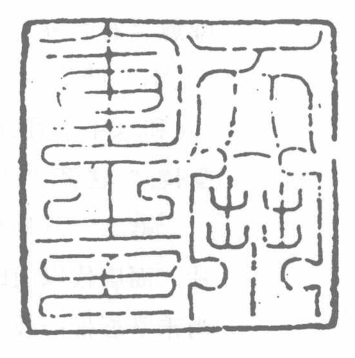


图58–4
“天门军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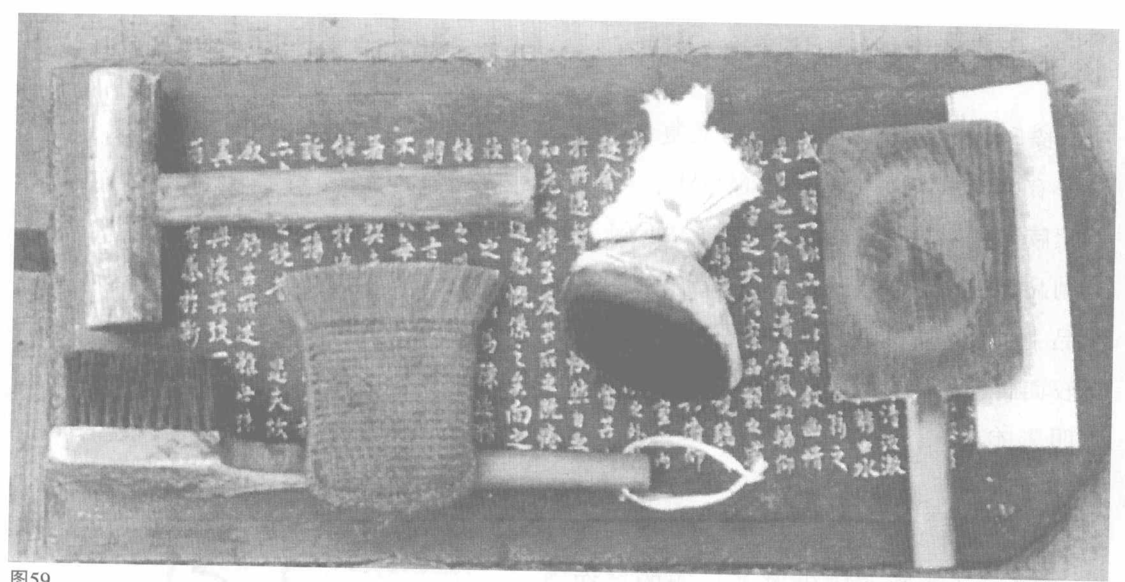


图59
捶拓工具

打石台《孝经》本，分为上下两卷，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闻。”[1] 颜真卿为平原太守时，曾刻三碑：一碑记同时台省擢授诸郡者，立于郡门之内；一碑记颜之推等人事，立于郭门之西；同时台省擢授诸郡者，立于郡门之内；一碑记颜之推等人事，立于郭门之西；一碑为《东方朔庙碑》，后碑因安史之乱没有立成，埋于地下，“河朔克平，别驾吴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于庙所。其二碑求得旧文，买石镌勒，树之郡门。时颜任抚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2]。这是颜真卿书迹的最早拓本。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文藻雄丽，有孝行，历仕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曾撰书《李楷洛碑》，文士莫不成诵。德宗在东宫时，“雅好杨崖州（即杨炎）字，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3]。韩愈《石鼓歌》云：“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论。”这里“纸本”即拓本。西安有一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末附题识云：“元和八年八月五日，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碑，打本散施，同愿受持。”这里“打本”即拓本，“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

第二，从唐碑的书写形式看，字行分段书写，以便装订拓片。而唐代以前的碑文都是贯通上下写的。因为唐代以前，人们尚未掌握椎拓技术，不存在拓片的装订问题。今人马衡《凡将斋

【1】《全唐文》卷377。

【2】《唐语林》卷6。

【3】《唐语林》卷3。

金石丛稿》指出：

> 历代石经皆刻于长方形之碑，汉魏碑一行直下，如寻常刻碑之式。自唐以后，则每碑分为若干列，每列分为若干行，所以然者，汉魏时未有拓碑之法，其碑仅供人摹写，唐以后既知传拓，将拓本分为剪裁，即可装成卷子本，取其便于应用也。

第三，从现存实物看，唐代已有拓本流传至今。传世唐拓有《化度寺塔铭》、《孟法师碑》、《温泉铭》等。《化度寺塔铭》，李百药撰，欧阳询书，贞观五年（631年）刻石，敦煌石室有唐拓本，后伯希和劫往巴黎。《孟法师碑》为岑文本撰，褚遂良书，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刻，碑石久佚，清人李宗瀚所藏唐拓本，早已流入日本。《温泉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撰书，刻石不传。敦煌石室中有此铭拓本，拓本末题“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果毅”是唐代统帅府兵的武官，因此前人定为唐拓（图60），后伯希和劫往巴黎。传世唐拓还有褚遂良书《善才寺碑》、柳公权书《金刚经》和《神策军纪圣碑》（图61）数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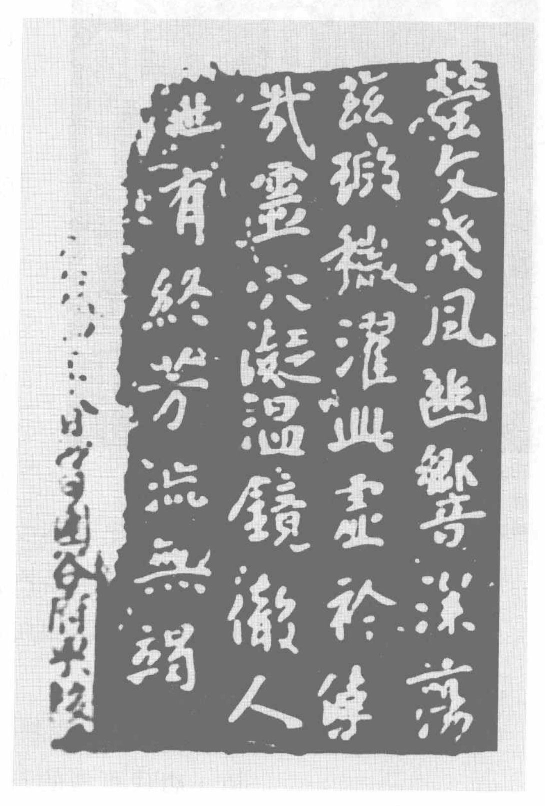


图60
唐拓《温泉铭》



图61
唐拓柳公权《神策军纪圣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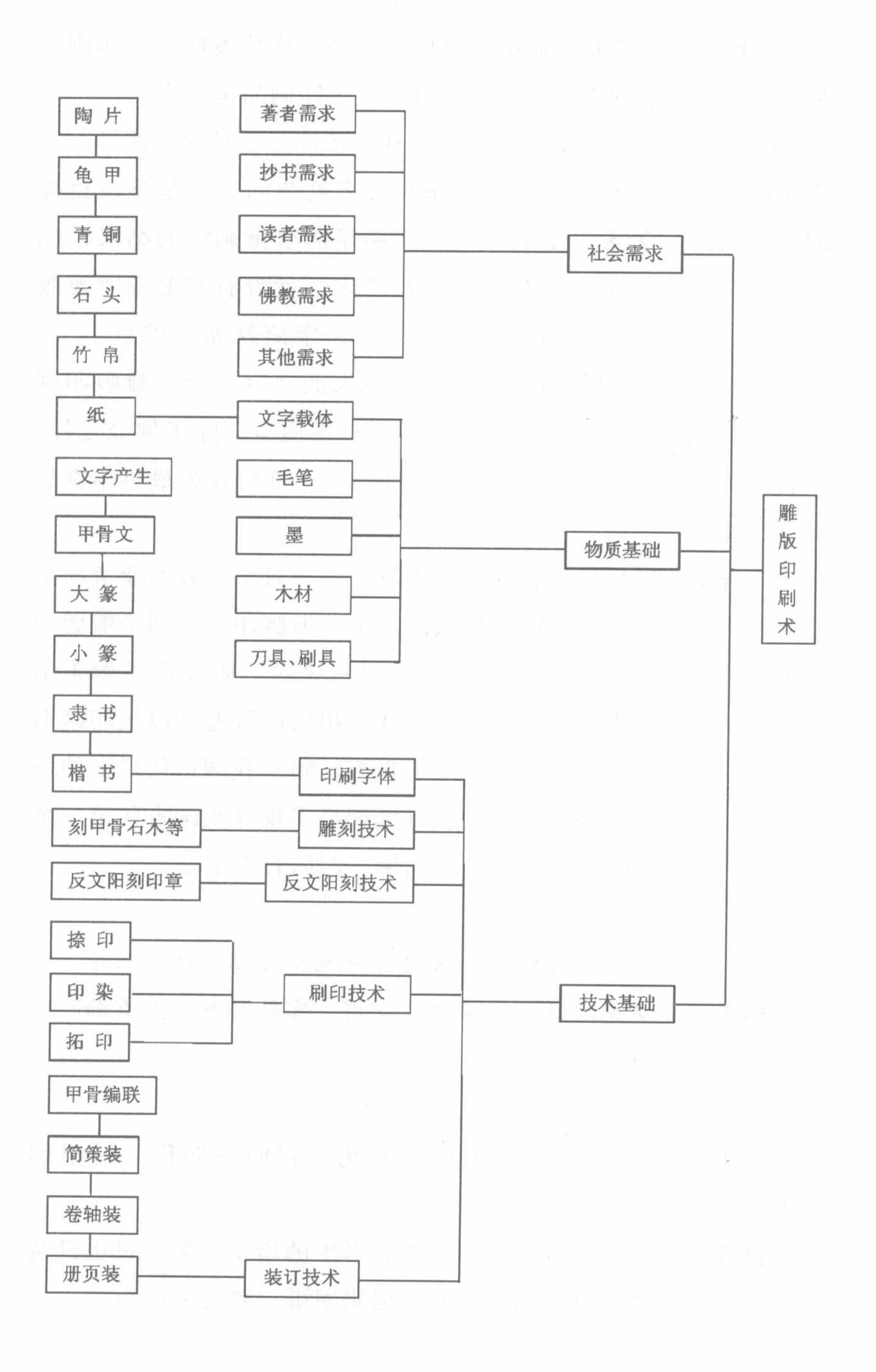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唐初发明雕版印刷

以上各节从社会需求、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三个方面论述了发明雕版印刷术的种种条件，为了便于研究，兹列示意图如下：

从社会需求看，唐代可考散文著者有3 042人，可考书商有24人，可考学生不少于20万，可考藏书家87人，流入日本的汉籍有1 568部、17 209卷，各项数字均居诸代之冠。另外，可考抄书者和写经者也是最多的。以上情况表明：唐代对于雕版印刷的需求，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迫切。

从物质基础看，虽然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张，但是直到南北朝才得以普及，至唐代而极盛，唐代造纸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纸张品种大量增加，纸张无处不有，无处不用。笔和墨早在先秦已经出现，三国时期的制笔、制墨技术已有相当水平，至唐代而极精，唐代出现不少名牌笔和名牌墨，并出现大量制造笔墨的名工巧匠，毛笔生产技术已经传到日本。以上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发明雕版印刷所需物质基础的奠定，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牢固。

从技术基础看，先秦已有的刻字技术不断发展，至唐代而极精，唐代可考的石刻、石匠总数均为诸代之冠。印刷字体（楷体）虽然东汉已经出现，但是远未成熟，多如繁星的唐代书法家始把楷书推向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在纸张没有普及的时候，印章因钤于印泥而多为阴刻，对于雕版印刷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南北朝纸张普及之后，反文阳刻印章大量增加，雕版印刷始得加以借鉴。拓印技术唐初已经出现。以上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发明雕版印刷所需技术条件，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具备。


陶 片
龟 甲
青 铜
石 头
竹 帛
纸
文字产生
甲骨文
大 篆
小 篆
隶 书
楷 书
刻甲骨石木等
反文阳刻印章
捺 印
印 染
拓 印
甲骨编联
简策装
卷轴装
册页装
著者需求
抄书需求
读者需求
佛教需求
其他需求
文字载体
毛笔
墨
木材
刀具、刷具
印刷字体
雕刻技术
反文阳刻技术
刷印技术
装订技术
社会需求
物质基础
技术基础
雕版印刷术

总而言之，从社会需求、物质基础、技术基础三个方面全面衡量，唐代发明雕版印刷的条件已经具备，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那么，可考最早印刷品是什么呢？

能否成为最早印刷品当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文字简易。雕版印刷初兴，技术水平不高，那些文字复杂的图书是难以付梓的。二是需求量大。雕版印刷的发明是需求量刺激的结果。如果需求量不大，手工抄写即可满足需求，就没有必要发明雕版印刷。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单是文字简易而需求量不大，雕版印刷缺少实用价值；单是需求量大而文字复杂，雕版印刷发明之初缺乏技术基础。根据这两条标准衡量，除了佛经之外，广告、试卷、度牒、名片、历书、印纸等，亦可作为最早印刷品的候选物。

广告是传播商品信息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于繁荣商业贸易是不可缺少的。广告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版印广告却是雕版印刷发明以后的事情。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版印广告始于宋代，唐代还没有发明版印广告。宋代四川眉山万卷堂以刻印医书著称于世，该堂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附有我国古代最早的一个书目广告。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行了现存我国古代第一个商业广告，该广告中有白兔捣药商标，四周有文字云：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

以上两则广告均印于宋代，因此，它们不能称为最早印刷品。

试卷在实行科举制度之后，随着考生的增多，需求量也日益增多，那么，刻印试卷始于何时？据明周祈《名义考》卷二：

《白居易集》：礼部试士，例用书册，兼得通宵。

《容斋随笔》：大中祥符元年试进士，出《清明象天赋》，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景祐元年诏试日题目，其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是挟书给烛，自唐已然；摹印题目所出，则宋事也。

又据明佚名《事物纪原》卷三：

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真宗亲试进士于崇政殿内，出策题摹印以赐，印题自兹始也。

可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始有刻印试卷之举，试卷也不是最早印刷品。

度牒是古代僧尼的出家文凭，上有僧尼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等。僧尼持此，不仅可以证明身份，而且还可以免除地税徭役，得到政府的保护。南北朝时已制定了有关僧尼的登记制度，度牒的产生不会晚于南北朝。唐代僧尼隶属祠部管辖，因此唐代度牒又称祠部牒。我国古代最早的版印度牒始于宋代，据宋王林《燕翼诒谋录》卷五：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

可见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才出现版印度牒，度牒也不是最早印刷品。

名片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郦食其传》：

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

这里，“谒”就是名片，可见早在秦汉时代就有了名片。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纸张刚刚发明，尚未普及，名片皆由竹木削制而成，三国时“弥衡尚气刚傲，好傲时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书一刺怀之，漫灭而无所遇”[1]。这里，“刺”即名片，可见弥衡的名片就是用竹木制成的，否则，字迹怎么会磨掉呢？纸张普及之后，人们开始用纸制作名片，因称名纸、名帖等，但有时也沿用“刺”的叫法。名片上除了姓名之外，间有爵里，据记载：

【1】[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卷27，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印本。

> 魏夏侯渊七岁能属文，诵书日千言。文帝闻而诣焉，宾客百余人，人奏一刺，书其乡里姓名，世所谓爵里刺也。[2]

【2】《古今事文类聚》卷27。

唐代以后的门状、手本也和名片相当，但文字较繁。就制作方式而言，今之名片概由印制而成，而古之名片皆临时书写，据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五：

> 寇莱公镇洛，暇日写刺访魏野，野葛巾布袍，长揖莱公，礼甚丰简，顷之议论骚雅，相得甚欢，将别，谓莱公曰:“盛刺不复还，留为山家之宝。”

可见寇莱公的名片就是拜访魏野时临时写成的，既然名片全由手写，更不可能成为早期印刷品。

历书也叫历日、历本、时宪历（清避弘历讳，易名《时宪书》）等，它是专门排列日月时令节候的书，文字比较简单，需求量也大，亦可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印刷品。据《隋书·律历志》，隋代历书“散写甚多”（详第三章第一节）。说明当时的历书均为抄写，还不曾刻印。唐代前期历书亦无刻本，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多种唐代写本历书：其一为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写本具注残历（图62）。时间最晚的一种为唐玄

宗开元八年（720年）写本具注残历[1]。这就是说，直到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历书尚无刻本。那么唐代刻印历书到底始于何时？据《全唐文·冯宿禁版印时宪历奏》（详第三章第二节），唐代刻印历书的最早记载是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现存最早的历书实物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刻印的具注历（图63）和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成都樊赏刻印的历书（图64）。按照史学界关于历史分期的习惯划法，以上历书的刻印时间均属“晚唐”，因此，历书不能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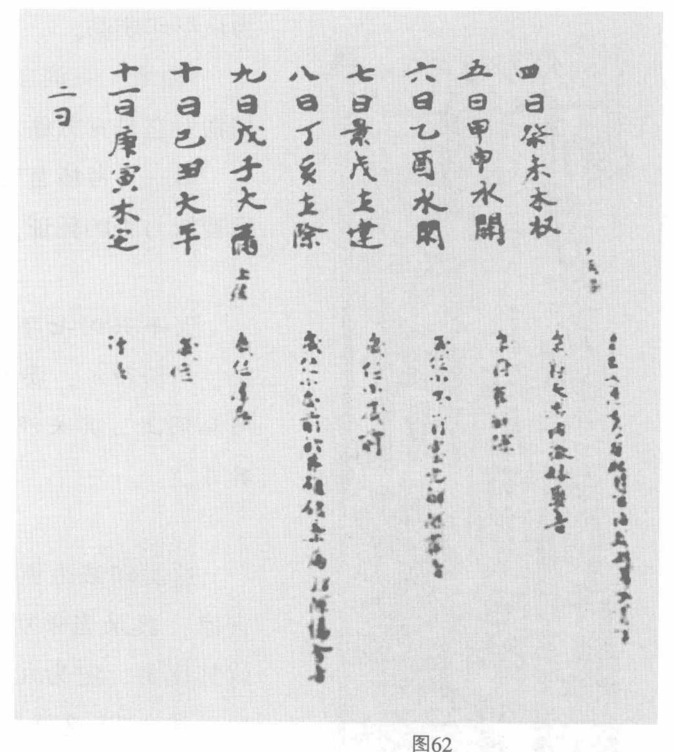

四日癸未木收
五日甲申水開
六日乙酉水閉
七日景戌土建
八日丁亥土除
九日戊子火滿
十日己丑火平
十一日庚寅木定
十二日

图62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具注历写本

【1】阿斯塔那201号墓出土显庆历，《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341号墓出土开元历，《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

图63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刻印的历书

为最早印刷品。

"印纸"一词在唐宋文献中大量出现。"印纸"是何物？它是官方颁发的一种凭证，其作用是：

第一，考核官吏任职功过，相当今日之人事档案，是晋级与否的凭证，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十一》：

>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诏："京朝官出使，所给印纸，委本属以实状书，不得增减功过，阿私罔上。其关涉书考之官，悉署姓名，违者论其罪。"

这类印纸由吏部统一颁发。唐代规定："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1] 这就是说，在正式填写"印纸"之前，还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要求填写者"以实状书，不得增减功过，阿私罔上"，否则要追究填写者的责任。唐宋时代对官吏的考核均由吏部考功郎中负责。

第二，登记各类名物，以便官方考核。据《旧唐书·食货志下》：

> 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



图64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樊赏刻印的历书

【1】《旧唐书》卷43《职官二》。

此之"印纸"似经商所用卖物登记簿，它是向政府交税的凭

证。有的"印纸"似罪犯登记簿，是犯人的原始档案；有的"印纸"似户口登记簿，是核查某地户口增减的凭证。

第三，出入宫廷的凭证。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

>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

可见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给王庆之的印纸相当于今之特别出入证。这是"印纸"一词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

印纸的作用大致如上所述。印纸既然有考核、登记等功能，其内容与今之鉴定表、登记表、账簿之类大体相当，文字必定简易。作为出入证的"印纸"，文字当比登记表之类还要简单。就使用者而言，各级官府需要印纸，大小官吏需要印纸，行商坐贾需要印纸，其需求量之大，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印纸"作为最早印刷品，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对唐代"印纸"早已有所研究，他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印刷术的起源》中说：

> （唐）德宗时（783—785年）市场上出现一种印刷品，名为"印纸"，作为商人交易纳税的凭据。

可见张秀民先生认为唐德宗时出现的"印纸"是一种印刷品。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的"印纸"比德宗时之"印纸"早了94年，天授二年（691年）的印纸是不是印刷品呢？回答是肯定的。顾名思义，"印纸"可有两种解释：一是钤印之纸，二是雕版"印刷"之纸。究竟哪种解释正确？当以第二种为确，原

因是：（一）作为皇帝，和其他皇帝一样，“印”一般称“玺”，但武则天不喜欢“玺”字，改“玺”为“宝”，正如《旧唐书·职官二》所说：

> 两汉得秦六玺及传国玺，后代传之。随置符玺郎二员，从六品。天后恶“玺”字，改为“宝”，其受命传国等八玺文，并改雕“宝”字。

武则天使用的八宝是：“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四曰皇帝之宝，劳勋贤则用之；五曰皇帝信宝，征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凡大朝会，则捧宝以进于御座。车驾行幸，则奉宝以从于黄钺之内。”[1] 既然如此，钤有武则天大印之纸，当称“宝纸”，不能叫做“印纸”。退一步说，即使特别出入证上所钤非武后印，而是有关保卫部门的印章，也不当称为“印纸”，因为纸和印章的历史悠久，如果钤印之纸可以称为“印纸”的话，那么“印纸”一词早在唐宋之前就应该出现了，为什么姗姗来迟，直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才第一次出现呢？这也说明此之“印纸”并非钤印之纸，而和唐宋文献中的“印纸”一样，都属于印刷品，它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的产物。（二）作为雕版印刷之意的“印”字在唐代已经大量出现，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例如柳玭《柳氏家训序》中就用了“雕版印纸”四字（详第九章第二节），它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一般的纸，而是雕版印刷之纸。当然，这时讲的是中和三年（883年）的事情，比天授二年（691年）要晚192年。汉语常识告诉我们：词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既有变异性，又有保守性。具体到一个特定的词，是变异，是保守，不可一概而论，要结合语言环境进行分析。既然“印纸”一词在唐宋文献中均属印刷品，那么天授二年（691年）的印纸亦概莫能外。如果上述分析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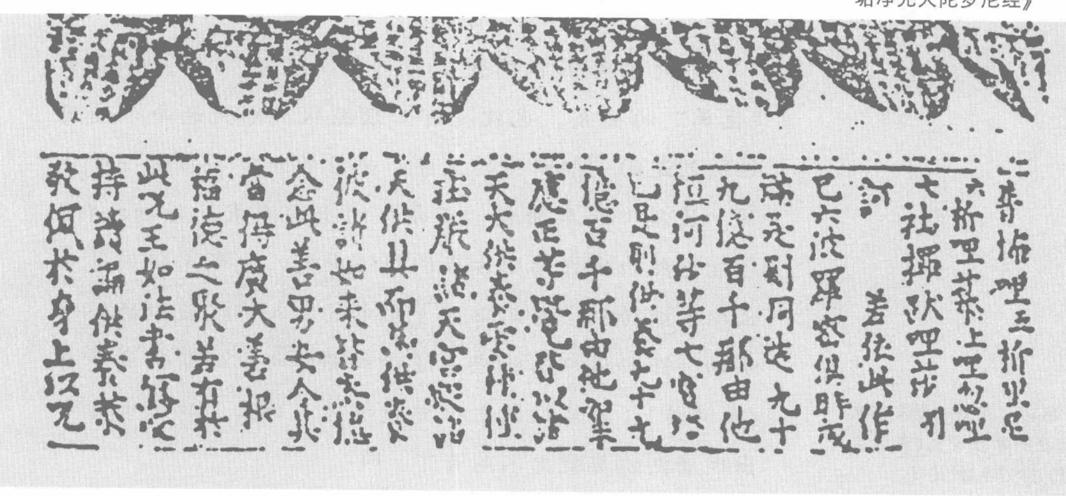
[1]《旧唐书》卷43《职官二》。

话，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的印纸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它比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陀罗尼经》要早66年。

总而言之，古代名片尽皆手写，与印刷无缘。广告、试卷、度牒和历书的刻印时间均在宋代或晚唐，都不能称为最早印刷品；佛经和印纸的刻印时间均在唐代初期，才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印刷品。可惜因时代久远，尚未发现印纸实物遗存，而零种佛经则屡有发现。1974年，西安柴油机厂在唐墓中发现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印刷品。出土时此经置于死者佩戴的铜臂剑内，麻纸，纸幅为27厘米×26厘米，中有7厘米×6厘米的空白方框，四周各印以13行梵文。据专家鉴定，将该经咒定为唐初（7世纪初）的印刷品。1966年新疆吐鲁番发现刻印的《妙法莲华经》卷5《如来佛寿品第十六》残卷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全卷。日本著名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据经文中武则天时颁行的制字，定为中国武周时期（684—704年）刻本。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卷汉字《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刷品（图65），该经印在12张黄色楮纸上，总长6.43米。美国著名印刷史专家富路特认为该经是唐代武周刻本，他说：

> 这新发现的经卷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

图65
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1】〔美〕福路特：《关于一件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书林》，1980年第3期。

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1]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许多中国著名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武则天刻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事出有因。佛教认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灭罪、祛病、延寿之经。武则天执政期间，曾滥杀无辜，晚年病魔缠身，于是刻印该经供养，试图一举三得：一示自己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是驱散冤魂，勾销罪孽；三求祛病延年，万寿无疆。第二，唐代与新罗交往甚密，不少使节、学者、僧人往来其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可由多种途径传至新罗。武周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至少有两个版本：先有实叉难陀译本，后来高僧法藏在武后沉疴在身之际，为了取媚武氏，重译此经。据潘吉星先生考证：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三月，新罗僧明晓来唐，和翻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法藏、实叉难陀等关系密切，明晓当是最早将武周刻本携至新罗的僧人之一[2]。据邱瑞中先生考证，武周末年，新罗高僧义湘、胜佺等先后来唐，义湘与法藏曾在终南山智俨门下同学《华严经》。义湘回国后，法藏曾写信给他，并赠书多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传入新罗的时间，不会晚于神龙二年（706年）[3]。第三，该经有八处使用武周制字，这是武周刻本的铁证。启功先生指出：

【2】潘吉星：《无垢经——中韩学术论争的焦点》，《出版科学》，2000年第4期。

【3】邱瑞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武周朝刻本辨》，《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4日。

> 那时的韩国古朝代是有外交关系的邻邦，并没有“臣属”的关系，也就没有必须服从武则天的命令使用她所创造的一些新字的义务。武后的新字在当时一些分明“臣属”而奉唐朝“正朔”的小国尚未见强制推行，怎能忽然出现在韩国古代的刻经中呢？这毫无疑问是中土印本流传到当时的韩国古庙中被装入佛塔藏中的一件法物，正如近年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中所出的非佛典竟有《水浒传》，其非辽国之书更为明显，那么，韩国古塔中出现唐刻佛典就更不足奇了。[4]

【4】启功：《喜见中朝友好文化交流的新鉴证》，《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16日。

第四，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发明的过程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印刷术的发明是社会文化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晶。8世纪的新罗王朝不具备发明印刷术的种种条件。

总而言之，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在7世纪的初唐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

第九章　唐代图书出版

唐代出版处于由人工抄写到雕版印刷的转型时期。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还不太长，人工抄写仍然是图书出版的一种主要方式。无论官方或民间，都出版了大量图书。唐代图书在装订、纸张、字体等方面都很有特色，册页装的出现是古代图书装订形式的重大变革。唐代官方对图书出版的管理也很严格。

第一节　唐代出版机构

唐代官方出版机构有史馆、集贤院、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司经局等。史馆和集贤院已详第五章，现将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司经局介绍如下。

一、弘文馆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武德九年（626年）三月易名弘文馆。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因避孝敬皇帝之讳，易名昭文馆。神龙二年（706年）复称修文馆；睿宗景云中，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719年）复称弘文馆。贞观初，弘文馆建于弘文殿侧；贞观三年（628年）馆址移于纳义门西；贞观九年（635年）又移于门下省南。

弘文馆的编制，据《旧唐书·职官二》，有学士若干、学生30人、校书郎2人、楷书手30人、典书2人、拓书手3人、笔匠3人、熟纸装潢匠9人、亭长2人、掌固4人。其中学士又有大学士、学士、直学士、文学直馆学士、详正学士之分。五品以上称学士，六品以下称直学士。著名学者曹宪、朱子奢、张士衡、李玄植、盖文达、谷那律、萧德言、刘伯庄、郭正一、刘胤之、刘延祐、邢文伟、许子儒、柳冲、马怀素、元行冲等都先后担任过弘文馆学士的职务。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始于弘文馆（按：当时叫修文馆）置大学士4人，以象四时，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首当其选；又置学士八人，以象八节，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和刘知几首当其选；还置直学士12人，以象十二个月，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首当其选。凡天子游宴，只有宰相和学士才有资格侍从，享受极高的待遇，正如《新唐书·李适传》所说：

> 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

武后垂拱以后，宰相兼领馆事，号称“馆主”，褚遂良、刘祎之、范履冰等先后担任此职。

弘文馆的职责有四：（一）藏书、校书和抄书。这三件事情关系非常密切。为了扩大馆藏，除了购买图书之外，还要大量补抄残缺；为了收藏善本，必须认真做好校勘整理工作。一书经过校勘整理成为定本，也要重抄一遍。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唐太宗即位，于弘文殿聚书二十余万卷。穆宗长庆三年（823年）二月，弘文馆奏请添修屋宇，建造藏书楼，奏称：“伏以儒学之

科，政化根本，苟或隳废，则人何观。伏望赐敕所司，遂急补修，庶使已成之业免附坠，弘阐之义再扬。”帝然其奏。高宗仪凤中，因为弘文馆图书错讹较多，专委学士校理。开元七年（719年）十二月三日，置弘文馆校书4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二十五日，校书减为2人。（二）著书。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六月，弘文馆修《续会要》，曾奏请增拨纸笔杂物，奏称：

> 今缘准敕修《续会要》以来，官僚入日稍频，因缘费用，其数至多，纸笔杂物等，不敢别有申请，其厨料从前欠少。伏请准两馆流例增添，给用之间，庶得济办。[1]

【1】《唐会要》卷64《史馆下·弘文馆》。

帝然其奏。至于弘文馆所修他书，因文献无征，已不得而知了。（三）参政议政。唐太宗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任弘文馆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2]。弘文馆常常成为唐太宗与众学士纵论古今、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地方。（四）教育。弘文馆又是一所高等贵族学校。贞观元年（627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24人入馆学习书法，由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亲任教师。后又增学经史，由太学助教侯孝遵授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史记》、《汉书》。贞观二年（628年），置讲经博士，考试经学，兼习书法。开元七年（719年）规定，弘文馆学生限额38人，简选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性识聪敏者才有资格入弘之馆读书，课程设置、教授方法、考试制度皆同国子学。以上四项任务之中，藏书、议政、教育为其主要任务。所以《旧唐书·职官二》云：“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

【2】《唐会要》卷64《史馆下·弘文馆》。

二、秘书省

唐代秘书省沿袭隋制，是国家藏书的主要场所。唐代两都均有秘书省。西京长安皇城内的秘书省小，即原隋代秘书省旧址。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唐军攻克长安，李渊命令主符郎宋公弼接收隋代藏书八万余卷。东都洛阳秘书省约建于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之后。唐初秘书省有内外之别。唐初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史馆建立之后，秘书省著作局始罢史职，秘书内省亦不复存在，秘书外省即秘书省的办公地点，因处宫城之外，故名。

终唐一代，其名屡有改易：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四日改称兰台；武后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五日改称为麟台；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二月五日，复称秘书省[1]。唐代文献中所谓“秘阁”者，亦指秘书省。

【1】《唐会要》卷65《秘书省》。

唐代秘书省的编制，据《旧唐书·职官二》，有秘书监一人、秘书少监2人、秘书监丞一人、校书郎8人、正字4人、主事1人、令史4人、书令史9人、典书8人、楷书手80人、亭长6人、掌固8人。其中秘书监是秘书省的最高长官，相当于今之国家图书馆馆长；秘书少监为其副，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秘书监丞协助秘书监和秘书少监处理日常事务，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校书郎和正字的任命非常慎重，元和三年（808年）三月诏称：

> 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及判入等第。[2]

【2】《唐会要》卷65《秘书省》。

此外，秘书省还兼管著作局和太史局。著作局唐初称著作曹，武德四年（621年）改称著作局；龙朔二年（662年）改称司文局；咸亨元年（670年）复称著作局。著作局有著作郎2人、著

作佐郎4人、校书郎2人、正字2人、楷书手5人、掌固四人。太史局唐初称太史监，武德四年（621年）称太义局，龙朔二年（662年）称秘阁局，光宅元年（684年）称浑天监，久视元年（700年）称浑仪监，长安二年（702年）称太史局，景云元年（710年）称太史监，后又称太史局。西京太史局位于皇城承天门街之西，第六横街之北；东都太史局在皇城之外。唐初因其与修史有关，故与著作局同隶秘书省下。后来著作局罢去史职，太史局与秘书省的上下隶属关系也便名存实亡。直到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十月，太史局更名太史监，最终从秘书省独立出来。其编制有太史监1人、少监2人、灵台郎2人、挈壶正2人、五官正2人、五官丞2人、五官主簿2人、定额直5人、五官灵台郎5人、五官保章正5人、五官司历5人、五官监候5人、五官挈壶正5人、五官司辰15人、五官礼生15人、五官楷书手5人、令史5人、漏刻博士20人、典钟典鼓350人、天文观生90人、天文生50人、历生55人、漏生40人、视品10人等。

秘书省的职责有：（一）藏书、校书和抄书。三者关系之密切已如上言。秘书省相当于今之国家图书馆，藏书是其主要任务。文宗时，秘阁藏书56 476卷；开元时，秘阁藏书125 960卷。天宝以前，秘阁藏书以小印印缝，安史之乱中，书印丢失，长庆三年（823年）四月，准秘书少监李随奏请铸“秘书阁图书印”一枚。校书是秘书省的一件经常性的工作，例如贞观间，唐太宗“尝叹五经去圣远，传习寖讹，诏（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多所厘正”[1]。秘书省有楷书手、熟纸匠、装潢匠等百余人，抄书之多，可想而知。（二）著作局的职责是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等。（三）太史局的职责是观察天文、制定历书等，具体而言，“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每年预造来年历，颁于天下”[2]。（四）参政议政。唐初秘书监魏征就是当时有名的诤臣。贞观七年（633年）九月二十三日，唐太宗对侍臣说：“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3] 另外，秘书省还

【1】《新唐书》卷198《颜师古传》。

【2】《旧唐书》卷43《职官二》。

【3】《唐会要》卷65《秘书省》。

有访书、修书等任务。访书即搜访遗书，天宝十二载（753年）十二月，左相陈希烈曾兼任秘书省图书使。贞元中秘书省置修书学士，负责编撰书目等。

三、崇文馆

崇文馆是太子学馆，是东宫左春坊领导下的高级学校。贞观三年（629年）始名崇贤馆，上元二年（761年）八月二十七日，为避章怀太子李贤讳，易名崇文馆。崇文馆为东宫贵族学校，入学者都是东宫三师、三少、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卫率及崇文馆三品学士子孙，学生限额20人，课程设置同国子学。

崇文馆的编制，据《旧唐书·职官三》，学士、直学士皆无定员。显庆元年（656年）置学士20人。据有关文献记载，许叔牙、秦景通、盖文达、刘伯庄、路敬淳、周思茂、王元感、祝钦明、郭瑜、顾胤、董思恭、员半千、徐坚等著名学者都曾先后担任崇文馆学士的职务。高宗时，贺德仁之弟子贺纪和贺敳并为崇贤馆学士，“学者荣之”[1]。崇文馆学士的任命非常慎重。例如武后长安三年（703年），王元感撰《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书，当他申请入藏秘阁时，弘文馆和崇文馆的专家对这些著作提出不少疑问，王元感力排众议，一一释疑，后因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深爱其才，连表荐之，武后才授于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的职务。另外，崇文馆还有校书2人、令史2人、典书2人、搨书手2人、楷书手10人、熟纸匠3人、装潢匠5人、笔匠3人。

[1]《旧唐书》卷190上《贺德仁传》。

崇文馆的职责有二：一是教授生徒，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二是收藏、校理并抄写图书。

四、司经局

唐初因袭隋制，设司经局，隶左春坊。龙朔二年（662年）二月九日改称桂坊，罢隶左春坊，领崇贤馆。咸亨元年（670年）复称司经局，并复隶左春坊。

司经局的编制，据《旧唐书·职官三》和《新唐书·百官四上》，有太子洗马2人、太子文学3人、校书4人、正字2人、书令史2人、书吏2人、楷书手25人、典书4人、掌固6人、装潢匠2人、熟纸匠1人、笔匠1人。龙朔二年（662年）太子洗马改称司经大夫；龙朔三年（663年）司经大夫改称桂坊大夫，咸亨元年（670年）复称司经大夫。

司经局的职责有二：一是收藏、校理并抄写四部图书；二是侍从太子，辅导太子读书习文。它和崇文馆都是东宫的文教机构，二者都负责收藏、校理和抄写图书，但崇文馆重于教授生徒，而司经局则重于侍奉太子。唐高宗时，刘纳言为太子洗马，侍奉皇太子李贤，撰《俳谐集》十五卷进献太子，后来李贤被废，高宗见到这本书，生气地说：

> 刘纳言收其余艺，参侍经史，自府入宫，久淹岁月，朝游夕处，竟无匡赞。阙忠孝之良规，进诙谐之鄙说，储宫败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从屏弃，以励将来。可除名。[1]

【1】《旧唐书》卷189上《刘纳言传》。

可见高宗把李贤“败德”的责任全部推在太子洗马刘纳言身上。

第二节　唐代图书的出版

唐代图书的出版方式有手工抄书和雕版印书两种，手工抄书又可分为官方抄书和民间抄书两类。官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抄书活动，民间抄书方兴未艾。民间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刻印了一些佛经、历书、韵书等实用性较强的图书。

一、官方抄书

唐代官方规模较大的抄书活动有如下六次：

第一次是在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当时国家初定，秘书监令狐德棻奏曰："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1] 几年以后，常用书基本抄齐。武德初，唐代继承隋代藏书八万余卷，到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的时候，"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2]，可知从武德五年（622年）至武德九年（626年）共抄书十二余万卷。

【1】《唐会要》卷35《经籍》。

【2】《唐会要》卷64《弘文馆》。

第二次是在太宗贞观间。据《旧唐书·崔行功传》："（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征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其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魏征出任秘书监的时间是贞观二年（628年），从贞观二年（628年）一直抄到高宗显庆中，历时30余年。又据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二："（贞观间）秘书省增置百二十员，善书者凡二千人，致所得文籍，历代为盛。"这里，"百二十员"当指在编的"雠校"和"御书手"的总和，"二千人"当为临时聘用的"善书者"。2 000名善书者抄写30余年，抄书之多，可想而知。

第三次是在高宗乾封间。乾封元年（666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俨、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3]。这里所谓"东台"即门下省，"兰台"即秘书省。这次抄写工作是由门下省和秘书省共同主持的。抄写过程大体分为刊正、缮写、检校三步。前两步工作进展顺利，最后一步工作竟出了问题，据《旧唐书·李怀俨传》："（怀俨）历兰台侍郎，受制检校写四部书进内，以书有污，左授郢州刺史。"这就是说李怀俨受诏负责检查验收工作，因为验收不认真，污染的抄本没有检查出来，竟然贬职外放，由京官降到外地任职，可见官方对抄书工作十分重视，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3】《唐会要》卷35《经籍》。

第四次是在玄宗开元间。著名学者褚无量、元行冲等先后主持了这次抄写工作。开元三年（715年）褚无量"以内库旧书，

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1]。到开元八年（720年）褚无量死的时候，还没有抄完，“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2]。为了广求异书，开元七年（719年）时，曾“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3]。褚无量死后，诏令元行冲总代其职，与著名学者毋煚、韦述、殷践猷、余钦等编《群书四录》奏上，并继续主持校书抄书工作，不久“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4]。元行冲卒于开元十七年（729年），说明开元十七年（729年）前后，抄书工作仍在进行，只不过主持者以元行冲“衰老”而易人。开元十九年（731年）冬天，集贤院共有四部古籍89 000卷，其中也有一些梁、陈、齐、周和隋代图书，“贞观、永徽、麟德、乾封、总章、咸亨年”间的图书，“奉诏缮写”[5]。综上所述，可知这次抄书工作从开元三年（715年）一直持续到开元二十年（732年）以后，时间长达17年以上。

第五次是在玄宗天宝间。从天宝三载（744年）至十四载（755年），“库续写又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6]。天宝“十四载”，即安史之乱发生的那一年；“库”指集贤院书库。这就是说，从天宝三载（744年）到安史之乱发生前的12年间，集贤院又续抄图书16 843卷。

第六次是在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安史之乱时，“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7]，秘书省藏书逐年增多。文宗开成元年（836年）七月御史台奏云：“秘书省管新旧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长庆二年已前，并无文案。太和五年已后，并不纳新书。今请创立簿籍，据阙添写卷数，逐月申台。”这就是说，截止太和五年（831年），秘书省共藏图书56 476卷，还有不少图书没有收藏，御史台请求建立阙书目录，“据阙添写”。该年九月，阙书目录编成，文宗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8]。经过

【1】《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

【2】《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

【3】《旧唐书》卷46《经籍上》。

【4】《旧唐书》卷102《元行冲传》。

【5】《唐会要》卷35《经籍》。

【6】《唐会要》卷64《集贤院》。

【7】《旧唐书》卷46《经籍上》。

【8】《旧唐书》卷17《文宗纪下》。

安史之乱，国力大衰，国家已不可能斥巨资抄写图书，只好把抄写任务分派到地方完成。

除了上述六次规模较大的抄写活动之外，平时官方也从未停止抄书，例如集贤院每年十一月都要抄写第二年的历书，据王应麟《玉海·艺文》：

> 自置院之后，每年十一月内，即令书院写新历日一百二十本，颁赐亲王、公主及宰相、公卿等，皆令朱墨分布具注历星，递相传写，谓集贤院本。

可见集贤院本历书是国家颁发的权威标准本，其流通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由集贤院抄写120本；第二步是根据集贤院本“递相传写”，流布全国。又如：

贞观间，魏征撰《类礼》二十卷，太宗认为是部好书，“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1]。

开元十八年（730年），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2]。

天宝十四年（755年），诏集贤院写玄宗撰《韵英》五卷数十本，交由“诸道采访使，传布天下”[3]。

大中三年（849年），秘书省抄书417卷，集贤院抄书365卷[4]。

大中五年（851年），秘书省抄书452卷[5]。

以上是唐代官方抄书的大概情况。官方抄书的目的有四：（一）补充国家藏书。秘书监、集贤院、弘文馆、史馆等机构的藏书大多是唐代官方组织抄写的。（二）对外交往。唐代对外开放，和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关系，与周边国家的来往尤其频繁。赠赐图书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例如垂拱二年（686年），武后诏有关方面抄写《吉凶要礼》，赐于新罗使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关部门抄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赐于渤海国。（三）赐于臣民。张九龄《唐六典》卷六云：“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

【1】《旧唐书》卷71《魏征传》。

【2】《旧唐书》卷196《吐蕃上》。

【3】《新唐书》卷57《艺文一·玄宗韵英》。

【4】《唐会要》卷35《经籍》。

【5】《唐会要》卷35《经籍》。

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例如高宗调露二年（680年）二月一日，诏故符玺郎李延寿撰《政典》一部，一本藏秘书省，一本赐皇太子。（四）标准样本。不少图书版本各异，令人莫衷一是。为了纠讹谬而定一尊，国家专门颁行标准样本。例如《孝经》中多有讹谬，玄宗天宝五年（746年）二月二十四日，诏令集贤院抄写正本，颁行全国。

官方除了抄写一般图书之外，也抄写了不少道教著作，据阙名撰《请颁赐〈洞灵〉等三经奏》：

> 两京及诸郡崇玄学生等，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制，前件人合习《道德》、《南华》、《通玄》、《冲虚》等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诸条补崇玄学，亦令习读。伏准后制，合通五经，其《洞灵真经》，人间少本。臣近令诸观寻访道士，全无习者。本既无广，业实难成。并《通玄》、《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阐，学者宜精。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十本，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玄学生亦望各付一本。[1]

【1】《全唐文》卷964。

可知这次抄写的道经有《洞灵》、《通玄》、《冲虚》三经。开元间，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部道教著作的汇编《开元道藏》，关于该藏的卷数说法不一，或云3 744卷，或云5 700卷，或云7 300卷，这部《道藏》到天宝间才诏颁天下，传写流布，据《混元圣记》卷九所引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闰六月丙辰诏：

> 玄宗妙本，实备微言，垂范传学，将弘至化。朕所以发求道之使，远令搜访。因闻政之余，亲加寻阅，既刊讹谬，爰正简编。必有阐扬，以崇劝道。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传写。

天宝间，全国分十五道，每套《开元道藏》按5 700卷计，则抄经总数就有85 500卷，如果每道置若干副本，则抄经总数逾百万卷之多。天宝十年（751年），内府又“写一切道经五本，赐诸观”[1]，抄经总数有数万卷之多。

[1] [宋]钱易：《南部新书》卷3，中华书局，1958年。

二、民间抄书

唐代民间抄书可考者有李袭誉、李大亮、王元感、王绍宗、韦述、柳仲郢、吴彩鸾（详第十一章第三节）、皇甫湜、孟郊、杜牧、李商隐、李九龄、杜荀鹤、陆龟蒙等。

李袭誉，字茂实，陇西狄道人。历仕光禄卿、蒲州刺史、江南道巡察大使等职，“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2]。

[2]《旧唐书》卷59《李袭誉传》。

李大亮，雍州泾阳人，历仕安州敕史、越州都督、交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工部尚书等职，“在越州写书百卷，及徙职，皆委之廨宇”[3]。

[3]《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少举明经，历仕博城县丞、四门博士、弘文馆学士、崇贤馆学士等职。武后长安三年（703年），“表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4]。

[4]《旧唐书》卷189下《王元感传》。

韦述（生平详第七章第三节），“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5]。

[5]《旧唐书》卷102《韦述传》。

柳仲郢，字谕蒙，京兆华原人。元和十三年（818年）进士，历仕谏议大夫、刑部尚书、郓州刺史等职，著名藏书家，“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钞；魏、晋及南北朝史再；又类所抄它书凡三十篇，号《柳氏自备》。旁录仙佛书甚众，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其每种藏书都有三个复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6]。这些复本不少都是自抄的。

[6]《新唐书》卷163《柳仲郢传》。



图66
孟郊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一号甫里先生、天随子等），姑苏人。唐代文学家。与皮日休齐名，人称“皮陆”。《新唐书·陆龟蒙传》称其“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

皇甫湜（约777—约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人。举进士，历仕工部郎中等职。多抄书，“一日命其子录诗，一字误，诟跃呼杖，杖未至，啮其臂血流”[1]。可见皇甫湜对于抄书一事特别认真，不允许抄错一字。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图66）。唐代著名诗人，与贾岛齐名，时人有“郊寒岛瘦”之目。抄书甚多，其《自惜》诗云：“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于人。”其《老恨》诗云：“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2]

【1】《新唐书》卷176《皇甫湜传》。

【2】[唐]孟郊：《孟东野诗集》卷3。

张参，代宗大历间名儒，曾任国子司业等职。他曾抄过九经，据宋罗大纲《鹤林玉露》卷一：“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机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灿然，终始如一。”可见唐高宗李治也抄过《九经》。

杜兼，字处弘，建中进士，历仕濠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等职。其家“聚书至万卷。署其末，以坠鬻为不孝，戒子孙云”[3]。其书末原话见《全唐诗》卷873《题书卷后语》：“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可见其藏书是由薪水购买纸笔，抄写而成，实属来之不易。

【3】《新唐书》卷172《杜兼传》。

白居易（生平详第六章第三节），唐代著名诗人。其诗文结集次数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每次结集都要抄录许多副本，“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4]。

【4】《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杜牧（生平详第六章第二节），在抚州时抄书甚多。他在

《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1] 可见杜牧的万卷藏书多为手抄（图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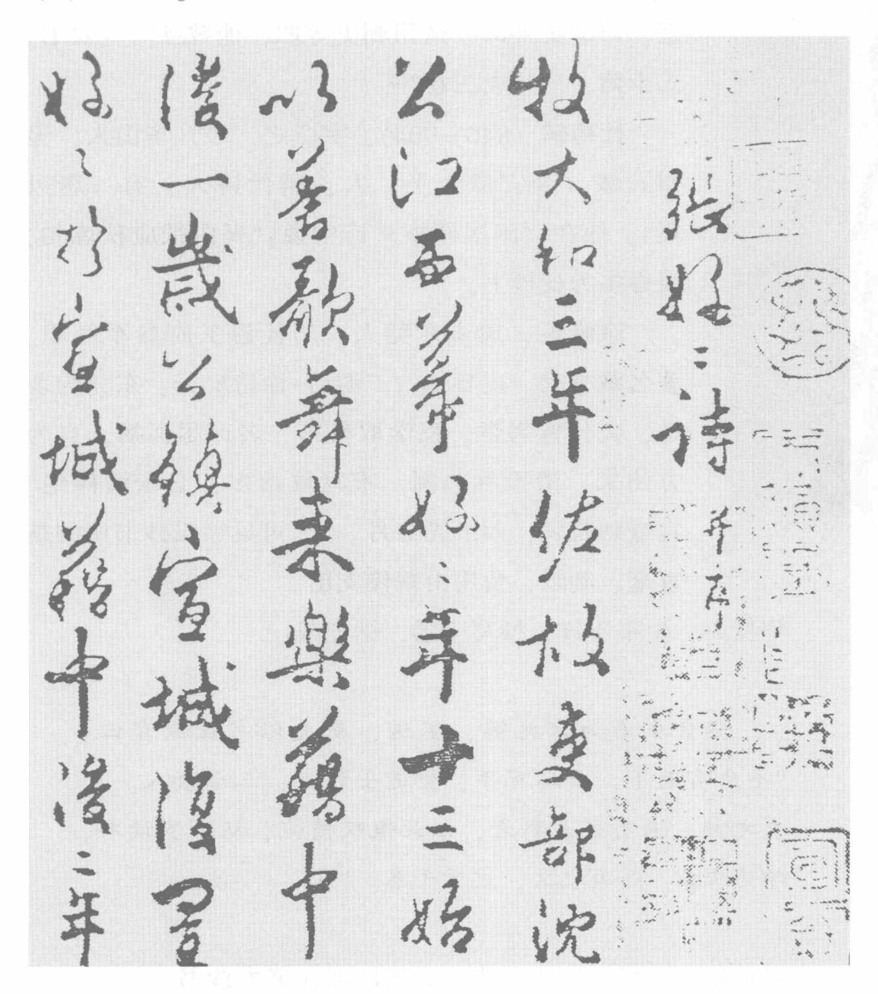


图67
杜牧书《张好好诗》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著名诗人（图68）。他在《韩碑》诗中说："愿书万本诵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2] 可见他经常抄书，还要永远抄下去，手长老茧，也在所不惜。

李九龄，洛阳人，唐末进士，抄书甚多，他在《写庄子》诗中说："闲中亦有闲生计，写得《南华》一部书。"[3]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大历进士，历仕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忠州别驾等职。晚年"家居瘴乡，

【1】《全唐诗》卷520。

【2】《全唐诗》卷539。

【3】《全唐诗》卷730。



图68
李商隐

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1]。

吕温，字化光，河中人。贞元进士，历仕左拾遗、户部员外郎、道州刺史等职，他曾抄写《农书》二十篇，“共成三卷”[2]。

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人，唐代诗人，有《唐风集》。他在《闲居即事》诗中说：“鬓白祗应秋炼句，眼昏多为夜抄书。”[3]

徐修炬，唐末东莞人，历仕恩王府参军等职，著名藏书家。皮日休《二游诗·徐诗》云：“东莞为著姓，奕代皆隽哲。强学取科第，名声尽孤揭。自为方州来，清操称凛冽。唯写坟籍多，必云清俸绝。宣毫利若风，剡纸光与月。”[4] 可见徐氏抄书用的是宣毫、剡纸，费用由薪俸支出。

华良夫，生平不详，抄写千卷，据记载：

> 华良夫尝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书让试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叹愤惋，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5]

可见华良夫发奋图强，为了金榜题名而努力抄书。

韦氏子，京兆人，举进士，“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本改正，文理晓然”[6]。可见洛妓文化水平之高，不仅抄诗，而且精诗，绝非一般经生所可比。经生又有佣书、书手、楷书、赁书、书工等名，其书法水平甚高。但是，经生的生活比较困苦，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云：

【1】《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2】《全唐文》卷630《代百寮进农书表》。

【3】《全唐诗》卷692。

【4】《全唐诗》卷609。

【5】［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53《感遇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51《韦氏子》，中华书局，1961年。

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布裙行赁舂，裋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1]

可见“佣书”是位“贫者”，依靠为人抄书而求口食。更有甚者，经生时常挨打受骂，开元中，洛阳尉李休烈就曾受理过经生挨打的案例：

甲居道周以佣书自业，乙侮之，折箠以笞其背，甲告他物殴人。[2]

可见经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官府书手的地位稍高一些，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书法优秀，二是出身官宦。集贤院有位书手叫阳城，北平人，“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3]。

总而言之，唐代民间抄书非常普遍，以上所举，可谓沧海之一粟。在众多抄本之中，经书抄本尤多，同书异本的错讹大量存在，令人莫衷一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十月癸卯，国子祭酒郑覃建议刻经于石，正其谬误[4]。据《旧唐书·文宗纪下》：

（开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

这就是有名的《开成石经》（图69）。这是我国古代继《熹平石经》、《正始石经》之后，第三次刻经于石。参预校勘者有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等。据清万斯同考证，《开成石经》包括十二种经书，“九

【1】《白氏长庆集》卷5。

【2】《全唐文》卷301《对佣书判》。

【3】《旧唐书》卷192《阳城传》。

【4】《旧唐书》卷173《郑覃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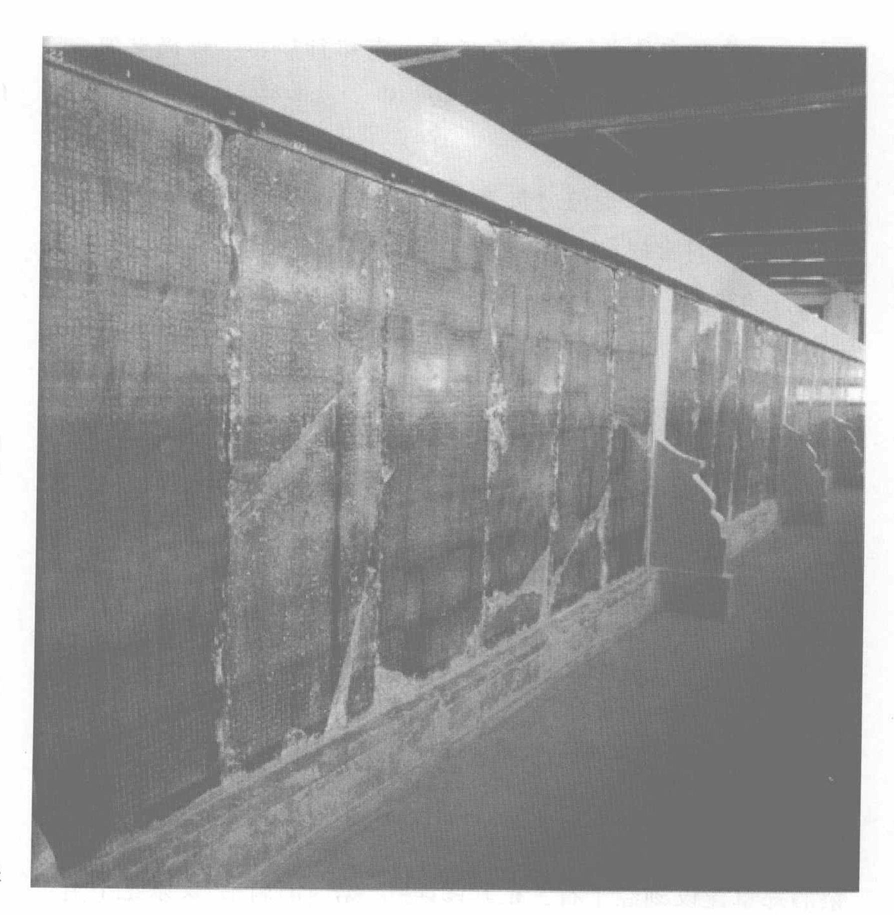


图69
开成石经

经之外，更有《孝经》、《论语》、《尔雅》，凡十二经，不止九经也。其时《孟子》尚杂诸子中，未与《大学》、《中庸》共列为《四书》也”[1]。官方刻经的初衷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准确无误的善本，正如郑覃奏章所说："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2]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校勘不精，加上字体"又乖师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名儒皆不窥之"。

[1] [清]万斯同：《同经考》卷下。

[2]《旧唐书》卷173《郑覃传》。

三、唐代刻书

关于唐代刻书的资料不多，除了前言最早印刷品之外，可考者尚有以下数种：

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之前洛阳刻印的佛经。据司空

图《司空表圣文集·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

> 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镂。

武宗排佛，“焚印本”事发生在会昌间，所焚之“印本”当刻于会昌之前，又上文标题下有一小字注：“印本共八百纸。”可知当时确有“印本”。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之后成都刻印的《陀罗尼经咒》（图70）。据《中国版刻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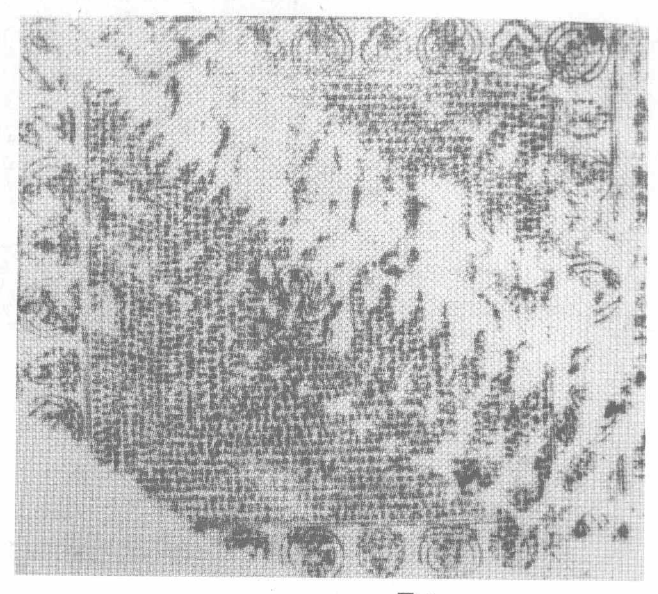


图70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之后刻印的《陀罗尼经咒》

> 一九四四年出成都市内一唐墓人骨架银镯内。四周双边，框外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成都改称府，因推知经咒板行，当在是年以后。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四川、江苏等地刻印的历书。据《全唐文·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

> 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图71）。

冯宿为东川节度使，此疏上于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又据《旧唐书·文宗纪下》：

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與王武俊書

張公與君爲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沒，幼子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強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勳，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歸闕，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四 馮宿 十五

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人阜。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予過其邑，洪君導予以邑之勝賞，於是有東峰亭之遊。背城之闉，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闤闠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忽焉如失。但山風飀飀，嶺雲峩峩，飛軒憑空，洞壑在

全唐文 卷六二四 馮宿

图71
冯宿关于禁止民间刻印历书的奏折

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

这说明中央政府试图独揽历书版权，严禁地方政府私自刻印。

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江西刻印的《刘宏传》。据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

纥干泉，字咸一，雁门人，大中元年至三年任江南西道观察使。

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以前，西川刻印的《唐韵》和《玉篇》。据日僧宗睿所编目录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印子”即印本。宗睿咸通三年（862年）来华，咸通六年（865年）回国时，随身携带经卷并

《唐韵》、《玉篇》等若干杂书。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图72）。该经用七张纸粘连而成，长十六尺，完整无缺，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此经现藏英国。


凡欲讀經先念淨口業真言遍
脩唎　脩唎　摩訶脩唎　脩脩唎　娑婆訶
奉請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衣持
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
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時長老須菩提在大
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
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图72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唐僖宗乾符间（875—879年）四川刻印的历书。据宋王谠《唐语林》卷七：

>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成都刻印的杂书。据唐柳玭《柳氏家训序》：

> 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

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重城即成都，柳玭即唐代藏书家柳仲郢之子。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成都樊赏刻印的历书。据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书首冠图之十：首行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等字样，次行小字有“中和二年具注历日”等字样。

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年）之前西川过家刻印的《金刚经》。据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字九号《金刚经》残卷，末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七字，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八十四岁老人手写流传”题记。又《伯希和劫经录》3493号也有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据“西川过家真印本”传抄的写本《金刚经》残卷。由此可知，依“西川过家真印本”传抄的《金刚经》不一而足。丁卯年即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年），既然84岁老人于该年抄写，则“西川过家真印本”的刻印时间当在该年之前。

唐末刻印的徐夤著《斩蛇剑赋》、《人生几何赋》等。徐夤，字昭梦，莆田人，唐昭宗乾宁初进士，有《钓矶文集》。其《自咏十韵》云:“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其中“镌印”就是刻印的意思。

四、从同书异本看唐代出版

唐代出版的繁荣，还可以同书异本之多，得到证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贾至集》有十五卷和二十卷两种版本，《杜甫集》有六卷和六十卷两种版本，《元氏长庆集》有十卷和一百卷两种版本；《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卜商传《周易》注本33种。智昇《开元释教录》著录的佛经版本更多，例如《幻士仁贤经》的另一版本名《仁贤幻士经》，《大方等大集经》有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卷等五种版本。唐代同书异本的名称有正本、副本、贮本、好本、古本、净本、俗本、

旧本、异本、注本等。

“正本”也叫真本，即正确无误的本子；副本即据正本抄录的据以流通的本子；“贮本”即据正本抄录据以收藏的本子。张九龄《唐六典·秘书监》云：“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这就是说，正本用来“进内”呈上；副本和贮本多用于“赐人”。

“好本”即善本，也是正确无误的本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云：

> 《史》、《汉》文字相承已久，若“悦”字作“说”，“闲”字作“闻”，“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溉”，“勑”字作“饬”，“制”字作“剬”，此之般流，缘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

“古本”即时间较早的本子。颜师古《汉书·叙例》云：“《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识之。”

“净本”即据草稿誊清写定的本子。俞樾《茶香室三钞·净本》云：

> 大历中，西川节度使崔宁尝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马入奏，发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中见所奏净本犹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忧惶不已。张植乃炷香一炉，以所写净本置香烟上，忽然飞去，食顷，得所封表草。及使回问之，并不觉，进表时封题印署如故。按此知唐人以写定之本谓之净本，今人则以真草对言矣。

“俗本”，亦名流俗本，即广为流传的本子。“旧本”即不详

时代的早期本子。《汉书·宣帝纪》云："(地节二年) 夏四月，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 (师古注：今流俗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 而后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盖以《元纪》云元帝二岁宣帝即位，八岁为皇太子，故后人妄于此书加之，旧本无也)。

"异本" 即不同于俗本的本子。据《旧唐书·王方庆传》："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

"注本" 即带有注解的本子。据颜师古《汉书·叙例》，唐代《汉书》有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晋灼、刘宝、臣瓒、郭璞、蔡谟、崔浩等23种注本。

同书异本名称之多既如上述，同书异本的文字亦多有不同。例如唐代《春秋》三传的同书异本 "或以音相近而致误，昧蔑、潜岑之类是也；有字义同而文异者，帅率、克剋之类是也；有穿凿而改易者，裂繻君氏之类是也；有字体相似而致误者，括结、嘉善之类是也；也有义类致误者，及会、侵伐之类是也；也有端然而误者，卫浮、弋氏之类是也；又有误脱者，其类非一"[1]。又如《周易》韩康伯注的同书异本 "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又兼有脱漏，两字颠倒，谬误增省，义理不通"[2]。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同书异本的文字差异为读者阅读制造了不少困难，为此唐代学者先后为之纠误，出现了不少专著，例如颜师古《匡谬正俗》、陆淳《春秋经传纂例》、郭京《周易举正》、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

总而言之，唐代同书异本数量之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图书出版的兴盛。

【1】[唐]陆淳:《春秋经传纂例·三传经文差缪略第三十七》,四库全书本。

【2】《全唐文》卷902《周易举正序》。

第三节　唐代出版管理

作为手工业劳动的一种，唐代出版业必须遵守唐代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据张九龄《唐六典》卷二十：

（手工业作坊）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

“诸器物亦如之”，就是说其他手工业作坊的众多“器物”产品，也应该像制造“弓矢长刀”的手工业作坊一样，做到两点：一是“官为立样”，即仿照官方制作的标准样本（相当于今之“国家标准”）制作，不得粗制滥造，随意为之。冯宿所谓“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1]，就是说每年司天台未颁下标准样本历书，民间已擅自广为印刷，可见当时市场秩序的混乱，冯宿上奏要求制止这种不法行为。二是手工业作坊生产的“诸器物”上应“题工人姓名”，即“物勒工名”之意。现在我们看到的唐代出版物大多题有书坊及坊主姓氏，如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刻印的《陀罗尼经咒》题“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刻历书题“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等等，不一而足。又据记载：

【1】《全唐文》卷624《禁版印时宪书奏》。

（唐玄宗令）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已后，与钱货兼用，违法者准法罪之。[2]

【2】《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门》。

这说明包括书市在内的唐代市场“钱货兼用”，即以钱、物从事买卖活动均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谓“持之（按：指图书）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就是说，书市可以以“酒茗”买书。包括图书在内的商品价格实行优质优价，“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3]，也就是物价分为三等，优劣得所。而且书价也并非是几十年一贯制，而是“每月旬别三等估”[4]，每十天就要重新制定一次价格。另外，据前引《旧唐书·食货志下》，唐代市场的“市牙”给商人发有“印纸”（相当于今之发票），随时记录买卖活动，国家凭此收税。没有“市牙”者，商人自记交易

【3】《唐六典》卷20《太宗寺·京都诸市令》。

【4】[清]陆心源：《唐令拾遗》卷26《关市令》。

活动，不得隐瞒。书市贸易活动当不应例外，书商当定期交税。以上谈了唐代书市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下面重点论述唐代官方关于图书内容的管理情况。

一、鼓励出版儒、释、道著作

唐代实行儒、释、道并重的文化政策，鼓励出版儒、释、道著作。儒家著作如《五经正义》、南北朝诸史系列、法律系列、类书系列等；释家著作如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和《广弘明集》、智昇《开元释教录》、道世《法苑珠林》等，还翻译了大量佛经；道家著作如卢藏用、邢南和、冯朝隐、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陆德明、陈廷玉、陆希声、杨上善、成玄英、孙思邈等对《老子》的注疏等。为了保证儒、释、道著作的出版，官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在组织方面，组建了史馆、集贤院等机构，征集了大批人材，完善了监修制，为官方修书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二，在选题方面，几乎所有官修书的选题均由钦定。例如唐高祖诏撰《艺文类聚》等；唐太宗诏撰《五经正义》、南北朝诸史、《氏族志》等；唐高宗诏撰《永徽五礼》、《西域国志》、《文馆词林》、《东殿新书》等；武后诏撰《兆人本业》、《孝子列女传》、《武后玄览》、《三教珠英》等；唐玄宗诏撰《群书四部录》、《唐六典》、《太一金镜式经》、《遁甲图》、《初学记》等；唐宪宗诏撰《礼记字例异同》等。唐代历书《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宣明历》等均奉诏编定。

第三，在出版方面，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抄书活动。为了保证出版物准确无误，每次抄书都组织有关专家认真校勘。图书三校出版之例屡见不鲜。

第四，在经费方面，大力支持。经费开支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用于图书抄写，据《新唐书·艺文志一》：

> 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

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

可见政府在抄写图书方面投资巨大，每年供纸6万番，供墨1 344丸，供兔皮1 500张。另一方面，政府经费用于奖励有功人员。官修书修成之日，预修者照例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赏赐。

第五，在流通方面，有两项措施：一是诏藏国家有关部门，借阅流通；二是将有关图书广颁（赐）臣下（详第十一章第二节）。

第六，唐代官方似已开始注意著作权问题，这表现在著作署名权、稿酬和打击盗版三个方面。在著作署名权方面，不允许剽窃他人著作据为己有，官方似已受理此类诉讼案件，据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

> 国子进士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

"牒"是官方办案公文，这是唐代官方受理著作权纠纷的一个案例。不管其判决是否公正，它至少说明唐代官方已开始重视著作署名权问题，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在稿酬方面，文人获取稿酬的现象十分普遍（详第五章第三节和第七章第四节）。但是，唐代"稿酬"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奏请皇帝恩准，韩愈撰《平淮西碑》及《王用碑》的"稿酬"俱经唐宪宗批准，杜牧撰《江西遗爱碑》的稿酬也是经过皇帝批准的。因此，清人赵翼曾说："以区区文字馈赠，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唐代）朝野通行之例。"[1] 这也是唐代关于出版物管理的内容之一。可惜唐代官方

【1】[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1《润笔》，中华书局，1963年。

关于“稿费”的具体规定，因文献无征，已不得而知了。在打击盗版方面，唐代官方也采取一些措施。据上引《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历书的著作权属于国家，然而剑南两川、淮南道等地的盗版历书满天飞。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唐文宗“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严厉打击盗版行为。那些盗版历书“每差互朔晦”，书商之间经常发生“争执”，甚至互相扭打，让政府有关部门评理。由于当时不可能有处理盗版问题的法规，有关部门也只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二、严禁民间出版的著作

为了巩固政权和维护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严禁出版非法著作。唐太宗贞观初年，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制定《贞观律》十二卷，其中包括律500条、令1 546条、格700条。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诏令长孙无忌、李反、于志宁、唐临、段宝玄、刘燕客、贾敏行等撰成《唐律疏义》三十卷，进一步对《贞观律》进行解释和说明。兹将有关禁书的内容介绍于下：

第一，严禁出版并收藏妖书。什么是妖书？妖书就是怪诞不经、蛊惑人心、危害国家安全的图书。《贞观律》卷七《贼盗律》第二十一条中规定：

> 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传用亦惑众者，亦如之（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

这里把“妖言妖书”分为两个大类，一为“言理有害者”，一为“言理无害者”。对于“言理有害者”的处理有四种方法：一是“造”者（即编著者）处以绞刑；二是传播惑众造成严重后果者也处以绞刑；三是传播范围较小，“不满众”者流放三千里

外；四是收藏而不传播者，判徒刑二年。对于言理无害妖言妖书的处理，有两种方法：造者（即编著者），杖一百；收藏而不传播者，杖六十。唐代有五种刑法，从轻到重依次为笞、杖、徒、流、死。“笞”即打竹板，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等五种；“杖”即棒打，分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等五种；“徒”即拘禁并强迫服劳役，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等五种；“流”即流放，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等三种；“死”即判处死刑，有绞、斩二种。可见唐代对于言理有害的妖言妖书的处理十分严厉，重者处以极刑；轻者也要判处二年徒刑。相对而言，对于言理无害的妖言妖书的处理则较为宽松，打几十棍了事。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发生一起妖书案。当年吉州地区司法官吉辨在检查囚犯物品时，偶然发现一本名叫《三皇经》的图书。《三皇经》又叫《三皇文》，是《天皇文》、《地皇文》、《人皇文》的总称。是唐代以前道士的必读书。内容记载鬼神谱系、修道要诀、驱除凶危和求吉保禅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其中写道：“凡诸侯有此文者，必为国王；大夫有此文者，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钱财自聚；夫人有此文者，必为皇后。”这几句话似有鼓动臣民造反夺权之嫌，有关方面十分重视，驰书上报，唐太宗责成朝仪郎、刑部郎中纪怀业等严加审理，同年五月十五日由侍郎崔仁师宣读圣旨如下：“《三皇经》文字既不可传，又语妖妄，宜并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经》替处。有诸道观及百姓人间有此文者，并勒送省除毁。”[1] 可见“钦定”处理结果有两条：一是《三皇经》语涉“妖妄”，应当“除毁”；二是用《道德经》代替《三皇经》作为道士的戒法。一件轰动朝野的大案就此收场。静言思之，这样不杀一人、不判一人的做法是恰当的，因为《三皇经》的作者是晋代鲍静，已经死了三百余年，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再说《三皇经》为历代道士戒法，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应当属于“言理无害”的妖书。

【1】[唐]道世：《法苑珠林》卷69。

第二，严禁出版和收藏天文、图谶、兵书、占卜等杂书。《贞观律》卷三《职制律》第二十条规定：

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

其中“玄象器物”，指测量天象的各种仪器；“天文”指各种有关天文星象的书籍；“图书”、“谶书”即图谶，指那些宣扬符命占验、妄言吉凶休咎的书籍；“兵书”指《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之类书籍；“七曜历”是指西方的一种根据日月五星计算的历书；《太一雷公式》是一种占卜的格式。为什么要禁上述著作呢？（一）古代官方的钦天监（或叫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司天监等）是专门研究天文历象的机构，绝不允许民间涉足。因为根据“天人感应”的学说，天象的变化就意味着人间的吉凶祸福，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天象变化的机密，从而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如果民间人人研习天文，岂不泄露了天机？（二）《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之类的兵书实用性强，如果民间有人熟读兵法，掌握了有关战略战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揭竿而起，颠覆政权。（三）《七曜历》随着佛教东来而传入，是舶来品。它与本土官历有两点不同：一是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记日；二是在日曜上多注“蜜”或“密”字，每日之下多记吉凶。本土官历对指导全国农事活动和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而《七曜历》这种标识吉凶的怪忌历书，就可能扰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对封建政权构成威胁。（四）太一、雷公本是传说中的神名，《太一雷公式》是其发明的占卜格式，据说其灵验度较高。作为统治者，当然不会允许民间妄论吉凶。以上各书屡禁不止，代宗大历二年（767年）正月癸酉发布《禁藏天文图谶制》云：

自四方多故，一纪于兹，或有妄庸，辄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共肆穷乡之辩，相传委巷之谈。饰诈多端，顺非而泽，荧惑州县，诖误闾阎，怀挟邪妄，

> 莫逾于此。其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准法，官人百姓等私家并不合辄有。自今以后，宜令天下诸州府切加禁断，各委本道观察节度等使与刺史、县令严加捉搦，仍令分明榜示乡村要路，并勒邻伍递相为保。如先有藏蓄者，限敕到十日内赍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对众焚毁。如限外隐藏，有人纠告者，其藏隐人先决杖一百，仍禁身闻奏；其纠告人先有官及无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资授正员官；其不愿任官者，给赏钱五百贯文，仍取当处官钱，三日内分付讫，具状闻奏。告得两人以上，累酬官赏。其州府长史县令本判官等不得捉搦，委本道使具名弹奏，当重科贬。两京委御史台切加访察闻奏，准前处分。咨尔方面勋臣，洎十连庶尹，罔不诚亮王室，简于朕心，无近憸人，慎乃有位，端本静末，其诚之哉！[1]

[1]《全唐文》卷410《禁藏天文图谶制》。

以上制文说明当时天文、图谶等禁书泛滥成灾，肆虐乡曲，“荧惑州县”，官方按照法律规定，严加惩处，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将禁令张贴于交通要道，广为宣传。二是在组织上邻伍之间互相担保。三是限十日之内，将禁书上交有关部门，当众销毁。四是奖惩分明：隐藏不交者，先杖一百，然后拘禁立案上报；揭发检举一人者，破格升官；不愿当官者，发给奖金五百贯文，三天内兑现；揭发检举两人以上者，倍加奖励；地方官吏行动不力者，从重处理。

第三，严禁出版匿名文书。据边归说《请禁无名文书疏》：

> 臣伏见诸处有人抛无名文书，及言风闻访闻之事。不委根苗，接便追扰。既非责实，多是构虚。穷理本之有伤，渎化源之无益。遂使贪吏狡吏，蓄私憾以雠人；谗夫佞夫，扇狂言而害物。请明行条制，庶绝罔诬。其受纳狱讼，直须显有披论，具陈名姓，即据理详按，无

纵舞文。其无名文书及风闻访闻，并望止绝，不得施行。俾存钦恤之风，不失含宏之体。[1]

[1]《全唐文》卷861。

也就是说，匿名文书多游谈无根，蛊惑人心，影响社会安定。

第四，禁止出版《化胡经》。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发布《禁化胡经敕》云：

> 如闻天下诸道观，皆画化胡成佛变相，僧寺亦画元元之形，两教尊容，二俱不可。敕到后限十日内，并须除毁。

《化胡经》又叫《老子化胡经》，是西晋道士王浮所作的一部扬道抑佛的著作。汉代佛教传入中土之初，曾依附黄老，以扩大影响，故东汉后期，曾有老子入夷狄化胡成佛之类的传说，汉末至三国这种传说尤其风行。到了西晋，道士王浮著《老子化胡经》，详细说明了老子西出阳关，经过西域到达天竺，化身为佛，教化胡人，从而产生佛教的经过，成为晋代以后扬道抑佛的经典著作。南北朝时，佛教广为传播，影响不断扩大，再也不需要依附黄老了，遂对《化胡经》进行反击，双方多次进行辩论，互有胜负。北周武帝并禁佛、道二教，《化胡经》首次遭到禁毁。隋、唐二朝，关于《化胡经》的争论屡有发生。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诏令僧人、道士再次进行辩论，最后僧人取得胜利，《化胡经》第二次遭到禁毁。不过，中宗认为佛、道二教应当和平共处，无意对其进行褒贬，所以这次禁毁并不彻底，《化胡经》仍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直到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将《道藏》中的伪妄经文统统焚毁，《化胡经》首当其冲，《化胡经》自此亡佚。现在我们看到的《化胡经》是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唐玄宗时抄写的十卷本残卷。

第五，禁止民间出版历书。我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大国，历

书对于农事活动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发行量极大。一些不法书商为了牟取暴利，置国家法令于不顾，私自编制历书，错误极多，因此，官方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出版历书（详第九章第二节）。

第六，禁止随意出版佛经。据前引唐玄宗《禁坊市铸佛写经诏》，唐代禁止那种极不严肃的民间经铺写经，他们“口食酒肉，手漫膻腥”，无“尊敬之道”，有“慢狎之心”。

第七，禁止出版相书、私史等。载初元年（689年）六月，武后《禁相书敕》云：“相书及朔计家书，多妄论祸福，并宜禁断。”[1] 相书是以人的出生年月、形象及气色来推测吉凶祸福的书，多凭主观臆断，容易造成混乱。私史是指那些私人编写的国史。自从唐贞观间建立史馆以后，绝不允许私人修史。郑虔因私修国史而坐谪十年。据记载：

> 郑虔，天宝初协律，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人有窃窥其稿草，上书告虔私修国史，虔遽焚之，由是贬谪十余年。[2]

以上是唐代关于禁书的若干规定。

【1】《唐会要》卷44《杂录》。

【2】《唐语林》卷2。

第四节　唐代图书的制作形式

唐代图书的装订形式虽然仍以卷轴装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装订形式不便翻阅的缺点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为此唐人进行了种种探索，并最终发明了册页装。唐重视书法，楷书水平最高，图书多采用之。唐代图书制作的形式有许多特点，让我们从装订、纸张、字体、序言、凡例、引文等方面加以说明。

一、装订形式

唐代图书装订有梵夹装、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等多种形式。

梵夹装源于印度，是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佛教经典的装订形式，其制作方法是：将写好的贝叶经从上到下依次排成一摞，再用两块竹（木）板一上一下地将其夹住，然后打孔穿绳即成。这种装订形式随着佛经的东传流入我国。《敦煌遗书》中的纸写本也有用梵夹装的，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便是。

唐代图书主要采用卷轴装。卷轴装又叫卷子装。这种形式在简帛流行的时代就产生了，是一种最古老的装订形式。在纸书出现以后，这种装订形式更加完善了。卷轴装由卷、轴、褾、带、签五个部分组成。“卷”是整个卷轴的主要部分，它由若干张纸粘连而成。纸的长短不一，长的可达二三丈，短的只有数尺，这主要依据文字多少而定。“轴”是一根短棒，卷子就缠绕在上面。轴可用檀木、象牙、琉璃、玳瑁、珊瑚等多种材料制成。到底用什么材料，主要依据藏书者的地位和图书价值而定。藏书者官高位显，图书本身为难得善本，就用名贵材料；反之，就用一般材料。据记载，文宗时，王涯藏书“数万卷，侔于秘府”，死之日，人破垣而入，“剔取”其图书“玉轴而弃之”[1]。可见王涯藏书就是以玉为饰的卷轴装，书轴之玉终于被人剥去卖钱。“褾”也叫包头，是卷端另加粘接的厚纸或丝织品，有保护全卷的作用。“带”指褾头的丝带，用以捆扎卷子。“签”是指轴头所系标明书名、卷次等内容的牌子。签和轴一样，也用象牙、骨、玉等不同材料表示不同的内容和价值。卷轴装虽然有容量可大可小等特点，但卷面过长，翻阅极不方便（图73）。

文献中关于唐代卷轴装的记载甚多，《旧唐书·经籍志下》云：

[1]《旧唐书》卷169《王涯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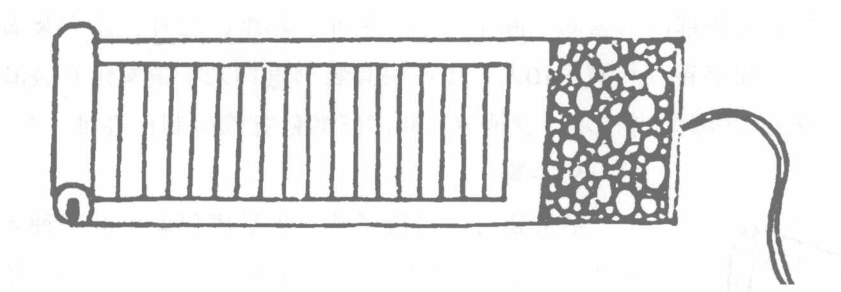


图73
卷轴装

> 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

这是以不同质料、不同颜色区别不同图书的卷轴装。据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28：

> 隋唐藏书，皆金题玉躞，锦赙绣褫。金题，轴头也；玉躞，轴心也。锦赙，卷首贴绫，又谓玉池，又谓之赙。有球路锦赙、有楼台锦赙，有标蒲锦赙、有蠲纸赙。

这里讲的也是唐代的卷轴装，装帧之豪华，匪夷所思。据王谠《唐语林》卷二：

> 至天宝十二载冬季，成《起居注》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轴，用雕檀轴、龙凤绫标。

这是史馆编撰《起居注》的卷轴装。以50张麻纸为一卷，卷到雕檀轴上，包头用紫龙凤绫。又如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讲的也是卷轴装。又据记载，邺侯李泌的三万卷藏书，"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1]。唐代秘书省、

【1】《山堂肆考》卷124《藏书》。

集贤院等部门的编制，除了书手、笔匠、熟纸匠之外，还有装潢匠，秘书省有装潢匠10人、集贤院有装书直14人、崇文馆有装潢匠3人。因为当时盛行卷轴装，装潢匠的任务就是制作卷轴、缥、带、牙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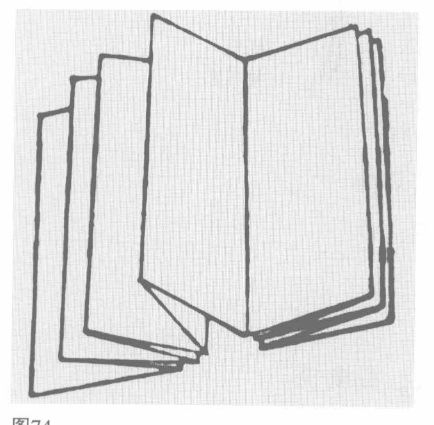


图74
经折装

经折装（一名折子装）也是唐代产生的一种新的装订形式（图74）。其制作方法是将写好的长条卷子，按照特定的行数，就像折扇那样，均匀地折叠成长方形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保护封面和封底，它和旋风装的区别在于：旋风装是双面书写，仍保留卷子形式，而经折装则是单面书写，已变为折子形式了。经折装的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的经折装成为一张张散页，和后来的册页装非常相似。元人吾丘衍《闲居录》云："古书皆为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这段话说明了古书装订形式由卷轴而经折、而册页的演变过程。经折装也是一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一种形式。由于经折装的折叠处容易断裂，所以至今存留下的经折装唐写本实物极为罕见。

李致忠先生在《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一文中指出：

> 唐代是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站在书史研究的角度，鸟瞰敦煌遗书中所存唐五代时期的书籍装式，我们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唐末五代是我国书籍装帧形制演化的大变革时期，是书籍从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期，或者叫作转型期。[1]

【1】《文献》，2004年第2期。

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人们解放思想，进行了种种探索。旋风装的表现形式不一而足，杜伟生先生就举出四个例子：（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将长短不齐的书叶以右侧为准

码齐，每叶右端上下两面涂上浆糊，逐叶粘连，在最后一张书叶下面粘上底纸。由于书叶较长，收藏的先将全部书叶对折，再用底纸包裹。（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46号（原件无题名），全部书叶以左侧为准码齐，各叶之间先以浆糊粘连，然后用宽约5厘米左右的竹条两根夹住书叶，再在竹条上打眼七个，用一根麻线循环串连装订，线头结在第二眼外侧。（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490号（原件无题名），全部书叶以右侧为准集齐，然后再粘在一根直径一厘米左右的小木棍上。（四）英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S6349号《筮宅凶吉法》，全部书叶以左侧为准集齐，逐叶粘好，再用一根直径约为9毫米的竹棍破开，夹住书叶，竹棍上再打三眼，用麻线串连缝好[1]。李致忠先生见过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藏唐写本《切韵》的一张照片。末叶单面书字，其余各叶双面书字，然后将每幅书叶都等距离用针打眼，逐眼穿绳，绳尾系在一根细圆木杆上。最后以木杆为轴心，从右向左卷起，再以绳系捆。以上各例有许多共同之处，“最重要的一点，这种装帧的书籍展阅时书叶有序排列，可逐叶阅览。卷收时以书叶集齐的一侧为轴心，卷起收藏”（图75）[2]。这种装订形式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卷轴装的旧制，但它实开了后世册页装的先河，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切韵》就是这种形式（图76）。文献中关于唐代旋风装的记载很多，例如：

【1】杜伟生:《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文献》，1997年第3期。

【2】杜伟生:《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文献》，1997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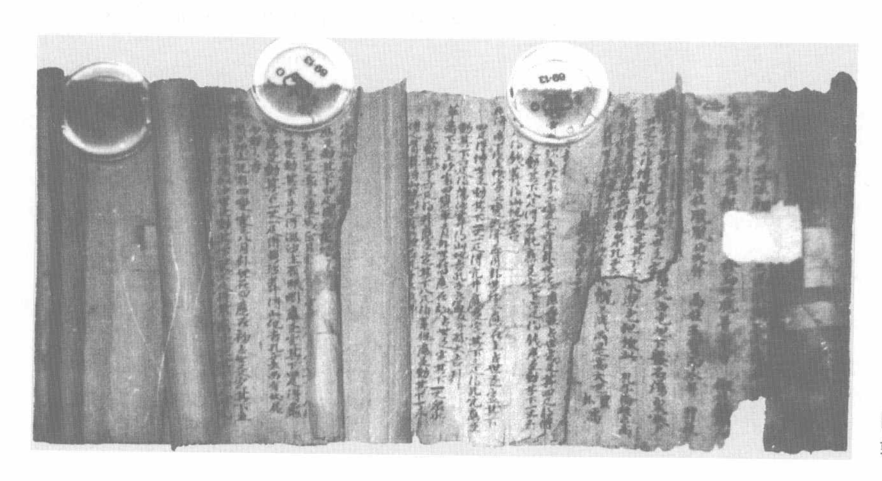


图75
敦煌藏经洞出旋风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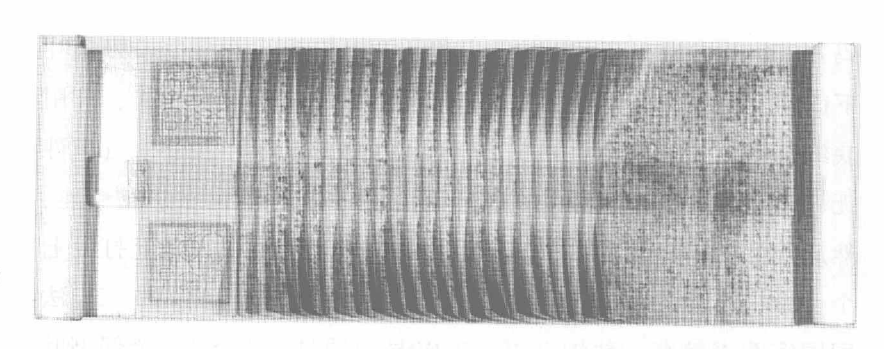


图76
故宫博物院藏旋风装唐写本《切韵》

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页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页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

——(宋)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页，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

——(宋)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

吴彩鸾龙鳞楷《韵》(按：指《唐韵》)……鳞次相积，皆留纸缝了。

——(元) 王恽《玉堂嘉话》卷二

相传彩鸾所书《韵》，散落人间者甚多，余从延陵季氏曾睹其真迹……逐页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页者即此，真旷代奇宝。

——(清)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

当然，尽管以上各种装订形式的命名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五花八门的形式都是对卷轴装的改进。

蝴蝶装简称蝶装，因书页展开似蝶而得名。这是古代册页装的最初形式（图77）。最早产生于唐代末期。其装订方法是将每一页有字的一面向内对折，然后把书口的背部连在裹背纸上，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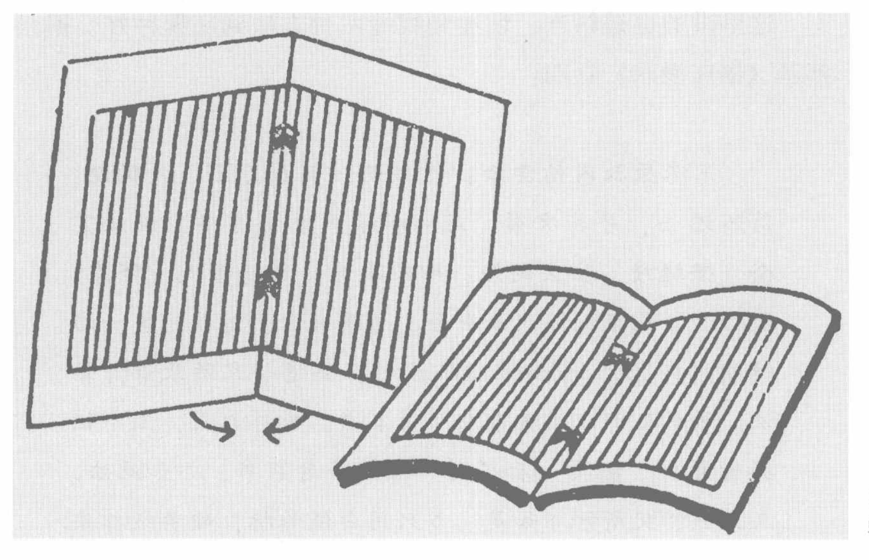


图77
蝴蝶装

装上硬纸作为封面。蝴蝶装的图书可以在书架上直立，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与现代图书的排架形式差不多。由于这种装订形式是版心向内，单口向外，因此，书背保护完好。其余三边若有污损，可以裁去，而不影响文字内容，这是它的优点。其缺点是每读一页，必须连翻两页，不胜其烦。关于蝴蝶装纸背的连结方法有二：一是粘连，二是线缝。据明张懋修《谈乘》：

> 王古心问僧永光："前代如一线，日久不脱，何也？"永光曰："古法用楮树叶、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粘接纸缝，如胶漆之坚。"此法文房可用。

这里讲的就是粘连，粘连用料是一种特制的胶状物。纸张可经久不脱。又据宋罗璧《识遗》卷一：

> 唐末书犹未有模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成册子，后以幅纸概粘之，其后稍作册子。

这里讲的也是粘连。粘连和线缝两种方法到底哪种好？据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页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公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页，上下栏界皆界出于纸页。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是。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可见宋人喜用粘连之法的蝴蝶装。

据李致忠先生考证，包背装、线装等也当始于唐代。总而言之，至迟到唐末装订形式已经完成从卷轴装到册页装的过渡。唐代后期，来华日本人所编的众多目录中已有不少"策子"、"册子"或"帖"、"本"的记载，例如日本《惠运律师书目录》著录：

诸佛境界摄真实经一部三卷，
观世音说多利心咒经一卷，
以上四卷为一册子。
慈氏菩萨略修愈念诵法一部二卷
以上（二卷）为一策子。

日僧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也有不少"策子"的记载，例如：

青颈观自在菩萨经一卷（三纸策子）
不动明王摧怨他敌等法一卷（二纸策子）
仪轨法一卷（五纸策子）
毗那夜迦经一卷（十二纸策子）

“策子”的容量可大可小：就卷数而言，一策少则一卷，多则十卷；就纸数而言，一策少则一张纸，多则十余张纸。又据《根本大和尚真迹策子等目录》，虽然书目名称标有“策子”二字，但正文著录却没有“策子”二字，每称“□帖第□帙，”例如：

六波罗蜜经一部（复十卷）右一部一帖第七帙
金刚顶略出经一部（复四卷）右一部一帖第十帙
十一面仪轨经一部（三卷）右一部一帖第十三帙

可见该目所谓“策子”者，指的就是“帖”，“策子”和“帖”是同义语。像“策子”一样，帖的容量可大可小，少则一二卷，多则数十卷。唐人又称“策子”为“本”，例如唐咸通六年（865年）日僧圆载《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著录：

七俱胝佛母准泥赞一本（一纸策子）
贤劫千佛心陀罗尼一本（一纸策子）
金刚顶莲花部一百八名赞一本（二纸策子）
梵字降三世一百八名赞一本（二纸策子）

说明唐人所谓“本”者，亦指策子。综上所述可知，诸目所谓“策子”、“册子”、“帖”、“本”云者，指的都是册页装。

二、纸张

唐代图书多用麻纸和藤纸。开元时，内府每月给集贤院调拨“蜀郡麻纸五千番”，每年调拨六万番[1]。国家藏书125 960卷，

【1】《新唐书》卷57《艺文一》。

【1】《旧唐书》卷47《经籍下》。

【2】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出版社，1979年。

【3】[唐]释法藏：《华严经传记》第五。

【4】《全唐诗》卷609《二游诗·徐诗》。

【5】《全唐文》卷825《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

【6】《全唐文》卷825《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

“皆以益州麻纸写”[1]。著名造纸技术史专家潘吉星先生对新疆出土的19种唐纸进行检验，发现其中12种都是麻纸[2]。唐代图书使用皮纸亦多。皮纸有楮皮纸、藤纸等。唐释修德“种楮树凡历三年，兼以花药，灌以香水，洁净造纸”，然后，召善书人为之抄写《华严经》[3]。藤纸以产自越州嵊县剡溪者最为著名，因有“剡纸”、“剡藤”、“越藤”等名称。徐修矩是唐代藏书家，其书多用剡纸抄写，皮日休因有“宣毫利若风，剡纸光与月”的诗句[4]。唐代不少佛经也用剡纸抄写，唐黄滔称福州报恩寺所藏《大藏经》“五千四百有八卷，皆极剡藤之精”[5]；又称泉州开元寺所藏佛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6]。为了制造剡纸，剡溪两岸的藤树惨遭砍伐，据记载：

> 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株蘖逼土，虽春入土脉，他植发活，独古藤气候不觉，绝尽生意。予以为本乎地者，春到必动。此藤亦本于地，方春且有死色。遂问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擗剥皮肌，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洎东洛西雍，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7]

【7】《全唐文》卷727《悲剡溪古藤文》。

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剡纸在唐代久负盛名，全国各地“皆以剡纸相夸”；二是纸工“砍伐无时”，唐代后期，剡藤多已枯死，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唐纸在使用前多加工成为熟纸和黄纸。采用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等手段填平纸面纤维间的多余毛细孔，以便在运笔时不致走墨而晕染，这样的纸叫“熟纸”。未经加工的纸叫“生纸”。抄写文字一般使用熟纸，生纸用于居丧间，据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杂记二》：

> 唐人用纸，有生熟二种。熟者妍妙辉光，生者不经治，粗涩碍指，非丧中不敢用。韩昌黎曾上陈给事书，

急于自辩，遂用生纸，书尾乃叙仓猝不能复俟更写之意。

黄纸也是一种加工纸，就是把纸浸泡在一种叫做黄柏的染制液中，染成黄色。这种纸有很多优点，李致忠先生曾经指出：

为什么古人喜欢用黄纸？盖有三条理由：一是黄檗中含有小柏碱，能杀虫防蛀，延长纸的寿命，益于图书保护。同时黄檗本身具有香气，以染纸写书，使书也能开卷清香。二是古代的五行说，以金木水火土对应于五色、五方、五音、五味等。而五行中的土行，正对应于五方中的中央和五色中的黄色。而黄是五色中的正色，故古时凡神圣、庄重的物品，就都用黄色。如皇帝的衣服要用黄袍，皇帝的轿子要用黄盖，皇帝的宫苑要用黄琉璃等等，都是由此而来。官府文书、重要典籍，取用黄纸，也是这个意思。后世书籍虽然多用白纸了，但宫里出的书，也还是多黄色书皮。三是古时有一种雌黄，易于涂改黄纸上写错的字。而且黄纸不刺眼，长期阅读而不致伤目。[1]

【1】《古书版本学概论·造纸术的发展与古书用纸的演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三、字体

唐代图书的主要字体有三种：隶书、草书和楷书。隶书是由小篆演变而成的一种简化字体。隶书始于秦代。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 100余枚竹简，字体端整，书体虽属小篆，但笔法已有隶书笔意，是由小篆向隶书过渡的产物，现称"秦隶"。秦朝灭亡之后小篆消亡，隶书代之而起，现称"汉隶"。"唐隶"，唐人称为"八分"，是隶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唐隶"的特点是"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2]，著名代表书家有唐太宗、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顺宗、杜如晦、殷仲容、王知敬、褚遂良、颜昭甫、卢藏用、元希

【2】[宋]佚名：《宣和书谱》。

声、韦斌、吕向、王维、史怀则、徐浩、韩滉、裴休、张彦远、林杰、李含光等，今传唐人隶书图书还有不少，例如唐玄宗书《孝经》等。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此体始于汉初，当时通行“草隶”，即隶书的草体。汉末张芝等完全丢掉章草中的隶书痕迹，一笔连写多字，偏旁互相假借，形成“今草”。唐代张旭、怀素等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划连绵回绕，如同龙飞凤舞，字形变化繁多，人称“狂草”。唐代著名草书名家除了张旭、怀素之外，尚有李元嘉、李灵夔、魏叔瑜、房玄龄、杜如晦、王知敬、杨师道、薛纯陀、颜元孙、陆曾、裴行俭、卢藏用、元希声、韦斌、吕向、贺知章、王维、张芬、韩滉、归登、房广、陈贤、张仲谋、释亚栖、释高闲、释景云、释梦龟等。《敦煌遗书》中《因明人正理论后疏》、孙过庭《书谱》等就是草书。楷书是由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楷书初叫“正书”，稍后又叫“真书”，“楷书”之名是唐代才有的。楷书出现在东汉末年，至唐而极盛，出现了不少楷书名家，例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柳公权、贾膺福、韦陟、戎昱、沈传师、李约、裴休等。其实唐代楷书名家比比皆是。《敦煌遗书》中有不少唐人写经用的都是楷书。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曾说：

> 吾观唐世经生楷书手之字迹，笔墨流动，结构谨严，常出碑上名家法度之外。[1]

【1】刘石：《中国书法》，三环出版社，1990年。

唐代书法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唐代秘书省、史馆、集贤院等部门都有专事抄写的书手，据张九龄《唐六典》记载，唐玄宗时，集贤院有写御官100人、造笔直4人；秘书省有楷书手80人、笔匠6人；弘文馆有楷书手75人、笔匠3人；司经局有楷书手25人。到官府充当书手，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出身官宦之家；二是书法优秀。唐太宗时，入弘文馆抄书者必须是五品以上子弟。

四、序言、凡例、引文及其他

序是说明写作经过、刊刻情况、学术源流等内容的文字。唐代书序已很普遍。其中名序有李阳冰《草堂集序》、韩愈《荆谭唱和集序》、柳宗元《愚溪集序》、皇甫湜《顾况集序》、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杜牧《李长吉集序》等。唐序有两个特点：一是序文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尤其是对于他人索序绝不有求必应、率尔操觚。唐代贤相韦处厚之子韦正蕃编撰文集，向文学家李翱求序，“十年不得，竟以翱言别求于刘宾客，乃始得之”[1]。著名诗人杜牧曾多次拒绝为人作序，当庄克向他索序时，他回信说：

【1】《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5。

> 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2]

【2】《全唐文纪事·体例三》。

太和五年（831年），集贤学士沈子明编讫李贺诗集，向杜牧求序，考虑到李贺“才绝于前”，怕写不好，杜牧一再推辞，“极道所不敢叙贺”，后来，沈子明发了脾气，杜牧“因不敢复辞，勉为贺叙，然其甚惭”[3]。唐序的第二个特点是千篇一律，程式化。清王士禛指出：

【3】[唐]杜牧:《李长吉集序》。

> 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业，如碑版之体，后则历举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胜更仆。如独孤及、权德舆诸序及《英华》、《文粹》所载皆然，千篇一律，殊厌观听。至昌黎始一洗之，如皇甫湜作《顾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为法。[4]

【4】[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凡例又叫叙例、例言等，它是说明图书内容和编撰体例的文言。凡例对于内容、体例的整齐划一是十分必要的。唐刘知几《史通·序例》从理论上对凡例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了凡例的重

要性:“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还探讨了凡例的起源和历代凡例的得失，对唐以前的图书凡例进行了总结，这在我国图书编撰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实践方面，唐代不少图书已经出现凡例专篇，如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前有凡例十七条，其中云：

> 一、凡三传叙事有先后于经者，今皆移于本经之下；
>
> 一、凡三传叙事不主于经文又无别意可通者皆不入；
>
> 一、《公》、《谷》多自云:“公羊子曰”、“谷梁子曰”及引尸子、鲁子“曰”，今但录其传而去“某某子”字。

唐代官修《晋书》也有凡例，清钱大昕云：

> 《晋书》纪、志、列传、载记百三十卷之外，别有叙例一卷、目录一卷，今目录犹存，而敬播所撰《叙例》久不传矣。[1]

【1】[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6《晋书·叙例》，商务印书馆，1957年。

唐代图书引文标明出处。但是，唐代引文有两大缺点：第一，引文不确，作者往往撮其大意而引之，文字多有改动。例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十五引许慎《说文解字》云：“礿，夏祭名也，从示，勺声，亦作禴”。其中，“亦作禴”三字为衍文，非许书所固有。同书卷五十七引许书云:“祟，神为祸也，从示，出声。”其中“为”是衍文。当然，这种毛病并非自唐代始，唐人之前大多如此。例如《诗经·齐风·鸡鸣》云：“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许慎《说文解字》卷七引作“东方昌矣”。第二，引文出处的标注混乱，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同书异名，标注不一，如贾谊《新书》在欧阳询《艺文类聚》中，或

作《新书》，或作《贾谊书》；《孔子家语》，在徐坚《初学记》中或作《孔子家语》，或作《家语》。（二）同一诗文篇名，前后标注不一，如晋桓玄《南游衡山诗序》，《初学记》中或作《南游衡山序》，或作《南游山诗序》等。（三）同名异书，不标注著者姓名，如《荆州记》有盛弘之、刘澄之两种，而《初学记》有时不标著者，难辨盛、刘。（四）仅标注著者姓名，不标书名、篇名，如《艺文类聚》中有“庾信诗曰”等，《初学记》中有“胡伯始曰”等。（五）同书著者前后标注不一，如《宋书》著者，《初学记》或作孙嚴，或作孙巖，或作孙嵒。（六）著者误标，如《毛诗草木疏》著者当为陆玑，而《初学记》却标为“陆士衡”，陆士衡，名机，与陆玑同乡，因而误标[1]。

唐代书页版式已有乌丝栏、朱丝栏、鱼尾等名称。大中四年（850年）三月十日，著名诗人许浑曾将自己创作的500首诗汇编在一起，题为《乌丝栏诗》，并抄写一次。从书名可知，该书每页均有黑色栏线。据记载：唐代“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2]，可见唐代用来写字的丝织品也往往织有黑色或红色的栏线。据唐蒋防《霍小玉传》：

> 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

这里的“乌丝栏素缣”就是以素缣制作的带有黑色栏线的图书。鱼尾始于何时？清赵遵路说：“书中间缝，每画，名鱼尾，象形也，始于唐太宗。”[3]

【1】许逸民：《初学记引书索引凡例》，中华书局，1980年。

【2】［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

第十章　唐代佛经翻译、编撰与出版

唐代佛经的翻译、编撰和出版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代出现了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等著名翻译大师，编撰了《广弘明集》、《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开元释教录》、《法苑珠林》等一大批佛教名著。唐代出版《大藏经》和《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佛经零种的数量难以数计，为佛经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唐代佛经的翻译

据统计，唐代译经总数为372部、2 159卷[1]。据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开列唐代可考译师如表22：

【1】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一册《中国佛教史略·唐代佛教》，知识出版社，1989年。

表 22　唐代可考佛经译师表

译　者	原　籍	译　数	译　时	译　地
义　净	范　阳	61 部 260 卷	700—711 年	福先寺、西明寺等
金刚智	南印度	4 部	720—741 年	资圣寺、大荐福寺等
不　空	师子国	77 部 120 余卷	743—774 年	兴善寺等
善无畏	中印度	5 部	716—735 年	菩提院
智　慧	北天竺	3 部 12 卷	792 年	西明寺

续表

译者	原籍	译数	译时	译地
道因	濮阳	协助玄奘	639—654 年	大慈恩寺
智贤	南海波凌	1 部 2 卷	664—665 年	
觉救	北天竺	1 部		洛阳白马寺
波利	北天竺	1 部	676—678 年	
尊法	西印度	1 部 1 卷		
无极高	中印度	1 部 12 卷	653—654 年	慧日寺
阿难律权师	中印度	1 部	653—654 年	经行寺
极量	中印度	1 部 10 卷	705 年	广州制止寺
实叉难陀	于阗	19 部	695—704 年	大遍空寺、清禅寺等
日照	中印度	18 部	679—688 年	太原寺、广福寺
天智	于阗	6 部 7 卷	689—691 年	魏国东寺
慧智	印度	1 部 1 卷	693 年	东都佛授记寺
智严	于阗	1 部	707—721 年	奉恩寺
宝思惟	北印度	7 部	693—706 年	天宫寺、福先寺等
菩提流志	南天竺	49 部 120 卷	683—713 年	福先寺、崇福寺等
怀迪	循州	1 部 10 卷		罗浮山石楼寺
智通	陕州安邑	4 部 5 卷	647—653 年	总持寺
寂默	印度	1 部 10 卷	803 年	慈恩寺
戒法	于阗	2 部	785—804 年	龙兴寺
莲华	中印度	1 部 40 卷	796 年	崇福寺
飞锡		1 部	765 年	大明宫内道场
般若	罽宾	1 部 8 卷	781—811 年	醴泉寺
悟空	京兆云阳	3 部 11 卷	789 年	章敬寺
满月	西域	2 部 5 卷	840 年后	
玄奘	洛州缑氏	75 部 1 335 卷	645—663 年	弘福寺、玉华宫等

据《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开元释教录》（《四库全书》本），唐代译经者还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伽梵达摩、阿地瞿多、那提、地婆诃罗、杜行、弥陀山、李无谄、达摩战湿罗、阿质达霰、勿提提犀鱼、尸罗达摩、法琳、道宣、玄

应、靖迈、玄恽、彦琮、复礼、慧立、怀素、明佺、跋日罗菩提、输波迦罗、智昇等。除了僧众参与译经活动之外，封建士大夫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杜正伦、李义府、范颐、徐坚、苏晋、崔璩、陆象先、郭元振、张说、魏知古等都参与了译经活动，这些人“皆一时英秀，当代象龙”[1]。中书侍郎崔湜因为行香到翻经院，看到不少士大夫都在这里工作，自己却没有参加，竟然长叹一声：“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因奏请参加润色工作[2]。

【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4《慧沼传》，中华书局，1987年。

【2】《宋高僧传》卷4《慧沼传》。

唐代佛经翻译大致可分如下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唐代建国到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历时27年。这个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中天竺人，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来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调拨19名翻译人员，协助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在兴善寺开始译经，历时4年，主持翻译《宝星陀罗尼经》、《般若灯论》、《大庄严论》等三部、三十五卷，由僧慧等证义，无模等译语，慧颐、慧净、慧朗、法琳等缀文，房玄龄、杜正伦参加铨定，萧璟为总监护。其中慧颐，俗姓李，荆州江陵人，工草隶，以文笔知名。慧净，俗姓房，常山真定人，生于儒学世家，善属文，通梵语，性慈善，有“东方菩萨”之称。法琳（572—640），俗姓陈，世居襄阳，博学多闻，淹贯群籍。武德初，住京师济法寺。贞观初，主龙田寺，一生为弘扬佛教作出重要贡献。第二时期从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至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历时20年。这个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玄奘（详本章第二节）、窥基等。窥基（632—682），俗姓尉迟，字道洪，京兆长安人。深谙佛典，精通梵文。25岁那年，在玄奘的指导下，参加佛经翻译工作。由他笔受的玄奘译本有《成唯识论》十卷、《辨中边论》三卷、《辨中边论颂》一卷、《异部宗轮论》一卷、《阿毗达磨界身足论》三卷等。第三时期从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历时139年。这个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实叉难陀、义净、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实叉难陀，葱岭北于阗人，精通大小乘和外

论，旁通异学，名满天下。武后证圣元年（695年），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在洛阳内廷大遍空寺从事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华严经》八十卷、《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八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一卷、《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一卷、《普贤菩萨所说经》一卷、《文殊师利受记经》三卷、《十善业道经》一卷、《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等十九种、一百零七卷。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人，与法显、玄奘并称“三大求法高僧”。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他从广州出发，经海路去印度取经，备极艰辛，历经三十余国，历时二十五年，武周证圣元年（695年）满载而归，带回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回国后，先在实叉难陀译场工作，参译《华严经》八十卷。武后久视元年（700年）开始，自组译场，担任主译11年，先后在洛阳福先寺、宫中内道场、长安西明寺等地翻译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柰耶戒经》、《尼戒经》、《律摄》、《大孔雀咒王经》、《佛为胜光天子说五法经》、《法华论》等56部、230卷。善无畏（637—735），天竺僧人。开元四年（716年）来华，深受玄宗礼遇，被尊为教主。开元五年（717年），他奉诏在西明寺菩提院主译《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一卷。开元十二年（724年），他在洛阳奉先寺主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苏婆呼童请问经》三卷等。其中《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著名的《大日经》，是密教胎藏部大法的根本经典。金刚智（669—741），天竺僧人，开元八年（720年）来华，开元十一年（723年）奉敕译经，先后翻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等多种佛经。不空（705—774），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幼年随叔父来华，15岁拜金刚智为师，参加译经工作。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经海路遍游五天竺，访得密藏及诸经论梵本500部。天宝五载（746年）回到长安。他精通梵语，又懂汉语，为他翻译佛经创造了有利条件。据圆照《贞元释教录》著录，不空共译密教经典110部、143卷，其中有《金刚顶十八会指归》、《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等。由于

他在唐玄宗开元间影响较大，他和善无畏、金刚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第四时期从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到唐代灭亡，历时102年。译经活动几乎停止，直到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才恢复了佛经翻译工作。

佛经翻译属于官方修书活动，这是因为：（一）译场由官方提供。如玄奘在弘福寺、玉华宫、长安北阙紫微殿右弘法院、终南山翠微宫、长安大内顺贤阁，东都大内丽日殿等处的译场均如此。义净在福先寺、西明寺的译场亦由官方提供。（二）译经活动奉诏进行。如神龙三年（707年），唐中宗“诏（义净）入内与同翻经沙门九旬坐夏”[1]；开元五年（719年），善无畏“奉诏于菩提院”译经[2]；开元十七年（729年），金刚智“奉敕于资圣寺”译经[3]；不空“累奉二圣令”译经，“二圣”即唐肃宗和唐代宗。（三）译经人员由皇帝钦定。如贞观中，唐太宗“敕搜天下僧中学解者充翻经馆缀文、笔受、证义等”[4]；显庆元年（656年），高宗敕令于志宁、来济、许敬宗、李义府、杜正伦等参与玄奘译经工作；贞元八年（792年），德宗“敕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参与智慧译场工作[5]。元和五年（810年），唐宪宗“诏工部侍郎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就醴泉寺译经”[6]。（四）经费由国家提供，如玄奘在弘福寺译经，唐太宗诏令“诸有所需，一共玄龄（按：房玄龄此时为京师留守）平章”[7]。（五）译经进呈御览。如大历六年（771年）十月二日，不空进译经表云：“起于天宝迄今大历六年，凡一百二十余卷、七十七部，并目录及笔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诵仪轨，写毕，遇诞节，谨具进上。”义净所译经亦多进呈武后御览。（六）译经多有御制序。如武后曾先后为实叉难陀、日照、义净等所译之经写序；不空“译《密严》、《仁王》二经毕，帝（按：指代宗）为序”[8]。（七）译经人员多有恩赐。如不空译经呈上，赐“锦彩绢八百匹，同翻经十大德各赐三十匹”[9]。贞观八年（634年）智慧等在西明寺译经，“即日赐钱一千贯、茶三十串、香一大合，充其供施”[10]。

佛经翻译也是一场大型集体编撰活动，其组织形式相当今之

【1】《宋高僧传》卷1《义净传》。

【2】《宋高僧传》卷2《善无畏传》。

【3】《宋高僧传》卷1《金刚智传》。

【4】《宋高僧传》卷3《智通传》。

【5】《宋高僧传》卷2《智慧传》。

【6】《宋高僧传》卷3《般若传》。

【7】[唐]慧立、彦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8】《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

【9】《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

【10】《宋高僧传》卷2《智慧传》。

主编负责制。译场内译主相当于主编，下面分工细密，各负其责。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言之甚详：

此务所司，先宗译主，即赍页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次则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西晋伪秦已来立此员者，即沙门道含、玄赜、姚嵩、聂承远父子。至于帝王，即姚兴、梁武、天后、中宗，或躬执翰，又谓为缀文也。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如翻《显识论》，沙门战陀译语是也。次则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如居士伊舍罗证译《毗柰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证梵义一员，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证禅义一员，沙门大通充之。次则润文一位，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傥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义净译场，则李峤、韦嗣立、卢藏用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也。次则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如译《婆沙论》，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义，唐复礼累场充任焉。次则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闻此位也。次则校勘，雠对已译之文，隋则彦琮复疏文义，盖重慎之至也。次则监护大使，后周平高公侯寿为总监捡校，唐则房梁公为奘师监护，相次许观、杨慎交、杜行颉等充之。或用僧员，则隋以明穆、昙迁等十人监掌翻译事，诠定宗旨。其处则秦逍遥园、梁寿光殿、瞻云馆、魏汝南王宅。又隋炀帝置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唐于广福等寺，或宫园不定。又置正字字学，玄应曾当是职，后或置或否。

可知译场有译主、笔受（亦名缀文）、度语、证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正字、字学等职，其中除了译主一人

之外，其他各职人无定数，润文多时或至二十余人，证义多时或至三百人。义净在大福先寺道场翻译《一切庄严王经》时，由沙门盘度读梵文，沙门玄伞笔受，沙门大仪证文，沙门胜庄、利贞证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1]。实叉难陀在东都佛授记寺译场翻译《文殊授记》等经时，沙门波仑、玄轨等笔受，沙门复礼等缀文，沙门法宝、恒景等证义，太子中舍贾膺福监护[2]。菩提流志在甘露亭等译场翻译《大宝积经》时，沙门思忠、天竺大首领伊舍罗等译梵文，天竺沙门波若屈多、沙门达摩证梵义，沙门履方、宗一、慧觉笔受，沙门深亮、胜庄、尘外、无著、怀迪证义，沙门承礼、云观、神暕、道本次文。润文官有卢粲、学士徐坚、中书舍人苏瑨、给事中崔璩、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尚书郭元振、中书令张说、侍中魏知古等[3]。

【1】《宋高僧传》卷1《义净传》。

【2】《宋高僧传》卷2《实叉难陀传》。

【3】《宋高僧传》卷3《菩提流志传》。

图78
玄奘



总而言之，随着佛教的盛行，唐代涌现出不少杰出的翻译家。这些翻译家犹如群星灿烂，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杰出翻译家玄奘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著名高僧、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图78）。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他出生于一个儒学之家。八岁时已开始从父陈惠学习《孝经》和其他经史著作。隋炀帝大业末年出家，开始研习佛经，先后师从法师长捷、法常、僧辨等，游学荆州、相州、赵州等地，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回到长安。自汉末佛法东渐，到了隋唐已蔚为大观，但是，译者或为胡人，不谙汉语；或为汉人，昧于梵言。加上流派纷呈、版本各异，汉译佛经多晦涩难明、错误百出，令人无所适从。玄奘在国内游学的过程中，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决计西行，求师访学，探索佛法真谛。他说：

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众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1]

【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凉州出发，踏上了荆棘丛生的万里征程[2]。路上或山高路险，或水深浪急，或沙海茫茫，甚至屡遭劫难，九死一生，却始终没有停下西行的脚步。贞观五年（631年），终于来到天竺那烂陀寺，师事戒贤法师。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壮志初酬：不仅精通了梵文，而且精通了《瑜伽师地论》等佛典。接着他又用了四年时间游学天竺各地，并同一些当地学者就佛典要义进行辩论，从莫能屈，誉满五竺，成为全印度最有影响的佛学大师，声望和学问都超过了他的老师戒贤。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历时19年，行程25 000公里，圆满完成了西行任务，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九年的大唐故土，受到长安数万人的夹道欢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他满载而归，带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金银檀佛像七尊、经论五百二十筴，计六百五十七部。

【2】关于玄奘西行的出发时间，有"贞观二年"、"贞观三年"等说法，此据玄奘撰《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

玄奘回国后，喘息未定，二月初就迫不及待地拜谒唐太宗，请求开馆译经。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就开始了译经活动。兹据杨廷福撰《玄奘生平年谱》、马佩《玄奘研究》等书[3]，开列玄奘译经编年如下：

【3】杨廷福：《玄奘生平年谱》，《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马佩：《玄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46岁，居长安弘福寺译经。

五月初二　创译《大菩萨藏经》。
六月初十　始译《显扬圣教论颂》一卷。
七月十四日　译《六门陀罗尼经》一卷。
七月十五日　译《佛说佛地经》一卷。
九月初二　译毕《大菩萨藏经》二十卷。
十月初一　始译《显扬圣教论》。

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47岁，居弘福寺译经。

一月十五日　译毕《显扬圣教论》二十卷。

一月十七日　始译《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

闰三月二十七日　译毕《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

五月十五日　始译《瑜伽师地论》。

七月　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七月十三日　将已译五部经论和《大唐西域记》呈太宗，请其作序。

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48岁，居长安弘福寺译经。

二月二十四日　译《大乘五蕴论》一卷。

三月初一　译《摄大乘论》十卷。

五月十八日　始译《解深密经》。

七月十三日　译毕《解深密经》五卷。

八月十六日　译《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奉敕把《老子》译为梵文；将《大乘起信论》汉文译为梵文。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49岁，居长安弘福寺译经。

三月二十日　译《天请问经》一卷。

五月十五日　译毕《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又译《胜宗十句义论》。

五月二十九日　译《唯识三十论颂》一卷。

八月初四　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上表启谢。

十月初一　在坊州宜君县凤凰谷玉华宫弘法台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奏上，并论旧译之误。

十月十六日　随太宗返回长安，居紫微殿弘法院，

昼则帝留谈说，夜则还院翻经。

十月十七日　始译《摄大乘论释》。

腊月　慈恩寺落成，玄奘奉敕入住。

闰腊月二十六日　译《摄大乘论本》三卷。

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50岁，居慈恩寺翻经院译经。

正月初一　译《佛说缘起圣道经》一卷。

正月十五日　始译《阿毗达磨身识是论》。

二月初六　译《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一卷。

四月　陪从太宗至翠微宫，为说佛法与西游见闻直至五月己巳唐太宗病重，一直留在宫中。

五月　回慈恩寺继续译经。

自此以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同时，因玄奘任慈恩寺上座，综理寺务。"僧事复来咨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经》十部，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亦令取法师进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务辐凑，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其精敏强力，过人若斯"[1]。

【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五月十八日　译《甚希有经》一卷。

五月二十四日　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六月十七日　译毕《摄大乘论》十卷和《摄大乘论释》十卷。

七月十五日　译《菩萨戒羯磨文》一卷。

七月十八日　译《王法正理论》一卷。

七月十九日　译《最五比经》一卷。

七月二十日　译《菩萨戒》一卷。

九月初八　译《大乘掌珍论》一卷。

十月初三　始译《佛地经论》。

十月初八　译毕《阿毗达磨身识论》十六卷。

十一月二十四日　译毕《佛地经论》七卷。

腊月二十日　译《因明正理门论》一卷。

高宗永徽元年（650年），51岁，居慈恩寺译经。

正月初一　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一卷。

二月初一　译《瑜伽师地论释》一卷。

二月初八　始译《说无垢称经》。

五月初五　译《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

六月初十　译《广百论》一卷。

六月二十七日　始译《大乘广百论释论》。

八月初一　译毕《说无垢称经》六卷。

九月初十　始译《本事经》。

九月二十六日　译《诸佛心陀罗尼经》一卷。

十一月　译毕《本事经》七卷。

腊月二十三日　译毕《大乘广百论释论》十卷。

高宗永徽二年（651年），52岁，居慈恩寺译经。

正月初九　译《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一卷。

正月二十三日　始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四月初五　始译《阿毗达磨显宗论》。

五月初十　译《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一卷，始译《阿毗达磨俱舍论》。

六月十九日　译毕《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十卷。

闰九月初五　译《大乘成业论》一卷。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53岁，居慈恩寺译经。

正月十六日　始译《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三月　奏请造塔安置经像，兼防火灾。诏造雁塔，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斯毕”[1]。

三月二十八日　译毕《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二卷。

四月初四　译《佛临涅槃记法住经》。

腊月二十日　译毕《阿毗达磨显宗论》四十卷。

[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高宗永徽四年（653年），54岁，居慈恩寺译经。

正月初一　始译《阿毗达磨顺正理论》。

高宗永徽五年（654年），55岁，居慈恩寺译经，译毕《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八十卷。

闰五月十八日　译《大阿罗汉提婆密多罗所说法注记》一卷。

六月初五　译《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卷。

七月二十七日　译毕《阿毗达磨俱舍记》三十卷。

九月初十　译《拔济苦难陀罗尼经》一卷。

九月二十七日　译《八名普密陀罗尼经》一卷。

九月二十八日　译《显无边佛士功德经》一卷。

九月二十九日　译《胜幢臂印陀罗尼经》一卷。

十月初十　译《持世陀罗尼经》一卷。

高宗永徽六年（655年），56岁，居慈恩寺译经。

高宗显庆元年（656年），57岁，居慈恩寺译经。

三月二十八日　译《十一面神咒心经》一卷。

五月初一　旧病复发，御医为之治愈。高宗迎玄奘于凝阳殿供养，译事未之或间。

七月二十二日　始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高宗显庆二年（657年），58岁，在洛阳译经。

正月二十六日　始译《阿毗达磨发智论》。

二月　高宗赴洛，敕玄奘陪从，随翻经僧5人、弟子各1人，住翠微宫，继续译经。

四月　陪高宗于明德宫，住飞华殿，继续译经。

五月　敕玄奘还积翠宫译经。

九月二十日　玄奘为排除干扰，不愿当文学侍从之类的官，上表请到少林寺专心译经，高宗不允。

十一月　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译事未之或间。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59岁，居长安西明寺、慈恩寺继续译经。

正月　返回长安，继续译经。

五月　参与官修书《西域图志》的编撰工作。

七月　敕居西明寺译经。

十月初八　始译《入阿毗达磨论》。

十月十三日　译毕《入阿毗达磨论》二卷。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60岁，居长安西明寺译经。

四月十九日　译《不空羂索神咒心经》一卷。

七月初三　译毕《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

七月二十七日　始译《阿毗达磨法蕴足论》。

九月十四日　译毕《阿毗达磨法蕴足论》十二卷。

十月　鉴于译事繁重，人寿无常，老病交加，两次上奏入山译经，未允。第三次奏请到京师近郊玉华寺译经，诏可。

闰十月　始译《成唯识论》。

腊月三十日　译毕《成唯识论》十卷。

高宗显庆五年（660年），61岁，居长安玉华宫译经。

正月初一　始译《大般若经》。

五月初七　译毕《阿毗达磨发智论》二十卷。

九月初一　始译《阿毗达磨品类足论》。

十月二十三日　译毕《阿毗达磨品类足论》十八卷。

十一月二十六日　始译《阿毗达磨异门足论》。

高宗龙朔元年（661年），62岁，居长安玉华宫译《大般若经》等。

五月初一　译《辨中边论颂》一卷。

五月初十　始译《辨中边论》。

五月三十日　译毕《辨中边论》三卷。

六月初一　译《唯议论》一卷。

七月初九　译《缘起经》一卷。

高宗龙朔二年（662年），63岁，居长安玉华宫译《大般若经》等。

七月十四日　译《异部宗轮论》一卷。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64岁，居长安玉华宫译《大般若经》等。

六月初四　译《阿毗达磨界身足论》三卷。

十月二十三日　译毕《大般若经》六百卷。

腊月初三　译《五事毗婆沙论》二卷。

腊月二十九日　译《寂照神变三摩地经》一卷；译毕《阿毗达磨异门足论》二十卷。

高宗麟德元年（664年），65岁，居长安玉华宫译经。

正月初一　译《呪五首经》一卷。

正月初三　应众僧之求，始译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大宝积经》，译了几行，已觉体力难支，遂收起梵本，与众僧道："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1]从此，绝笔翻译，并预嘱后事。

【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

正月初九　跌倒伤胫，病笃。

正月十七日　命门徒俱录所翻经74部、1 335卷。尚有582部未翻；又录俱胝画像、弥勒像各一千帧；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写《能断般若》、《药师》、《六门陀罗尼》各一千部。

二月初五　与世长辞。

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初二到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初五溘然长逝。玄奘二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噩耗传来，举国悲悼，高宗为之罢朝数日。据统计，玄奘总共翻译佛经74部、1 335卷，平均每年翻译3.8部、66.8卷。而最后四年，平均每年翻译多至170卷。从隋开皇元年（581年）到唐贞元十六年（800年）的220年中，共译佛典491部、2 622卷，而玄奘一人所译就占这个时期译经总卷数的一半。在翻译质量上也是最好的，据智昇《开元释教录》

卷八：

> 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玄奘治学严谨，精通佛经版本，在翻译《大般若经》时"文有疑错"，即用西域带回的"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1]。佛经译本向有"古译"、"旧译"、"新译"之说："古译"即鸠摩罗什以前的译本；"旧译"即鸠摩罗什以后的译本；"新译"即玄奘译本。新译后来居上，为弘扬佛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

玄奘在佛经翻译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何在？第一，"贞观之治"，为玄奘译经提供了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其译经活动得到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唐高宗的大力支持。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从全国各地征调大德数十人担任他的助手。房玄龄作为监护大使，为译场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坚强保证。第二，玄奘本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精通佛教教义和佛经版本，精通梵、汉二语，为佛经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玄奘又很刻苦努力，"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2]。第三，拒绝参政，为他赢得了译经的宝贵时间。唐太宗曾经两次劝他还俗从政，他都婉转拒绝。第一次是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他回答说：

[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 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

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1]

【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第二次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六月，唐太宗说："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于意何如？"他回答说："玄奘庸陋，何足以预之。至于守戒缁门，阐扬遗法，此其愿也。伏乞天慈，终而不夺。"[2]放弃参政的机会，使他排除干扰，一意译经，最后终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果玄奘当年还俗从政，踏上仕途，那么他的译经事业就可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可能就会失去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印度柏乐天教授对于玄奘的译经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玄奘也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国以外没有过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的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这么伟大的翻译家。[3]

【3】〔印度〕柏乐天：《伟大的翻译家玄奘》，《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和第6期。

第三节　唐代佛经编撰

除了翻译外来佛经之外，唐代在佛典著作的编撰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让我们从一般佛教著作和佛经目录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一般佛经著作的编撰

唐代一般佛教著作数量众多。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8年版）言之甚详，兹从注疏、论著、汇编等方面简介如下：

唐代佛经注疏同隋代一样，也有科文、文句、述记、玄义、

集注、训释、音训等类别。著名者如并州武德寺沙门慧觉著《华声疏》、《十地疏》、《维摩疏》等；长安延兴寺沙门吉藏著《中论疏》二十卷、《百论疏》九卷、《十二门论疏》十二卷、《三论玄义》等；天台山国清寺沙门灌顶著《涅槃玄义》、《涅槃经书》、《观心经疏》等；长安普光寺沙门法常著《摄论义疏》八卷、《涅槃疏》、《维摩疏》等；长安大慈恩寺沙门窥基著《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二十唯识论述记》等；西明寺沙门圆测著《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等；长安青龙寺沙门道氤著《唯识疏》、《法华经疏》、《御注金刚经疏》等；五台山清凉寺沙门澄观著《华严经疏》六十卷，玄应《大唐众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义净《梵唐千字文》、智广《悉昙字记》，等等。

唐代佛经论著也有通论、专论之别。通论如道绰著《安乐集》、法藏著《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宗密著《原人论》等。专论佛性者如恒景著《佛性论》二卷、灵一撰《法性论》等。专论因果者如阳尚善（或作杨上善）著《六道论》十卷，道世撰《敬福论》十卷、《略敬福论》二卷、《善恶业报论》等；专论形神者如海云著《形神不灭论》一卷等；专论仪式者如玄琬著《礼佛仪式》二卷、道世著《礼佛仪式》二卷、智昇著《集诸经礼忏仪》二卷、道氤著《信法仪》等。反驳排佛言论的专著也不少，如慧净《析疑论》一卷、普应著《破邪论》二卷、法琳著《破邪论》和《辨正论》、李师政撰《正邪论》、道宣著《通感决疑录》二卷、李玄冀著《显常论》二卷、道世撰《辨伪显真论》一卷、道氤著《定三教论衡》、复礼撰《十门辨惑论》、玄嶷著《甄正论》三卷、楚南著《破邪论》一卷等。唐代还有不少有关佛教历史、地理方面的专著，如道宣著《释迦氏谱》属于释迦传记；神清著《释氏年志》、玄琬著《佛教后代国王赏罚三宝法》、玄畅著《三宝五运图》等为中国佛教史资料；灌顶著《智者大师别传》、彦琮著《法琳别传》、慧立撰、彦琮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李吉甫著《一行传》、李华著《善无畏行状》、崔致远著《法藏和

尚传》等属于僧人专传；道宣著《续高僧传》等属于僧人总传；道宣著《集神州三宝感通记》、法藏著《华严经传记》、怀信撰《释门自镜录》等属于感应传；海云著《师资相承记》记密宗源流，属于教派史；法琳著《清溪山记》、彦琮著《大唐京寺录传》、段成式著《寺塔记》、清彻著《金陵塔寺记》等属于名山塔寺记；玄奘著《大唐西域记》、慧超著《往五天竺传》、圆照著《悟空入竺记》等属于西域地志。

唐代著名佛教著作编撰者有法琳、道宣、窥基、圆测、法藏、义净等。法琳（572—640），俗姓陈，远祖寓居襄阳。博通多闻，淹贯群典，武德初，住长安济法寺；贞观中，主龙田寺。贞观十三年（639年），因道士秦英诬告而入狱，流放四川途中而死，终年69岁。著有《破邪论》、《辨正论》、《释老宗源》等，是佛教的忠实卫士。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人。中国佛教律宗的创立者。十五岁出家，师从智首，专门研究律学，曾参加玄奘译场，后为西明寺上座。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广弘明集》、《续高僧传》、《释门章服仪》、《释门旧敬仪》、《律相感通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弘氏谱》等。窥基（632—682），俗姓尉迟，字道洪，京兆长安人。十七岁出家，先后在大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处师从玄奘学法，并参与译经工作。玄奘去世后，他重新回到大慈恩寺，弘法之外，潜心著书。著作多至43种，今存者有《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述》等31种。其为佛经作疏甚多，多达百余种，因有“百疏论主”之称。圆测（613—696），原新罗人，唐初来华学习佛法，是高僧玄奘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深研佛理，精通梵文、汉文等六种语言，曾先后协助提婆诃罗、实叉难陀翻译佛经，著有《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般若心经赞》、《阿弥陀经疏》、《成唯识论疏》等，共计19部83卷。法藏（643—712），华严宗的创始人。因武则天赐“贤首”之称，后人尊为贤首大师。著《华严探玄记》、《五教章》、《起信论义记》、《华严经指归》、《华严策林》、《华严经问答》、《华严义海百门》、《华严经关脉义

记》、《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华严经关义记》、《华严经传记》等。怀素（625—698），俗姓范，祖籍南阳，生于京兆。十岁出家，曾从高僧玄奘受学。显庆中，师从道成受戒学律。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前人律学未能尽善，决心另撰《四分律开宗记》。书成之日，洛阳纸贵，名动一时。除了《四分律开宗记》之外，还有《俱舍论疏》、《遗教经疏》、《开四分律拾遗钞》、《四分尼羯磨》等著作。义净（635—713），俗姓张，齐州人，著名僧人、旅行家、翻译家。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由海道往印度求法，经25年，历30余国，得梵本佛典约400部而归。回国后，翻译经、律56部、230卷。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等5部9卷。

二、佛经目录的编撰

随着佛教的盛行，唐代佛教著作大量增加。为了便于收藏和利用，佛经目录的编撰势在必行。可考的唐代佛经目录有：

（一）众经目录五卷 （唐）释玄琬撰

玄琬，俗姓杨氏，弘农华阳人。隋仁寿四年（604年）造经四藏。唐贞观初，建普光寺，诏而居之。从贞观五年（631年）开始，敕于德业寺、延兴寺抄写《大藏经》，委玄琬监护。该目当作于此时。该目著录佛经720部、2 690卷。

（二）《京师西明寺录》三卷 （唐）释道宣撰

（三）《大唐内典录》十卷 （唐）释道宣撰

道宣于高宗龙朔四年（664年）正月编成《大唐内典录》，该目分为十卷：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一；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第二；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第三；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第四；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第五；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第七；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第八；历代众经录目终始序第九；历代众经感兴敬录第十。该目有以下优点：一是一经多译，注明“初出”、“第一出”、“第二出”等，知其传译次第；

二是注明一经初见之目，知其著录之源；三是著录疑伪，以辨真假；四是著录阙本，以便搜寻；五是著录善本，极便读者。梁启超称《大唐内典录》中“最有价值之创作”，就在卷四《众经举要转读录》，“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1]。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

（四）《大唐东京太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唐）释静泰撰

龙朔三年（663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于敬爱道场抄写《一切经》，参加者有惠概、明玉、神察、道英、昙邃、韩康、李亮、卢行讷、郑祖均等，历时三年，抄写旧经论741部、2 731卷；又写玄奘新译经论75部、1 335卷。对于失传的382部、725卷佛典，随访随写。该目就是这次所抄佛典的目录。

（五）《古今译经图记》四卷（唐）释靖迈撰

靖迈，四川梓橦人，居简州聚福寺，以学行驰誉于时。贞观中，诏与玄奘译场，充任证义。当时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壁绘有古今译经僧人图像，靖迈配之以文，题之于壁。其意在于说明图像，并非完备的佛经目录。

（六）《大周刊正众经目录》十五卷（唐）释明佺撰

明佺，东都佛授记寺沙门，以义学名，而戒行清严，威仪卓绝。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敕其编撰该目，与修者多达二十余人。然此目错误较多，深为后人所讥。

（七）《续大唐内典录》一卷（唐）释智昇撰

（八）《续古今译经图记》一卷（唐）释智昇撰

（九）《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唐）释智昇撰

（十）《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唐）释智昇撰

智昇（669—740）曾自我介绍说：“昇早预释流，志弘大教。但才微力寡，无遂本怀。俯仰之间，亟经寒暑。”[2] 可见他自幼出家，久有弘扬佛法之志，但地位不高，很不得志。他生于高宗总章二年（669年）。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曾参与金仙公主给

【2】《开元释教录》卷9。

房山云居寺的送经活动，《开元释教录》就编于这一年。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卒，终年72岁。《开元释教录》分为总录、别录二部，末附入藏录。总录以朝代为序，著录佛典，有译人小传。别录将佛典分为七类：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阙录、疑惑再详录和伪妄乱真录。其中有译有本录又复分为五级细目。入藏录著录唐开元入藏经典，以千字文编号，是我国古代汉文大藏经的雏形（图79）。该目搜罗完备，考订精审，分类细密，著录准确，对佛经目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赞宁评价说：

開元釋教錄卷第一序

唐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但以法門幽邃化網恢弘前後翻傳年移代謝屢經散滅卷軸參差復有異人時增偽妄致令混雜難究蹤由是以先德儒賢製斯條錄今其存者殆六七家然猶未極根源尚多疎闕昇以庸淺久事披尋參練異同指陳臧否成茲部袟庶免乖違幸諸哲人俯共詳覽

稽首善逝牟尼尊 無上丈夫調御士

亦禮三乘淨妙法 并及八輩應真僧

我撰經錄護法城 三寶垂慈幸冥祐

图79
《开元释教录》明《南藏》本书影

（此目）最为精要，何耶？诸师于同本异出、旧目新名，多惑其文，真伪相乱。或一经为两本，或支品作别翻，一一裁量，少无过者。如其旧录江泌女子诵出经，黜而不留，可谓藻鉴。杜塞妖伪之源，有兹独

断。后之圆照《贞元录》也，文体意宗，相距不知几百数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内典论》十卷，靖迈出《图记》四卷，昇各续一卷，经法之谱，无出昇之右矣。[1]

【1】《宋高僧传》卷5《智昇传》。

（十一）《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唐）释圆照撰

（十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唐）释圆照撰

（十三）《般若三藏续古今译经图记》二卷（唐）释圆照撰

圆照，俗姓张，京兆兰田人，住京师西明寺，博通内外，能诗文。因《开元释教录》成书之后，“经六十五年，中间三藏翻经，藏内并无收管，恐年代浸远，人疑伪经”[2]，故编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之。贞元十五年（799年）十月二十三日，圆明又奉敕改《开元释教录》为《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贞元十六年（800年）四月十五日上之，分类全依昇录，内容除了因袭昇录之外，又加入开元十八年（730年）以后新译入藏诸经，卷数由昇录的二十卷析为三十卷。

【2】《宋高僧传》卷15《圆照传》。

唐代影响较大的佛典目录大致如上所述，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数十种佛经目录，例如：

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斯3624）　佛经目录（斯2872）

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在唐都数目录（斯3565）

藏经目录（斯5943）　佛经目录（斯1519）

佛经目录（斯2142）　佛经目录（斯5525）

佛经目录（斯5676）　佛经目录（斯5995）

佛经目录（斯6225）　龙兴寺藏大藏经目（伯3852）

金光明寺藏经目（伯3853）

沙州准目录大藏经数（伯3851）

佛经目（伯3854）　佛经目（伯3855）

安国寺经目（伯3654）　佛经目录（伯3138）

永康龙兴报恩三寺缺经目（伯2727）

某寺所藏佛经目（伯3060）

佛经目录（斯0375）　乾元寺经目（伯3188）

佛经目录（伯3279）　沙州诸佛寺藏经目（伯3337）

开元藏经目录（伯3313）　金光明寺藏经目（伯3869）

可以看出，这些佛经目录品种多样：既有一寺佛经目录，又有多寺联合目录；既有入藏佛经目录，又有阙经待访目录。敦煌一地就有这么多可考佛经目录，全国各地无考的佛经目录何啻千万！

第四节　唐代佛经的出版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后，虽然刻印了一些佛经零种，但是，手工抄写仍然是佛经出版的主要手段。抄写《大藏经》的例子屡见不鲜，抄写佛经零种的例子也多如牛毛。

一、官方写经

官方财力充足、抄手众多、人才云集，多次抄写《大藏经》，可考者如：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敕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又于延兴寺更造藏经，并委琬监护”[1]。据《大唐内典录》记载：

【1】《大正藏》卷49。

> （玄琬）以法流东渐，三被诛残。虽后鸠拾，不无纰紊，琬欲澄一文义，该贯后贤，乃集达解名德三十余人，亲自综括，披寻词理，经延岁序，方乃究竟。即写净本，以为法宝正则。故方隅道俗，欲写藏经，皆就传本，以为楷准。

可见这次玄琬奉诏抄写两部《大藏经》，一藏德业寺，一藏延兴寺。抄写之前，玄琬等三十多位“名德”认真进行整理。这两个抄本是当时的国家标准本，其他抄本均以此为据。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智通奉敕抄《大藏经》，据《静泰录》卷一："贞观九年（635年）四月，奉敕苑内写《一切经》，大总持寺智通共使人秘书郎褚遂良等，附新译经，校定申奏，奉敕施行。"可见这次抄写的《大藏经》增入了新译经。主持者智通，俗姓赵，陕州安邑人，隋大业中出家，经论该博。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抄写《大藏经》三千卷[1]。

【1】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范文澜《唐代佛教》附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子李治于延兴寺写《一切经》（即《大藏经》），主持者仍为智通[2]。

【2】《大正藏》卷55。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敕"为穆太后写佛《大藏经》，敕选法师六人校正"[3]。

【3】《大正藏》卷49。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新罗僧慈藏回国，赍《大藏经》一部[4]。

【4】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新罗普耀禅师回国，赍《大藏经》一部[5]。

【5】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唐太宗贞观间，还曾诏令抄写《遗教经》：

> 《遗教经》者，是佛临涅槃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宏阐，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需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6]

【6】《全唐文》卷9《佛遗教经施行敕》。

五品以上官吏和诸州刺史人手一册，其抄本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唐高宗显庆间，诏令西明寺写经一部，"更令隐炼，区格尽尔，无所间然"，除了单译、重翻、梵集三大类目外，"附申杂藏，即法苑、法集、高僧、僧史之流是也"[7]。这就是说，高宗要求该藏结构更严谨，分类更合理，使所有佛典均有类可归。除了收录外国人著作之外，还要收录中国人的著作。

【7】《大正藏》卷55。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诏于敬爱寺写《大藏经》。命沙门惠概等参加校对工作，三年写成。关于该藏的卷数，据记载：

写旧经论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又写大唐三藏法师新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合新旧八百一十六部，四千六十六卷入藏。其古来有目而无本者，合三百八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随访随写。[1]

【1】《大正藏》卷55。

唐高宗在位时赐栖霞寺《大藏经》一部，据唐高宗撰《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铭》：

古往今来，抚运化而虽寂；德崇业著，眷神理而犹存。寤寐遗尘，有兼前烈，瞻言胜轨，叹伫唯深。今故于彼度人，常满七七，各兼衣钵钱二百贯，绢二百匹，苏参拾斛，绣像织成像，新旧翻译《一切经》一藏，并幡华等物。[2]

【2】《全唐文》卷15。

唐高宗时，还为高僧玄奘造《一切经》一部，据玄奘《谢得一切经表》：

前降明敕，遣造《一切经》，欲使载金言于素叠，非止鹤林；启玉字于霜螺，宁惟鹿苑。香檀制轴，掩瞻蔔之芳；绣组裁帙，夺鲜霞之彩。[3]

【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谢得一切经表》。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命沙门法藏"仍写三藏并诸家章疏贮之"[4]。

【4】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唐玄宗开元间，赐真定大历寺《大藏经》一部。据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真定大历寺有藏殿，虽小而精巧，藏经皆唐宫人所书，经尾题名氏极可观。佛龛上有一盒，开钥有古锦，俨然有开元赐藏经敕书及会昌以前赐免拆殿敕书，有涂金匣藏《心经》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曰："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寺僧珍宝之。"

可见该藏是杨贵妃为唐玄宗书写，装潢华丽，历经武宗排佛而幸存至宋代。

唐玄宗天宝七载（748年），杨贵妃兄鸿胪卿杨铦为唐玄宗写《一切经》5 048卷、《般若四教天台疏论》2 000卷，置于五台山清凉寺，据李邕撰《清凉寺碑》：

天宝七载，贵妃兄银光青禄大夫弘农县开国男上柱国鸿胪卿杨铦奉为圣主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般若四教天台疏论》二千卷，俾镇寺焉。海墨树笔，竹纸花书，密藏妙论，千章万品，置之以宝案，盛之以玉箱。[1]

【1】《全唐文》卷264。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十月，为使患病的爱女早日康复，代宗将其送至大兴善寺不空处，并赐《一切经》5 050卷[2]。

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潭州岳麓寺沙门疏言往太原求佛经，河东节度使司空卢钧、副使韦宙以经施之，共得佛经5 048卷[3]。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前江西观察使韦丹曾施俸庐山东林寺建堂宇，写经藏。及会昌废佛，僧窃藏之石室，及寺复经出，已亡佚过半，后稍补之[4]。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懿宗生日那天，诏福寿尼缮写《大藏经》5 461卷，由名僧担任校对[5]。

以上是可考官写《大藏经》例。此外，官抄零种佛经也有不少，例如：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中天竺沙门波颇译诸经毕，敕各

【2】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第二章《皇家官藏概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3】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4】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5】《宋高僧传》卷6《僧彻传》。

写十部散流海内；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诏有司写新译经论，颁赐九州。武后天授元年（690年），制颁天下，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1]。

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门下省、弘文馆、秘书省、左春坊等部门都抄过《妙法莲华经》，兹举例如表23[2]：

[1] 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2] 表中"校勘"栏①②③表示初校、再校、三校者。

表23 唐代官方抄经例表

时　间	卷次	麻纸	抄写	校勘	主管	监造	出处
咸亨三年(672年)三月初七	3	19	王思谦	①王思谦 ②僧仁敬 ③僧思忠	向义感	虞　昶	伯2644
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十五日	3	19	赵文审	①赵文审 ②僧智藏 ③僧智兴	向义感	虞　昶	斯4209
咸亨三年(672年)八月二十九日	4	22	刘大慈	①刘大慈 ②僧行礼 ③僧惠冲	向义感	虞　昶	斯4551
咸亨四年(673年)九月二十一日	4	22	封安昌	①僧怀福 ②僧玄真 ③僧玄真	李　德	虞　昶	斯0312
咸亨五年(674年)八月初二	3	19	萧　敬	①僧智彦 ②僧符轨 ③僧怀贤	李　德	虞　昶	斯0045
上元元年(674年)九月二十五日	6	20	萧　敬	①僧智彦 ②僧符轨 ③僧怀瓒	李　德	虞　昶	斯3348
上元二年(675年)十月十五日	6	20	袁元悊	①僧义威 ②僧义威 ③僧义威	李　德	阎玄道	伯2195
上元三年(676年)五月十三日	5	21	孙玄爽	①僧法界 ②僧法界 ③僧法界	李　德	阎玄道	斯1456
上元三年(676年)八月初一	3	19	任　道	①僧无及 ②僧道善 ③僧道善	李　德	阎玄道	斯2637
上元三年(676年)十一月初五	5	21	成公道	①僧慧智 ②僧慧智 ③僧慧智	李　德	阎玄道	斯1048

以上各经的“装潢手”均为解善集，“详阅”均为太原寺大德神符、太原寺大德嘉尚、太原寺主慧立和太原寺上座道成四人，故从略。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写经是由经坊承担的。从时间看，以上各经抄于咸亨二年（671年）至上元三年（676年）之间，可见唐高宗重视写经；从内容看，抄写《妙法莲华经》第三卷共四例，是抄写次数最多的一卷；从纸张看，抄经均用麻纸，麻纸是当时的最佳纸张。四例《妙法莲华经》第三卷，用纸数量相同，均为19张。这说明四例的行款完全相同。如果行款不一，纸数必有差别。从参预者看，经坊是一个由书手、装潢手、校对、详阅、主管、监造等数十人组成的严密组织，是一个专门抄写佛经的常设机构。每种经文的制作都要经过抄写、装潢、一校、二校、三校、详阅等步骤。在其工作人员中间，书手、装潢手和校对者的地位较低，书手可以是经生，如王思谦等；也可以是政府内的专业书工，如赵文审、刘大慈、封安昌、袁元悊等为门下省书手，萧敬为左春坊书手，任道等为弘文馆书手，孙玄爽等为秘书省书手等。装潢是个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要求较高，解善集当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校勘工作非常认真，要进行三次。初校多由书手兼任，再校和三校多由僧人担任。有时人手不够，初校、再校、三校亦可由同一人担任。负责详阅者地位较高，其中不少人都是名僧，例如太原寺主慧立在赞宁撰《宋高僧传》卷十七中就有专传，他是天水人，贞观三年（629年）出家，曾协助玄奘翻译佛经，任大慈恩寺翻经大德，后授太原寺主，“皆降纶旨，令继寺任”，曾为玄奘立传，题为《慈恩三藏行传》，“未成而卒，后广福寺沙门彦琮续而成之”，即今所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事详赞宁《宋高僧传》卷七。嘉尚也是玄奘的得意门生，曾协助玄奘在玉华宫翻译《大般若经》，任证义、缀文之职。道成为京兆恒济寺名僧，弘四分律，文纲、怀素从其游学，皆出其门。垂拱中，“日照三藏译《显识》等经，天后诏名德十员助其法化，（道）成与明恂、嘉尚同预证义”[1]。向义感、李德是写经主持人，负责经坊的组织工作。虞昶、阎玄道等

【1】《宋高僧传》卷14《道成传》。

是监造，他们传达皇帝命令，反映抄经进展，是皇家的派出人员。除以上人员外，还有一些负责膳食、纸张调拨、房屋修缮等工作的勤杂人员。这些人在经坊中的地位最低，写经题记中不可能会有他们的姓名。经坊的主要任务是抄写《大藏经》，皇帝颁赐的《大藏经》当由经坊提供。经坊行有余力，也抄写一些零星佛经。经坊人员众多，纸张需求量大，经费开支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些经费全由官方提供。对于官方来说，只要能够大造“功德”，花费再多，也在所不惜。《敦煌遗书》斯5826号《经坊供菜关系牒》提供了蔬菜供应的例证：

> 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写经二十五人，一年准方印等菜八十五驮，丝棉部落供。昨奉处分，当头供者具名如后（姓名及供菜数略）。右件人准官汤料，合请得菜，请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

这个经坊虽非皇家经坊，而是敦煌地区官办经坊，但其管理当和皇家经坊相似。从牒文看，“判官”是经办人。经坊工作人员既有僧人，更有不少俗人。蔬菜供应总量是每年120驮，人均3.4驮。除了蔬菜之外，还有粮食、燃料、丝绸、纸张等。

二、僧人写经

开元二年（714年）七月，唐玄宗《禁坊市铸佛写经诏》云：

> 佛教者，在于清净，存乎利益。今两京城内寺宇相望，凡欲归依，足申礼敬。下人浅近，不悟精微，睹菜希金，逐焰思水，浸以流荡，颇成蠹弊。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

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诸身，道则不远，溺于积习，实藉申明。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并准此。[1]

【1】《全唐文》卷26。

可见唐代只准官方、僧人写经，不允许私人随意写经。据赞宁《宋高僧传》、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孙星衍《寰宇访碑记》、赵明诚《金石录》、《宣和书谱》等书（注明者除外），兹将可考僧人写经者举例如下：

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弥留之际，命助手嘉尚抄录所翻经论75部、1 335卷。

文明中，僧玄览于杭州华严寺写经2 000余轴，以金字《涅槃经》为首。

天宝初，湖州大云寺僧子瑀前后抄写3部《大藏经》，共16 000卷。

天宝六载（747年），西京千福寺僧楚金抄写《妙法莲华经》1 000部，金字36部。

大历中，京兆恒济寺僧怀素写经画像，不可胜数。

咸通间，京兆大安国寺僧抄写《大藏经》5 461卷。

贞观间，僧昙韵抄《法华经》，据记载：

唐昙韵禅师，定州人。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山，常诵《法华》，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著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复如初，曾不告倦，及缮写毕，乃至装褫，一如正法。[2]

【2】《太平广记》卷109《昙韵禅师》。

可见抄经以前，要进行洗澡、更衣、净室、受戒、烧香、悬

幡等一系列准备工作，表现了昙韵的虔诚之心。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在唐学问僧玄昉、学生吉备真备随遣唐使返国，赍去佛经五千余卷。这些佛经当为僧人抄写。

天宝元年（742年），鉴真和尚造佛菩萨像无数，并造数千领袈裟，送五台僧，又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

大历十四年（779年），长安郑道觉巡礼五台，舍财写金银字《大藏经》六千卷。

元和四年（809年），江西观察使韦丹以僧灵彻言，施俸及其妻田租于东林寺，抄经藏，建堂宇。

开成元年（836年）二月一日，白居易于苏州南禅院作转轮经藏。白居易《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云：

> 千佛堂转轮经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发心，蜀沙门清闲、矢谟，吴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僝功，檀主邓子成、梁华等施财，院僧法弘、惠满、契元、惠雅等蒇事。大和二年秋作，开成元年春成。堂之费计缗万，藏与经之费计缗三千六百。堂之中，上盖下藏，盖之间，轮九层，佛千龛，彩绘金碧以为饰，环盖悬镜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门，丹漆铜锴以为固，环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柅，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1]

【1】《白居易集》卷61。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二十五日，白居易在洛阳香山寺修《大藏经》一部，据白居易《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

> 先是，乐天发愿修香山寺，既就，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无经典。寂寥精舍，不闻法音，三宝阙一，我愿未满。乃于诸寺藏外杂散经中得遗编坠轴者数百卷帙。以《开元经录》按而校之，于是绝者续之，亡者补之，稽诸藏目，名数乃足。合是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

【1】《白居易集》卷70。

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护焉。[1]

可见该藏乃白居易在搜访杂散经的基础上，续补而成。

中和元年（881年），唐商张蒙至日本，携去圆珍托婺州人李达代为访求之《一切经》阙本百二十卷。

中和二年（882年），日僧圆珍托唐人李达至长安大兴善寺慧轮三藏处以求阙经，又遣其弟子入唐求阙经三百三十卷。

乾宁四年（897年）十一月，泉州开元寺“缮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驾以白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兹之楼”[2]。

【2】《全唐文》卷825《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

天祐三年（906年），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写经“凡五百四十有一函，总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极剡藤之精、书工之妙，金轴锦带，以为之饰”[3]。

【3】《全唐文》卷825《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

贞固律师而屡写藏经，常营众食。贞固，俗姓孟，荥川人，初唐僧人。

道一写《大藏经》，手自刊校。天宝十三年（754年）卒，享年76岁。

龙朔二年（662年），善导和尚写《弥陀经》数万卷。

圣历二年（699年），法藏撰《授玄疏》成，致书同门新罗义湘，并写副本托人与之。

璋上人，玄宗时楚国寺高僧，岑参《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诗云：“璋公不出院，群木闭深居。誓写一切经，欲向万余卷。挥毫散林鹊，研墨惊池鱼。音翻四句偈，字写五天书。”[4]

【4】[唐]岑参:《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释词浩，僖宗时人，乾符六年（879年）二月，在陕西咸宁书《陀罗尼经》。

释昙林，唐代高僧，书法家，曾书《金刚经》等。

释道秀，德宗时高僧，建中三年（782年）书《观无量寿经》。

释法昭，德宗时高僧，贞元八年（792年）书《观无量

寿经》。

释令洪，武宗时高僧，会昌三年（843年）十月在浙江归安书《尊胜陀罗尼经》。

写经是僧人分内的事，“书写一言，功超数劫”[1]，僧人写经之例比比皆是，兹不赘述。

【1】《法苑珠林》卷17《敬法篇·述意部》。

僧人或民间有不少刺血写经的记载，例如：

咸通间，灵武龙兴寺僧增忍刺血写经283卷[2]；

京兆韦绶少有至性，父亡，刺血写佛经[3]；

开元中，河南元德秀母亡，庐于墓所，刺血画像写佛经[4]；

京师崇圣寺僧文纲刺血写经600卷[5]。

其实，官方并不提倡、甚至反对刺血写经，据记载：

【2】《宋高僧传》卷26《增忍传》。

【3】《旧唐书》卷162《韦绶传》。

【4】《旧唐书》卷190下《元德秀传》。

【5】《宋高僧传》卷14《文纲传》。

>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进刺血写经，聚众教化寺，所司申报高燕公，判云：“断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贝多叶上，不许尘埃；俗子身中，岂堪腥腻！宜令出境，无得惑人，与一绳递出东界。”所司不喻绳绞，赐钱一千，送出东郭，幸而误免。后卒于荆州玉泉寺。[6]

【6】［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9，中华书局，2002年。

可见刺血写经者法进被赐“绳绞”，由于当事者误解，幸免一死。尽管如此，佛教信徒为了表示拳拳之心，刺血写经者仍然屡见不鲜。

三、民间写经

除了官方、僧众写经之外，民间善男信女写经之例也有很多（图80）。这些人或称为“供养者”。供养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水平高者可以自己亲自抄写；水平低者甚或文盲，可以请人抄写。“经生”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就是专门以抄经谋生的人（图81）。唐代民间写经之例屡见不鲜，兹据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孙星衍《寰宇访碑记》、李昉《太平广记》、赵明诚《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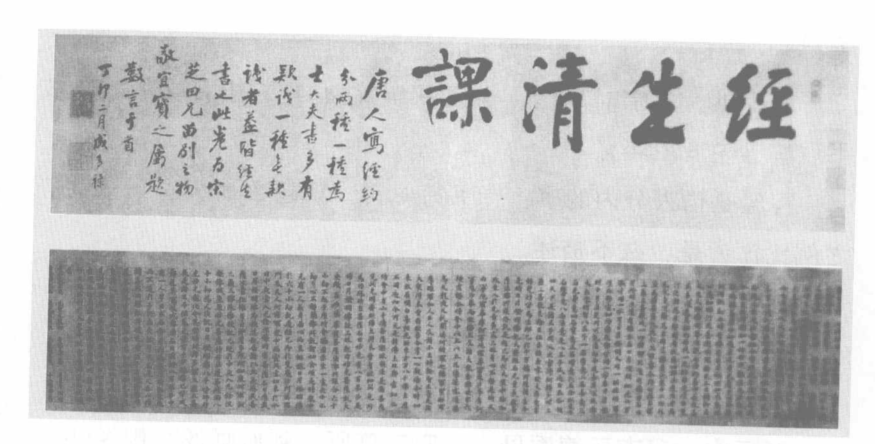


图80
经生写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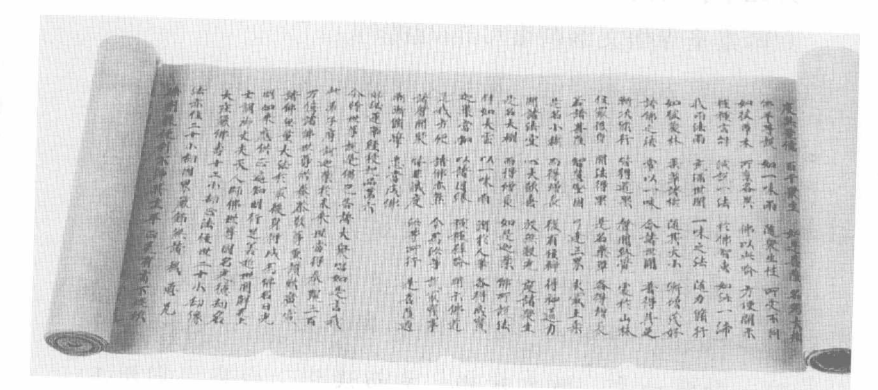


图81
唐代写经

录》等书，举例如下：

姚待，梓州人，为母写《金刚经》一百部；

任义方，乐安人，任括州刺史，以其俸禄抄写《金刚经》千余部。

阳文瓘，北平人，二十三年如一日写《一切经》，据记载：

> 武陵公北平阳文瓘，通儒硕学，海内具瞻，并岁时致问，亲诣其所。先是父于墓左别建精舍，笔精墨妙，广事招延，写《一切经》，厥功垂毕，法师聿遵前志，草创后图，经之营之，复二十有三年矣，遂于寺院设经藏以贮焉。[1]

钟绍宗，虔州赣人，书法家，曾写《轻论圣王经》、《维摩

【1】《全唐文》卷236《宁义寺经藏碑》。

诘经》等。

楚金，唐武后至肃宗间人，曾写《法华经》千余部。

王知敬，武后时为麟台少监，书法家，曾写《金刚经》。

张旭，字伯高，苏州吴人，书法家，曾写《心经》等。

彤唐，钱塘人，书法家，师从张旭而传于怀素，写《尊胜经》等。

元载，唐代大臣，凤翔岐山人，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

韩择木，韩愈叔父，唐代大臣，书法家，写《心经》等。

赵偃，代宗时人，曾写《般若心经》等。

高坚，代宗时人，大历十三年（778年）曾写《梵网经心地戒品》等。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人，书法家，曾写《金刚般若经》、《清净经》、《心经》等。

郭谓，德宗时人，贞元五年（789年）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窦巩，京兆金城人，元和二年（807年）写《心经》等。

盖巨源，文宗时人，曾写《六译金刚经》。

徐璋，宣宗时人，大中五年（851年）写《般若心经》。

凌渭，宣宗时人，大中十一年（857年）写《尊胜陀罗尼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

曹訢，懿宗时人，咸通十年（869年）在浙江鄞县写《尊胜陀罗尼经》。

冯卯，懿宗时人，咸通十年（869年）在浙江归安写《尊胜陀罗尼经》。

王铜，懿宗时人，咸通十三年（871年）写《尊胜陀罗尼经》。

王修已，懿宗时人，咸通十五年（874年）写《尊胜陀罗尼经》。

郑昌嗣，僖宗时人，乾符二年（875年）十月在河南荥阳书

《尊胜陀罗尼经》。

李瑞符，僖宗时人，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在江苏无锡写《尊胜陀罗尼经》。

李茂璋，僖宗时人，中和四年（884年）十一月在安徽亳州写《陀罗尼经》。

李宗，昭宗时人，天复三年（903年）在山西凤台写《金刚经》。

崔衡，唐书法家，曾写《尊胜陀罗尼经》。

崔元，唐书法家，曾写《尊胜陀罗尼经》。

崔谕，唐书法家，曾写《尊胜陀罗尼经》。

张钦元，唐书法家，曾写《金刚经》。

陈仁棱，唐书法家，曾于襄阳写《阿弥陀经》。

《敦煌遗书》中也有不少唐人写经的记载，兹如表24[1]：

【1】表中"出处"栏，"斯"代表《斯坦因劫经录》；"伯"代表《伯希和劫经录》；"日大"代表《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刘"代表"刘幼云所藏敦煌卷子目录"；"金"代表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敦煌碎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表24　唐代私人抄经例表

抄写人	身　份	抄写内容	抄写时间	出　处
吴勿儿		妙法莲华经	贞观九年(635年)	日大0780
翟　迁		妙法莲华经	显庆四年(659年)	金p92
彭　楷	经生	妙法莲华经	龙朔三年(663年)	斯0409
崔安居		妙法莲华经	咸亨元年(670年)	斯3655
郭　德	经生	妙法莲华经	咸亨二年(671年)	斯3076
程君度	书手	妙法莲华经	咸亨二年(671年)	斯5319
王思谦	经生	妙法莲华经	咸亨三年(672年)	伯4556
王　谦	经生	妙法莲华经	咸亨三年(672年)	伯2644
蔡义哲	书手	金刚般若经	咸亨四年(673年)	日大0708
吾巨言		金刚经	咸亨四年(673年)	刘0659
王智菀		妙法莲华经	仪凤元年(676年)	金p56
欧阳立悊		金刚经	仪凤元年(676年)	金p97
张昌文		妙法莲华经	仪凤二年(677年)	金p77
刘意思	书手	妙法莲华经	仪凤二年(677年)	斯3094
阴仁协		金刚经	调露元年(679年)	刘0655

续表

抄写人	身 份	抄写内容	抄写时间	出 处
邓弘礼		观世音三昧经	永淳间(682—683年)	刘0662
索仁杰		观音经	文明元年(684年)	斯2863
张元礼		妙法莲华经	长寿二年(693年)	金p77
薛崇徽		妙法莲华经	证圣元年(695年)	金p97
薛国徽		大般涅槃经	景龙三年(709年)	斯2136
李奉裕		佛说阿弥陀经	景龙三年(709年)	斯2424
张万及		赞阿弥陀佛并论	景云二年(711年)	斯2723
索洪范		金刚经	开元二年(714年)	金p75
氾感儿		四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开元五年(717年)	金p61
令狐若弼		佛说大公经	开元五年(717年)	刘0653
马奉禄		妙法莲华经	开元九年(721年)	金p73
张 廉		诸经杂论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	日大0878
王崇艺		千手千眼陀罗尼经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伯2291
张 彻		妙法莲华经	上元三年(762年)	斯0114
杨文泰	书手	妙法莲华经	上元三年(762年)	斯2181
马元礼	书手	妙法莲华经	上元三年(762年)	斯4168
尹 岩		妙法莲华经	宝应元年(762年)	金p55
索 奇		维摩诘经	天复二年(902年)	金p76

佛经信徒把念佛、诵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写经也是造“功德”的手段之一。据说，只要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就可以给自己或亲朋带来无限幸福，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多种要求。民间写经，目的各异：或因病写经，希望通过写经恢复健康；或因战写经，希望通过写经，化干戈为玉帛，参战的亲人早日安全返回；或因亲人去世而写经，希望通过写经，使亲人在“地狱”中免受折磨，并换取来世幸福；或为普济众生而写经，希望通过写经，换取众生幸福。要达到上述目的，写经必须虔诚，不得随意为之。如果抄写时，“心不至殷，既不护净，又多舛错，共同止宿，或处在门簷，风雨虫寓，都无惊惧，致使经无

灵验之功，诵无救苦之益，实由造作不殷，亦由我人逾慢也”[1]。《敦煌遗书》中有一种《梵网经佛说菩萨心地戒》，用了19种版本进行校勘，除了请名僧大德进行校勘外，“或至道俗贤能，或隐居山谷，或混遁人间，处处请求勘校，向余四载，与始毕功”[2]。在众多佛经抄本中，《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无量寿经》和《陀罗尼经》抄本最多。《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它用莲花比喻佛法的清静微妙，宣扬众生都能得到和佛一样的智慧，很容易被人接受，《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云：

> 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目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

抄写《法华经》就可见“释迦牟尼佛”。对于善男信女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莫大的幸福。《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该经用“总”、“别”、“同”、“异”、“成”、“坏”等所谓“六相”，来说明世界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

> 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既然有“无量无边”的幸福，善男信女何乐而不为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该经用金刚比喻智慧有能去烦恼的功用，该经卷中云：

> （写经等）有五种胜功德：一如来忆念亲近；二摄福德；三赞叹法及修行；四天等供养；五灭罪。

[1]《法苑珠林》卷17《敬法篇·谤罪部》。

[2]《敦煌遗书·斯0102》题记。

好处如此之多，自然抄本众多。《无量寿经》即《阿弥陀经》，该经描写阿弥陀佛所在的极乐净土的景象，劝人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字。只要这样，死后即可往生极乐净土。此经所言法门简便，对佛教信徒的吸引力尤其大。据说有些信徒一天竟念十万声“阿弥陀佛”，声嘶力竭，连话都讲不出来了。《陀罗尼经》是消灾、祛病、长寿之经，抄写者自然众多。

第十一章　唐代图书流通

随着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唐代图书流布四海，不胫而走天下，《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中关于图书"传于代""传于时"之类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刘洎有集十卷"行于时"[1]；萧钧有集三十卷"行于代"[2]；唐临《冥报记》二卷"大行于世"[3]；杜佑《通典》"大传于时"[4]；陈子昂有集十卷"盛行于代"[5]；李邕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6]；郑处诲《明皇杂录》"为時盛传"[7]；颜师古《汉书注》和《急就章注》"大显于时"[8]；裴行俭文集二百卷"宝传人间"[9]，等等。下面就讨论唐代图书的流通情况。

【1】《旧唐书》卷74《刘洎传》。

【2】《旧唐书》卷61《萧钧传》。

【3】《旧唐书》卷85《唐临传》。

【4】《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5】《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

【6】《旧唐书》卷190中《李邕传》。

【7】《新唐书》卷165《郑处诲传》。

【8】《新唐书》卷198《颜师古传》。

【9】《全唐文》卷228《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10】本节参考了李德辉著《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一节　唐代交通与图书流通

图书流通离不开道路交通，远距离的图书流通尤其与道路交通密切相关[10]。

唐代交通，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就陆路交通而言，以长安为中心，正西至岐州，西北至凉州，正北至丰、胜、中受降城，东北至太原，正东至汴州，东南至襄阳，正南至金州，西南至梁州兴元府，八方驿道呈"米"字形交会长安。然后又以岐州、凉州、太原、洛阳、

汴州、襄阳、扬州等为中心，形成二级辐射，大大小小的道路像血管一样密布全国，延伸到塞北江南，无远不至。就水路交通而言，从沿海到内地有黄河、长江、淮河、珠江等大河贯通东西，每条大河又有不少支流，干流和支流纵横交错，加上南北大运河，形成覆盖全国的水运网络。

唐代交通虽然便利，但是远距离图书流通实现，还要依靠三种途径：一靠唐代的驿递制度；二靠文人的行旅生涯；三靠商人搬运。唐代每隔30里设一驿站，唐玄宗时天下有驿1 639所[1]，其中陆驿1 297所，水驿260所，水陆兼办驿82所，驿道总长已逾65 000公里。

【1】《新唐书》卷46《百官志》。

驿的主要功能是传递诏书、敕文、章奏等各类文书。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诏赐的图书。在传递时间上有明确规定：

>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2]

【2】[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户部度支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

遇到紧急情况，驿马一天可跑数百里。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山在今陕西陇县，从咸阳到陇县有三百多里，速度之快，可想而知。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数千里之外的范阳起兵叛唐，通过高速驿传，正在华清宫的唐玄宗很快就得到了消息，马上作了军事布置。唐代驿传有因便使、差官、邮驿三种。"因便使"是交由入京使顺便带上文书；"差官"是派遣专使投递；"邮驿"是由驿卒、递夫传递。唐代不少图书是通过邮驿传递的，例如长庆中，元稹在浙东，白居易在杭州，二人常常通过邮驿传递诗作，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云："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又《秋寄微之十二韵》："忙多对

酒榼，兴少阅诗筒。”自注云：“比在杭州、两浙，唱和诗赠答于筒中递来往。”诗筒是传递所用的具体工具，以竹制筒状而得名，“诗筒始于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诗，入筒中递之”[1]。竹筒之外，还有用纸袋传递的，如王贞白《寄郑谷》诗：“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2] 长庆四年（824年），刘禹锡官和州，李德裕官润州。太和四年至六年（830—832年），刘转官苏州，李移官西川。二人始终邮诗相和，正如刘禹锡所说：“长庆四年，余为历阳守。今丞相赵郡李公时镇南徐州。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尔后出处乖远，亦如邻封。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3]

【1】[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9。

【2】《全唐诗》卷701。

【3】《刘宾客外集》卷9《吴蜀集引》。

行旅生活是唐代文人生活经历的重要内容之一。入仕前，他们为了金榜题名，而四出奔走；入仕后，浮沉宦海，或至通都大邑，或到穷乡僻壤，常常在驿道上消磨时光。唐人诗文集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例如：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等；杜甫《宿白沙驿》、《舟对驿近寺》等；孟浩然《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驿》、《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等；孙樵《书褒城驿屋壁》等；张祜《题平望驿》、《题松汀驿》等；李涉《题五松驿》等；司空曙《题江陵临沙驿楼》等；薛能《题嘉陵驿》等；杨巨源《题范阳金台驿》等；赵嘏《题横水驿双峰院松》等；曹邺《题舒乡驿》等；郑谷《题樟亭驿楼》等；孟迟《题嘉祥驿》等；李日新《题仙娥驿》等；薛逢《题白马驿》等；韩愈《题层峰驿梁》、《食曲河驿》、《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记宜城驿》等；柳宗元《长沙驿前南楼感旧》、《馆驿使壁记》、《青水驿丛竹天水赵云余手种二十一茎》、《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等；元稹《骆口驿》、《嘉陵驿》、《西县驿》、《望喜驿》、《三泉驿》、《题蓝桥驿》等；白居易《骆口驿旧题诗》、《蓝桥驿见元九诗》、《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宿阳城驿对月》、《临都驿答梦得》、《临都驿送崔十八》、《望亭驿酬别周判官》等。因为当时交通工具落后，出行速度极慢，白居易诗称“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4]。从长

【4】《全唐诗》卷448《从陕至东京》。

安到洛阳的八百里路现在坐火车需要几个小时，而在唐代就需要十三天。旅途虽然辛苦，但也有不少乐趣，不少人在旅途中触景生情，进行文学创作，《全唐诗》中就有不少行旅诗，有的通过旅游开展行卷活动，客观上也起到了图书流通的作用。有些已仕文人，也常常趁着出差之便，将自己的著作带给外地的朋友。

当然，由于道路通畅，也有不少书商通过长途贩运，实现图书流通。

第二节　唐代图书流通

随着唐代出版的繁荣，交通的便利，图书流通无远不至。颁赐图书之例时或有之。皇帝颁赐图书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这是中央审定的国家标准本，各地如有抄写，以此为据；二是表明皇帝对臣民的恩宠。除了颁赐流通之外，还有献书流通、借阅流通、市场流通等。

一、颁赐流通

在封建社会，帝王动辄赐书臣民。颁赐流通是一种常见的流通方式。除了第九章第三节诸例外，尚有：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赐给李大亮一部荀悦撰《汉纪》[1]。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颁新定《五经》”[2]。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甲寅，房玄龄进《五礼》，“诏所司行用之”[3]。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诏颁行之[4]。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以萧瑀好佛，赐其“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5]。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赐新罗使所制《晋书》[6]。

【1】《旧唐书》卷66《李大亮传》。

【2】《旧唐书》卷3《太宗下》。

【3】《旧唐书》卷3《太宗下》。

【4】《旧唐书》卷79《吕才传》。

【5】《旧唐书》卷63《萧瑀传》。

【6】《旧唐书》卷199上《新罗》。

魏征编《类礼》二十卷成，唐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1]。

【1】《旧唐书》卷71《魏征传》。

贞观间，唐太宗曾颁行《遗教经》，《佛遗教经施行敕》云："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需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2]

【2】《全唐文》卷9。

永徽四年（653年）三月壬子，唐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3]。

【3】《旧唐书》卷4《高宗上》。

显庆三年（658年）正月戊子，长孙无忌等修《新礼》成，"诏颁行于天下"[4]。

【4】《旧唐书》卷4《高宗上》。

武后垂拱元年（685年）三月，"颁下亲撰《垂拱格》于天下"[5]。

【5】《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

武后载初元年（689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6]。

【6】《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

武后尝"撰《少阳政范》及《孝子传》以赐"章怀太子李贤，仍数作书以责贤[7]。

【7】《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

神龙初，韦巨源、李怀远、祝钦明等"定《垂拱格》及《格后敕》，前后计二十卷，颁下施行"[8]。

【8】《旧唐书》卷92《韦安石传》。

开元十一年（723年）十一月己巳，"颁上撰《广济方》于天下"[9]。

【9】《旧唐书》卷9《玄宗下》。

开元十六年（728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古迹，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搨进。寻且依文搨两本进内，分赐诸王[10]。

【10】《全唐文》卷302《叙书录》。

开元十六年（728年）八月己巳，"诏有司颁行"张说进《开元大衍历》[11]。

【11】《旧唐书》卷8《玄宗上》。

开元十九年（731年）腊月戊戌，裴光庭上《瑶山往则》、《维城前轨》各一卷，"上令赐太子、诸王各一本"[12]。

【12】《旧唐书》卷8《玄宗上》。

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上《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13]。

【13】《旧唐书》卷8《玄宗上》。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庚子，“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1]。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九月壬申，“颁新定《令》、《式》、《格》及《事类》一百三十卷于天下”[2]。

开元间，唐玄宗《颁示道德经注孝经疏诏》云：“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3]

开元间，唐玄宗《答李林甫等请颁示太子仁孝诗诏》云：“今请具写六章，颁示中外，兼编诸简策，以传不朽。”[4]

开元间，颁行《洞灵真经》、《南华真经》、《通玄真经》等，佚名撰《请颁赐洞灵等三经奏》云：“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有司，各写十本，较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玄学生，亦望各付一本。”[5]

天宝三载（744年）腊月，诏令“家藏《孝经》一本”[6]。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甲午，“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7]。

贞元十二年（796年）正月乙丑，“上制《贞元广利药方》五百八十六首，颁降天下”[8]。

贞元间，苏州吴人于公异，不孝敬老人，陆贽当政，“乃奏其状，诏赐《孝经》，罢归田里”[9]。

太和二年（828年）二月庚戌，武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10]。

柳宗元也有不少赐书，他在给京兆尹许孟容的信中写道：“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久易主，书存亡不可知。”[11] 赐书多至3 000卷，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1】《旧唐书》卷8《玄宗上》。

【2】《旧唐书》卷9《玄宗下》。

【3】《全唐文》卷32。

【4】《全唐文》卷32。

【5】《全唐文》卷964。

【6】《旧唐书》卷9《玄宗下》。

【7】《旧唐书》卷9《玄宗下》。

【8】《旧唐书》卷13《德宗下》。

【9】《新唐书》卷203《于公异传》。

【10】《旧唐书》卷17上《文宗上》。

【11】白居易等：《白孔六帖》卷88。

二、献书流通

献书流通是自下而上实现图书时空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具体来说，可分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臣民献书，即臣民献书皇上，诏藏秘府。据《唐会要》卷36《修撰》记载：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三日，魏王泰上《括地志》五十卷，“其书宣付秘阁”。

贞观十五年（641年）十月二十五日，高士廉等上《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诏藏之秘府”。

永徽三年（652年）三月三日，颜扬庭上其父颜师古撰《匡谬正俗》八卷，“令付秘阁”。

显庆六年（661年）正月二十七日，李善上《文选注》六十卷，“藏于必府”。

龙朔三年（663年）十月二日，窦德玄上《瑶山玉彩》五百卷，“诏藏书府”。

仪凤元年（676年）腊月二日，皇太子贤上《后汉书注》，“诏付秘书省”。

大历十二年（77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颜真卿上《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诏付集贤院”。

“诏藏”国家有关部门，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犹今之绘画名作被国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一样。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

许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贞观时任弘文馆学士等职，精于《诗经》、《仪礼》，“献《诗纂义》十篇，太子写付司经”[1]。

刘允济，河南巩人。历仕下邽尉、著作佐郎等职，“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献之，迁左史，兼直弘文馆”[2]。

杜佑（生平详第七章第三节），开元时以三十年之功撰成《通典》二百卷献之[3]。

宝历二年（826年）五月辛未，秘书省著作郎韦公肃“注太宗所撰《帝范》十二篇进，特赐锦彩百匹”[4]。

开成二年（837年）二月戊申，王彦威“进所撰《唐典》七十卷，起武德，终永贞”[5]。

太和中，李靖孙彦芳任凤翔府司录参军，“诣阙进高祖、太宗所赐卫国公（李）靖官告、敕书、手诏等十余卷，内四卷太宗

[1]《新唐书》卷198《许叔牙传》。

[2]《新唐书》卷202《刘允济传》。

[3]《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4]《旧唐书》卷17上《敬宗纪》。

[5]《旧唐书》卷157《王彦威传》。

文皇帝笔迹，文宗宝惜，不能释手”[1]。

长安二年（702年）秋，右庶子平贞慎献《孝经议》、《养德传》以讽，（节愍太子）重俊皆优纳焉[2]。

开元六年（718年），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褚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以献”[3]。

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将封岱岳，房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4]。

开元初，宋璟“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5]。

开元初，右拾遗刘贶“依刘向《说苑》撰《续说苑》一十卷以献，玄宗嘉之”[6]。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地理学家，“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之[7]。

于休烈，河南人，历仕起居郎、集贤殿学士、工部侍郎等职，“献《五代帝王论》”，肃宗甚嘉之[8]。

杜牧（生平详第六章第二节），其《献诗启》云：“某苦心为诗，惟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纸，多自焚之。今谨录一百五十篇，编为一轴，封留献上。”[9]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撰《书纠谬》、《春秋振滞》等书凡数十百篇，“长安时上之，丐官笔楮写藏秘书”，武后下诏表扬，以为儒宗[10]。

另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

> 常举外，复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开元中有唐频上《启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范外传》上卷；李镇上《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辛之谔上《叙训》两卷；卞长福上《续文选》三十卷；冯中庸上《政事录》十卷；裴杰上《史护异议》；高峤上《注后汉书》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

【1】《旧唐书》卷67《李彦芳传》。

【2】《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

【3】《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

【4】《旧唐书》卷111《房琯传》。

【5】《旧唐书》卷119《宋璟传》。

【6】《旧唐书》卷136《刘贶传》。

【7】《旧唐书》卷138《贾耽传》。

【8】《旧唐书》卷149《于休烈传》。

【9】《全唐文》卷752。

【10】《新唐书》卷199《王元感传》。

霑赏赉，亦一时之美。

可见唐代献书例是很多的。一般地说，献书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步由献书人提出申请；第二步交由专家审定，决定收否；第三步是将专家认可的著作入藏秘阁。专家没有认可的著作，不得入藏秘阁。例如上述王元感献书后，“有诏两馆学士，成均博士议可否”，结果有关专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祝钦明、李宪等为代表，认为王元感诋毁先儒，提出不少问题；另一种意见以魏知古、徐坚、刘知几等为代表，认为王元感的著作见闻广博，不愧为“五经指南”，最后武后同意第二种意见，将王书入藏秘阁[1]。太宗时，校书郎王玄度献上自己注解的《尚书》和《毛诗》，太宗“诏礼部集诸儒详议，玄度口辨，诸博士皆不能诘之”，郎中许敬宗、河间王李孝恭都赞成将其书与孔、郑并行，入藏秘阁，然而度支郎中崔仁师认为王玄度的著作“穿凿不经，乃条其不合大义，驳奏请罢之”，最后太宗听从了崔仁师的意见，没有收藏王玄度的著作[2]。

【1】《新唐书》卷199《王元感传》。

【2】《旧唐书》卷74《崔仁师传》。

第二，行卷献书也是唐代常见的一种献书方式。考生通过行卷，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面呈显官名流，请他们在科举考试时为自己说上几句好话。考生能否金榜题名，不仅需要考试成绩优秀，而且需要名贤推荐。行卷之风因此而盛行。著名诗人李白称韩朝宗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因此海内豪俊之士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3]。五代王定保说：“太平王崇、窦宪二家，率以科目为资、是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走’。”[4] 可见王崇、窦宪二人对于“升沉后进”的重要作用。清王士禛也说：“盖唐中叶以后，江湖布衣，挟行卷干缙绅，延接稍迟，赠遗稍薄，则谤讟随之，浸以成习，观诸书可见。”[5] 唐代不少名人名作，正是因为行卷大显于时，宋赵彦卫云：

【3】《李太白全集·与韩荆州书》，中华书局，1977年。

【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7。

【5】[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6《谈艺六》，中华书局，1982年。

唐之举人，多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

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删为《唐百家诗》。[1]

【1】[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中华书局，1996年。

可见唐代诗集多以行卷"行于世"，宋王安石汇而削之，以成《唐百家诗》。兹列举唐代行卷之例如下：

诗僧皎然先以古诗十数篇投献韦应物，皆不称赏，后来"写其旧制献之，韦吟讽，大加叹赏"[2]。

【2】《唐语林》卷3。

韩愈先后四次参加进士考试，先后以行卷投献贾耽、浑瑊诸人，屡试不第，后因"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3]。

【3】《旧唐书》卷160《韩愈传》。

朱庆余应试前，以行卷投献张籍，张籍"遍索庆余新制篇什十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4]。

【4】[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中华书局，1958年。

李贺以歌诗投献韩愈，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愈读后，极为称赞。后因"进士"二字犯其家讳，终于没有摘取进士桂冠[5]。

【5】《唐语林》卷3。

白居易以诗投献顾况，顾况非常欣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句，"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6]。

【6】《唐语林》卷3。

牛僧孺以诗轴投献韩愈和皇甫湜，受到二人的称赞。二人趁他外出，前往访问，在其门上大书"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第二天，观者甚多，"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7]。

【7】《唐摭言》卷6《公荐》。

行卷献书还有不少例子，兹如表25[8]：

【8】此表"出处"栏为[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的卷数和页码。

表25　唐代行卷献书例表

行卷者	行卷对象	行卷内容	及第时间	出　处
牛锡庶	萧　昕	文　卷	德宗贞元三年（787年）	卷12，p510
包　谊	刘太真	文　卷	德宗贞元四年（788年）	卷12，p513
韩　愈	郑余庆	文　卷	德宗贞元八年（792年）	卷13，p543

续表

行卷者	行卷对象	行卷内容	及第时间	出处
白居易	李逢吉	性习相近远赋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	卷14，p614
牛僧孺	韦崖州	文卷	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	卷15，p661
章孝标	李绅	诗卷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	卷18，p761
卢储	李翱	文卷	宪宗元和15年（820年）	卷18，p767
朱庆余	张籍	诗文	敬宗宝历二年（826年）	卷20，p822
刘三复	李德裕	文卷	文宗太和中	卷27，p1218
李商隐	令狐楚	文卷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	卷21，p863
郑愚	崔铉	文卷	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卷21，p865
丁棱	李德裕	文卷	武宗会昌三年（843年）	卷22，p884
项斯	杨敬之	诗卷	武宗会昌四年（844年）	卷22，p891
皮日休	郑愚	《文薮》	懿宗咸通八年（867年）	卷23，p954
褚载	邢君才	文卷	昭宗乾宁五年（898年）	卷24，p1033

第三，施主献书是佛教信徒为了大造“功德”，通过向佛寺进献佛经实现佛经时空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这是佛寺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施主献书多少不等，少则一卷，多则数十百千卷，甚至有捐献整部《大藏经》者，本书第十章第三节已有多例，此不赘。

三、借阅流通

借阅流通是读者通过从藏书者手中借阅图书实现图书时空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这种流通方式的图书时空转移是周期性的：读者借阅图书期间，图书暂时从藏书者转移到读者手中；过了一

段时间，读者读完图书之后，图书又回到了藏书者手中。其流通过程就是借阅、归还、再借阅、再归还的无限循环过程。这种流通方式可以缓解读者“买书难”的矛盾，充分发挥图书的利用率。如今书店实行开架售书，专门提供可供读者在店内读书的桌椅，读者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店内读书，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借阅流通，只不过借阅时间较短罢了。唐代借书活动可分官借、民借两类。所谓“官借”就是唐代政府向臣民借书，抄写复本，补充官藏。例如开元七年（719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1]，图书从“公卿士庶”手中转移到秘书省，秘书省抄完之后，又物归原主。所谓“民借”就是士民向官府或藏书家借书。例如：

李敬玄，亳州谯人。贞观末，高宗在东宫，马周启荐之，召入崇贤馆，兼预侍读，“借御书读之”[2]。

段成式（？—863），字柯古，临淄人，唐末文学家。历仕尚书郎、太常少卿等职。初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秘阁书籍，披阅皆遍”[3]，可见他是利用工作之便借书阅读的。

李邕（678—747），字泰如，扬州江都人，唐朝书法家。历任左拾遗、郡守等职，因其曾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据《新唐书·李邕传》：

> 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

可见李邕也是借阅秘阁图书而成才的。

吕向，字子回，立志苦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4]。

王绩（585—644），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学家。历仕隋、唐二朝。因撰隋史，曾借阅陈叔达藏书，其《与陈叔达重借隋纪

【1】《旧唐书·经籍志·叙》。

【2】《旧唐书》卷81《李敬玄传》。

【3】《旧唐书》卷167《段成式传》。

【4】《新唐书》卷202《吕向传》。

书》云：

久承所借《隋纪》，缮写咸毕，前舍弟及家人往，并有书借，咸不见付。岂连城之珍，俟楚文而乃进；崩山之操，待钟期而后发！……足下裁成国典，褒贬人伦，欲使明镜一时，覆车千祀，故当贻诸好事，岂拟唯传子孙。方复固其缄縢，严其扃鐍，天下之望，岂如是乎！仆亡兄芮城，尝典著局，大业之末，欲撰隋书，俄逢丧乱，未及终毕。仆窃不自揆，思卒余功，收撮漂零，尚存数帙。兆自开皇之始，乞于大业之初，咸亡兄点窜之遗迹也。大业之后，言事阙然。仆虽欲继成，无可凭采。以此尤思见足下之所作也。还使请致，无再三，王绩白。[1]

【1】《全唐文》卷131。

陈叔达马上回信，其《答王绩书》云：

贤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频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纪》……了不知贤兄芮城有隋书之作，足下既图继就，须有考寻，谨依高旨缮录驰送……又恐足下纪传之作，须备异闻，今更附王胄《大业起居注》往。[2]

【2】《全唐文》卷133。

可见王绩向陈叔达借书，并非有求必应。借书之难，于此可见。

刘知几（生平详第六章第一节）在回忆早年读书经历时说："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他在出游京洛期间，也到处借书阅读，他说："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3]从"恣情披阅"四字可知，刘知几借书的数量当是很多的。

【3】《史通》卷10《自叙》。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历仕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职，"藏书甚多，子弟直日看书，有借书者先束脩投贽，然后写

之"[1]。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偿"借阅图书之例，但与封闭型藏书家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可以想见，到倪若水家借书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徐修炬，著名藏书家，历仕恩王府参军等职，著名诗人，皮日休在《二游诗·序》中说："(矩) 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余假其书数千卷。未一年，悉偿夙志，酣饫经史，或日晏忘饮食。"可见徐修炬也是开放型藏书家，其书在社会广泛流通。

皮日休（约833—?），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唐末文学家。咸通进士，历仕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他"借人书有编简断坏者辑之，文字谬误者刊之"[2]。

【1】[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24。

【2】[唐]皮日休:《笠泽丛书》卷1。

四、市场流通

市场流通是通过买卖交易实现图书时空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这种方式是所有流通方式中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流通方式。图书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作为有价商品，图书的时空转移不是无偿的。上文论及的颁赐流通、献书流通等，表面上是无偿的，颁赐者、献书者和受书人之间似乎没有金钱交易，其实也是有偿的，颁赐者（即帝王等）、献书者在背后已经付出了代价，书价由颁赐者、献书者代替受书人预先垫付。市场流通是历代收藏者（含官藏和私藏）获取图书的一种主要手段。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唐代官方的购书情况。根据文献记载，唐代官方多次进行大规模购书活动，有明确记载者至少有如下四次：

第一次是在唐高祖武德间。鉴于隋末战乱图书亡佚的严重局面，令狐德棻首先提出了购置图书的建议，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 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

这就是说，令狐德棻的建议包括两项内容：一是不惜重金购置遗书；二是增置书手，抄写图书。唐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没过几年，“群书略备”。

第二次是在唐太宗贞观间。据《新唐书·艺文志·总叙》：

> 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可知这次征书活动仍分两步进行：首先购置图书，然后抄写副本。又据韦述《叙书录》:“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1] 可知贞观中，唐太宗还购置了不少名人法书。

【1】《全唐文》卷302《叙书录》。

第三次是在安史之乱后。据《旧唐书·经籍上》：

> 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

既是“屡诏购募”，说明曾不只一次地诏令购求图书。元载为相时，“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2]。可见当时还专门制定了书价，委派特使到书业发达的江淮地区和全国府县搜访购置。史官于休烈也曾上书要求购置史书，据《旧唐书·于休烈传》：

【2】《新唐书》卷57《艺文一》。

> 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

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

肃宗从之，然这次征书效果不佳，“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1]。

【1】《旧唐书》卷149《于休烈传》。

第四次是在唐末广明之乱后，据《旧唐书·经籍上》：“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这次购书数量多达二万多卷，可见用费之多。唐末昭帝天祐间，罗衮《请置官买书疏》云：

> 兹历代所以盛藏书之府，不可一日而阙也。臣伏念秘阁四部、三馆图书，乱离已来，散失都尽，一为坠阙。二十余年，陛下追纵往圣，劳神故实，岁下明诏，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访，或购以官爵，亦已久矣。然而一编一简，未闻奏御，加以时玩武事，不急文化。若非别降圣谟，无因可致。臣今伏请陛下出内库财，于都下置官买书，不限经史之集、列圣实录、古今传记、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则价有差等。至于零落杂小，每卷不过百钱，率不费千缗，可获万卷。倘或稍优其值，则远近趋利之人，必当舍难得之货，载天下之书，聚于京师矣。不惟充足书林，以备宣索。今三朝实录未修，无所依约，便期因此遂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务也。[2]

【2】《全唐文》卷828。

这里罗衮鉴于往日“岁下明诏”、效果不佳的教训，提出三条新的建议：一是“出内库财”，即动用公库经费，“稍优其值”，高价收购；二是“于都下置官”，在都城设置购书之官，专掌其事；三是购书内容放宽，“不限经史之集”。

唐代私人购书之例多如牛毛，甚至可以说，文人学者无不参与书市贸易活动。兹据《全唐诗》举例如下：

尽捻书籍卖，来向尔东家。

——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卷224）

时复打门无别事，铺头来索买残书。

——王建《题崔秀才里居》（卷301）

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

——李中《书王秀才壁》（卷747）

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杜兼《题书卷后语》（卷873）

黄金都散尽，收得邺侯书。

——牟融《题朱庆余闲居》（卷467）

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

——杜荀鹤《书斋即事》（卷692）

军人游书肆，商人占酒楼。

——刘禹锡《酬令狐相公早秋见寄》（卷358）

得钱只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

——张籍《送杨少尹赴凤翔》（卷385）

买书添架上，断酒过花时。

——李廓《上令狐等舍人》（卷479）

分题得客少，著价买书高。

——周贺《寄姚合郎中》（卷503）

初为断酒客，旧识卖书家。

——项斯《宁州春思》（卷554）

结社僧因秋朔吊，买书船匠葬时归。

——徐夤《经故广平员外旧宅》（卷708）

托客买书重得卷，爱山移宅近为邻。

——徐夤《寓题》（卷709）

拙赋遍闻镌印卖，恶诗亲见书画呈。

——徐夤《自咏十韵》（卷711）

可见诗人杜甫、王建、李中、杜兼、牟融、杜荀鹤、刘禹锡、张籍、李廓、周贺、项斯、徐夤等都曾参与过书市贸易活动。下面从书市图书内容、书价、售书方式、书业中心等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就内容而言，唐代书市经史子集无不具备。陇西王李博乂衣必罗绮，食必粱肉，朝夕弦歌，不学无术，高祖鄙之，曰：

> 我怨雠有善，犹擢以不次，况于亲戚而不委任？闻汝等唯昵近小人，好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习学。今赐绢二百匹，可各买经史习读，务为善事。[1]

[1]《旧唐书》卷60《李博乂传》。

可见书市多有经史著作。封建帝王以此作为治世、治人的法宝，用200匹绢买回书的数量，定然可观。史书之中，历书最多，据前引冯宿《禁版印时宪历奏》，唐代“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官修历书尚未颁下，“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当时书市历书之多。从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唐代书市也有不少诗文作品。书商为了牟利，往往以假乱真，兜售伪作，即元稹所谓“盗窃名姓，苟求自售”者（详本章第三节）。

就书价而言，千钱一卷比较多见。据《山堂肆考》卷一二四：

> 唐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

这是官方规定的统一价格。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女子抄书》：

> （吴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

《唐韵》是唐人孙愐所作，全书五卷，正好一卷一缗，一缗就是一千文钱。除了以钱购书外，还可以以物换书。据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五：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学，尝有鬻异书于市者，其母将为买之，搜索家财，不足其价，惟榼中有金钗数枚，既而叹曰："何爱此物，令吾子不有异闻！"促令货易此书，昭后以诗咏流誉。

这是以金钗购书的例子。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关于"或持之以交酒茗者"的记载说明，唐代绍兴也有用酒和茶叶换书的。此外，还有以官爵换书的例子，据《旧唐书·王涯传》：

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

可见王涯是以"厚货"和"官爵"两种方法换取法书名画的。

就售书方式而言，既有行商、又有坐贾，即既有流动售书的商人，又有以固定店铺售书的商人。据前引唐玄宗《禁坊市铸佛写经诏》，所谓"开铺写经"者，就是指在固定地点开设店铺，抄写、出卖佛经的人。一些书铺采取开架的方式，允许读者任意挑选。那些无钱买书的读者，也可以就室阅览。据《旧唐书·徐文远传》：

属江陵陷，（文远）被虏于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其兄休鬻书为事，文远日阅书于肆，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

又据《新唐书·吕向传》：

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

可见徐文远、吕向像汉代王充一样都是在书店读书成才的。除了固定书商之外，也有不少流动书商。

第三节 唐代书业中心

唐代书业中心在长安、洛阳、成都、敦煌、扬州、绍兴等地。这些地方既是图书出版中心，又是图书贸易中心。书业中心汇聚了众多书商，这些书商为图书流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长安

长安是唐代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官方重要出版单位秘书监、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崇文馆、司经局等都集中在这里（图82）。

唐代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周长70余里。城区由十四条东西大街和十一条南北大街纵横交错，分为若干方块，这些方块被称为“坊”，相当于今之居民小区。坊内开设了不少店铺、茶馆和酒店。在兴道、务本、长兴、靖安、亲仁、永乐、宣平、布政、崇贤、延寿等坊内，还开设了不少旅馆，迎接八方来客。长安城的东西两面各有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分别叫做“东市”和“西市”。市内同卖一种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起，称为“行”，同“行”店铺多者可达数十家。东市有相当于两“坊”大的面积，有220个行业、数千个店铺，各类商品，应有尽有。西市有服装行、绢行、秤行、药行、蜡烛行等。除了行店之外，还有邸店。行店是商人直接经营买卖活动的场所，邸店是寄卖活动的场所，即商人把货物交给邸店，让邸店代为出售。中亚、波斯、大食的商人大多采用这种方法。除了东、西二市之外，崇仁坊的乐器铺、延寿坊的玉器店、常乐坊的酒店、宣阳坊的丝绸店等也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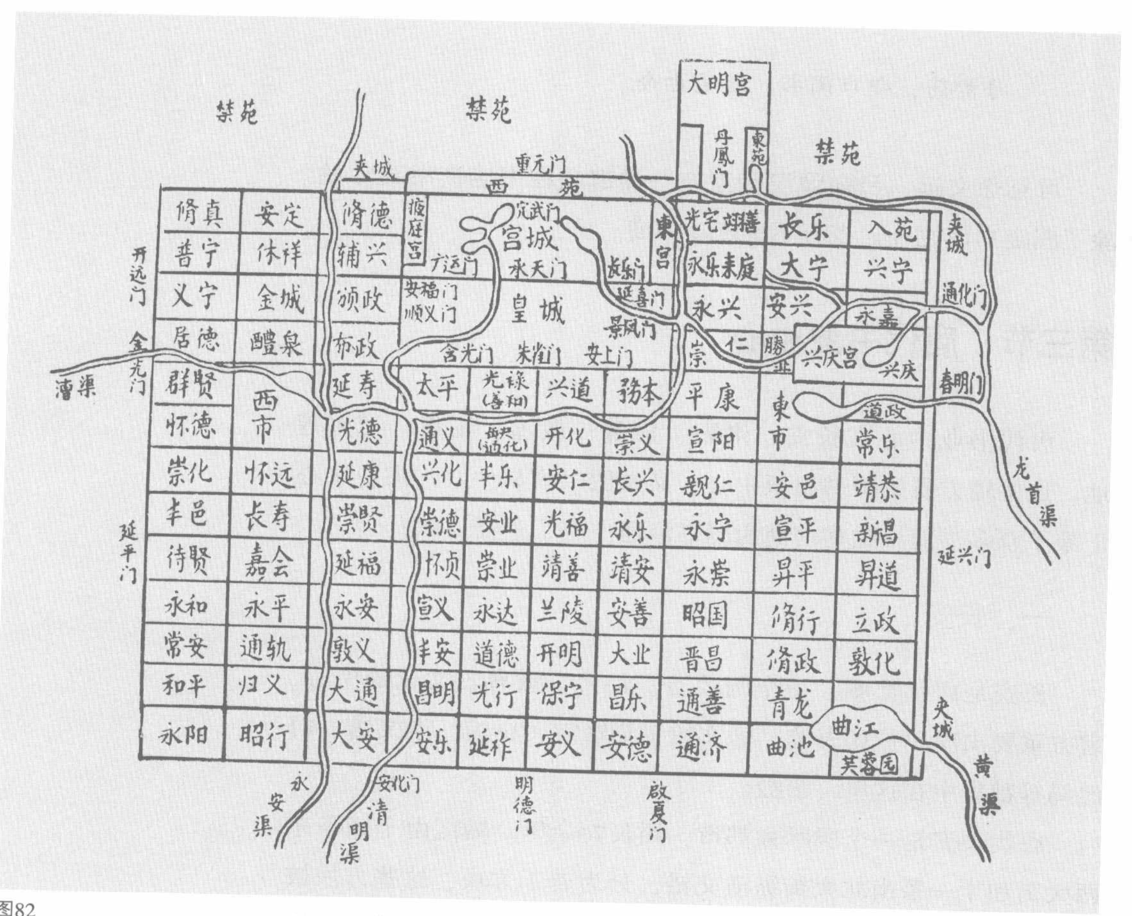


图82
唐长安城区图

名。由于贸易额的大量增加，铜钱作为当时的货币，携带极不方便，唐代中期便出现了"飞钱"。"飞钱"跟后来的汇票相似，就是商人把钱存放在高级军官设在长安的办事处或其他官僚富豪家里，让他们开个收据，商人凭此收据到异地如数取钱。"飞钱"的产生说明唐代后期的商业更加发达。唐代长安的手工业也很发达，皇城内设置了专门管理各类手工业的机构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少府监是专门管理为宫廷制作器物的部门，下设五个分部：有的专管染织做衣，有的专管制作车辆、马鞍，有的专管制作御用珍玩，下属工匠多至一万九千余人。将作监是专门管理建筑的部门；军器监是专门管理制作兵器的部门。总之，各行各业的管理井井有条，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唐代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国际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唐太宗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多至3 260人。四方儒士不远千里，负笈长安，甚至高丽、百济、新罗等周边国家的国王也纷纷把子弟送到长安求学。唐高宗开成五年（840年），一次就有105名新罗留学生毕业回国。日本来华留学者更是难以数计。有一次派来的留学生和僧侣，加上水手、弓箭手、画师、医师、翻译、管理人员等，共计五六百人，乘坐四艘大船，浩浩荡荡，飘洋过海，来华学习，可见当时长安的文化也很发达。这里汇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陆德明、虞世南、欧阳询、李百药、颜师古、孔颖达、阎立本、于志宁、李淳风、褚遂良、张说、张九龄、刘知几、徐坚、吴兢、韦述、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佑、杜牧、颜真卿、王昌龄、王维、李白、杜甫、孙思邈、一行、韩愈、柳公权、元稹、白居易等都在长安生活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据张永禄撰《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可考唐代名人故址有600余处，其中书法家欧阳询曾住敦化坊；画家阎立本曾住延寿坊；文学家韩愈曾住靖安坊；柳宗元曾住亲仁坊；诗人白居易先后在新昌坊、宣平坊、昭国坊、常乐坊住过。长安文化不仅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吸收了印度、波斯、中亚各国文化的精华，中外文化的碰撞，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促进了长安书业的发展。如前所言，史馆、集贤院等单位的图书编撰活动，大规模的抄书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作为书业贸易中心，书肆所在皆是，据《太平广记·李娃传》，常州刺史、荥阳公子与名妓李娃相识，坐车出游，“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命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一次买书就用费“百金”，可见买书之多。《太平广记》卷二六一《李秀才》中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

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笺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子复闻于播，笑曰："此盖无能之辈耳，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实可哀也。"

这说明长安书商为了牟利，大量出售举业之文，才演出了这场冒名顶替的笑剧。由于书肆林立，唐代长安已经出现书林的经纪人——书侩，孙仲容、孙盈父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孙氏父子精于鉴别，名动京师。据唐李绰《尚书故实》："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书侩是专门从事书籍、书画买卖的中介人，协调买方、卖方之间的关系。书侩的产生，也意味着京师长安书业贸易的繁荣。

二、洛阳

唐代洛阳又叫东都、神都、东京等，据《新唐书·地理志二》：

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上元二年罢京，肃宗元年复为东都。

唐代皇帝常来洛阳居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唐中宗李显、唐玄宗李隆基、唐昭宗李晔、唐哀宗李柷等六位皇帝先后移都洛阳，历时四十余年。其中，武则天居洛时间最长，唐玄宗居洛也有十年之久。唐代洛阳由宫城、皇城、东城、园壁城、含嘉

城、外郭城等组成。其中宫城是皇帝起居之地；皇城是皇帝子孙和公主的府第，也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平民居住的地方。

唐代洛阳是全国经济中心之一。通过漕渠运送粮食的船只数以千计。含嘉仓是全国最大的粮仓。天宝八年（749年）的储粮总数是全国官仓的一半。其中1601号粮窖至今还保存着五六十万斤谷子。唐代洛阳的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城内有南市(大同市)、北市（通远市)、东市（平都市）三个规模较大的集贸市场，其中北市聚集了来自中外的富商大贾。商船常达一万多艘。旅店、酒店和各种商行应有尽有。洛阳是关东丝绸的集散地，官府专门设置织染署管理纺织练染业，下属的东都官锦坊，丝绸工人多至五六百人。

唐代洛阳也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在洛阳设立国子监，学生多达千余人，除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有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尚药局、崇玄馆、教坊等。其中崇玄馆相当于道家高等专科学校；尚药局相当于高等医学专科学校。教坊专门培养音乐、歌舞人才，相当于高等音乐艺术专科学校。唐代著名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都先后在洛阳生活过，他们或漫游山水，流连忘返；或对酒当歌，歌咏唱和；或卜居长住，安度晚年。李白曾先后七次定居洛阳。杜甫30岁在洛阳陆浑山庄结婚，直到43岁才迁居长安。洛阳也是李白、杜甫两位诗坛巨人初次相会的地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阳，死后葬于香山。唐代洛阳也是盛况空前的艺术大观园。各种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等犹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武则天亲自制作的《神宫大乐舞》，参加表演者多达900人。著名音乐家李龟年，著名书画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吴道子等都曾在洛阳展示过他们的艺术天才。在雕塑方面，洛阳又是“唐三彩”的故乡，体态高大的骆驼、骏马等，釉色鲜艳、栩栩如生，反映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唐代东都洛阳和长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里也曾多次开展图书编撰活动和抄书活动，洛阳书肆也不少。贞元十四年(798年)，吕温的朋友崔仁亮曾在洛阳南市买了一册上官婉儿著《研神记》一卷，因作《上官昭容书楼歌》云：

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
有人买得《研神记》。
纸上香多蠹不成，
昭容题处犹分明。
令人惆怅难为情。[1]

【1】《全唐诗》卷371。

《研神记》当属传奇之类，发行量大，加上作者又是名人上官婉儿，书肆居为奇货。又据陈子昂《陈拾遗集》附录《陈氏别传》："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说明陈子昂的著作在洛阳广泛流传，书商到处出售其书。又据《太平广记》卷二〇九《东都乞儿》：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官楷书不如也。

可见乞丐以写经谋生。为了招揽生意，扩大影响，每当写经时，还要进行"特技表演"。把笔抛向空中一尺多高，然后用脚接住，万无一失。这种特技表演，带有广告宣传的性质。

三、成都

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是唐代经济发达地区。唐代剑南道除了云南、贵州、甘肃部分地区外，约相当于四川中部地区，是全国人口密集的地方。唐贞观间，剑南道的户口总数为638 200户、2 865 679人，户数约占全国的20.98%，人数占全国的

23.13%。因为这里远离兵火、丰衣足食。唐高祖曾下令移民剑南：

> 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子，奔波道路……今岷嶓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火……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依本土置令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1]

【1】《全唐文》卷1《定户口令》。

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为图书出版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劳力。唐代四川盛产纸张和木材，又为图书出版提供了物质基础。唐代中央抄书所用麻纸大多来自四川。蜀人谢师厚的十色笺、薛涛的小彩笺，尤其闻名天下。

唐代皇帝两次入蜀和大批文人流寓四川，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对四川的图书出版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三日逃亡成都，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返回长安，历时17个月；唐末战乱时，唐僖宗于广明元年（880年）逃亡成都，光启二年（885年）正月返回，历时5年左右。每次逃亡，均有大量扈从官吏。唐玄宗逃亡四川，"车驾至蜀郡，扈从官吏军士到者一千三百人"[2]。终唐一代，入蜀文人难以数计。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贾岛、李商隐等都到过四川。王勃为绛州龙门人，他在四川生活了两年多，到过绵州、梓州、玄武、金堂、汉州、成都、绵竹等地，有《入蜀纪行诗》一卷。卢照邻为幽州范阳人，他在四川生活了十几年，曾在成都、新都任职。高适为德州蓨人，他在四川生活过六年，历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岑参为河南南阳人，51岁任嘉州刺史，在四川病死。杜甫，河南巩县人，在四川生活过9年，四川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成都写诗271首，在奉节写诗429首，成都杜甫草堂就是他当年寓居的地方。白居易，太原人，曾任忠州刺史，在四川写过120多首诗。刘禹锡，洛阳人，曾任夔州刺史，在四川生活过三年。元稹，洛阳人，曾任通州司马，在四川生活过四

【2】《旧唐书》卷9《玄宗下》。

年多。贾岛，范阳人，曾任普川司仓参军，最后病死四川，其墓今在安岳城内。李商隐，河内人，曾先后两次入蜀，第二次入蜀时间长达五年，到过四川许多地方。

综上所述，可知四川具有发展书业的众多有利条件。成都作为四川的首府，其书业之繁荣，也就不言而喻。如第九章第二节所述，唐代成都历书、占卜、小学等杂书的出版，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书业贸易也很发达。唐代著名女性出版家和发行家吴彩鸾就是成都人，据《列仙传》记载：

> 吴猛之女彩鸾，遇书生文箫于道，竟许成婚，箫贫不自给，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复写如是一载，稍为人知。

《唐韵》为唐人孙愐所作，全书五卷，正好一卷一缗，一缗就是一千文钱。除了《唐韵》之外，吴彩鸾还抄卖有《玉篇》、《法苑珠林》等书。据元王恽《玉堂嘉话》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广韵》有柳诚悬（即柳公权）跋：

> 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可及也。时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共五十四页，鳞次相积，皆留纸缝。

清著名学者俞樾反驳云：

> 盖隋开皇初陆法言等著《切韵》五卷，唐天宝中孙缅刊正之，名曰《唐韵》。至宋景德四年，诏陈彭年等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曰《广韵》，是《广韵》之名至宋始有，而柳诚悬题语乃曰“一夕书《广韵》一

部”，其伪托可知矣。[1]

【1】[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18《吴彩鸾所写之书》，中华书局，1987年。

此事说明吴彩鸾抄书名声在外，书商往往假托其名，以求牟利。

除了吴彩鸾之外，其他成都书商已无从查考了。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成都书市的历书“每差互朔晦”，书商之间常常“争月之大小尽”[2]，否定竞争对手的图书质量，以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可见成都书市的竞争相当激烈。

【2】《唐语林》卷7。

四、敦煌、扬州、绍兴及其他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唐朝占领敦煌，敦煌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在农业方面，逐渐完善了水利灌溉系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在商业贸易方面，由于丝绸之路畅道无阻，中外商人云集，经营丝绸、瓷器、珠宝等各种商品，市场繁荣。在文化方面，敦煌设有州、县两级学校，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长安宫廷写经的传入，加深了汉地佛教的影响，使敦煌成为唐代佛教的传播中心。据陶秋英辑《敦煌碎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等书著录，可考唐代敦煌佛寺至少有大云寺、灵图寺、龙兴寺、开元寺、崇教寺、报恩寺、莲台寺、金光明寺、永安寺、乾元寺、兴善寺、永寿寺、永康寺、禅定寺、三界寺、净土寺、奉唐寺、城东寺、天王堂寺、乾明寺、安国寺、修多寺、圣光寺、普光寺、福田寺、护国寺、灵修寺、寻西寺、弘济寺、崇义寺等数十个，其中永康寺、永安寺、安国寺、净土寺、圣光寺、晋光寺、龙兴寺、灵图寺等均为敦煌名刹。这些佛寺抄写、收藏了大量佛经。如前所言，这里生活着郭德、萧敬、彭楷、王谦、蔡义哲、杨文泰等大批以抄书为业的经生，使敦煌成为唐代书业中心之一。

扬州是唐代江淮地区最繁华的都市，为淮南道治所，经济、文化繁荣，有“扬一益二”之称。在商业方面，扬州是东南地区

水陆交通的枢纽，来自巴蜀，岭南，东南地区的货物，通过长江汇集扬州，然后通过运河北运，扬州成为唐代东南地区货物的集散地；在手工业方面，扬州的纺织、铜镜、毡帽、家具、蔗糖、酒食等手工业产品闻名全国；在文化方面，扬州学校教育发达，来济、上官仪、曹宪、李善、李邕、王播、骆宾王、王昌龄、孟浩然、崔颢、李白、顾况、卢纶、戴叔伦、吕温、王建、李商隐、刘长卿、皮日休、韦应物、张祜、杜牧、卢仝、李益、姚合、权德舆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李袭誉、刘知柔、姚崇、陆象先、李怀远、李绪、高适、杜佑、李吉甫、李德裕、李绅、刘禹锡等都曾在此任职。绍兴是唐代会稽郡治所，简称“越”，与扬州一样，向为江南人杰地灵之区，也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农业方面，鉴湖水利工程仍然发挥着较好的效益，蚕桑业、植茶业有较大发展。在手工业方面，丝绸、纸张、陶瓷等产品流布全国，甚至远销国外，整体实力在唐代前期的浙江一带仍然居于领先地位，元稹因有“天下风光属会稽”的诗句[1]。扬州、绍兴是唐代南方书业中心。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图83）。

【1】《元稹集》卷22《寄乐天》。

图83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相倣傚，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八〕，時人罕能知
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
詩〔九〕，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一〇〕，苟求自售，雜亂間厠，無可奈何！予於平
水市中〔一一〕，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一二〕，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
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一三〕，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
篇〔一四〕。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一五〕。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一六〕，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
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一七〕。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一八〕，
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是以諷
諭之詩長於激〔一九〕，閑適之詩長於遣〔二〇〕，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
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表奏狀長於直，
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二一〕，與予之交分淺
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二二〕。

〔一〕樂天：《英華》卷七〇五作「始年二歲未」。

元稹集卷第五十一　序　記　　五五五

这段话说明四个问题：第一，扬、越地区书商很多。“处处皆是”，说明不只一个地方有、二个地方有，而是到处都有，书市的繁荣情况，于此可见。第二，说明交易方式不一，有直接以钱购书者，也有用酒换书者，还有用茶叶换书者。第三，说明书市上有不少冒牌图书，即打着元稹、白居易的旗号，兜售伪作。第四，说明当时市场管理亟待完善，对于那些伪劣产品，竟然“无可奈何”，任凭不法书商胡作非为。唐代扬州可考书商有王绍宗、白岑等。王绍宗，字承烈，扬州江都人，“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净自守，垂三十年”[1]。

[1]《旧唐书》卷189下《王绍宗传》。

唐代可考书商除了上文列举者外，还有穆详、王昌、叶丰、田颍、杜福、刘翌、齐光等，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

> 开元中商胡穆聿别识图书，遂直集贤告讦技术，至德中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详……辽东人王昌，括州人叶丰，长安人田颍，洛阳人杜福、刘翌，河内人齐光，皆识别贩卖，此辈业邻好事，而迹类藩身。

这些人原以卖书为业，后来竟然受到官方的青睐，跻身仕林。书商在封建社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业，历史文献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可谓凤毛麟角，成千上万的书商早已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

第四节　唐代畅销书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记载，唐代畅销书有儒家经典、《史记》、《汉书》、《老子》、《庄子》、著名诗人的别集等。

一、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是唐代最畅销的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研读经书的记载较多，例如：

刘迺，字永夷，洛州广平人。自幼聪颖好学，“暗记《六经》，日数千言”[1]。

崔郾，字广略，清河武城人，“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2]。

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通究《六经》深旨，奏对之际，多以古义傅之”[3]。

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通《五经》，博览史籍”[4]。

路泌，字安期，少好学“通《五经》，尤嗜《诗》、《易》、《左氏春秋》，能讽其章句，皆究深旨”[5]。

郭承嘏，字复卿，自幼刻苦学习，“比及成童，能通《五经》”[6]。

徐文远，洛州偃师人。“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7]。

谷那律，魏州昌乐人，精于儒家经典，“黄门侍郎褚遂良称为‘九经库’”[8]。

萧德言，雍州长安人，晚年好学，“自昼达夜，略无休倦，每欲开《五经》，必束带盥濯，危坐对之”[9]。

高子贡，和州历阳人，“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10]。

祝钦明，雍州始平人，“少通《五经》，兼涉众史百家之说”[11]。

王友贞，怀州河内人，素好学，“读《九经》皆百遍”[12]。

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人，“十五通《五经》，薛元超称之”[13]。

郗士美，字和夫，兖州金乡人，“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14]。

【1】《旧唐书》卷153《刘迺传》。

【2】《旧唐书》卷155《崔郾传》。

【3】《旧唐书》卷158《郑余庆传》。

【4】《旧唐书》卷159《韦处厚传》。

【5】《旧唐书》卷159《路泌传》。

【6】《旧唐书》卷165《郭承嘏传》。

【7】《旧唐书》卷189上《徐文远传》。

【8】《旧唐书》卷189上《谷那律传》。

【9】《旧唐书》卷189上《萧德言传》。

【10】《旧唐书》卷189下《高子贡传》。

【11】《旧唐书》卷189下《祝钦明传》。

【12】《旧唐书》卷192《王友贞传》。

【13】《新唐书》卷123《李峤传》。

【14】《新唐书》卷143《郗士美传》。

韩愈，字退之，河阳人，自幼好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1]。

陆龟蒙，字鲁望，姑苏人，“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2]。

在经书之中，《春秋》尤为盛行，攻读其书者比比皆是。例如：

韩滉，字太冲，“好《易象》及《春秋》”[3]。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蓨人，“九岁通《春秋》，能属文”[4]。

陆质，吴郡人，“有经学，尤深于《春秋》”[5]。

武甄，字平一，以字行，“博学，通《春秋》，工文辞”[6]。

高霞寓，幽州范阳人，“能读《春秋》及兵法”[7]。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8]。

盖文达，冀州信都人，博览群书，“尤明《春秋》三家”[9]。

尹愔，秦州天水人，“明《春秋》，擢高第”[10]。

读《春秋》，离不开注解，在三家注中，《春秋左氏传》的读者最多，除了上文列举的路泌、徐文远等人外，又如：

裴炎，绛州闻喜人，少补弘文生，“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11]。

哥舒翰，居河西，“好读《春秋左氏传》及《汉书》”[12]。

田弘正，字安道，平州卢龙人，颇好儒书，“尤通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13]。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人，“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14]。

张仲武，范阳人，“少业《左氏春秋》”[15]。

朱子奢，苏州吴人，“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16]。

萧德言，雍州长安人，“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17]。

刘知几，少时父授《古文尚书》，不感兴趣，后授《左氏春秋》，甚喜，叹曰：“书如是，儿何怠！”[18]

【1】《新唐书》卷176《韩愈传》。

【2】《新唐书》卷196《陆龟蒙传》。

【3】《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4】《旧唐书》卷147《高郢传》。

【5】《旧唐书》卷189下《陆质传》。

【6】《新唐书》卷119《武甄传》。

【7】《新唐书》卷141《高霞寓传》。

【8】《新唐书》卷178《刘蕡传》。

【9】《新唐书》卷198《盖文达传》。

【10】《新唐书》卷200《尹愔传》。

【11】《旧唐书》卷87《裴炎传》。

【12】《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

【13】《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

【14】《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15】《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

【16】《旧唐书》卷189上《朱子奢传》。

【17】《旧唐书》卷189上《萧德言传》。

【18】《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李至远，赵州高邑人，“能治《尚书》、《左氏春秋》，未见杜预《释例》而作《编记》，大趣略同”[1]。

贾公彦，洺州永年人，精于《左氏春秋》，传业李玄植[2]。

经书之中，除了《春秋》之外，研读《周易》、《尚书》、《诗经》、三礼、《论语》、《孝经》的人也不少。例如：

王希夷，徐州滕县人，“好《易》及《老子》”[3]。

员半千，字荣期，齐州全节人，“能讲《易》、《老子》”[4]。

崔植，字公修，“博通经史，于《易》尤邃”[5]。

卫大经，蒲州解人，“邃于《易》，人谓之‘易圣’”[6]。

唐绍，博学多才，“善《三礼》”[7]。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精《三礼》，好事者多询访之”[8]。

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人，“涉猎经史，尤好《三礼》”[9]。

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贫，苦学，尤通《三礼》”[10]。

高仲舒，雍州万年人，“博通经史，尤明《三礼》及诂训之书”[11]。

张士衡，瀛州乐寿人，“遍讲《五经》，尤攻《三礼》”[12]。

韦叔夏，京兆万年人，“少而精通《三礼》”[13]。

韦温，字弘育，京兆人，“七岁时，日念《毛诗》一卷”[14]。

许叔牙，润州句容人，“少精于《毛诗》、《礼记》”[15]。

韦逌，韦述之弟，其兄弟六人并以词学登科。韦逌“尤精《三礼》”[16]。

二、史书和子书

史书畅销书为《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子书畅销书为《老子》、《庄子》等。例如：

李纲，字文纪，观州蓨人。“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张纲传》，慕而改之”[17]。

郝处俊，安州安陆人，“好读《汉书》，略能暗诵”[18]。

[1]《新唐书》卷197《李至远传》。

[2]《新唐书》卷198《贾公彦传》。

[3]《旧唐书》卷192《王希夷传》。

[4]《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

[5]《新唐书》卷142《崔植传》。

[6]《新唐书》卷196《卫大经传》。

[7]《旧唐书》卷85《唐绍传》。

[8]《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

[9]《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

[10]《旧唐书》卷157《王彦威传》。

[11]《旧唐书》卷187《高仲舒传》。

[12]《旧唐书》卷189上《张士衡传》。

[13]《旧唐书》卷189下《韦叔夏传》。

[14]《旧唐书》卷168《韦温传》。

[15]《旧唐书》卷189上《许叔牙传》。

[16]《旧唐书》卷102《韦逌传》。

[17]《旧唐书》卷62《李纲传》。

[18]《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

王方庆，少时曾“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1]。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2]。

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与弟暐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纳言以《汉书》授沛王贤”[3]。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擿其失”[4]。

颜师古（生平详第七章第三节），京兆万年人，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之孙，其《汉书注》“大行于世”[5]。

研读《老子》、《庄子》的人也很多，例如：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人，著名书法家。学问渊博，“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6]。

陆希声，苏州吴人，博学善属文，“通《易》、《春秋》、《老子》，论著甚多”[7]。

武攸绪，武后兄武惟良之子，“恬淡寡欲，好《易》、庄周书”[8]。

尹知章，绛州翼城人，精于《周易》、《老子》、《庄子》等[9]。

康子元，越州会稽人。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推荐“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康子元及平阳敬会真”[10]。

阎朝隐，赵州栾城人，武后时为预修《三教珠英》，“能推索《老》、《庄》秘义”[11]。

【1】《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

【2】《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

【3】《旧唐书》卷189上《秦景通传》。

【4】《新唐书》卷201《王勃传》。

【5】《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

【6】《旧唐书》卷165《柳公权传》。

【7】《新唐书》卷116《陆希声传》。

【8】《新唐书》卷196《武攸绪传》。

【9】《新唐书》卷199《尹知章传》。

【10】《新唐书》卷200《康子元传》。

【11】《新唐书》卷202《阎朝隐传》。

三、诗文集

诗文集畅销书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别集以及总集《文选》、孙季良编《正声集》等。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号称“初唐四杰”，影响

甚大，据《新唐书·王勃传》：

>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

骆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诗。曾为徐敬业府属，为之撰讨伐武后檄文，“则天素重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1]。

[1]《旧唐书》卷90《骆宾王传》。

李白、杜甫为唐代著名诗人，号称“李杜”。《新唐书·杜甫传》说："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萧统编《文选》在唐代非常盛行，并形成一门专学。为了便于人们研习，许多人为之注解。据《旧唐书·曹宪传》，曹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许淹，润州句容人，博学洽闻，尤精训诂，有《文选音》十卷。李善（约630—689），扬州江都人，历仕崇贤馆学士、兰台郎等职，学问渊博，为“文选学”的著名学者，有《文选注》六十卷，大行于世，诏藏秘阁，赐绢120匹。另外，还有《文选辨惑》十卷。公孙罗，江都人，历仕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等职，有《文选音义》十卷行世。开元间，有吕延济等五人撰《五臣注文选》三十卷，据《新唐书·吕向传》："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吕向字子回，世贯不详，或曰泾州人，工草隶，有志于学，少时家贫，以采药卖药为生，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开元十年（722年）召入翰林，历仕集贤校理、左拾遗、左补阙、工部侍郎等职。开元六年（718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吕向奏上此书，玄宗遣将军高力士宣口敕曰："朕今留心此书，比见注本，唯只引事，不说意义。略看数卷，卿此书甚

好，赐绢及彩一百段，即宜领取。”其实，五臣注与李善注相比，后者优于前者，正如《唐语林》卷二《文学》所说：

> 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大误也。所广征引，非李氏立意。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有旧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题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阔乖谬，犹不削去之。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既存元注，例皆引据，李氏续之，雅谊慇懃也。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当初旋被传写之误。其绝笔之本，兼释音训义，注解甚多，匡义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进表反非斥李氏，无乃欺心欤！

可见五臣注自李注出，李注远胜五臣注。李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等多种版本，各本互有异同。李注流传之广，于此可见。此外，唐代续补《文选》的著作还有孟利贞《续文选》十卷、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等。唐代无论官方或民间，都很重视《文选》这部书。唐高宗“尝以绢素百卷令（裴）行俭草书《文选》一部”[1]。著名诗人杜甫甚至把《文选》当作教育孩子的课本，因有“续儿诵《文选》”、“精熟《文选》理”等诗句[2]。

孙季良编《正声集》也盛行于世。集中收录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诗人。这些人因此而知名天下，例如汝州人刘希夷，“少有才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后孙翌（即孙季良）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3]。可见此集在唐初有较大影响。

【1】《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

【2】［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7，商务印书馆，1959年。

【3】［唐］刘肃：《大唐新语》卷8，中华书局，1984年。

第五节　唐代图书的国外流通

唐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交往频繁，不少唐代图书远播海外，其中东传日本、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的图书尤多。这些图书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成为沟通中外关系的桥梁，成为中外往来的友好使者。

一、唐代图书东传日本

唐代中日关系密切，人员来往不断，不少图书东渡日本，现将有关资料整理如下：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前后，著名学者张鷟的著作东传日本等国。据《旧唐书·张荐传》：

> （张鷟）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张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人，调露进士，官司门员外郎，有《朝野佥载》等。

唐玄宗在位时，不少日本遣唐使带回大量书籍。据《旧唐书·东夷传》：

> 开元初，（日本）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从“尽市文籍”四字可知购书之多。当时日本有位叫吉备真备（约693—775）的人，开元五年（717年）来唐，留学19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国；天宝十一载（752年）任遣

唐副使再次来唐，天宝十三载（754年）回国。他在介绍政治制度和传播唐代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把《东观汉记》的两个版本带回日本：一是一百二十七卷本；一是一百四十卷本[1]。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元稹、白居易的诗集《元白诗笔》东传日本。据日本《文德实录·承和五年》："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于唐船，得《元白诗笔》献，因功叙位。"[2] 藤原岳守因在中国船上发现一部大唐名著而升官进爵，可见日本统治者对中国典籍的重视。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日本学问僧惠萼在苏州南禅院手抄《白氏文集》三十三卷，带回日本[3]。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之前，唐李瀚《蒙求》三卷东传日本。据日本著作《扶桑集》：博士都良香"八月二十五日第四皇子于披香舍从吏部橘侍郎广相初受《蒙求》，便引文人命宴赋诗，并序"。博士都良香卒于公元879年，即唐僖宗乾符六年[4]。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至中和四年（884年），日本人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家部》著录有"《文馆词林》一千条"，可见该书全帙确于唐代东传日本。今藏日本《文馆词林》残卷上有"冷然院"和"嵯峨院"印章，还有"校书殿写，弘仁十二年岁次癸卯二月为冷然院书"题记，可知日本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还曾组织抄写一次。弘仁十四年相当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5]。

唐代东传日本的图书总数虽然无法统计，但可在唐代来华日本人编的书目中略见一斑。

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日僧圆仁《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著录的唐代图书有以下14部14卷（帖）：

杭越寄和诗并序一帖　　沙门清江新诗一帖
判一百条别　道一帖　　祇对仪一帖
任氏怨歌行一帖　　寒菊一帖

[1]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一章。

[3] 严绍璗：《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轨迹》，载陆坚等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4] 羌国华：《汉籍与日本中世纪文学》，载王勇主编《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林家骊：《文馆词林在日本的流传及其所存残卷的文献价值》，载陆坚等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揽乐天书一帖	叹德文一帖
杂诗一帖	祝无膺诗一帖
杂诗一帖	前进士施肩吾诗一卷
汉语长言一卷	波斯国人形一卷

唐文宗开成三年（837年），日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著录的唐代图书有：

诗赋格一卷	碎金一卷
杭越唱和诗一卷	王建诗一卷
仆郡集一卷	庄翱集一卷
李张集一卷	杜员外集二卷
台山集一卷	杂诗一卷
白家诗集六卷	开元诗格一卷
祇对义一卷	判一百条一卷（骆宾王撰）
祝无膺诗集一卷	杭越寄和诗集一卷
诗集五卷	

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圆珍编《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著录的唐代图书有：

舜帝峰为首杂诗一卷	建阳山水歌（177首）
诗集一卷（72首）	杂诗一卷（78首册子）
杂句一卷（102首）	福州往来集一卷
温州台州往来集一卷	建老宿手书集一卷
七曜历一卷	诸杂要药方一卷

吉备真备编《将来目录》和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汉籍最多。《将来目录》（一名《携来目录》）是吉备真备在唐留学时带回日本的汉籍目录，其中包括《唐礼》一百三

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等，可惜该目已经亡佚，我们已无法知其全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名《本朝见在书目录》）仿照《隋书·经籍志》分类，各类著录实际种数、卷数如下：

易家33种177卷	尚书家14种133卷
诗家15种168卷	礼家46种1 172卷
乐家23种207卷	春秋家35种379卷
孝经家20种51卷	论语家35种285卷
异说家17种95卷	小学家158种613卷

正史家35种1 590卷	古史家9种240卷
杂史家516卷（种不详）	霸史家3种122卷
起居注家3种39卷	旧事家4种20卷
职官家4种（卷不详）	仪注家113卷（种不详）
刑法家513卷（种不详）	杂传家306卷（种不详）
土地家37种（卷不详）	谱系家7种7卷
簿录家7种22卷	

儒家15种134卷	道家62种491卷
法家4种38卷	名家2种4卷
墨家3种4卷	纵横家1种3卷
杂家2 359卷（种不详）	农家2种13卷
小说家10种49卷	兵家221卷（种不详）
天文家406卷（种不详）	历数家56种186卷
五行家524卷（种不详）	医方家1 159卷（种不详）
楚辞家6种16卷	别集家152种1 619卷
总集家85种2 835卷	

关于该目著录的部帙卷数，历来说法不一，据严绍璗统计，

共计1 568种、17 209卷。此数相当于隋唐汉籍总数的二分之一，可见唐代流入日本汉籍数量之多[1]。而且，该目著录的汉籍之中，有300种不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其中易家就有如下21种[2]：

[1]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二章。

[2]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二章。

周易八卷　陆善经注　周易三卷

周易副象三卷　万叔撰注　周易六十四卦，奏赞一卷

周易异议十卷　刘遵撰　周易通义十卷

周易私记一卷　周易流演

周易义记　周易略例一卷　武守节注

周易许氏扶抑一卷　徐佩等撰　周易略例一卷　邢玮解

周易通问一卷　韦光晨　周易难问一卷

周易异论一卷　周易搜藏诀一卷

周易译名一卷　周易判卦略例一卷

周易赞一卷　周易精微赋一卷　刘遵撰

周易集音一卷

以上是唐代儒家著作东传日本的情况。佛教著作东传日本者也很多，兹据《大正藏》卷五十五著录的各家目录如表26：

表26　唐代东传日本汉籍目录表

目　录	编　者	佛典数量	时　间
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	最　澄	120部，345卷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
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	最　澄	102部，115卷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
御请来目录	空　海	216部，461卷	元和元年(806年)
灵岩寺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	圆　行	69部，123卷	开成四年(839年)
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	圆　仁	137部，201卷	开成四年(839年)
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	圆　仁	127部，142卷	开成五年(840年)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圆　仁	584部，802卷	开成三年(837年)

续表

目　录	编　者	佛典数量	时　间
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	圆　珍	156卷	大中七年(853年)
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疏记外书等目录	圆　珍	458卷	大中八年(854年)
青龙寺求法目录	圆　珍	115卷	大中九年(855年)
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	圆　珍	341本，772卷	大中十一年(857年)
智证大师请来目录	圆　珍	441本，1 000卷	大中十二年(858年)
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	宗　睿	134部，143卷	咸通六年(865年)

唐代图书东传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政治方面，大化革新时，日本中央政治机构的设置仿照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大宝律令》、《养老令》等均仿唐代律令。在文学方面，奈良、平安时期，贵族文坛掀起学习汉诗汉文的热潮，上至天皇，下至一般文士，竞相模仿汉诗汉文。萧统《文选》和白居易的诗歌对日本文坛影响最大。

公元751年，日本第一本诗歌总集《怀风藻》，收录64位日本诗人的120首诗歌，其中引用中国典故词语者竟有241处，模拟唐诗句式者有40处[1]。

公元823年至833年，日本淳和天皇时期，朝臣参议主编了大型汉籍类书《秘府略》，现虽多亡佚，从残存的"百谷类"和"锦绣类"两卷来看，征引了大量汉籍，其中"百谷类"征引了刘向《别录》、《氾胜之书》等124种；"锦绣类"征引扬雄《蜀都赋》等98种[2]。

唐代著名文人张志和撰《渔父词》五首之一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日本嵯峨天皇撰《渔歌》五首之一云：

【1】严绍璗:《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轨迹》，载《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2】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一章。

江水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迟。

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两相比较，后诗显系模仿前诗，其模仿之迹至少有二：一是内容均与捕鱼有关；二是句式为“七七三三七”结构[1]。

[1]〔日〕山口博：《唐词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在天文、历法方面，日本先后采用《仪凤历》、《大衍历》等唐代历书；在史书编撰方面，日本史书《日本书纪》、《文德实录》等采用了中国史书的编纂方法；在文字方面，汉字的日本化与日本假名的形成，也是通过遣唐使得以最终实现的。相传写定片假名者就是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创制平假名者是入唐“学问僧”空海和尚。假名的形成，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书法方面，唐代大量法帖流入日本，日本朝野竞相临摹，出现了空海、嵯峨天皇等书法名家，在日本书法史上大放异彩。在佛教方面，随着唐代成实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的传入，日本人最澄、空海等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开始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点，为弘扬佛学作出了贡献。

二、唐代图书流入朝鲜和印度

唐代朝鲜分为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三国与唐的关系都很密切，唐代图书大量流入朝鲜。

高丽先后于武德二年（619年）、武德四年（621年）、武德五年（622年）、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贞观二年（628年）、贞观三年（629年）、贞观十三年（639年）、贞观十四年（640年）、贞观十六年（642年）、贞观十七年（643年）、贞观十八年（644年）、贞观二十年（646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永徽三年（652年）、显庆元年（656年）、乾封元年（666年）、景龙四年（710年）、元和十三年（725年）等遣使来唐，这些使者回国时带回大量图书，据《旧唐书·高丽传》：

（高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这里提及的《五经》、《史记》、《汉书》等书都是从唐代传去的。

百济先后于武德四年（621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贞观三年（629年）、贞观五年（631年）、贞观六年（632年）、贞观九年（635年）、贞观十年（636年）、贞观十一年（637年）、贞观十三年（639年）、贞观十四年（640年）、贞观十五年（641年）、贞观十七年（643年）、贞观十八年（644年）、贞观十九年（645年）、永徽三年（652年）、麟德二年（665年）等遣使来唐，唐代图书流入百济亦多，据《旧唐书·百济传》："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

新罗遣使来唐次数多达88次，其中贞观间10次、开元间19次、大历间8次、元和间8次。唐诗中有不少送别诗，如孟郊《奉同朝贤送新罗使》、张籍《送新罗使》、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马戴《送朴山人归新罗》、张乔《送新罗僧》等。唐代图书大量流入新罗，据《旧唐书·新罗传》：

（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神祠碑》并新撰《晋书》……垂拱二年，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

唐代中印关系密切，在梵文佛经及其他图书流入中国的同

时，唐代图书也西传印度。据《旧唐书·西戎传》："王玄策至（天竺之伽没路国），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可见唐时《道德经》等书曾传入印度。西传印度的其他典籍因文献无征，已不得而知了。

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出版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我国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朝代，历时53年，史称“五代”。同时，中国南方地区和山西一带先后建立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亦名南平）、北汉等十个国家，史称“十国”。具体情况见表27 [1]：

【1】参考《辞海·历史分册》编制。

表 27　五代十国表

朝　代	起止年代	开国者	都　城	管辖地区
后　梁	907—923 年	朱　温	汴	今豫、鲁全部和陕、鄂大部等
后　唐	923—936 年	李存勖	洛　阳	今豫、鲁、晋、冀、陕北、甘东、鄂北、皖北等
后　晋	936—946 年	石敬瑭	汴	大体同上
后　汉	947—950 年	刘知远	汴	今豫、鲁、晋、冀南、鄂北、陕北、皖北等
后　周	951—960 年	郭　威	汴	今豫、晋、晋南、冀中南、陕中、甘东、鄂北等
吴	902—937 年	杨行密	扬　州	今苏、皖、赣、鄂四省间
南　唐	937—975 年	徐知诰	金　陵	今苏、皖、淮南地区和闽、赣、湘、鄂东部

续表

朝代	起止年代	开国者	都城	管辖地区
吴越	907—978年	钱镠	杭州	今浙及苏部分地区
楚	907—951年	马殷	长沙	今湘及桂东北
闽	909—945年	王审知	长乐	今闽
南汉	917—971年	刘龚	广州	今粤、桂
前蜀	903—925年	王建	成都	今川、甘东南、陕南、鄂西等
后蜀	933—965年	孟知祥	成都	同上
荆南	924—963年	高季兴	荆州	今鄂江陵、公安一带
北汉	951—979年	刘旻	太原	今晋北和陕、冀部分地区

一、政治与经济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同中有异：相同之处是南方和北方都遭受到战争的困扰；不同之处是困扰的程度，北方甚于南方。

北方中国的53年基本上成为穷兵黩武的舞台，兵连祸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在后梁统治的17年中，梁太祖朱全忠与河东军阀、沙陀贵族李克用继续争夺霸权，金戈铁马，未尝稍息。后来朱全忠被其子杀死，政局更加混乱。朱全忠父子为了阻止李克用骑兵南下，曾经三次扒开黄河大堤，造成山东、河南一带的特大水灾，耕地面积缩小，人民流离失所。由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920年陈州爆发了毋乙、董乙领导的农民起义，加深了后梁的社会危机，终于在923年4月，被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勗所取代，史称“后唐”。在后唐统治的14年中，唐庄宗李存勗昏庸无知，大修宫室，广征美女，崇信宦官和伶人，刚愎自用，最后弄得众叛亲离。唐明宗李嗣源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位七年，农业丰收，人民得到短期喘息的机会，但是到了后唐末年，李嗣源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屈事契丹贵族，答应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贡纳丝绸三十万匹，取得了契丹的支持。936年，起兵灭唐，建立后晋。45岁的石敬瑭竟尊称34岁的契丹首领耶律德光为“父皇

帝”，自称“儿皇帝”。在后晋统治的12年中，幽云十六州成为契丹不断南侵的基地，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946年，契丹攻占开封，灭了后晋。第二年，后晋太原节度使刘知远乘机称帝，建立后汉。在后汉统治的4年中，高祖刘知远只做了11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其侄儿刘承祐（隐帝）即位，他忌杀大臣，天雄节度使郭威被迫反汉，杀死隐帝，951年建立后周。在后周统治的10年中，周太祖关心民生，搜罗人才，革除弊政，严惩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生产得到发展。周世宗继周太祖之后，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继续实行改革，广开言路，裁减冗员，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租税，经济恢复较快，成为五代时期北方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他还扩建开封，使开封继长安、洛阳之后，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他还三次亲征南唐、取得江北、淮南之间14州60县的地盘，长江以北归后周所有。又亲征北辽，收复瀛、莫、易三州以及“三关”等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为北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南方各国虽然也存在军阀割据、独霸一方的局面，但就整体而言，南方广大地区战乱比北方要少许多，割据政权的统治时间要长得多，吴国36年、吴越72年、南唐39年、楚45年、闽37年、南汉55年、前蜀23年、后蜀33年、荆南40年。而北方各国多则十余年，少的只有4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人大批南迁，为南方补充了大批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加上南方各国多数统治者在小国如林、弱肉强食的环境中，有一定的忧患意识，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的措施，也对南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南方各国重视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吴越在钱塘江北岸修建了捍海塘，既保证了人民的安全，又保证了农业的发展。治理西湖，使湖水能灌溉大批良田。还在武义修筑长安堰，灌田万余顷；在越州鉴湖筑58里长堤，灌田9千余顷。为了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还在各州设置都水营田使。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灌溉了不少良田。闽国在长乐修筑海堤，保护大批良田；在连江

县东湖修筑围堤20里，灌田4万余顷。楚筑龟塘，灌田万顷。南唐和吴越修筑的圩田，解决了因河床较高、田地较低而导致的洪涝问题。在河梁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闭闸拒水。圩田是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发明，对于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唐还奖励耕织，每人垦田80亩，赏钱2万文，5年不抽税；3年栽桑3 000棵，赐帛五十匹。在南方地区农业发展的同时，丝织、制茶、制瓷、造纸、造船、矿冶等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大进步。在丝织业方面，“吴绫”、“越锦”、“蜀绣”都是当时的名牌产品。在杭州城内，专为吴越王制锦的工人就有200多人。浙江地区每年向外地输出大量的纺织品；在制茶业方面，楚国每年仅向中原王朝的贡茶就有25万斤。南唐在建安地区就有茶焙1 336处。南平江陵有全国最大的茶市。在制瓷业方面，吴越生产的秘色瓷器，是青瓷中的精品，胎质色釉都比以前进步。越窑生产的“金扣”（镶边）瓷器，动以万计，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在造纸方面，扬、越、蜀是纸的著名产地，南唐“澄心堂纸”的制作非常精美。在矿冶方面，吴与南唐的宣州，盛产铜、铁，楚盛产铅、铁，南汉盛产金、银。炼铜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发明了胆水浸铜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湿法冶金技术。随着矿冶业的发展，金属制造业也相应发展起来。浙江的金属器皿驰名全国，向北方进贡，一次就有金银首饰、陶器14万件，金银饰龙凤船舫200艘，银装器械70余万件。在造船方面，吴越最为发达。当时中日往来商船，几乎全是吴越制造。南唐曾与后周激战于淮上，动用数百艘船只。南汉有一种不用铁钉的船，用橄榄糖代替铁钉，糖干甚坚，入水如漆。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方商业也比较发达，广州、福州、成都、扬州、金陵、潭州、杭州、洪州、丹阳等城市，都是商业贸易的中心地区。楚国每年向外输出大量茶叶，为了吸引四方商贾，楚国对于外地商人一律免征商税。吴越通过水路与中原地区开展贸易活动，商品主要有丝织品、茶叶、瓷器和一些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吴越都城杭州，成为东南最繁华的都市。闽国利用海

路与中原开展贸易活动。福州成为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泉州成为对外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阿拉伯商人来此经商。南汉的广州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五代的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前蜀、后蜀的商业也很发达，成都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锦城”之称。吴国的盐不断运送到楚国和荆南。南唐商人多以茶、丝织品与中原交换羊马，甚至从海上与契丹进行商业往来。荆南地盘较小，税收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为发展对外贸易作了不懈努力。

以上就是五代时期政治、经济的大概情况。归纳起来，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两个特点：第一，南方北方发展不平衡，南方优于北方。就是在南方或是北方诸国中，发展也不平衡。第二，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当时运河虽然中断，但是海路和荆州一线的陆路交通，基本没有停止。

二、文化政策

五代虽然天下大乱、小国林立，但是各国仍然奉行儒、释、道并重的文化政策。

儒学在五代时期仍然受到尊重。让我们从尊崇孔子、兴办儒学和读书风气等方面加以说明。孔子是儒学的开山祖师，五代各国仍把孔子当做“圣人”加以供奉。后唐时，国子监生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谒先圣先师”[1]，据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五月七日国子博士蔡同文奏折：

[1]《五代会要》卷8《褒崇先圣》。

> 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释奠于文宣王，以兖国公颜子配坐，以闵子骞等为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贤，图形于四壁。[2]

[2]《五代会要》卷8《褒崇先圣》。

学校是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五代各国也有不少兴办儒学的记载。据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正月中书门下奏折：“伏以祭酒之资，历朝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况属圣朝，方勤庶政，

[1]《五代会要》卷16《国子监》。

须宏雅道，以振时风，望令宰臣一员兼国子祭酒。”[1] 后以宰臣崔协兼任国子祭酒。可见官方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视。后蜀宰相出私财百万兴建学馆，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人才。昇元二年（938年），南唐在开设太学的同时，还兴办了各级地方官学。据马令《南唐书·朱弼传》：

> 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坟典，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

位于庐山白鹿洞的庐山国学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校。白鹿洞原为唐代李渤读书处。南唐昇元间，李昪在此建学馆，称为“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任洞主，成为南唐的儒学教育中心，南唐诗人孟归唐就曾肄业于庐山国学。除了庐山国学之外，五代江西可考书院还有六所，如表28[2]：

[2]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表28　五代江西书院例表

书院名称	创办者	院　址	创办时间
留张书院	张　玉	高安（今宜丰）	后　梁
匡山书院	罗　韬	太　和	后唐长兴间
华林书院	胡仲尧、胡珰	奉　新	南　唐
云扬书院	吴　白	建昌（今永修）	南　唐
梧桐书院	罗靖、罗简	奉　新	南　唐
光禄书院	刘　玉	庐陵（今吉安）	南　唐

五代私人办学可考者还有石昂、罗绍威、窦禹钧等。石昂是青州临淄人，“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3]。罗绍威是长沙人，“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4]。窦禹钧是后周范阳人，“于宅南构一书院，屋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之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

[3]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4《石昂传》，中华书局，1986年。

[4]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4《罗绍威传》，中华书局，1986年。

需者，公或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显贵者，前后接踵"[1]。就整个五代来说，南唐儒学最盛，人才最多。据马令《南唐书·儒者传》：

【1】[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窦谏议录》。

> 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

五代佛教南北也不一样。北方地区因为战争频繁，加上后周世宗排佛，佛教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从后梁到后汉，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赠紫衣师号、度僧等佛事活动基本上因袭唐代旧规，管理机构依然存在，如后梁的祠部、后唐的功德使等仍然行使管理职能。按照规定，欲出家者必须到京师参加考试，禁止私度，禁止新建寺院。但到后来，管理松弛，寺僧数量大增，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征兵等活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采取断然措施，严格限制佛事活动。佛教活动有所收敛。南方较北方相对安定，加上各国帝王都信奉佛教，佛教的发展没有什么阻力。闽地建寺267所，后改属吴越，又增建221所。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还有480所。南方各国还大量度僧、造塔、造像等。闽地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度僧2万，闽地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又冶铜铁3万斤铸造释迦、弥勒诸像；南汉在广州造千佛铁塔；吴越王钱弘俶在杭州铸造84 000小铜塔。佛教宗派禅宗、天台宗等在南方也有较大发展。禅宗大师义存在闽王支持下，僧徒发展到1 500人，其中著名者有玄沙师备、洞岩可休、鹅湖智孚、鼓山神宴等。文益在南唐国王支持下，创立了“法眼宗”，其弟子天台德韶成为吴越国师。“天台宗”的代表人物义寂，在吴越王钱弘俶的支持下，在天台建立了道场，并派人到高丽搜求散失的天台教籍。在佛教艺

术方面，十六罗汉的雕塑也比较盛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铜十六罗汉像，烟霞洞也有十六罗汉像。在佛教建筑方面，造塔所用材料多用砖石代替木材，如闽地福州建崇妙保圣塔、吴越杭州建保俶塔、南唐在南京改建的栖霞寺舍利塔等均属砖石结构。

五代各国也很重视道教。后梁建立后，多方笼络郑章、夏隐言等道士。遇到自然灾害，就向神灵祈祷。后唐庄宗重用道士周玄豹、程紫霄等。宰相豆卢革是一个狂热的神仙迷，不以辅佐、进贤为务，日事修炼、服药，以求长生不老。明宗极力修复已废道观，恢复会昌元年（841年）规定的玄元皇帝降圣节的休假制度。后晋高祖多次向道士请教治世之策，拜道士张荐明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年）天和节，道释赐紫衣师号者92人；天福六年（941年）道释赐紫衣师号者34人。后汉封蒙州城隍为灵威王，表现了统治者乞求道教神灵保佑之用心。后周世宗大力推行崇道抑佛之策，赐号陈抟为“白云先生”，显德五年(958年)，赐帛50匹、茶叶30斤。南方各国统治者也信奉道教。前蜀高祖王建对道士杜光庭尤其礼遇，以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封为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后主王衍封杜光庭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后蜀后主孟昶贵儒尚道，自号玉霄子，研习方士房中之术。吴王杨行密崇信道士聂师道，建紫极宫以居之。南唐烈祖李昪对茅山道士王栖霞特别尊崇，加金印紫绶，赐号玄博大师、真素先生等。吴越王钱镠关心宫观修建工作，师事道士钱朗。闽主尊道士陈守元为“洞真先生”，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听信其言，最后二主竟死陈手。南汉统治者相信女巫樊胡子，时常问以国事，任凭她以道教神话摆布。总而言之，五代十国时期，道教受到多国的重视，得到一定的发展。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五代道教的发展与动乱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社会动乱，滋长了人们的归隐避世心理，而这种归隐避世心理，正好为道教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 五代十国的学术与出版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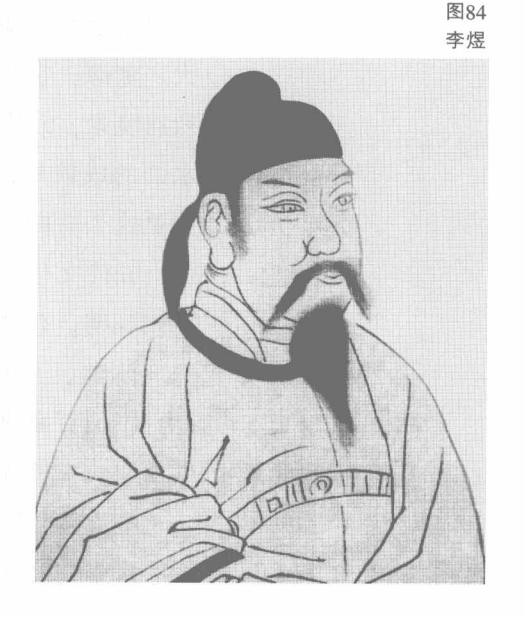
一、五代十国的学术

五代虽然战争频繁，但是在史学、文学、艺术、文化等方面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在史学方面，史官们面对战火中燃烧的历史文献，坚守岗位，奋力抢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挥笔直书，其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五代史学没有因为战争而产生断层，为后人留下一批重要的历史著作。

在文学方面，五代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词，亦名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它是一种句法长短不齐的诗体。词萌芽于南朝，形成于唐代，盛于宋代。五代时处唐、宋之间，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著名词家有欧阳炯、冯延巳、李璟、李煜等。欧阳炯（896—971），益州华阳人，后蜀文学家，其词多写艳情。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人，南唐文学家，南唐中主（李璟）时，官至宰相，其词多写儿女情长，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情趣。语言清丽，对北宋文人晏殊、欧阳修影响较大，有《阳春集》行世。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一说湖州）人，南唐中主、文学家，其词仅存四首，意境较高。李煜（937—978），字重光，号钟隐，李璟第六子，南唐后主、文学家（图84）。能诗、好乐、善画，尤以词著。前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风格柔靡；后期作品多怀念故国，哀叹身世。其词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后人把李璟、李煜的作品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图84
李煜



五代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绘画方面，花

鸟画、人物画、山水画都有较大成就。花鸟画以黄筌、徐熙为代表。黄筌（903—968），字要叔，成都人，后蜀著名画家。前蜀王衍时，曾任画院待诏。他善于写生，并创“钩勒法”，号称“黄体”，今传《柳塘聚禽》是其代表作。徐熙，江宁（一说钟陵）人，出身江南望族，终生不仕，南唐著名画家。他也是写生大师，创“没骨法”，号称“徐体”。今传《莲花图》是其代表作。人物画以顾闳中为代表。顾闳中，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任待诏，著名画家。今传《韩熙载夜宴图》（图85）是其代表作。该画刻画了南唐宰相韩熙载与宾客、舞伎寻欢作乐的夜宴场



图85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面，显示出画家杰出的写实能力和人物画的高超水平。山水画以荆浩、关同、董源为代表。荆浩，字浩然，号洪谷子，沁水人，后梁著名画家。他集唐代山水技法之大成，善画山水松石，撰《山水画诀》一卷。关同，长安人，后梁著名画家，荆浩的学生，有出蓝之誉。他善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对宋代山水画影响较大。董源，字叔达，钟陵人，南唐著名画家，工山水，善画江南秋岚晚景，元代画家黄公望、倪瓒等深受其影响。总之，五代山水画的成就是很大的，中国山水画浑厚苍劲、气韵生动的特色，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五代文化（主要是南方文化）比较发达，这可从藏书风气中得到证明。兹就可考藏书家举例如下：

孙骘，后梁滑台人，“雅好聚书，有《六经》、《汉》、《史》，洎百家之言，凡数千卷。皆简翰精至，披勘详定。得暇即朝夕躭玩，曾无少怠”[1]。

翟光邺，后唐濮州鄄城人，“日与宾客饮酒、聚书为乐”[2]。

张宪，字允中，后唐晋阳人，“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

【1】《旧五代史》卷24《孙骘传》。

【2】《新五代史》卷49《翟光邺传》。

事之余，手自刊校"[1]。

贾馥，曾在后唐镇州任职，"聚书三千卷，手自刊校"[2]。

韩恽，字子重，后晋太原晋阳人，"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3]。

郑玄素，后晋京兆人，"避地鹤鸣峰下，萃古书千卷"，其中多钟、王法帖，墨迹如新[4]。

张沆，字太元，后周徐州人。虽久居禄位，家无余财，"死之日，图书之外，唯使郓之赀耳"[5]。

王锴，字鳣祥，前蜀人，历仕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中书侍郎等职。"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又亲写释藏经若干卷"[6]。

陈贶，闽人，性淡漠，孤贫力学，"积书至数千卷"[7]。

朱遵度，南唐青州人，"家多藏书，周览略遍，当时推为博学，称曰'朱万卷'"[8]。

朱昂，其先京兆人，后随父卜居衡山，喜藏书，"时朱遵度号为'朱万卷'，因目昂为'小万卷'"[9]。

钱传瑛，吴越武肃王第三子，"聚书数千卷"[10]。

钱文奉，吴越广陵王第二子，"所聚图书、古器无筭。雅有鉴裁，一时名士多依之"[11]。

钱昭序，字著明，吴越文穆王钱弘仰之孙，"好学，喜聚书"[12]。

钱惟治，吴越忠懿王长子，好读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13]。

钱惟演，吴越忠懿王次子，博览群书，"家储文籍侔秘府"[14]。

暨齐物，吴越杭州人，"构垂象楼，贮道书几千卷，朝夕讨论，贯穿精微，听者莫不忘倦"[15]。

以上为私人藏书之例。其实官方（尤其是南方各国）亦重藏书，据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

【1】《旧五代史》卷69《张宪传》。

【2】《旧五代史》卷71《贾馥传》。

【3】《旧五代史》卷92《韩恽传》。

【4】《旧五代史》卷96《郑玄素传》。

【5】《旧五代史》卷131《张沆传》。

【6】[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1《前蜀七·王锴传》，中华书局，1983年。

【7】《十国春秋》卷29《南唐·陈贶传》。

【8】《十国春秋》卷75《南唐·朱遵度传》。

【9】《十国春秋》卷75《南唐·朱昂传》。

【10】《十国春秋》卷83《吴越·钱传瑛传》。

【11】《十国春秋》卷83《吴越·钱文奉传》。

【12】《十国春秋》卷83《吴越·钱昭序传》。

【13】《十国春秋》卷83《吴越·钱惟治传》。

【14】《十国春秋》卷83《钱惟演传》。

【15】《十国春秋》卷89《吴越·暨齐物传》。

始天祐间，江表多故，洎及宁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而无闻。及高皇（即南唐创建者李昪）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赀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降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暨昪元受命，王业赫然，称明文武，莫我企及。岂不以经营之大基有素乎！

南唐至后主时，宫中图籍多至十余万卷，这些图书校雠精审，篇帙完具，有“建业文房之宝”、“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等藏书印。前蜀官方藏书亦多，永平元年（911年），“始作新宫，命集四部书，选名儒专掌其事”[1]。

[1]《十国春秋》卷36《前蜀二·本纪》。

二、五代十国的出版

五代十国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是这个时期却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南移的时期。既有破坏性的一面，又有建设性的一面。图书出版事业并非漆黑一团，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就图书编撰而言，官方修书并没有因为战火而停顿，史馆工作人员，编出了《旧唐书》、《实录》系列、律书、礼书、历书等，体现了我国古代官方修书的连续性。民间涌现出孙光宪、齐己、朱遵度、和凝、赵崇祚、殷文圭、杨夔、沈颜、徐铉、徐锴、陈彭年、韦庄、王仁裕、杜光庭、昙域等一大批图书编撰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重要著作。在图书出版方面，官方采用雕版印刷技术，第一次印制儒家经典十二经，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出现了毋昭裔、和凝等私人出版家。初步奠定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的雏形。在刻印图书的同时，人工抄写仍然是

图书出版的重要手段。在图书流通方面，战争并没有影响南北图书交流和中外图书交流。清人顾檩三曾经指出：

> 其时深心好古之士摧锋幕府、对扬王庭，莫不截楮晨抄、然脂暝诵。蜀毋昭裔创为镂板，遂有《九经》、《文选》之刻。而楚天策学士彭玕亦遣人入洛访求石经。天成中，仿唐石经制作印板于国子监，其后屡下赐书之令。至广顺中，而板本流布，经籍盛行，俾学者无笔札之劳，获观古人全书。虽衰朝之创兴，实万世之良法也。[1]

[1] [清]顾檩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

这段话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五代十国的出版情况。

第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图书编撰

第一节　五代十国官修书

一、史馆修书

史馆、集贤院、弘文馆等仍然是五代时期的主要修书机构。其编制情况因袭唐代，此不赘述，下面主要谈谈史馆修书。

史馆工作人员的选拔非常慎重。据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十二月史馆奏折：

> 伏见前代史馆，归于著作，国初分撰五代史，方委大臣监修。自大历后来，始奏两员修撰。当时选任，皆取良能。一代之书，便成于手。其后源流失绪，波荡不还，冒当修撰之名，曷扬褒贬之职？[1]

【1】《五代会要》卷18《修国史》。

为了选任“良能”，罢免“冒当修撰之名”的滥竽充数者，史馆建议“别访通才”，担任史职。为了加强管理，史馆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史馆工作人员的奖惩制度、史料报送制度、遴选立传人的规定等。

史馆工作人员的奖惩制度，对于奖勤罚懒、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正月十一日史馆奏折，史馆工作人员可分两类：一类是“勤恪者”，他们竭尽心力，“著述不闲”，成果颇丰；一类是“怠惰者”，他们“因循度日”，打着史馆的金字招牌，把史馆当做他们“进趋”、“除官”的跳板，把分给自己的撰写任务“送付后人”，后人“效尤”，也照此办理，撰写任务一拖再拖，“为弊滋多”。据此，史馆制定了如下奖惩措施：

> 自判馆、修撰已下，见充职任及此后充馆，请以二周年为限据，在职馆中文书繁简，逐季分配纂修。如月未满，公事未阙，即当馆给与公凭，仍旋申中书门下，请别商量。其职限内遇本官本省署有递迁，请不妨其序进，即请令依前充职，终其月限，并请不许未终职限，特更除官。如职限满，有公事未了，不计几月，请不别与院官及差使，并与递迁本官。其旷职甚者，仍请量事殿罚，如据所分配文书修撰外，别能采访得皇后、功臣事实，及诸色合编集事，著撰得史传，堪入国史者，请量其课绩，别加酬奖。如当馆于职限满官员中，籍令充职者，则旋具奏闻，乞就加升陟。应此日已前曾充馆职，配过文书，除丁忧官员，则请与均分代修撰。其未了别除官者，所欠文书，不计多少，并与令本官修撰，速须了毕。其今日已前旷惰之过，特乞矜容。起今后若更将已前未了公事，迁延不速修撰了者，则别具奏闻。[1]

【1】《五代会要》卷18《修史官》。

史料报送制度详细规定了史料报送的具体内容及报送单位。据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四月史馆奏折，史料报送的内容有如下19大类：（一）时政记，由中书、门下二省负责录送；（二）起居注，由左右起居郎负责录送；（三）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各录一本报送；（四）天文祥变、占候

征验，由司天台负责逐月录报，并每月送历一本；祥瑞礼节，逐季录报，并由诸道负责画图申送；（五）蕃客朝贡，由鸿胪寺负责，查其风俗、衣服，及所贡物品，并报蕃国里程及其国王姓名；（六）四夷人役来降，其中表状由中书省负责录报，露布由兵部负责录报，还要说明军队返回日期、主将姓名、俘虏、杀敌人数、战争原因等；（七）变改音律和新造曲调，由太常寺负责录送，并说明变改原因及乐词内容；（八）法令变革、断狱新议、赦书德音，由刑部负责逐季报送；（九）详断刑狱、昭雪冤滥，由大理寺负责逐季报送；（十）州县废置及孝子贤孙、义夫节妇有受表彰者，由户部负责录送；（十一）水旱煌虫、雷风霜雹，由户部负责报送；（十二）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进封邑号祠，由司封负责录送；（十三）京官、百司长官、刺史以上官吏任命，其中文官由吏部负责录送；（十四）各种宣敕活动，由门下省和中书省负责逐月录送；（十五）公主、百官定谥，逐月将考功录、行状并谥议报送；（十六）宗室任官课绩，并公主出降仪制，由宗正寺负责录送；（十七）刺史、县令有重大政绩者，由州官负责录送；（十八）硕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由州县负责如实录送；（十九）中外官吏死后请谥者，由其家属录送行状一本[1]。上述报送制度的施行，保证了史馆资料的及时性、全面性、真实性和权威性，为史书编撰创造了有利条件。

【1】《五代会要》卷18《诸司送史馆事例》。

关于史书中立传人的遴选，也有详细规定。据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正月十一日史馆奏折：

当馆先奉敕修撰功臣列传，原奏数九十二人。馆司分配见在馆官员修撰，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连络

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简略书出；其无功于国，无德于人，但述履行身名，或述小才末伎；傥无可以垂训者，并请不在编修之限。伏自有史传以来，历代咸有著述，皆存定制，不可更张。如前汉止述萧曹绛灌之流，后汉但述寇邓耿贾之列，并同翼戴，咸共匡扶，爵号功臣，先为列传。其余宗室、外戚、文苑、儒林、游侠、逸人、循吏、酷吏之属，名目甚众，各有篇题，并随其次第撰述。其大恶大善之人，有善若周孔夷齐，恶若敦玄莽卓，亦各特为著撰，不附传记编修，或为世家，或为列传，盖欲取鉴前代，垂则后人，不可雷同，请令区别。其功臣未纳到行状者，馆司见更催促，候到即更分配修撰。大凡行状，皆是门人故吏叙述，多有虚饰文华。今请此后所纳行状，并须直书功业，不得虚文饰词。其已纳到行状合著撰者，仍请委修撰官略其浮辞，采其实事。[1]

[1]《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

这里，把原拟立传的92人分为两个大类：一类“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一类“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对于第一类人，要根据“功勋大小、德业轻重”而排序，忠实记录。立传人可分专传、类传两种：那些“大善大恶之人”，可立专传；一般传人可按宗室、外戚、文苑、儒林、游侠、逸人、循吏、酷吏等分类撰写。对于第二类人，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如果行状中的有关材料，可补史阙者，可“附在纪传内简略书出”；如果行状内容一无可取，本人既“无功于国、无德于人”，又无可“垂训”者，则坚决剔除，不在编撰之限。撰写功臣列传的目的在于“取鉴前代，垂则后人”，对于立传人的遴选必须慎之又慎。行状是撰写传记的重要根据，上引奏折提醒人们注意：行状多为“门人故吏”所为，不乏“虚饰文华”之词，利用时必须“略其浮辞”。

二、官修《旧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时期官修的一部重要著作（图94）。据《五代会要》卷十八，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二月下诏说：

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阙。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浸深，何由寻访？宜令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赵莹监修。

《旧五代史》卷七十九云：

（后晋天福六年四月）辛丑，宰臣、监修国史赵莹奏：奉诏差张昭远等五人同修唐史，内起居郎贾纬丁忧去官，请以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与编修。

《宋史·张昭传》云：

（后晋天福五年）以唐史未成，诏与吕琦、崔棁等续成之，别置史院，命昭兼判院事。

又据宋高似孙《史略》卷二：

赐监修宰臣刘昫、史馆张昭远、直馆王伸等缯彩银器各有差。

《旧五代史》卷八十四云：

（后晋开运二年六月）监修国史刘昫、史官张昭远等

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

这里所谓《唐书》就是后世所说《旧唐书》。据上引资料，《旧唐书》始修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二月，至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六月修成，历时四年又四个月。预修者有张昭远、贾纬、赵熙、吕琦、尹拙、郑受益、李为先、王伸、崔棁等九人。监修先后由赵莹、刘昫担任。需要指出的是，《旧唐书》题名"后晋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昫撰"是不公平的。就时间而言，赵莹任监修三年多，而刘昫任监修不到一年；就付出的劳动而言，赵莹用力甚勤，为了修好唐史，他曾多方搜集资料，并制定了奖励标准，他说：

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案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况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焕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又光化初，宰臣裴贽撰僖宗、懿宗两朝实录，皆遇国朝多事，或值銮舆播越，虽闻撰述，未见流传。其韦保衡、裴贽合有子孙，见居职任，或门生故吏，曾托纂修，闻此撰论，谅多欣惬。请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臣与张昭远等所撰《唐史》，只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

【1】《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

刑政……所陈条列如前，请下所司。[1]

据《五代会要》卷十八，他所征集的史料范围及分工如下：（一）《唐书》、《实录》之类；（二）自会昌至天祐年间的传记、日历、制敕、册书等；（三）司天台搜集唐朝甲子长历，以凭编述本纪；（四）大小官吏搜集家史、家传、族谱、族图，以凭纂序列传；（五）太常礼院搜集五礼、仪注及车服之制，以凭撰述《礼志》；（六）太常寺搜集乐章舞名，以凭撰集《乐志》；（七）大理寺搜集律令、条格及所断疑狱，以凭撰述《刑志》；（八）司天台搜集天文、灾异、五行、休咎、历法更改，以凭撰集《天文》、《律历》、《五行》等志；（九）御史台搜集官阶、检校、册拜、升降、废置，以凭撰述《职官志》；（十）兵部搜集军制军额、山河异制及州县废置，以凭撰述《郡国志》；（十一）秘书省搜集古今典籍的撰人、部数，以凭撰述《经籍志》。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本纪、列传之外，赵莹还计划纂修礼志、乐志、刑法志、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职官志、郡国志、经籍志等。《旧唐书》的一整套写作方案是赵莹一手制订出来的。既然赵莹的贡献大，为什么要署刘昫的名字呢？因为按照规定，一书历阅数官，惟题经进一人。刘昫虽然任职时间短，但他是最后一任，《旧唐书》是由他进呈的。

应该怎样评价《旧唐书》？在北宋至清初的六七百年之中，否定者多，肯定者少。我们认为此书虽然有材料芜杂、记事矛盾、前详后略等缺点，但就整体而言，瑕不掩瑜，仍然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在唐代后期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修书者竭尽全力，写出这样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可惜在《新唐书》行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旧唐书》被打入冷宫，直到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闻人铨重新刊布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三、官修实录系列

实录的编撰是五代官修书的第二个重要成就。兹据王溥《五

代会要》、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吴任臣《十国春秋》等书，五代时期所编实录如表29：

表 29　五代十国实录编撰表

书　名	卷数	成书时间	监　修	预修者
(后唐)庄宗实录	30	后唐天成四年(928年)十一月	赵　凤	张昭远、吕咸休
(后唐)明宗实录	30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二月	姚　颢	张昭远、李祥、吴承范、杨昭俭等
(后汉)高祖实录	20	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十月	苏逢吉	贾纬、王伸
(后晋)高祖实录	30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七月	苏逢吉	贾纬、王伸、窦俨等
(后晋)少帝实录	20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七月	苏逢吉	贾纬、王伸、窦俨等
(后周)太祖实录	30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六月	张　昭	尹拙、刘温叟
(后汉)隐帝实录	15		张　昭	尹拙、刘温叟
后梁实录			张　昭	尹拙、刘温叟
(后唐)前废帝实录	3		张　昭	尹拙、刘温叟
(后唐)后废帝实录	17		张　昭	尹拙、刘温叟
后蜀先主实录	30		李　昊	
后蜀孟氏后主录	80		李　昊	
前蜀实录		永平二年(912年)三月	张　格	
南唐烈祖实录	20		高　远	
南唐元宗实录	10	保大年间	高　远	
周世宗实录	40		王　溥	扈蒙、张淡、王格、董淳等
梁太祖实录	30	后梁贞明中		李琪、张衮、郄殷象等

在编撰实录和其他史书的过程中，史官们非常注意史料搜集，规模较大的征集活动至少有下列六次：

第一次是在后梁龙德元年（921年）二月壬申，史馆上言：

伏见北齐文士魏收著《后魏书》，于时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齐，书不获就，乃大征百官家传，刊总斟酌，随条甄举，搜访遗亡。数年之间，勒为一代典籍，编在北史，固非虚言。臣今请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候史馆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事相符会，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并与编载。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国之耿光；孝子顺孙，获记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见乎殷纪，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膺委任，获领监修，将赎素餐，辄干玄览。[1]

【1】《旧五代史》卷10《梁书·末帝纪下》。

第二次在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十一月四日，史馆上言：

当馆昨为大中已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绝，难可访求。窃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长为阙典，过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湘南奥壤，至于闽越，方属勋贤。戈铤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群士，富有奇书。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自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2]

【2】《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

第三次在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四月庚寅，史馆上言：

“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裔、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1]

【1】《旧五代史》卷46《唐书·末帝纪上》。

第四次在后唐。郭崇韬《请奖献书人》奏折云：

伏以馆司四库藏书，旧日数目至多。自广明年后，流散他方。宜示奖酬，俾申搜访。乞伏委中书、门下，再行敕命，遍下逐道，或有人家藏，能以经史百家之书进献，数及四百卷以上者，请委馆司点勘，无脱漏于卷轴，无重叠于篇题，比外写札精详，装饰周备，当据部帙闻奏，请量等级除官。仍仰长吏明悬榜示，即乡校庠塾之业，渐阐皇风；金石丝竹之音，无虞坠典。[2]

【2】《全唐文》卷844。

郭崇韬（？—926），字安时，代州雁门人。后唐时历仕枢密使、招讨使等职，曾奏时务利害二十五条，重视图书事业，攻取镇州时，郭崇韬“阅其府库，或以珍货赂遗，一无所取，但市书籍而已”[3]。

【3】《旧五代史》卷57《郭崇韬传》。

第五次在后汉。司徒诩《请采遗书奏》云：

臣闻致理之方，咸资稽古；多闻之道，讵舍群书。历代已来，斯文不坠，不渠蓬阁，今则阙于芸编、百氏九流，在广颁于搜访。唐朝并开三馆，皆贮百家。开元之朝，群书大备；离乱之后，散失颇多。臣请国家开献书之路，凡天下文儒衣冠旧族，有收得三馆亡书，许报馆进纳。据卷帙多少，少则酬之以缗帛，多则酬之以官资。自然五六年间，庶几粗备。[4]

【4】《全唐文》卷855。

司徒诩，字德普，清河郡人。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历仕

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担任过史馆修撰、刑部郎中、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太常卿等职务。

第六次是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十二月，诏云：

> 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内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课申报中书门下。[1]

[1]《旧五代史》卷116《周书·世宗纪第三》。

正是由于馆臣忠于职守，多方搜集资料，才保证了实录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五代史馆工作人员之中，赵莹、张昭远、贾纬是三位令人注目的人物。赵莹，字玄辉，华阴人，后唐时，为石敬塘的重要幕僚，曾任宰相等职。后晋灭亡后，与少帝一起被掠往契丹，他涕泪纵横，无时不在思念故国，后来老死于幽州。他在监修《旧唐书》的时候，“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2]。张昭远（避后汉高祖刘知远讳，或作张昭），字潜夫，号逍遥先生，世居濮州范县。五代、宋初著名史学家。自幼遍读九经、诸史，贯通古今，史书称其“博能学艺，书无不览，兼善天文、风角、太一、卜相、兵法、释老之说”，“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后唐时，武皇、庄宗实录未修，诏卢质、何瓒、韩彦辉等收集资料，何瓒推荐张昭远说：

[2]《旧五代史》卷89《赵莹传》。

> 昭有史才，尝私撰《同光实录》十二卷，又闻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赐武皇制诏九十余篇，请以昭所撰送史馆。[3]

[3][元]脱脱等：《宋史》卷263《张昭传》，中华书局，1977年。

因拜张昭为史馆修撰，参与编撰工作。先后撰成《纪年录》二十卷和《庄宗实录》三十卷。天成四年（929年），又撰《武皇以来功臣列传》三十卷。清泰二年（935年）预修《明宗实录》，成书三十卷。后晋天福间，撰《唐朝君臣正论》二十五卷。开运二年（945年），又和吕琦、崔棁等撰《唐书》二百卷。后周显德间，诏撰《制旨兵法》十卷、《周祖实录》三十卷、五朝实录（按："五朝"即梁郢王、梁均帝、唐闵帝、唐废帝和汉隐帝）。此外，还参与了《经典释文》、《九经文字》、《制科条式》的校订工作。张昭远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诸朝，先后担任史馆修撰、知制诰、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职，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卒，终年79岁。贾纬，真定获鹿人，唐末曾为赵州军事判官、石邑县令。后晋、后汉时历任史馆修撰等职，后周时任给事中等职。史书称他"常以史才自负，锐于编述"。不过，贾纬在修史过程中，有"憎爱任情"之弊。后晋宰相桑维翰执政时，薄其为人，不甚见礼，贾纬因此怀恨在心。等到他在史馆写桑维翰传的时候，借机发泄私愤，随意夸大事实，硬说桑维翰"身没之后，有白金八千铤"，后经友人劝说，才被迫改为"白金数千铤"[1]。后周广顺元年（951年），贾纬等撰成后晋《少帝实录》，要求依例升迁，未果，又耿耿于怀。于是在编撰日历时，又借机大书当时大臣过失，监修王峻恶之，曰："贾给事家有士子，亦要门阀无玷。今满朝并遭非毁，教士子何以进身！"因贬为平卢军行军司马，第二年死于青州[2]。

[1]《旧五代史》卷131《贾纬传》。

[2]《旧五代史》卷131《贾纬传》。

四、其他官修书

除了《旧唐书》和多种实录外，五代官方还编撰了一些律书、礼乐、史传、历书等方面的图书。

五代统治者重视律书的编撰，因为"刑法者，御人之衔勒、救弊之斧斤，固鞭扑不可一日弛于家，刑罚不可一日废于国"[3]。五代律书的编撰至少有如下十次：

[3]《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

（一）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李燕、萧顷、张衮、崔沂、王鄯、崔浩等刊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十卷、律并目录十三卷、律疏三十卷，以上各书共计103卷，总书名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

（二）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十二月，御史台上言：

> 当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书，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今见在三司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删改者，兼伪廷先下诸道追取本朝法书焚毁，或经兵火所遗，皆无旧本节目。只定州敕库有本朝法书具在，请敕定州节度使速写副本进纳，庶刑法令式，并合本朝旧制。[1]

【1】《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

没过多久，定州节度使王都进纳唐朝格式律令286卷，同光二年（924年），据以编成《同光刑律统类》13卷。

（三）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六月，龙敏、张鹏、卢道、任赞、李延范等详定《大中统类》。

（四）后唐清泰四年（937年）四月，御史中丞卢损等把清泰元年（934年）之前11年内长期施行的制敕394道编为三十卷。

（五）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七月，薛融、吕琦、刘皞、司徒诩、张仁瑑等详定编敕368道，分为三十一卷。

（六）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六月，卢亿、曹匪躬、段涛等将有关敕条16件，编为二卷，题名为《大周续编敕》[2]。

【2】《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

（七）后周显德四年（957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请张湜、剧可久、率汀、邓守中、王莹、贾玭、赵砺、李光赞、苏晓、王伸等人重编刑书，显德五年（958年）七月书成。中书、门下奏折云：

> 侍御史知杂事张湜等九人，奉诏编集刑书，悉有条贯，兵部尚书张昭等一十人，参详旨要，更加损益。臣

质、臣溥据文评议，备见精审，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于今、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所冀发函展卷，纲目无遗；究本讨源，刑政咸在。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一卷。刑名之要，尽统于兹，目之为《大周刑统》……[1]

其书颁行天下。赐侍御史知杂事张湜等9人各银器20两、杂彩30匹，奖赏删定《刑统》之功。

（八）吴太祖杨行密曾诏修格令，有《删定格令》五十卷。

（九）南唐升元三年（939年）七月，“命有司作《升元格》，与《吴令》并行，中外遵守”[2]。

（十）南唐升元六年（942年），颁《升元删定条》。

礼乐方面的图书，如后周显德间修《大周通礼》和《大周正乐》。据《旧五代史·乐志下》：

（显德五年）十一月，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礼乐刑政之源，其一曰：“请依《唐会要》所分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命编次，凡关礼乐，无有阙漏，名之曰《大周通礼》，俾礼院掌之。”其二曰：“伏请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乐章沿革，总次编录，系于历代乐录之后，永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乐》。俾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务在齐肃。”

诏可，并令“于内外职官前资前名中，选择文学之士，同共编集，具名以闻。委（窦）俨总领其事。所须纸笔，下有司供给”。

【1】《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

【2】《十国春秋》卷15《南唐一》。

史传方面的图书，如后梁龙德间，敬翔奉诏编《大梁编遗录》三十卷，与《太祖实录》并行。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李愚监修国史，与诸儒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撰《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吴国史官王振“所著太祖等本纪及讨论诸将战功，皆详核而不诬，切实而不靡，世称良史才”[1]。南唐史官高远先与陈濬编撰《吴史》未果，“后主嗣位，远与徐铉、乔匡舜、潘佑共成《吴录》二十卷”[2]。高远，字攸远，少孤，杜门力学，不交人事。烈祖受禅，礼贤下士，招其为秘书省正字，后又历仕校书郎、太常博士、枢密判官、史馆修撰、勤政殿学士等职。晚年病危，取其所著书尽焚之，终年57岁。后蜀李昊，字穹佐，生于关中，后遇兵乱，流寓奉天、新平等地，为蜀将刘知俊所得，历仕前蜀、后蜀50年，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左仆射、工部尚书等职，主修《前蜀书》四十卷，预修者有冯侃、贾元珪、幸寅逊、郭微、黄彬、赵元拱、王中孚等。其中赵元拱号称良史，“广政时，授职方员外郎。会宰相李昊监修国史，请置史官。后主乃以元拱为修撰。未几，修《前蜀书》，复命元拱等董其事”[3]。王中孚，长于史学，原任成都主簿，李昊监修国史，调至史馆工作，“已而修《前蜀书》，复与事焉”[4]。

【1】《十国春秋》卷11《吴十一·王振传》。

【2】《十国春秋》卷28《南唐十四·高远传》。

【3】《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赵元拱传》。

【4】《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王中孚传》。

历书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不可或缺。可考五代历书编撰活动至少有下列五次：

（一）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八月，司天监马重绩等撰《调元历》。据马重绩进书表：

> 臣闻为国者，正一气之元，宣万邦之命，受资历象，以立章程。《长庆宣明》，虽气朔不渝，即星躔罕验；《景福崇玄》，纵五丽甚正，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气朔、《崇玄》景纬，二历相参，方得符合。况自古诸历，皆以天正十一月为岁首，循太古甲子为上

元，积岁弥多，差阔之甚。臣改法定元，创为新历一部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经奏等草二卷，立成十二卷，取天宝十四载乙未，立为上元，以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其所撰新历，谨诣閤门上进。[1]

【1】《五代会要》卷10《历》。

预修者除了马重绩外，还有赵仁锜、张文皓、徐皓、赵延义、杜昇、杜崇龟等。马重绩，字洞微，居太原。自幼学习数术，精于太一、五纪、八象、《三统大历》等，初任后晋太子右赞善大夫，后迁司天监。赵延义，字子英，秦州人。其父赵温珪仕蜀为司天监，延义传其家学，亦精天文数术。

（二）后周显德二年（955年），王朴奉诏撰《钦天历》十五卷。王朴字文伯，东平人，天文学家。进士出身，精通万法音律，历仕东京副留守、枢密使等职，据《新五代史·王朴传》：

显德二年，诏王朴校定大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设通、经、统三法，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步日月五星，为《钦天历》。

（三）南唐昇元四年（940年）三月丁未，“颁《中正历》，历官陈承勋所撰也”[2]。

（四）前蜀永平二年（912年）十二月，“诏行《正象历》”[3]。

（五）前蜀咸康元年（925年）六月，诏“增闰十二月，历纸印造施行。初颁历无闰月，及是见唐历置闰，遂续补焉”[4]。

【2】《十国春秋》卷15《南唐一·本纪》。

【3】《十国春秋》卷36《前蜀二·本纪》。

【4】《十国春秋》卷37《前蜀三·本纪》。

五代时期，官方还修过一些韵书，如后蜀广政四年（941年），史馆修《古今韵会》五百卷等。

第二节　五代十国私人的图书编撰

五代十国时期，私人图书编撰也比较繁荣，兹据薛居正《旧

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吴任臣《十国春秋》、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书，举例如表30：

表30　五代十国图书编撰家例表

国别	姓名	生卒年	字	籍贯	著作举例
后梁	陈康图				《拟玄集》等
	钟安礼				《资吟集》等
后唐	王衍				《烟花集》等
	高辇				《昆玉集》、《丹台集》等
后晋	郑云叟				《拟峰集》、《续酒谱》等
	熊皦				《屠龙集》、《南金集》等
后周	马裔孙		庆先	棣州	《法喜集》、《佛国记》等
	王溥	922—982	齐物	祁	《翰林酬唱集》等
	和凝	898—955	成绩	须昌	《宫词》等
吴	殷文圭			池州	《登龙集》、《笔耕》等
	沈颜		可铸	德清	《聱书》、《解聱书》等
	游恭			建安	《小东里集》、《广东里集》等
	杨夔				《纪梁公对》、《原晋乱说》等
南唐	徐锴	920—974	楚金	广陵	《赋苑》
	徐铉	916—991	鼎臣	广陵	
	陈彭年	951—1017	永年	南城	《唐纪》、《江南别录》等
	朱遵度			青州	《鸿渐学记》、《群书丽藻》等
	韩熙载	902—970	叔言	北海	《格言》、《皇极要览》等
	章僚				《海外使程广记》等
	张易				《谏书》、《大唐直臣谏奏》等
	郑文宝				《南唐近事》、《江表志》等
吴越	赞宁			德清	《高僧传》、《内典集》等
	罗隐	833—909	昭谏	余杭	《江东集》、《谗书》等
	皮光亚				《皮氏见闻录》、《启颜录》等
	钱俨		诚允	临安	《皇猷录》、《吴越备史》等
	钱易		希白	临安	《南部新书》、《青云总录》等
	钱惟演	？—1033	希圣	临安	《典懿集》、《逢辰录》等

续表

国别	姓名	生卒年	字	籍贯	著作举例
楚	石文德			连州	《大唐新纂》等
闽	黄滔	840—?			《东家编略》、《泉山秀句集》等
	刘乙		子真	泉州	《百悔经》等
	陈致雍			莆田	《闽王列传》、《五礼仪鉴》等
南汉	王定保	871—941			《唐摭言》等
	黄损		益之	连州	《桂香集》、《射法》等
前蜀	贯休		德隐	兰溪	《禅月集》、《宝月集》等
	杜光庭	850—933	宾圣	缙云	《广成义》、《武夷山记》等
	王仁裕		德辇	天水	《开元天宝遗事》、《紫阁集》等
后蜀	赵崇祚				《花间集》等
	彭晓		秀川	永康	《明镜图诀》等
	韦縠				《才调集》等
	韩保昇			潞州	《蜀本草》等
荆南	王贞范				《续正声集》、《文章龟鉴》等
	孙光宪	约900—968	孟文	贵平	《北梦琐言》等
	齐己	863—937		益阳	《白草集》、《风骚旨格》等

下面重点介绍马裔孙、殷文圭、沈颜、游恭、杨夔、徐锴、徐铉、韩熙载、章僚、陈彭年、朱遵度、赞宁、罗隐、钱俨、石文德、刘乙、陈致雍、黄损、杜光庭、贯休、韦縠、赵崇祚、王仁裕、彭晓、孙光宪、齐己等人。

马裔孙，字庆先，棣州滴河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朝，先后担任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等职。后周时在洛阳闭门锁居，唯事吟咏著述。博学好古，曾枕籍黄卷，抄撮《华严》、《楞严》等佛书，兼以歌咏，谓之《法喜集》。又汇集诸经要言为《佛国记》。

殷文圭，池州（一云陈州西华人），幼时居九华山苦学，墨砚为之穿。曾为宁国节度使田頵门客，后事吴太祖父子，以文章著称于世，武义元年（919年），拜翰林学士。有《登龙集》十

卷、《从军稿》二十卷、《笔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

沈颜，字可铸，湖州德清人。唐末天复初，举进士，授校书郎。于吴历仕礼仪使、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等职。性闲淡，不慕荣利，常病当世文章浮靡，仿古著书百篇为《聱书》十卷。还有《解聱书》十五卷、《大纪赋》一卷等。

游恭，建安人，唐末进士，博学能文，著称于世。于吴任馆驿巡官、知制诰等，有《小东里集》三卷、《广东里集》四卷等。

杨夔，与殷文圭、杜荀鹤、康骈、夏侯淑、王希羽等同为宁国节度使田頵上客。知頵不足以抗吴太祖，著文以戒之，竟不用。有《纪梁公对》、《原晋乱说》，当世争传其文。

徐锴（920—974），字楚金，南唐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徐铉之弟，世称“小徐”，著名文学家。南唐时历仕秘书郎、集贤殿学士等职。酷嗜读书，炎夏寒冬，未尝少辍，在集贤院任职时，“书册不去手，非暮不出”，后主因叹曰：“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1] 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说文通释》四十卷、《方舆记》一百三十卷、《说文隐音》四卷、《说文韵谱》十卷、《历代年谱》二卷等。

【1】《十国春秋》卷28《南唐·徐锴传》。

徐铉（916—991），字鼎臣，南唐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十岁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江南，人称“韩徐”。初仕南唐，后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与弟徐锴俱精文字学，人称“大小二徐”。曾与句中正、葛湍、土帷恭等校订《说文解字》，新补19字于正文中，又以经典相承及时俗通用而为《说文》所不载者402字附于正文之后，世称“大徐本”。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南唐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唐同光进士。后逃奔江南，历仕南唐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兵部尚书、中书侍郎等职。善为文，文人、道释求铭志碑记者络绎不绝，累获赏赐，有《拟议集》五十卷、《定居集》二卷。

章僚（或云张僚），南唐人，善著述。后主时任如京使，奉使高丽，搜集其国山川、事迹、物产等资料，著《海外使程广

记》三卷。详述高丽地理区划、职官、服制等。

陈彭年，字永年，南唐抚州南城人。幼爱学，其母惜其身，禁其夜读，陈彭年篝灯密室，复读如故。十三岁著《皇纲经》万余言，为名辈所赞赏。后主闻之，召入宫，令教其子。后入宋，仕至兵部侍郎。有文集一百卷、《唐纪》四十卷、《江南别录》若干卷等。入宋，预修多种官书。

朱遵度，青州人，南唐学者。家多藏书，人称"朱万卷"。为避耶律德光诏，挈妻孥和图书奔楚，文昭王待之甚薄。朱遵度杜门却扫，一意读书著书。众学士每写文章，多向其请教有关事件的古今首末，人称"幕府书厨"。后迁居金陵，高尚不仕，有《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和《漆经》若干卷。其中《群书丽藻》是一部大型类书，该书汇集"古今文章，著为六例：一曰六籍琼华，二百五十卷；二曰信心瑶英，一百八十卷；三曰玉海九流，三百五十卷；四曰集苑金銮，五十卷；五曰绛阙蕊珠，四十卷；六曰凤首龙编，一百三十卷。合为二百六十七门，总杂文一万三千八百首，勒成一千卷，又别撰为目录五十卷"[1]。

【1】《十国春秋》卷75《南唐·朱遵度传》。

赞宁，吴越德清人。宝正中，舍身杭州灵隐寺为僧。不久又到天台山。博物多识，辨说纵横。入宋，任翰林史馆编修等职，有《高僧传》、《内典集》、《外学集》等著作。

图86
罗隐



罗隐（833—909），本名横，字昭谏，吴越新登（今浙江富阳西北）人（图86）。少时即负盛名。但因议论时政、讥刺公卿，加上形貌丑陋，屡试不第，遂改名隐。后投吴越王钱镠，历仕钱塘令、著作佐郎等官。有《吴越掌记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东后集》三卷、《湘南应用》三卷、《谗书》五卷、《淮海寓言》七卷等。在谈到《谗书》的命名时，罗隐曾说：

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1]

[1] [唐]罗隐：《谗书·自序》。

当时罗隐久负盛名，有个叫罗威（罗绍威）的人，专门模仿其诗，据记载：

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赂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2]

[2]《旧唐书》卷181《罗威传》。

钱俨，字诚允，吴越文穆王第14子。幼年为沙门，长大后谨慎好学，刻苦读书，未尝中辍。忠懿王时，任镇东军安抚副使。后周时，任衢州刺史、光禄大夫等职。入宋，任诸州观察使等职。有《皇猷录》、《光圣录》、《吴越备史》、《忠懿王勋业志》、《钱氏戊申英政录》等，又有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

石文德，楚连州人。酷好学，博览坟史，曾读范晔《后汉书》，摘其讹误数百条，一一为之辨驳。时人服其精博，以为刘知几《史通》不能过也。楚文昭王时，以其形貌丑陋，而不见用。文昭王之子重文德，曾延致门下，王怒甚，欲逐之。后值秦国夫人死，学士多献挽词以进，文德撰词云："月沉湘浦冷，花谢汉宫秋。"王大惊，曰："文德负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宫小儿却能知人邪！"[3] 遂授水部员外郎。名其乡曰儒林。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

[3]《十国春秋》卷13《楚·石文德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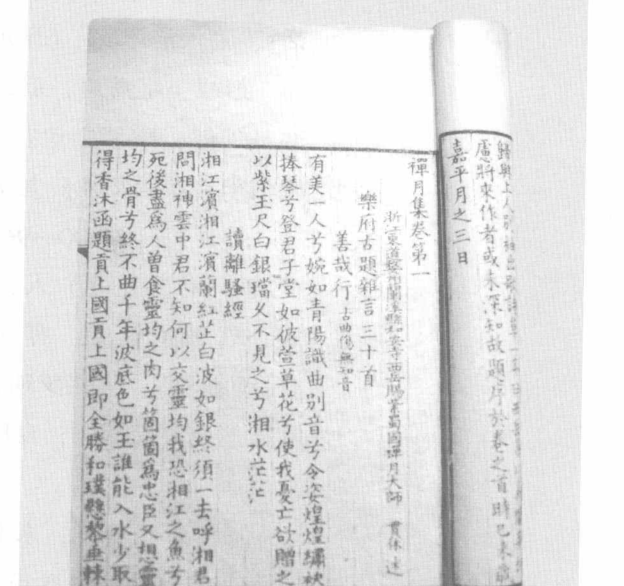
刘乙，字子真，闽泉州人。通文时，任凤阁舍人之职，后弃官隐凤山，有"扫石云随帚，耕山鸟傍人"的名句[4]。尝酒醉与人争妓，既醒惭悔，因集古代文献中以酒致失的故事，编以自警，题为《百悔经》。

[4]《十国春秋》卷97《闽·刘乙传》。

陈致雍，闽莆田人，博洽善文辞，历仕闽、南唐二朝，担任过太常卿、秘书监等职务，有《晋安海物异名记》、《闽王列传》、《五礼仪鉴》等书。

黄损，字益之，南汉连州人。少负大志，隐居静福山。后梁举进士，后汉历仕尚书、左仆射等职。工诗赋，每遇佳山水，留题殆遍。曾经将《阴符》、《鬼谷》之言依类编排，著为三种书，号称“三要”。黄损与郑谷、齐己等人定近体诗诸格，为湖海骚人所宗，有《桂香集》、《射法》等。

杜光庭，字宾圣，缙云人，著名道士。唐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入天台山修道，后避乱入蜀，事王建父子，官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等。晚年隐居青城山，号东瀛子。有《洞天福地记》一卷、《录异记》八卷、《阴符经注》一卷、《广成义》八十卷、《东瀛子》一卷、《青城山记》一卷、《武夷山记》一卷、《墉城集仙录》十卷、《崇道记》一卷、《混元图》十卷、《传受年载记》一卷、《元门枢要》一卷、《道门枢要》一卷、《续成都记》一卷、《名贤姓氏相同录》一卷、《兼明书》十二卷、《仙传拾遗》四十卷、《老子常谈净注》一卷、《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缑岭会真王氏神仙传》五卷、《规书》一卷、《道教灵验记》二十卷、《历代帝王崇道记》一卷、《古今类聚年谱图》一卷等。


處將來作者或未深知故題序於卷之首時巳未歲
嘉平月之三日

禪月集卷第一

樂府古題雜言三十首

善哉行 古曲傷無知音

有美一人兮婉如青陽識曲別音兮令姿煌煌繡袂
捧琴兮登君子堂如彼萱草花兮使我憂亡欲贈之
以紫玉尺白銀璫久不見之兮湘水茫茫

讀離騷經

湘江濱湘江濱蘭紅芷白波如銀終須一去呼湘君
問湘神雲中君不知何以交靈均我恐湘江之魚兮
死後盡爲人曾食靈均之肉兮箇箇爲忠臣又想靈
均之骨兮終不曲千年波底色如玉誰能入水少取
得香沐函題貢上國貢上國即全勝和璞

图87
《禅月集》四部丛刊本书影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前蜀著名诗人、书画家。自幼出家，日读《法华经》千字，过目不忘。工篆隶草书，其诗号为“姜体诗”，与僧齐己齐名。有《禅月集》一卷、《西岳集》四十卷等。其《禅月集》由其弟子昙域整理而成（图87）。

韦縠，生卒年不详，少有文藻。后蜀时任监察御史、户部尚书等职，编《才调集》十卷，其序云：

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光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之，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

该集所选之诗包括唐代各个时期，但不以时代先后为序，所选取标准是“韵高”、“词丽”，偏重闺情，风格浓艳。

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以文辞知名秦、陇间。历仕前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朝，先后担任中书舍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据吴任臣《十国春秋·王仁裕传》:“仁裕喜为诗，其少也，尝梦剖其肠胃，以西江水涤之，顾见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进。”梦中之事，虽属荒诞，然其颇富文才，却是一个事实。平生作诗万首，蜀人称为“诗窖子”。有《紫阁集》、《乘轺集》、《西江集》、《王氏见闻录》、《玉堂闲话》、《入洛记》、《开元天宝遗事》、《国风总类》等著作。

彭晓，字秀川，后蜀永康人。广政初，授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善修炼养生之道，别号“真一子”。有魏伯阳《参同契注》九十卷、《明镜图诀》一卷等。

孙光宪（约900—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荆南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事南平三世，官检校秘书少监等职。入宋，任黄州刺史。有《荆台集》、《桔斋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等。其中《北梦琐言》为其仕荆南高氏所作，自序云：

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箧，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

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

可知该事积三十余年之资料而编成。在编撰过程中，“三复参校”，态度非常严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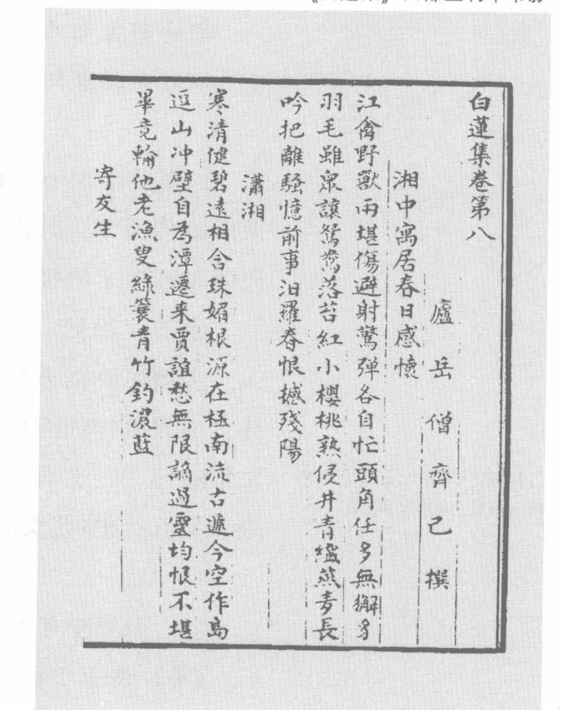
齐己（863—937），荆南益阳人。著名诗僧。自幼聪慧，诗才秀发，曾携《早梅》诗往谒郑谷，谷改一字，人称谷为齐己“一字之师”。齐己有《白莲集》、《风骚旨格》等著作。齐己生当唐末五代乱离之世，一般士子多攀龙附凤，寻找靠山，而齐己却卓尔不群，对各种割据势力采取坚不合作的态度，正像他在《自题》诗中所说：“未尝将一字，容易谒诸侯。”[1] 他非常羡慕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司空图，其《寄华山司空图》诗云：

【1】[五代]齐己：《白莲集》卷6。

> 天下艰难际，全家入华山。
> 几劳丹诏问，空见使臣还。
> 瀑布寒吹梦，莲峰翠湿关。
> 兵戈阻相访，身老瘴云间。[2]

【2】《白莲集》卷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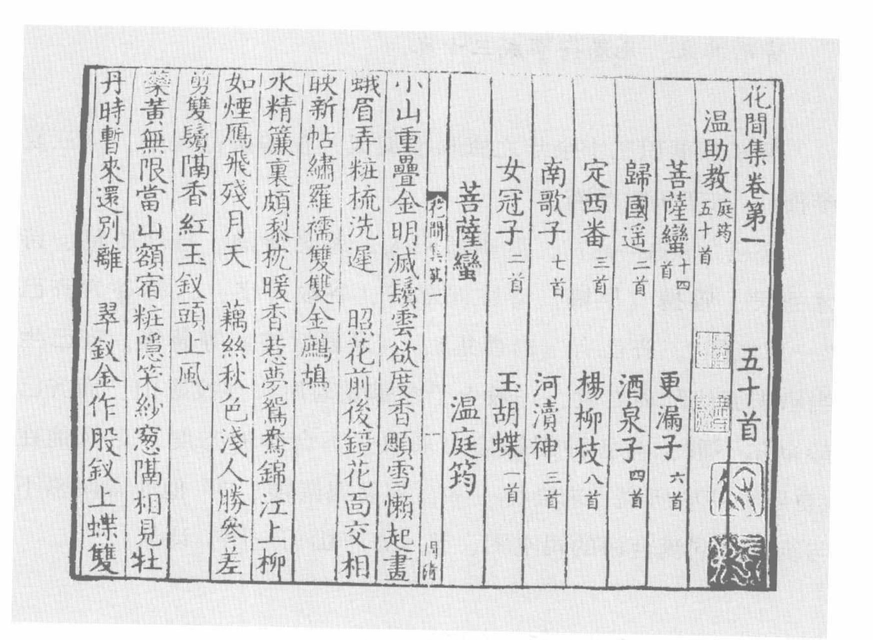
图88
《白莲集》四部丛刊本书影


白蓮集卷第八
廬岳僧齊己撰
湘中寓居春日感懷
江禽野獸兩堪傷避射驚弾各自忙頭角任多無獬豸
羽毛雖衆讓鴛鴦落苔紅小櫻桃熟侵井青纖燕麦長
吟把離騷憶前事汨羅春恨撼殘陽
瀟湘
寒清健碧遠相含珠媚根源在極南流古遞今空作島
逗山沖壁自為潭遷來賈誼愁無限謫過靈均恨不堪
畢竟輸他老漁叟綠蓑青竹釣濃藍
寄友生

其《白莲集》由其门人西文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编辑而成，据孙光宪《白莲集序》：“师平生诗稿，未遑删汰，俄惊迁化。门人西文以所集见授，因得编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题曰《白莲集》。”（图88）

赵崇祚，生卒年不详，曾任后蜀卫尉少卿职，编有《花间集》（图89），据该书欧阳炯序：

> 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



花間集卷第一　五十首
溫助教庭筠五十首
菩薩蠻十四首　更漏子六首
歸國遥二首　酒泉子四首
定西番三首　楊柳枝八首
南歌子七首　河瀆神三首
女冠子二首　玉胡蝶一首
菩薩蠻　溫庭筠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顋雪懶起畫
蛾眉弄粧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
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
如煙鴈飛殘月天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
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蘂黄無限當山額宿粧隱笑紗窻隔相見牡
丹時暫來還別離　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

图89
《花间集》宋建康本书影

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以阳春之甲，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广政三年夏四月大蜀欧阳炯叙。

该书共录唐五代词十八家、五百篇，其中不少作品，赖此书得以流传至今。其内容多写地主官僚骄奢淫逸的颓废生活，对后代词风产生了消极影响。

徐锴、徐铉、韩熙载、章僚、陈彭年、朱遵度等都是南唐人。南唐堪称南方的图书编撰中心。据唐圭璋《南唐艺文志》统计，南唐著作约有175种，其中经书12种、史书37种、子书44种、文集82种[1]。为什么南唐会成为南方的图书编撰中心呢？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云：

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坟典；后主开宏文馆，置《诗》、《易》博士于秦淮，设国子监，横经齿胄者千余人。后复

【1】《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期。

置庐山国学，所统州县亦往往立学。方是时，废立如吴越，弑逆如南汉，叛亲如闽楚。而南唐兄弟辑睦君臣义安，衣冠文物，甲于中原，不可谓非好文之力也。

除了南唐之外，吴越和前蜀的图书编撰也比较发达。五代十国的著作总数约有11 810卷，其中经书1 529卷、史书3 357卷、子书1 716卷、诗文集5 208卷[1]。其中诗文集最多，约占著作总数的44.1%。

【1】[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

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的图书出版与流通

第一节　冯道与国子监刻书

五代国子监刻书是中国古代官方刻书之始，冯道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五代监本经书不仅是五代时期的官定国家标准本，而且是历代官方刻印儒家经典的祖本。其版式、行款等对历代国子监刻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冯道其人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人（图90）。自幼为人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1]。长大从军、当官之后，亦能廉洁自律，与士民同甘苦，据《新五代史·冯道传》：

【1】《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 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道，道不能却，寘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其解学士居父丧于景城，遇岁

饥，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潜为之耕。其人后来媿谢，道殊不以为德。



图90
冯道

冯道于唐末曾在藩镇刘守光河东军张承业、晋王手下任职。五代时，历居诸朝显官要职：后唐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州节度使等职；后晋任司空中书门下平章事、司徒兼侍中、太尉等职；契丹灭晋，曾事契丹太傅；后汉任太师等职；后周任太师、中书令等职。冯道在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像走马灯似的社会环境中，竟然三入中书，身居相位二十余年，是位不倒翁式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冯道本人自我感觉良好，他在《长乐老自叙》中自我评价说：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1]

【1】《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到底怎样客观评价冯道？宋司马光评论说：

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2]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后周纪二》。

司马光是以政治家的眼光立论的，他忘记了冯道对于文化事

业的巨大贡献，据《旧五代史·冯道传》：

> 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

也就是说，冯道是五代国子监刻印群经的发起人。为什么首先要刻印儒家群经？冯道晚年认为自己“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可见他确有统一全国的愿望，也许刻印群经正是冯道“致一统、定八方”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在政治上也不能完全否定他。

总之，冯道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不容易的。简单地把他当做反面人物加以鞭挞是不公平的，他在雕版印刷方面的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二、国子监刻书概况

五代国子监先后刻过儒家群经、《经典释文》、《贞观政要》等。

关于监本群经的刻印经过，据宋王溥《五代会要·经籍》：

>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而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需依所颁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
>
> 汉乾祐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

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

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又据宋王应麟《玉海·艺文》：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命国子监校正《九经》，以西京石经本抄写，刻板颁天下。四月，命马缟、陈观、田敏详勘。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

由此可知，监本群经的刻印可分两个阶段：后唐长兴三年（932年）至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为第一阶段，刻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为第二阶段，刻有《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历时四朝七帝二十二年，终于完成了监本群经的刻印工作。

关于《经典释文》的刻印经过，据《五代会要·经籍》：

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

又据《玉海·艺文》：

周显德中诏刻《序录》、《易》、《书》、《仪礼》、《周礼》四经释文，皆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自是相继校勘《礼记》、三传、《毛诗音》，并拙等校勘。又《古文尚书》音义，周显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并书刻板。

由此可知，监本《经典释文》自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始雕，至显德六年（959年）雕成，历时五年，为什么要刻印《经典释文》？《经典释文》是唐陆德明撰写的一部关于群经音义的训诂著作，该书兼采汉魏六朝著作二百三十余家，考证各本异同，是研究群经的重要参考书。

《贞观政要》于天成二年（927年）由后唐国子监刻印。据汪应辰《文定集·〈贞观政要〉》：

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板（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时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穴（窘）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灯下书。

可见此跋作于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汪应辰"除知福唐"前夕写成的。为什么要刻印《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唐人吴兢所著的一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著作，该书类编了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的问答、大臣诤议和劝谏的奏疏，以及政治举措，国子监刻印此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三、群经底本、校勘及其他

关于监本群经的底本，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考证甚详：

监本《九经》虽依唐石经文字，然唐石经专刊经文，监本则兼经注。考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经注本……又注家略例、序文，无不载入。是石经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时病其文繁，故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监本反是，虽兼经注，非径以经注本上板，乃用石经经文，而取经注本之注以加之，故长兴三年敕云："遍注石经"；《会要》云："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则其渊源编写，可得而知。然监本经文虽依石经，亦非无所校定，如《礼记》不以《月令》为首，《尚书》"若网在纲"改为"若纲在网"，显与石经本殊异。

可见五代监本群经并非完全照刻西京石经（即唐开成石经），其异有二：一是西京石经只有经文，没有注文，而五代监本群经则经注兼备；二是监本群经经文亦有改窜之处。

底本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校勘工作，要对底本进行整理。据田敏《进印板书》奏：

臣等自长兴三年较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镌。幸遇圣朝，克经盛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进。[1]

田敏（879—971），淄州邹平人，少通《春秋》，后梁贞明中登科，任国子四门博士。后唐历任国子博士、屯田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后晋历任检校工部尚书、户部侍郎、兵部尚书、宏文馆学士、检校右仆射等职，还曾两任国子祭酒。后汉历任尚书右丞判国子监等职。后周历任太常卿、检校左仆射、工部尚书、太子少保等职。周世宗称其"详明礼乐，博涉典坟，为儒学之宗师，乃荐绅之仪表"[2]。宋开宝四年（971年）卒，终

【1】《全唐文》卷865。

【2】《宋史》卷431《田敏传》。

年92岁。田敏在五代时同冯道一样，历任要职，从而保证了该书工作的正常进行。作为刻印监本群经的主持人，田敏是仅次于冯道的第二功臣。留传到五代的群经诸本“传写纰缪，渐失根源”，田敏等“旁求援据”，为校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好为穿凿”，多改经文，“世颇非之”[1]。除了田敏之外，据上引《五代会要·经籍》和《玉海·艺文》，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周易》博士郭忠恕等也参与了校勘工作。又据《宋史·儒林传》：

【1】《宋史》卷431《田敏传》。

> 汉乾祐中，（聂崇义）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国学。（尹拙）与（张）昭及田敏同详定《经典释文》。

可见聂崇义、尹拙、张昭三人也参与了校勘工作。校勘工作贯穿于刻印工作的始终。群经校勘规模较大者至少有两次：第一次在长兴三年（932年）二月，由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第二次在长兴三年（932年）四月由马缟、陈观、段颙、路航、田敏等充详勘官，再次校勘。《经典释文》先由国子监官员初校，后由张昭、田敏详校。

底本经过校勘，第二步就是手写上板，即“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这就是说，写板人有两个条件：一是必为“选人”，选人即候补官员；二是善写端楷的书法家。到底有哪些人参与了写板工作？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十：

> 右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鹗书。鹗，五代时仕为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

可见《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等九经多由李鹗书写。据宋洪迈《容斋随笔·周蜀九经》：

> 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

可见《周礼》由郭嵠书写，《经典释文》由朱延熙书写。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仪礼》、《春秋谷梁传》亦当由郭嵠书写。据上引《玉海》卷37《艺文》，《古文尚书音义》由郭忠恕"覆定古文并书刻板"。郭忠恕是五代著名书画家，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曾任国子监书学博士。

监本群经的行款均为半页八行，每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与唐人卷子本大小行款一一相近。王国维认为：

> 此乃五代、南北宋监中经注本旧式。他经行款，固不免稍有出入，然大体当与之同……又后来公私刊本，若建大字本、兴国军本、盱江廖氏及相台岳氏本，凡八行十七字本，殆皆渊源于此。[1]

[1]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五代监本的刻工今已无考，但据上引《五代会要·经籍》可知，国子监刻书实行定额管理，规定"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关于群经的刻印经费，据《册府元龟》卷608《学校部·刊校》："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

可知当时尚未专项刻书经费，刻书工费来源有三：一是挪用政事堂厨钱的一部分，厨钱即招待费；二是挪用诸司办公费的一部分；三是及第举人缴纳的礼钱。至于校勘人员的报酬多为袭衣、缯彩等实物，据《册府元龟》卷601《学校部·恩奖》："赐田敏袭衣、缯彩，又赐司业赵铢袭衣、缯彩。"由此可知，司业赵铢当也参与了校勘工作。

尽管五代时期一个个皇帝匆匆来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不管是谁登上皇帝的宝座，都毫无例外地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这正是监本群经的刻印工作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所在。诚如上引《五代会要·经籍》所说，五代国子监刻印群经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儒家经典的钦定标准本，“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需依所颁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系统刻印儒家群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壮举，而且是10世纪前期，世界历史上一项无与伦比的规模巨大的出版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第二节 吴越、川蜀等地刻书与五代十国的抄书

吴越、川蜀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发祥地，也有不少刻书的记载。除了刻书之外，五代十国时期，手工抄书仍然是一种常见的图书制作方式。

一、吴越、川蜀等地刻书

吴越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辖区相当今之浙江全省及江苏南部一带。唐景福二年（893年），钱镠为唐镇海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梁太祖朱温封他为吴越王，建都杭州。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降于北宋，共历五主七十二年。吴越是五代时期南方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可考吴越印刷品有以下数种[1]：

（一）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数卷。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钱弘俶又称钱俶（入宋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改），在位时间最长。钱氏诸王均佞佛，钱俶尤甚，造释迦塔数以万计。

【1】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2期。

（二）高僧延寿（904—975）于天福四年（939年）前后刻印的《弥陀塔图》、《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大悲咒》等。延寿，字仲玄，号“抱一子”，杭州人。34岁出家，最为钱俶恩宠，令住灵隐寺，赐智觉禅师号。后入住永明寺，世称永明大师。四众钦服，声被异域，有弟子二千余人。宋开宝八年（983年）圆寂，终年72岁，著《宗镜录》一百卷行世。张秀民先生说：

> 钱弘俶与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计六十八万二千卷（或本）。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可说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少见的。[1]

[1] 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2期。

（三）水心禅院住持道诜造舍《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日本有此件覆刻本。

五代时期，四川一带先后建立过前蜀（903—925年）、后蜀（933—965年）两个小国。唐大顺二年（891年），王建攻占成都，天复三年（903年），唐封其为蜀王。四年后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同光三年（925年）为后唐所灭，共历二主二十三年。同光三年（925年），孟知祥为后唐西川节度使，长兴四年（933年），后唐封其为蜀王，次年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后蜀。建隆三年（965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二主三十三年。兹根据有关资料，开列前蜀、后蜀刻书目录如下：

（一）前蜀任知玄刻印《道德经广圣义》，据王欣夫《文献学讲义·道书的刻行》：

> 在唐朝灭亡的第二年（908年），前蜀任知玄身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年内雕成四百六十余版，藏在龙兴观，印造流行。

（二）前蜀乾德五年（923年）昙域刻《禅月集》。这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别集刻本之一。据《禅月集》昙域后序：

> 暇日或勋贤见访，或朝客相寻，或有念先师所制一篇二篇，或记三句五句，或未闲深旨，或不晓根源。众请昙域编集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枝梧，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板部，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岁。

（三）陈诹别集的刻印。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

> 唐前朝进士陈诹，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跸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颍川尝以诗道自负，谒荆幕郑准。准以自负雄笔，谓颍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数处回缄，祈为假手。"颍川自旦至暮，起草不就，盖欲以高之。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可见前蜀时陈诹诗集已有刻本。"昭宗劫迁"发生于唐天复四年（904年），唐昭宗被朱温劫离长安东迁。陈诹于该年由中原返蜀，其自刻诗集当在天复四年（904年）以后数年间。虽然陈诹原籍在成都之南的青神县，但其交游者韦庄、杜光庭等皆在成都，其返蜀后亦在成都活动无疑，则陈诹刻书地亦在成都。而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之杜光庭，当陈诹返蜀的天复四年（904年），已经55岁，后读陈诹自刻诗集，称之为"先辈"，则陈诹刻书时已有60余岁[1]。

（四）前蜀咸康元年（925年），刻印历书。据《十国春秋·前

【1】翁同文：《刻印文集最早者唐末蜀人陈诹》，《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1987年。

蜀三》：

咸康元年六月，诏增闰十二月，历纸印造施行。初颁历无闰月，及是见唐历置闰，遂续补焉。

（五）后蜀孟昶广政十六年（953年），毋昭裔刻印群书。据宋代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毋公印书》：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兮。"复雕九经诸书。两蜀文字，由是大兴。

又据《宋史·毋守素传》：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龙门人。父昭裔，伪蜀宰相、太子太师致仕……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

由引可知，毋昭裔刻有《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书。他是我国古代家刻的先驱。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毋昭裔与毋守素是父子二人，毌丘俭是三国人，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首页首条误称毋昭裔、毋守素为一人，王明清《挥麈余话》误称毋昭裔为毌丘俭，应予纠正。

五代十国时期，除了国子监、吴越、川蜀刻书之外，尚有如下记载：

（一）和凝集之刻印。和凝（898—955），字成绩，汶阳须昌人，自幼聪敏好学，17岁举明经，19岁登进士，先后担任过御中侍御史、端明殿学士、中书侍郎平章事、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职，后周显德二年（955年）秋，以其背疽卒于家，终年58岁。和凝平日好修整容貌，车服仆从，必加华楚。礼贤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史书称其“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1]。和凝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早自刻别集的文人之一。如果因此而称其“尤好声誉”，是不公平的，和凝敢于利用雕版印刷这种先进技术传播作品，为印刷术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1】《旧五代史》卷127《和凝传》。

（二）五代刻《唐韵》和《切韵》，载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其书为法人伯希和所窃取，今藏巴黎图书馆。

（三）后唐洛阳王家刻印的《弥勒下生经》。经卷后印“洛京朱家装印”、“洛京历日王家雕字记”两行，最后还有残存墨书：“从悔奉为亡妣特印此经一百卷”。可见此经的供养者为悼念已故母亲，专门印制，数量多至百卷；雕版者为洛阳王家书坊，该书坊是雕印历日的专业书坊；装印者是洛阳朱家书坊，该书坊是专门从事印刷、装订的专业书坊。

【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五代》。

（四）南唐昇元四年（940年）刻印《绮庄集》。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刘绮庄歌诗》四卷。右唐四库书目有《绮庄集》十卷，今所余止四卷，诗三十二，启状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纸墨甚精，后题曰：昇元四年重题印其文云云。”

图91
南唐“建业文房之印”



（五）南唐刻刘知几《史通》、徐陵《玉台新咏》，上有“建业文房之印”（图91）[2]。

（六）南唐保大间刻《楞严经》。据马令《南唐书》卷26：

> 僧应之姓王，其先南闽人，能文章，习柳氏笔法，以善书冠江左。初举进士，一黜于有

司，投册骂曰："吾不能以区区章句而程于庸人。"遂学为浮屠。保大中，授文章应制大德、赐紫，凡祷祠章疏一笔即就，意如宿构。元宗喜《楞严经》，命左仆射冯延巳为序……应之书。镂版既成，上之，元宗叹曰："是深得公权之法者也。"

（七）南唐青州刻王师范判案公文。据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

王师范性甚孝友，而执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殴杀美人张氏，为其父诣州诉冤。师范为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之，呼之为父，冀其可厚赂和解，勉谕重叠。其父确然曰："骨肉至冤，惟在相公裁断尔。"曰："若必如是，即国法，予安敢乱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责。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事》。

（八）后晋开运四年（947年）曹元忠雕印的《观世音菩萨像》（图92）和《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图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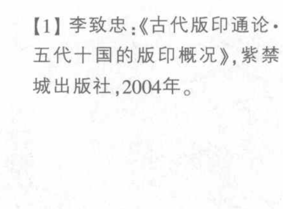

【1】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五代十国的版印概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图92（左）
曹元忠刻《观世音菩萨像》

图93（右）
曹元忠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九）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曹元忠雕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图94）[1]。

【1】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五代十国的版印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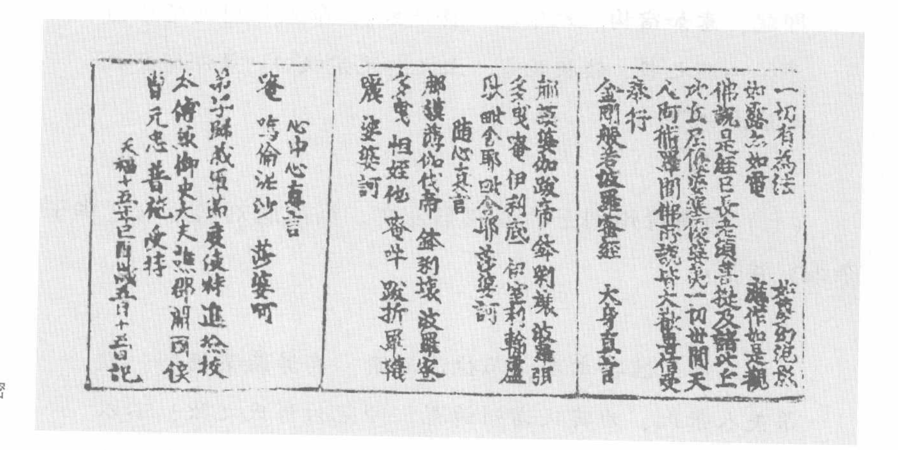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
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
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身真言
那謨婆伽跋帝 鉢喇壤 波羅弭
多曳 唵 伊利底 伊室利 輸盧
馱 毗舍耶 毗舍耶 莎婆訶
隨心真言
心中心真言
唵 嗚倫泥沙 莎婆訶
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
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
曹元忠普施受持
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

图94
曹元忠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十）五代杨洞芊刻《普贤菩萨像》（图95）[2]。

【2】白化文：《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年第3期。

（十一）五代雕版印刷的《阿弥陀佛像》（图96）和《文殊师利菩萨像》（图97）[3]。

【3】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五代十国的版印概况》。



图95
五代杨洞芊刻《普贤菩萨像》



图96
五代刻《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像》



图97
五代刻《文殊师利菩萨像》

二、五代十国的手工抄书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雕版印刷有所发展，但是手工抄写仍然是图书制作的主要手段，兹举例如下：

钱昭序，著名藏书家（生平详本章第一节），“书多亲写”[1]。

韩偓，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唐末龙纪进士，历仕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五代时，以不附朱全忠被贬，南投闽王王审知而终，著有《内庭集》、《金銮别纪》等，“自贬后，以甲子历历自记所在，其诗皆手写成帙”[2]。

李存勗，即后唐庄宗，后唐的创建者。“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3]。曾对勋臣自夸手抄《春秋》，又竖手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4]

郑遨，后唐滑州人，“时时为诗章落人间，人间多写以缣素，相赠遗以为宝，至或图写其形，玩于屋壁”[5]。

杨邠，后汉魏州冠氏人，官至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6]。可见他抄的都是史书。

王景绝，后汉人，“时时购四方书抄之，晚年集书数千卷”[7]。可见此数千卷图书，多由本人手抄。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闽王“泥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髹朱架，纳龙脑其中，以灭蠹蟫”[8]。每藏5 048卷，四藏则有20 192卷。抄写经藏之多，于此可见。且装帧讲究，还可防虫。抄写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书法家，据记载：“僧义英，泉州人，陈姓。励精释典，浃洽空妙。太祖造金银二藏经，闻义英善笔札，致之缮写，厚赀之。”[9]

后晋天福间东岳冥福禅院抄写《大藏经》一部，据周元休《东岳冥福禅院新写藏经碑》：

【1】《十国春秋》卷83《吴越七·钱昭序传》。

【2】《十国春秋》卷95《闽六·韩偓传》。

【3】《旧五代史》卷27《庄宗纪》。

【4】《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5】《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6】《新五代史》卷30《杨邠传》。

【7】《十国春秋》卷108《王景绝传》。

【8】《十国春秋》卷90《闽一》。

【9】《十国春秋》卷99《闽十·僧义英传》。

（施主李彦章等）坚比移山之志，勤用覆篑之功，仅越十年，始就前愿，凡写藏内经律论及圣贤传记等，共五千四百八十卷，并新纸墨，咸得精详，永用缄藏，是图悠久。[1]

【1】《全唐文》卷850。

闽王龙启元年“许饭僧三百万、缮经二百藏”[2]。如每藏以5 048卷计，200藏则有1 009 600卷，其抄经规模之大可知。

【2】《十国春秋》卷91《闽二》。

林鼎，字焕之，吴越侯官人。“性说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3]。

【3】旧题［宋］林禹等：《吴越备史》卷3。

查文徽，字先慎，南唐休宁人，“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数百卷”[4]。

【4】《十国春秋》卷26《南唐十二·查文徽传》。

韩熙载（生平详本章第三节），“性喜提奖后进，见文有可采者，手自缮写，仍为播其声名”[5]。

【5】《十国春秋》卷28《南唐十四·韩熙载传》。

邵拙，南唐宣城人。博通经史，有诗百篇，曰《庐岳集》，“又有手抄史传文集三百卷”[6]。

【6】《十国春秋》卷29《南唐十五·邵拙传》。

吴淑，字正仪，南唐润州丹阳人，“好学，多自缮写书籍”，国亡归宋，预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书[7]。

【7】《十国春秋》卷31《南唐十七·吴淑传》。

应用，南唐人，“以书法名江南，善写细字，微如毛发，常于一钱上写《心经》”[8]。

【8】《十国春秋》卷31《南唐十七·应用传》。

王文秉，南唐人，“善小篆，字画远过徐铉，所书《紫阳石磬铭》、《千字文》传于世”[9]。

【9】《十国春秋》卷31《南唐十七·王文秉传》。

李煜（生平详第十二章第二节），“喜作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穷谷道人、酸寒书生，鹑衣而鸢肩，略无富贵之气”，抄有《淮南子》、《春草赋》、《义天秤尺记》、《浩歌行》、《八师经》、《宫相诗》、《论道帖》、《招贤诗帖》、《乐章罗帖》、《乐府三临江仙》等[10]。

【10】［清］王士禛：《五代诗话》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王锴，著名藏书家（生平详第十二章第二节），“亲写释藏经若干卷。每趋朝，于白藤担子内抄书，书法绝工，其好学亦有足取者”[11]。

【11】《十国春秋》卷41《前蜀七·王锴传》。

文谷，后蜀成都温江人，“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1]。

句中正，字坦然，成都华阳人。明德中，授崇文馆校书郎，精于字学，“凡古文、篆、隶、行、草诸书，无所不工。常与宰相毋昭裔书《文选》等书行世”[2]。

孙光宪，字孟文，贵平人，性嗜经籍。聚书数千卷。其中不少图书是“或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3]。

【1】《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文谷传》。

【2】《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句中正传》。

【3】《十国春秋》卷102《荆南三·孙光宪传》。

三、五代十国的出版特点

综合分析上举材料，可知五代十国的出版有如下特点：

第一，就地区而言，汴（河南开封）、成都、杭州、金陵四地出版事业比较发达，汴是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作为出版中心是理所当然的。监本群经主要在这里刻印。和凝自著诗文集和张荐明刻《道德经》的地点也当在这里。作为国家藏书的秘书省，也当在这里抄了大量图书。成都是前蜀、后蜀的都城，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发祥地之一，继承了唐代遗风。毋昭裔在这里刻了那么多书，没有一大批熟练工人是难以胜任的。杭州是吴越的都城，也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发祥地之一。钱俶在这里刻印佛经84 000卷，可见印刷规模之大。金陵是南唐的都城，文化发达，抄写了大量图书。

第二，就出版方式而言，虽然雕版印刷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手工抄写仍然是图书制作的主要手段。经生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大量存在，然“经生多有不省文章，尝一邑有两人同官，其一或举杜荀鹤诗，赞‘也应无计避征徭’之句，其一难之曰：此诗误矣，野鹰何尝有征徭乎？举诗者解曰：必是当年科取翎毛耳”[4]。

【4】《五代诗话》卷2。

第三，就刻书单位而言，官刻和家刻发展很快。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代国子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按照既定计划代代相传，坚持刻完群经，实属不易。官方能够组织刻印如此卷帙丛重之书，说明官方刻书实力相当雄厚。毋昭裔、和凝等作为中国出版史上家刻的先驱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就内容而言，在大量出版宗教、杂书的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经书、类书、诗文集等。经书如监本群经、《经典释文》等；类书如《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诗文集如《文选》、《禅月集》等。

第五，就装订形式而言，册页装有了很大发展，斯坦因在《敦煌取书记》中曾经谈到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曹元忠雕印的《金刚经》：

> 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甚似近代之火车时间表。此小册佛经即为是式，共凡八页，只印一面，然而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隐。于是展开之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代为乾祐二年，即纪年后949年也。[1]

显然，这是一种经折装，但称其为“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似不确，因为当时的经折装不一而足。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图书流通

五代十国图书流通之例甚多，例如：李琪，后唐大臣，“以在内署时所为制诏，编为十卷，目曰《金门集》，大行于世”[2]。郑遨，著《拟峰诗》三十六章，“人多传之”[3]。沈颜，湖州德清人，有《聱书》、《解聱书》等“行世”[4]。邱旭，宣城人，有《宾明宴语》“行世”[5]。赵蕤，梓州盐亭人，有《长短经》十卷“行世”[6]。何光远，后蜀人，有《鉴诫录》十卷、《广政杂录》三卷等，“皆行于世”[7]。陈用拙，连州人，有诗八卷“行世”[8]。刘昭禹，桂阳人，有诗三百篇，“为集一卷行世”[9]。皮光业，襄阳竟陵人，随父皮日休移居苏州，有《皮氏见闻录》十三卷“行

【1】转引自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隋唐五代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旧五代史》卷58《唐书三十四·李琪传》

【3】《旧五代史》卷93《晋书十九·郑遨传》。

【4】《十国春秋》卷11《吴十一·沈颜传》。

【5】《十国春秋》卷31《南唐十一·邱旭传》。

【6】《十国春秋》卷44《前蜀十·赵蕤传》。

【7】《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何光远传》。

【8】《十国春秋》卷62《南汉五·陈用拙传》。

【9】《十国春秋》卷73《楚七·刘昭禹传》。

世"[1]。另据佚名《江南余载》卷下：

[1]《十国春秋》卷86《吴越十·皮光业传》。

> 庄布访皮日休不遇，因以书疏短其失，世颇传其文。日休子光业尝为吴越王使江南，辄问："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对曰："近世无闻，惟庄布赠皮日休书，家藏一本。"光业大惭。

从"家藏一本"可知，庄书流布之广。

以上诸例表明，五代十国时期，图书流通活动并未因为战争而中断。

一、图书流通的手段

五代十国图书流通的手段也有购买、颁赐、奉献、借阅等方式。购买即通过书市交易而流通，监本群经就是通过书市交易广为流通的，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7《后唐纪六》：

>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而甚广。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二月颁诏："天下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2] 不久又颁诏云：

[2]《旧五代史》卷27《唐书三·庄宗本纪》。

> 进纳四百卷以下，三百卷以上，皆成部帙，不至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数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官。[3]

[3]《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二》，中华书局，2003年。

这里表面虽然不是钱物交易，但在实际上，以书换官也是一

种变相的钱物交易。后唐明宗大量收购各地图经，据其《令诸道进州县图经敕》：

宜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所有装写工价，并以州县杂罚钱充，不得配率人户。[1]

[1]《全唐文》卷111。

可见图经的工本钱由地方财政的各类罚款支付。民间图书购买之例如：

彭玕，庐陵人，精于《春秋》，“尝募求西京石经，厚赐以金，扬州人至相语曰：‘十金易一笔，百金易一篇，况将士乎！’”[2]。这里所谓“西京石经”当指汉代熹平石经，彭玕以天价购买的当是该经残石。

[2]《十国春秋》卷73《楚七·彭玕传》。

王都，中山陉邑人，“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3]。

[3]《旧五代史》卷54《唐书三十·王都传》。

钟传，洪州高安人，好学重士。江西士流多因其荐而出名。诸葛浩素有词学，因择其事赫赫可称者十条，共五千字，列于启事以投之。钟传阅后大惊，对左右说：“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遂以五千贯，赠给诸葛浩[4]。

[4]［宋］陶岳：《五代史补》卷1。

颁赐即由皇帝颁赐图书于臣下，达到图书流通目的，例如：

据前引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折，监本群经印好之后，“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需依所颁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可见监本群经成书后，以皇帝的名义广颁天下，其流通之广，可想而知。

后晋天福五年（940年）五月，高祖“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5]。

南唐后主李煜“手书金字《心经》”赐于后主宫人乔氏[6]。

后蜀广政十六年（953年）五月，宰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镂板印《九经》，以颁郡县，从之”[7]。

[5]《旧五代史》卷79《晋书五·高祖纪》。

[6]《十国春秋》卷18《南唐四·乔氏传》。

[7]《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本纪》。

奉献即私人著作献给皇上，实现图书自下而上的流通，例如：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东第书籍”[1]。赵匡凝，字光仪，蔡州人，好学，有惠政，聚书数千卷。

【1】《旧五代史》卷3《梁书三·太祖纪》。

后梁贞明六年（920年）四月，前衡州长史刘隲进所撰《地理手镜》十卷[2]。

【2】《旧五代史》卷10《梁书十·末帝纪》。

郭昭庆，禾川人。博学，善著书。南唐元宗时，献《治书》五十篇。后主嗣立，献《经国治民论》[3]。

【3】《十国春秋》卷28《南唐十四·郭昭庆传》。

鲁崇范，庐陵人，自幼家贫，读书不辍。长大后，刻意藏书。据记载：

> 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会烈祖初建学校，典籍残阙，下诏旁求郡县，吉州刺史贾皓就取崇范本进之，以私缗偿其直。崇范笑曰：“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4]

【4】《十国春秋》卷29《南唐十五·鲁崇范传》。

鲁崇范以藏书为“天下公器”的说法是很高明的。古今藏书，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不应视为私有财产，更不应把它当做牟取暴利的工具。鲁崇范同那些秘不示人、主张“子孙永保”的藏书家相比，其精神境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洪庆元，南唐江宁人，曾任崇文馆直学士等职，喜读书，善著文，曾献书后主[5]。

【5】《十国春秋》卷31《南唐十七·洪庆元传》。

陈鄂，后蜀人，曾仿唐李瀚《蒙求》、高测《韵对》等书，为《四库韵对》四十卷，献给后蜀后主次子孟元珏[6]。

【6】《十国春秋》卷50《后蜀三·孟元珏传》。

孟宾于，字国仪，连州人。少孤力学，“以诗数百章，命为《金鳌集》献之”[7]。

【7】《十国春秋》卷75《楚九·孟宾于传》。

借阅也是一种常见的流通方式。从绝对意义上说，古代藏书，无论公私，都开展过借阅活动，只是范围大小，有所区别。

即使那些“秘不示人”者，也有亲朋好友借阅之例，只是借阅范围实在太小罢了。如前所引宋代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毋公印书》所云，毋昭裔为布衣时“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虽然藏书家并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借给他了。五代时不少藏书家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广招来学，这类开放的藏书家为图书借阅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

陈褒，江州德安人，“筑书楼，延四方学者”[1]。

罗绍威，字端己，原籍长沙人，后迁居魏州贵乡。“好学工书，颇知属文，聚书数万卷，开馆以延四方之士”[2]。

【1】《旧五代史》卷29《南唐十五·陈褒传》。

【2】《新五代史》卷39《罗绍威传》。

以上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图书流通的大概情况。比较而言，开封、成都、杭州、金陵是全国图书流通的中心地区。开封是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成都是前蜀、后蜀的都城，杭州是吴越的都城，金陵是南唐的都城。这些地方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交通便利，图书需求量大，公私藏书众多，为图书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另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唐释智昇著《法华言句》二十卷，“五代兵乱，其书亡。钱俶闻高丽有本，因厚赂贾人求得之，至今盛行于江浙”。可见吴越与高丽互通往来，未曾中断。既然吴越曾于高丽购得佚书，则高丽也当通过书贾购买吴越之书。

二、畅销书

根据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吴任臣《十国春秋》、王士禛《五代诗话》等书记载，可考五代畅销书有如下：

第一，儒家经典。据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折：“自有九经、五经之后，及三礼、三传已来，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废；缙绅之士，亦缄默而无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3] 可见群经是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考生众多，群经自然畅销。另外，群经也是五代学校的必修课，需求量则更大，这也正是五代国子监首刻群经，毋昭裔继刻群经的原因之一。据文献

【3】《旧五代史》卷148《选举志》。

记载，五代时期，精通群经者比比皆是，例如后梁朱诚精五经，“以五经教授乡里”[1]。后周司徒诩“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2]。南唐景遏“专以六经、名教为事”[3]。后周杨徽之“少通群经”[4]。在群经之中，《春秋》尤其畅销，例如后唐庄宗李存勗“善骑射，胆勇过人，稍习《春秋》”[5]。后唐乌震“少好学，通《左氏春秋》”[6]。后唐闵帝“好读《春秋》，略通大义”[7]。后唐张宪“弱寇尽通诸经，尤精《左传》[8]。后晋史匡翰“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时发难问，穷于隐奥，流辈或戏为‘史三传’”[9]。他如南唐朱元和吴仲举、后蜀刘保乂、楚国彭玕等都是研究《春秋》的专家。为什么研究《春秋》的人这么多？当与政治形势有关。五代时期战争频繁，与《春秋》所反映的内容相似，人们希望从《春秋》中找到拨乱反正的答案。

第二，史学名著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等。例如楚国石文德“常读范晔《后汉书》，摘其瑕璺数百条辨驳之，识者谓《史通》不能过也”[10]。刘素“不事科举，通迁、固、寿、晔之书”[11]。

第三，子书如佛经、道书、兵书等比较流行。人们试图研习佛经，找到乱世求安之方；道书与乱世归隐的思想有关；兵书则向人们提供百战百胜的法宝。吴越王钱弘俶刻印《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84 000卷，流传之广，不言而喻。后晋梁文矩“聚道书数千卷”[12]。吴越暨齐物“构垂象楼，贮道书几千卷”[13]。可见道书易得。兵书在读者中也有很大市场。例如后蜀王昭远“好读兵书”[14]。南汉潘崇彻，“颇读兵书，立战功”[15]。除了以上几类图书之外，《兔园册》五代时也很盛行。《兔园册》是一本类书，唐代蒋王李恽命僚佐杜嗣光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编为问答题，引证经史著作进行解释，编成此书。恽是唐太宗之子，因取汉代梁孝王刘武的兔园为名，题为《兔园册》（一作《兔园策》）。据《新五代史·刘岳传》：

【1】《新五代史》卷1《梁本纪》。

【2】《旧五代史》卷128《司徒诩传》。

【3】《十国春秋》卷19《南唐五·景遏传》。

【4】《五代诗话》卷2。

【5】《新五代史》卷5《唐本纪》。

【6】《新五代史》卷26《乌震传》。

【7】《旧五代史》卷45《闵帝纪》。

【8】《旧五代史》卷69《张宪传》。

【9】《旧五代史》卷28《史匡翰传》。

【10】《十国春秋》卷73《石文德传》。

【11】《五代诗话》卷3。

【12】《旧五代史》卷92《梁文矩传》。

【13】《十国春秋》卷89《暨齐物传》。

【14】《十国春秋》卷57《王昭远传》。

【15】《十国春秋》卷62《潘崇彻传》。

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刘）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

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说明《兔园册》流传甚广，上至朝官，下至"田夫牧子"，人手一册；第二说明《兔园册》是一本水平不高的启蒙读物。

第四，集部的一些诗文名集。例如萧统《文选》、韦縠《才调集》、后唐李琪《金门集》、前蜀后主王衍《烟花集》、后蜀释贯休《禅月集》、吴越钱元瓘《锦楼集》等，都广为传诵。

第十五章　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的发展

隋、唐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比过去更为紧密。皇室和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唐初对少数民族政策以安抚、羁縻为主，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有时还采取和亲的手段加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唐朝先后统一了北方和西北的突厥、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有一支回鹘人迁至西域，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在东北地区，契丹、漠河、室韦也设立了都督府。在西南地区，彝族和白族联合建立了南诏国，受到唐朝的册封。居住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俚、僚、蛮等族，分属岭南等道。

唐朝灭亡以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黄河流域相继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在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建立有十个国家。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十国中的北汉都是少数民族建立。

这一时期北方的于阗、突厥、回鹘，南方的吐蕃（藏族）发展较快，先后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编著了很多书籍，中国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开始兴旺起来。

第一节 于阗文图书的出版

一、于阗王国和于阗文的使用

于阗王国历史悠久，是西域一大强国。早在西汉时期与中原王朝就有联系，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来往频繁，隋唐时常遣使进贡，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其国王领安西节度副史名号。8世纪末被吐蕃占领，9世纪中叶左右，吐蕃内乱，于阗乘机独立，在西域与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鼎足而立。

于阗王统从汉代以来即是尉迟家族，9世纪中叶重新独立后，尉迟家族继续当政。于阗国深受唐朝文化影响，国内通行汉文，年号、纪年都仿汉制。内地的州县制、里甲制也在国内推行。五代时这些行政体系仍然沿用不废。国王自比唐朝宗室，改为国姓，名李圣天。从敦煌供养人画像看，李圣天身穿着汉族皇帝衣饰。其子李从德，亦用汉名。

隋唐时期的于阗国信奉佛教，是塔里木绿洲大乘佛教的中心。西晋的法显抵达于阗时，当地佛教僧人多达数万人。唐朝时僧人已有减少，但仍达五千余人。《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于阗国（瞿萨旦那国）“文字宪章聿尊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王甚骁武，敬重佛法”[1]。当时精通佛教经典的高僧辈出，许多人到唐朝和吐蕃译经讲学，弘扬佛法。

于阗国的主体民族一般认为是塞人，但学界还有很多说法。汉文史书对当地人的外貌有一段记载。《北史·西域传》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2] 藏文的《于阗国悬记》说“于阗乃印度人与汉人交会之国，其语言既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汉土，其文字悉同印度，习尚大有华风，其宗教仪俗和宗教用语则多遵印度”[3]。有的学者认为于阗国王尉迟氏原属吐谷浑，是西部鲜卑族，所以于阗人中有

【1】[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中华书局,1985年。

【2】《北史》卷97《西域传》。

【3】转引自黄振华:《于阗文研究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一部分有东方血统，与一般西域胡人有异[1]。亦有学者认为于阗国王李圣天是回鹘人[2]。有的学者则认为属于羌类。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于阗国在李圣天执政前便是回鹘人的政权，到李圣天时是回鹘政权的延续[3]。

对于阗国的情况不仅现在众说纷纭，早在北宋欧阳修撰修《新五代史》时，对于阗国的王统世系已不清楚："五代乱世，中国多故，不能抚来四夷，其尝自通于中国者仅以名见（指李圣天），其君世终始，皆不可知。"[4] 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只有"大宝国"、"同庆二十九年"见于汉文史籍[5]。

于阗文是新疆于阗地区发现的一种民族古文字，这种文字是印度婆罗米文的笈多王朝变体，记录的是于阗语或于阗塞语，又称东伊朗语或北雅利安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于阗文字母以辅音为主，采用附加符号表示元音，合体字也很多。

于阗文使用的时代有不同的说法，耿世民教授认为现存古代和阗—塞语文献多属公元3—11世纪初[6]。黄振华先生认为在6世纪以后，于阗地区通行汉文和于阗文，现有的于阗文文献属6—11世纪[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则认为于阗文文献约当5—10世纪[8]。牛汝极教授则认为于阗文大致开始应用于公元2世纪，成熟于6或7世纪，但存世的文献多为7—10世纪的遗物[9]。尽管各家说法不一，但对6—10世纪使用于阗文是一致的。

从后来发现的文献来看，公元6世纪以前，于阗国流行汉文与佉卢字，6世纪以后，通行汉文与于阗文。这种文字与实际语言完全相符，达到了言文一致，改变了以前佉卢字与于阗塞语不一致的情况。

【1】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389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2】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4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高永久：《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79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

【4】《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于阗》。

【5】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6】《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7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7】黄振华：《于阗文研究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8】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9】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1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二、于阗文图书

现已发现的于阗文文献大约有以下几类：

（一）佛教典籍类

1.《菩萨行愿赞》　　2.《佛本生赞》

3.《金光明经》　　4.《出生无边门陀罗尼》

5.《观自在陀罗尼》
6.《观自在赞颂》
7.《药师经》
8.《妙法莲华经》
9.《金刚般若经》
10.《阿育王譬喻》
11.《罗摩传》
12.《三归经》
13.《菩萨赞》
14.《理趣般若波罗密多经》
15.《甘露明陀罗尼》
16.《佛说无量寿经》
17.《智炬陀罗尼经》
18.《劫王经》
19.《业报经》
20.《僧伽陀经》
21.《首楞严三昧经》
22.《维摩诘经》
23.《贤劫经》
24.《般若波罗密多经》
25.《护命法门神咒经》
26.《善欢喜譬喻》
27.《阿育王譬喻》
28.《善财童子譬喻》
29.《金刚行愿赞》
30.《文殊师利化生经》
31.《忏悔经》
32.《白伞盖陀罗尼》
33.《佛顶尊胜陀罗尼》
34.《善门经》
35. 发愿文

（二）文书档案类

1.《使臣致于阗王奏报》
2.《尉迟释帝王赞颂》
3.《于阗王致曹元忠书》
4.《致金汗书信和奏报》
5.《七王子致于阗王书》
6.《朔方王子致于阗王书》
7.《朔方王子禀母书》
8.《致于阗王奏报甘州突厥情势》
9.《于阗—伽湿弥罗行程》
10.《于阗沙州行程》

（三）词汇集

1.《梵语—于阗语词汇集》
2.《突厥语—于阗语词汇集》
3.《汉语—于阗语词汇集》

（四）医药书

（五）文学类

诗歌如《佛本生赞》长达600多行，由尉迟尸罗用诗歌体创作。另有一些抒情诗。

（六）其他

账目、牒状、契约、铭文、练字作业等[1]。（图98）

自汉武帝通西域后，于阗地区与内地关系密切，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交流，汉文一直是当地的通用文字。于阗文传入当地后，汉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于阗文取代，但并未被废止，汉文对于阗文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于阗文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文献还在于阗文中夹写汉字。已发现的图书《汉语—于阗语词汇集》、《突厥语—于阗语词汇集》等表明了当时使用双语的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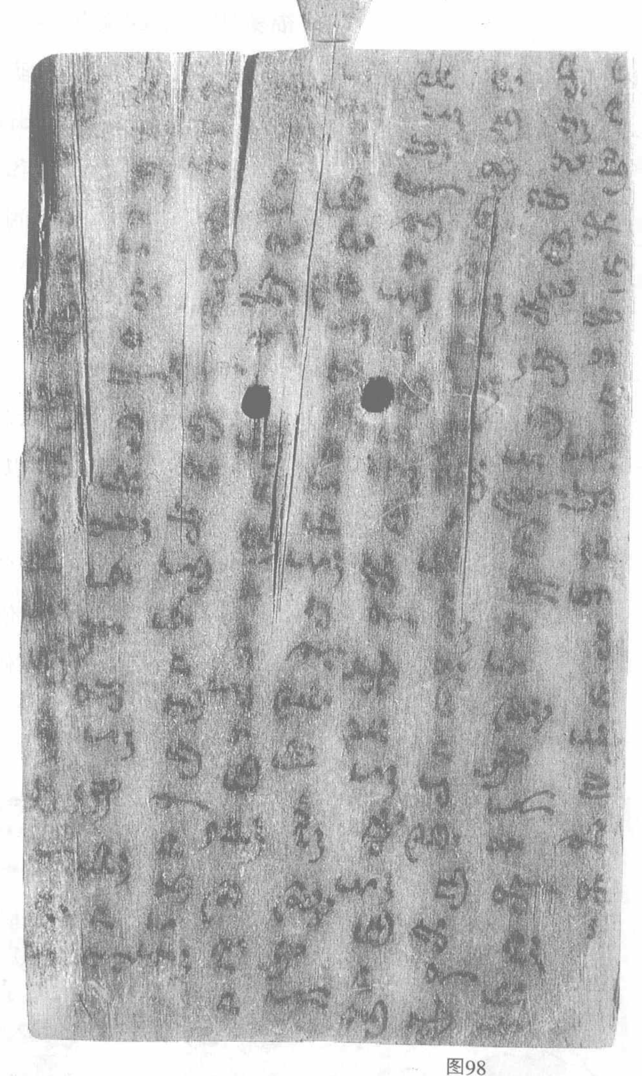


图98
于阗文契约（木函）

从于阗文的装帧形式看，主要有两种。一是梵夹装，纸叶左侧中间有一圆孔，以使用绳相连。另一种是卷轴装，纸的宽幅不等，一般在25厘米以内，卷子长度最长可达7米，这种卷轴装的图书往往是汉文与于阗文合璧。这两种不同的装帧形式反映出汉文化与印度文化在于阗地区的撞击与结合。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编号为P.3510的于阗文文献共10叶，梵夹装，前8叶是一发愿文，首尾完整，字迹工整，后2叶是另一篇发愿文的开头部分。在发愿文末节有一题记，意为"Tcumttehi太子叹佛功德而命人写讫"。据学者考证，Tcumttehi太子即是李圣天之子从德太子。从题记可知，当时有一批专业抄书人，专门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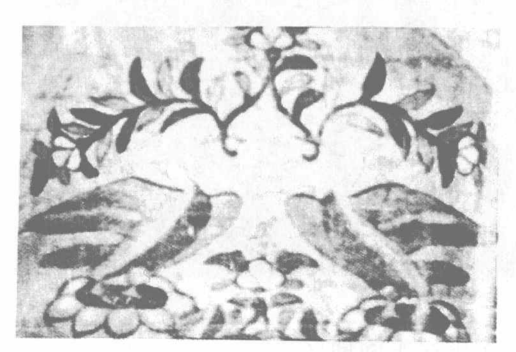
【1】黄振华:《于阗文研究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1辑,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人之请抄写经卷，而命人抄写者即以此为一种功德，为自己或他人祈福禳灾，于阗文长卷《佛本生赞》即是于阗王朝重臣张金山请人（一说自己）写成，献给当时于阗王的[1]。

【1】张广达，荣新江：《敦煌文书P.3510号(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拟）〉及其年代》，《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于阗文文献对了解和田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可以填补汉文史籍中的空白。著名的“钢和泰藏卷”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此卷从内容上看应定名《于阗沙州纪行》较为相宜，现以收藏者钢和泰（A. von Stael Holstein）得名。此件原出敦煌，20世纪20年代俄国人钢和泰在北京购得。原件为纸质，一面书写汉文佛经，另一面书写于阗文和古藏文。于阗文共73行，古藏文41行。于阗文1—51行内容是于阗王使者赴沙州的行记，记录了沿途村镇国家、山川地理、种族部落等，以及在沙州佛寺施财建塔、装修佛像等情况，第53—73行为韵文。经蒲立本（E. G. Pulleyblank）考定为公元925年所写。此件数十年来已有十多位各国学者进行了研究。

于阗文文献大多数是佛教典籍，这些佛典大多数直接译自梵文原著，这对研究西域佛教史和佛经流传史有很重要的意义(图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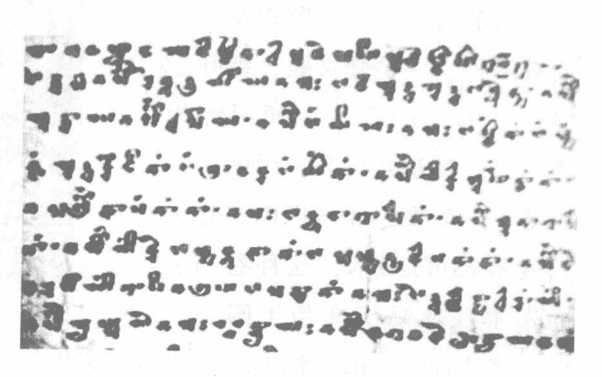


图99
于阗文《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英国贝利教授（H. W. Bailey）从1945年起将各国所藏大部分于阗文文献影印刊布，并进行了转写，计有《于阗文文献》六册（1945—1967年），《于阗文佛教文献》一册（1951年），影印原件《塞克文献》六册（1960—1973年），《于阗文抄本》一册（1938年），《塞克文献译文集》一册（1968年）等[2]。

【2】〔英〕贝利(Bailey)：《于阗文文献》(六册)，剑桥，1945—1967年；《于阗文佛教文献》，伦敦，1951年。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有一些于阗文文献出土，国内也有一

些专家进行研究，发表了有价值的论著[1]。

[1] 黄振华:《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文书中河西部族考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林梅村:《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第二节　粟特文图书的出版

一、粟特人和粟特文字的使用

隋唐时期，在西域的丝绸之路上活跃着一个新的民族——粟特人。粟特人是古代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民族，其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扎拉夫尚河流域。这一地区，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绿洲，构成了许多国家，中国史书称之为“昭武九姓”。居住在这里的粟特人属东伊朗人，与我国新疆的塞人、咸海周围的花剌子模人有血缘关系。中国史书中很早就出现过他们的名字，《晋书》称为“粟弋”，《三国志》作“属繇”[2]。《大唐西域记》作“窣利”，另有“速利”、“孙邻”、“苏哩”等译名，这些都是对钵罗婆语中Sulik的音译。粟特人自称Sogd，《北史》译为“粟特”[3]。

[2]《晋书》卷97《四夷传》;《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

[3]《北史》卷2《魏本纪二》,中华书局,1974年。

粟特人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新唐书》说他们“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4]。粟特人富于冒险精神，又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善于吸收、传授。粟特人与单一信仰佛教的塞人不同，其宗教信仰也是多元的，佛教、基督教、摩尼教、袄教在粟特人中都有各自的信徒。他们在公元前3—4世纪与中国已有接触，自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更是不绝于道，并且在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等地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聚居点。粟特人的经商和移民，加强了西域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对西域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

粟特商人的驼队带来了西域的特产，也传进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粟特文是广为使用的文字之一，这点被千年之后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粟特人有很高的文化。粟特人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他们生活在彼此隔离的绿洲。由于地理的分割、不同的宗教信

仰，粟特人使用不同的方言和文字。其文字属于阿拉美字母系统。起源于阿拉美字母的粟特文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用于书写不同宗教的文献，主要有书写佛经的佛经体，书写景教经典的古叙利亚体和书写摩尼教经典的摩尼体。粟特文一般是自右至左横写，后来受汉文的影响，也有自上而下竖写的。早期的粟特文字母之间分写，后来变成连写。《大唐西域记》中最早提到这种文字，说“字源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1]。根据对出土的粟特文献研究，佛经体字母17个，古叙利亚体字母22个，摩尼体字母29个。粟特字母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发生过重要影响，首先是回鹘人使用这种文字创造了回鹘文，其后，蒙古文、满文也传承了这种文字。

【1】[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

二、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粟特文图书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敦煌以西的烽燧中发现了6封粟特文信件，其中第二封长达63行，提到洛阳被匈奴人所破，中国皇帝逃亡等事。有的研究者将这批文献的时间定为4世纪，有的则认为在公元196年左右。与这批粟特文献一起出土的汉文文献则属于公元2世纪。不论其确切年代是何时，这批粟特文信件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粟特文文献。这批早期粟特文文献所用的字体与后来通行的三种文体还有较大的区别，被称为“老粟特体”，但它与后来的佛经体近似。

大多数粟特文文献的时代约在公元6—11世纪，大都是纸质抄本，也有一些木牍和羊皮书。篇幅较长的佛经《须达拏太子本生经》共34页，约1 500行。此外还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光明经》、《大般涅槃经》、《大悲经》、《禅经》、《善恶因果经》、《金刚般若经》、《长爪梵志所问经》、《青颈陀罗尼》等。这些佛经大多译自梵文、汉文和焉耆—龟兹文，属公元8—9世纪。摩尼教经典则译自钵罗婆语和安息语，年代约为公元8—10世纪，主要文献有《巨人书》、《福音书》、《国名录》及印度文学作品《五卷书》翻译残本等。景教经典则从古叙利亚语经典

中译出，年代约为公元6—11世纪，主要有《新约》残卷[1]。粟特文文献大多在敦煌、吐鲁番发现。

【1】龚方震：《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在20世纪初连续四次到新疆考察，掠走了大量文物，除泥塑、壁画、木雕、版画等艺术品外，还有数量惊人、文种繁多的古代写本，从第2次考察队开始担任队长的冯·勒·柯克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了发现粟特文文献的经过：

> 大量梵语（Sanskrit）文书的发现给佛教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此外还发现用叙利亚文（Syrian）写成的源于叙利亚的景教(Nestorian）教堂的礼拜著作，以及许多用粟特文（Sogdian）写成的涉及基督教派的写本。
>
> 我们还发现了其典籍的几张残页，这些残页上面都装饰有精美的细密画。这一荣誉应归功于冯·克·缪勒（F. W. K. Muller）教授，是他发现了这些文字的特征及其所表达的意义。书写这种文献所使用的文字是用中古波斯文和其他伊朗语文字，特别是用粟特文来书写的。后来，这些文献的突厥语译文，都是用晚期粟特文写成的——这一种文字曾被粟特人在较早的某个时期使用过。
>
> 这些摩尼教文献的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在整个北非、南欧、西亚，摩尼教在早期都有非常广泛的传播，这使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其为大敌，因此也使摩尼教的材料几乎荡然无存。
>
> 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请巴图斯同我一起去水盘（Shuipang）遗迹看看。这个遗迹靠近布拉伊克（Bulayiq）村庄，在吐鲁番城北边，以前我们曾去考察过。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在我们费力地挖开坍塌的土墙之后，看到了非常珍贵的基督教文献写本。在这中间，确定无疑的有公元5世纪巴拉维语（Pahlavi）的祷告文献

写本、中古突厥语翻译的圣乔治（Georgios）受难记以及其他基督教的不知名的经书，是关于三个国王去朝拜刚刚出生的基督的。但最有价值的，是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景教文献。这些文献中的一种文字后来在柏林被冯·安德瑞司和冯·克·缪勒发现是粟特语[1]。

【1】〔德〕冯·勒·柯克：《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陈海涛译，12~1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1932年在塔吉克斯坦的穆塔山发现了大批粟特文文献，这是在粟特故地首次发现粟特文书，自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这次发掘共发现了94件文书，其中两件为羊皮质地，上书阿拉伯文，另有5件粟特文书背面有汉文。这些文书属于8世纪，是研究当时粟特与唐朝、大食和突厥关系的重要文献。此外还有一些粟特文的碑铭，其中最重要的是蒙古布古特发现的6世纪的碑铭和1899年在中国黑城子发现的9世纪九姓回鹘可汗碑（图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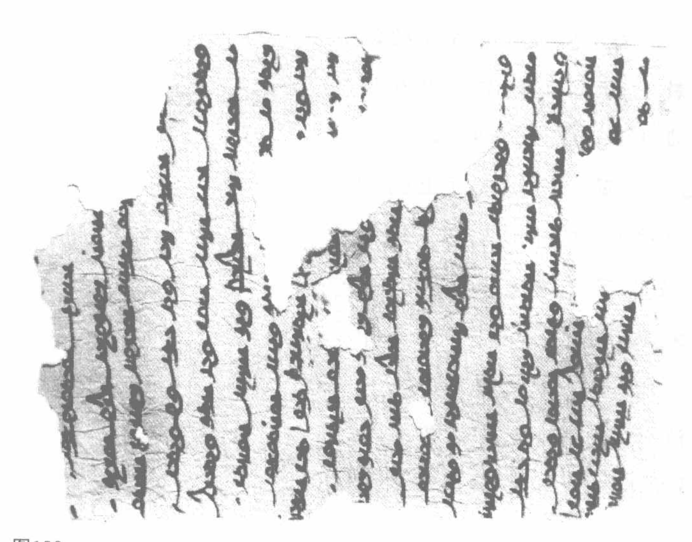


图100
粟特文文书

粟特文文献在19世纪末发现以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兴趣，但人们对这种文字一无所识。首先解读这种文字的是德国东方学家缪勒（F. W. K. Muller），认为这是一种钵罗婆语方言。后来德国伊斯兰学家安德里亚斯发现，10世纪阿拉伯语学者贝鲁尼的著作中关于粟特语的月份、名字与新发现的文献记载相同，方知这便是消失已久的粟特语。粟特文文献大都藏于国外，近年来我国新疆也有粟特文文献出土，如1975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哈喇和卓古墓中发掘出17枚木牌，其中9枚正面写“代人”二字，背面则用朱笔书写粟特文[2]。粟特文文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

【2】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摩尼体粟特文

粟特文的摩尼体主要用于书写摩尼教经文，在有的学术著作中，又将这种字体说成摩尼文。摩尼教是波斯古代宗教，以其创始人名字命名，创立于公元3世纪。摩尼教在波斯一直奉行的二元论宗教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和诺斯替教等思想观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义。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光明和黑暗即善良与邪恶相对立的理论，摩尼教崇拜日月，服装尚白，教徒奉行禁欲主义，并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创始人摩尼在世时，曾受到萨珊王朝统治者沙波尔一世的保护，但好景不长，沙波尔一世的继承者瓦拉姆一世上台后对摩尼教就开始进行迫害，公元273年，摩尼被残酷杀害。摩尼教长期被斥为异端，视为邪教，教徒四处逃散。在这种高压下摩尼教反而在叙利亚、小亚西亚、埃及和北非、南欧等地得到流传，还流传到中亚。

摩尼教约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至唐代已很兴盛，在长安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和河南、太原等地也广建寺庙。摩尼教在中国民间的迅速蔓延使唐政府深感不安，唐开元二十二年（732年），唐玄宗诏令“严加禁断”。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时，摩尼教也受到严重打击，从此转成民间秘密宗教，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从五代历经宋、元、明、清，摩尼教一直以明教、魔教、白莲教、明尊教等各种不同的名目形式活跃在中国民间。

唐宝应二年（763年），回鹘牟羽可汗从洛阳延请睿容等四名回鹘法师到漠北回鹘都城，牟羽可汗放弃了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改奉摩尼教，并将摩尼教尊为国教，从此摩尼教在回鹘王国广为流行，回鹘西迁后，摩尼教在回鹘王国还兴盛一时，直到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王延德出使高昌时还见到当地“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1]。有的史料还提到当时的回鹘国王还信奉摩尼教。

【1】《宋史》卷490《高昌传》。

摩尼教在新疆流行了近400年，留下了大量的遗物，1902—1914年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在新疆进行了四次考察，发现并掠走了大量古代文物，其中就有很多摩尼教寺庙遗址的壁画、文献残片等。据学者研究大多为9—10世纪的遗物。已发现的摩尼教文献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等。这些文献残片大多是在吐鲁番的亦都护城、胜金口、吐峪沟和交河故城等地发现的，有数千片之多。

摩尼文字体工整，结构优美，清晰易认，很多书页还带有用金粉或各种颜色绘成的插图，装帧精致。这可能与摩尼本人就是一位艺术家有关。摩尼文书籍用上等的不同颜色的墨汁抄写，所用的纸张有时还要用面粉和白垩混合做成的浆糊涂刷一遍。这种制作精美、富于艺术性的图书使得摩尼教文献很容易识别（图101、图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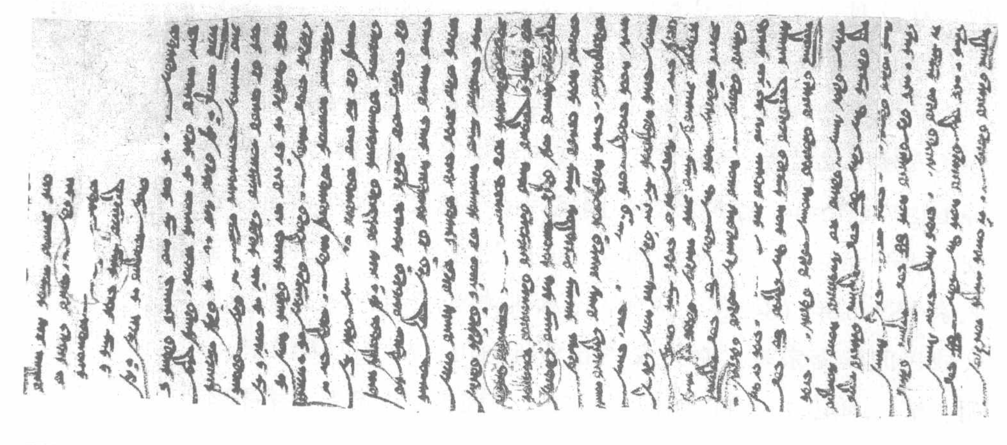


图101
粟特文书信



图102
粟特文书信

摩尼教文献有多种装帧形式。有的是卷轴装，有的是经折装，有的是欧洲式平装，还有是梵夹装，书页上穿一个或两个孔，上下用木板相夹，再用长绳穿孔捆紧。书写的材质多为纸张，也有羊皮、软毛皮或丝织物。

有的书籍封面用打有孔的、印有标记的皮子制作。设计十分精美，有的在孔眼旁还有金色的装饰物。德国吐鲁番考察队还发现过一本书的封面残片，用精心打磨过的龟甲制成，上面装饰着金箔。

第三节　突厥文图书的出版

一、突厥汗国和突厥文

公元6—8世纪，在蒙古高原上建有突厥汗国。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作为一个部落，大约出现于5世纪中叶，居住在今新疆阿尔泰山南麓，受制于柔然。6世纪中叶，突厥迁至蒙古高原，逐渐强大，建立了突厥汗国，最盛时疆域东至辽河以西，西至里海，北至贝加尔湖，西南至中亚阿姆河以南，形成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1]。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直至唐天宝四年（745年），在唐朝军队和回纥等民族联合攻击下，突厥退出了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

突厥有自己的文字，这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早已提到。据《隋书·突厥传》记载，北齐僧人惠琳被突厥所俘，在惠琳的宣传影响下，突厥国佗钵可汗皈依佛教，建立寺庙，并派人向北齐请经[2]。北齐有一名刘世清者通晓少数民族语言。齐后主命刘世清将《涅槃经》翻译成突厥语，送给突厥佗钵可汗[3]。在《周书·突厥传》中也记载“其书字类胡”[4]。但这种文字到底是什么样子，千百年来一直是个谜。

直至19世纪末叶以后，研究者解读了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碑铭，才揭开了这种文字的谜底。原来这是一种表音文字，被称之为突厥文。这种文字的碑铭许多发现于鄂尔浑河流域和叶尼塞河

【1】《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中华书局，1971年。

【2】《隋书》卷84《突厥传》。

【3】《北齐书》卷20《斛律羌举传》。

【4】《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

流域，因此又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19世纪欧洲人发现这种文字时，觉得它与北欧日尔曼民族使用的卢尼文（Runic）外形很相似，所以又叫它为“突厥卢尼文”，此外还有“蓝突厥文”、“西伯利亚文”等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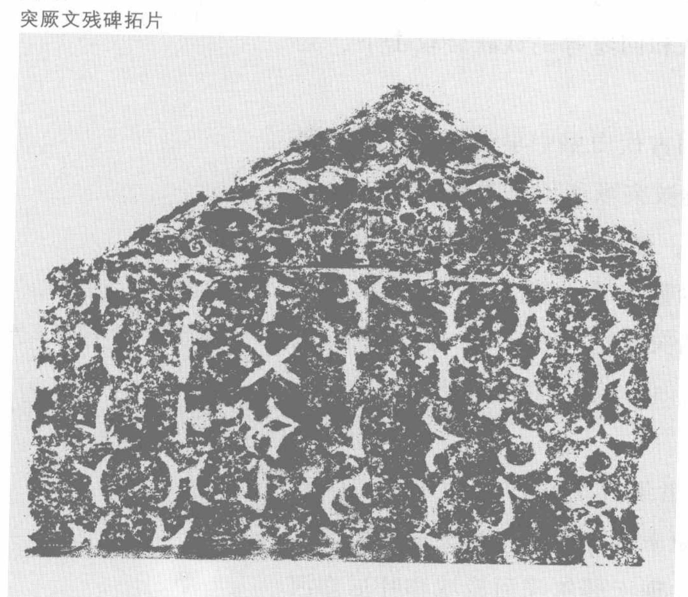
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一般有38-40个字母，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字母的形式和数量有所不同，突厥文通常从右向左横写。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突厥文使用时间大约在公元7—10世纪之间。

突厥文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它起源于阿拉美文，具体说是由源出阿拉美文的粟特文字发展而来。此外有的研究者认为突厥文属象形文字，有少量属于刻契符号，有其独自的来源，它的产生与突厥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对事物的认识和思维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能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1]。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由于语言相同，使用的文字也一样。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至别失八里的西州回鹘后来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有一段时期仍在使用突厥文。

【1】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29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二、突厥文文献

图103
突厥文残碑拓片



现存的突厥文文献大部分是突厥文碑铭，公元17世纪以来陆续被发现。

从公元17世纪末开始，在西方人的学术著作中不断提到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一些用不知名文字镌刻的碑铭，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巨大兴趣，并引起了种种猜测，有的说是匈奴人的遗迹，有的说是属于古代芬兰人，也有认为是属于古代突厥人或蒙古人的（图103、

图104）。直到1889年，俄国人雅德林采夫为首的蒙古考古队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两块石碑，这两块石碑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西400公里处，两碑相距1公里，上面除使人困扰的不知名文字外，另外一边还刻着汉文，这就为解读这种神秘文字找到一把金钥匙。后来的研究表明和硕柴达木湖畔的两块石碑分别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是古代突厥人的遗存。这种神秘文字就是一千多年前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突厥人使用的文字（图105）。



图104
突厥文残碑拓片

阙特勤是后突厥汗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之子，其父691年死时，年纪尚小，其叔默啜自立为可汗。默啜一生，对唐朝时降时叛，到其晚年，昏虐愈甚，所辖各部众叛亲离，最后被部下所杀。此时阙特勤起而拥立其兄默棘连为后突厥汗国国王，此即为毗伽可汗。毗伽可汗重用其岳父暾欲谷，一方面养精蓄锐，一方面与唐保持和好关系，连年向唐遣使朝贡，并向唐玄宗提出“请父事天子”（见《新唐书》），并再三请求联姻。唐玄宗最初未允请婚要求，后为其诚意所动，终于许诺，但婚期尚未确定，毗伽可汗即被其大臣梅禄啜毒死。毗伽可汗在位期间，是突厥与唐朝关系最好的时期，毗伽可汗及其弟左贤王阙特勤为此作出了贡献。唐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阙特勤死，唐玄宗“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1]。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唐玄宗敕命立碑，并亲撰碑文。

【1】《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

毗伽可汗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月被害，唐玄宗闻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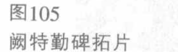


图105
阙特勤碑拓片

为其辍朝三日表示哀悼，并下敕书曰：“情义所在，礼固随之，岂限华夷，唯其人耳。突厥毗伽可汗顷者虽处绝域，尝以臣子事朕，闻其永逝，良用悼怀。务广宿恩，令所思择日举哀。”[1] 玄宗派金吾大将军、宗正卿李佺前往后突厥汗国，为毗伽可汗立碑建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毗伽可汗碑》立，唐起居舍人兼史馆修撰奉敕撰写碑文，唐玄宗亲笔御书（图106）。

阙特勤的侄子药利特勤为了纪念这两位先人的英雄伟绩，在这两块御制碑的背面和侧面，用突厥文铭刻了死者生平事迹和显赫武功。这两块碑与另一块位于蒙古巴颜楚克图的《暾欲谷碑》因其碑文保留较为完整，史料价值特别重要而被称为突厥文三大碑铭，是研究突厥语言文字和后突厥汗国的重要历史文献。

[1]《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义第三》。

继《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后，1891年在翁金河畔发现了《翁金碑》，1896年在塔拉斯河流域发现了《塔拉斯碑》，1897年在乌兰巴托附近发现了《暾欲谷碑》，1909年在蒙古希乃乌苏发现了《回纥英武威远可汗碑》，此外还有《苏吉碑》、《塔里亚特碑》、《塞乌列依碑》等。在叶尼塞河和中亚七河流域还发现一些文字简短的墓碑。现在发现的突厥文碑铭大约有200多块（图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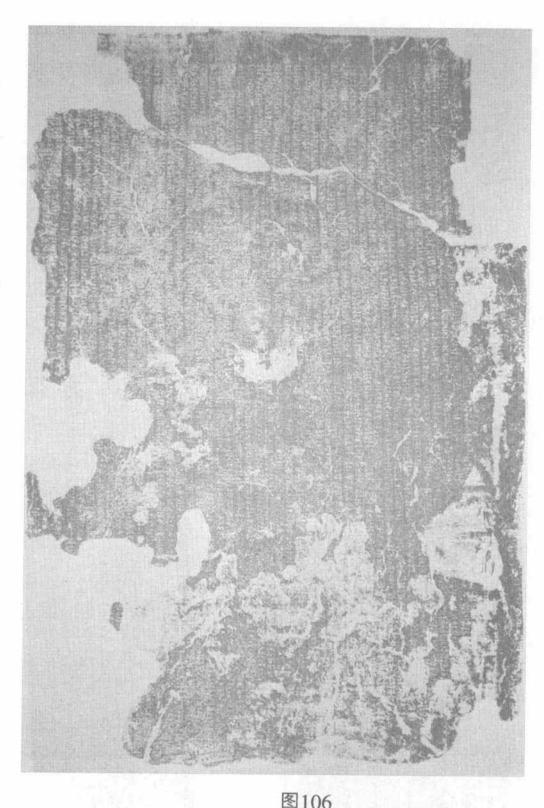


图106
毗伽可汗碑拓片

属于纸质载体的突厥文献都是写本，主要发现在敦煌藏经洞、新疆吐鲁番等地。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占卜书》是8、9世纪的写本，有104页突厥文。现藏于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8212（161）。此书由29张纸对折逐叶粘成，其中104页有文字。纸高约13.6厘米，宽约8厘米，纸质较厚韧，呈黄褐色，写本边缘已起皱，系被长期翻阅所致。从第5页反面到第57页正面为双面书写，最后两页（第103页、第104页）结尾用朱笔书写。每页文字8~9行，每行8~10个字母不等，天地头较大。此书内容为65卦占卜文，每卦卦文后写出“此为吉”、“此为凶”。在此书最后有一段题跋，上写“虎年二月十五日大云堂寺院的小摩尼僧布鲁阿乌鲁为我们的听众伊塞克将军和伊台渠克而书写”，这“虎年”为何年尚不清楚，可能是9—10世纪之间[1]。这段题跋十分重要，它透露出很多信息，首先西迁后的回鹘人仍在使用突厥文，其次其宗教信仰为摩尼教，再次，它表明了这份《占卜书》是为当时的地方长官而书写的，这可能是寺院僧侣出于尊敬而写，也可能是由官员出资雇人而写。看来许多纸质的突厥文文献都以这种缘故被抄写、流传（图108）。

【1】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360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

突厥文纸质文献还有《突厥格言》，亦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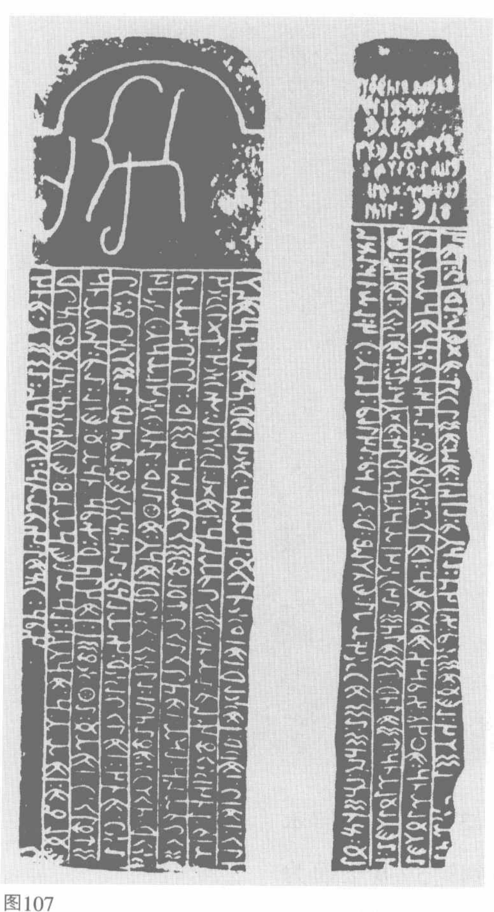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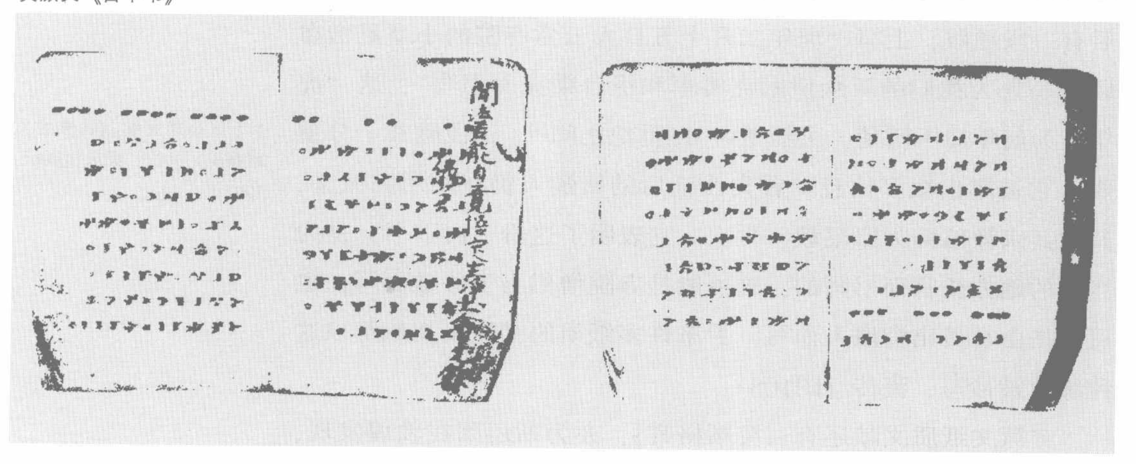


图107
翁金碑（描摹）

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OR8812–78，OR8812–79，共6片，其中最大的一页长约46.7厘米，宽约41.7厘米，存11行，每行约20字。其余残片每页存3~5行字不等，行间插有汉字。文字内容为警句格言，如“凭计谋可捕获狮子，凭蛮力难捉老鼠”，“没有不犯错误的智者，没有不迷路的向导”，“有证人的语言等于盖过印的文书”，等等。

这些突厥文格言写在一份汉文文书的背面，汉文文书是同光三年（925年）后唐庄宗遣郭崇韬伐蜀时的奏文，可见这份文献应写于10世纪中后期。这一《突厥格言》残篇不但对研究突厥文的文字、文学有重大价值，而且也可看出纸张在当时还是十分珍罕之物。此外，在新疆米兰出土了突厥文的军事文件，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发现了突厥文写本的残卷。1960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交河故城附近的洞窟中发现了突厥文简短题记（图109）。

图108
突厥文《占卜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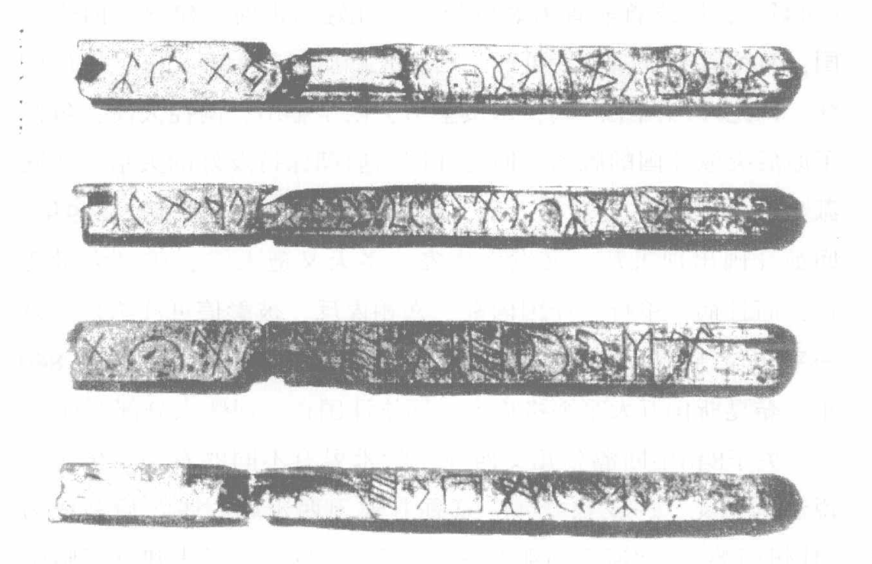


图109
突厥文木棒

突厥文文献包括碑铭和写本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外，国内一些单位如国家图书馆收藏部分碑铭的拓片。这些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由于其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字等方面，对研究突厥、回鹘、黠戛斯、骨利干等突厥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回鹘文图书的出版

一、回鹘王国和回鹘文

回鹘在中国唐以前的史书上被称作袁纥、韦纥、乌护、乌纥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是维吾尔的先民。其起源可追溯至纪元前的丁零。秦汉时代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一带，隋大业元年（605年）始称回纥，唐贞元四年（788年）改称回鹘，分布在现蒙古国色楞格河流域，约有10万人口。在漠北时期，先后依附于柔然汗国和突厥汗国之下。东突厥亡后，回纥与薛延陀两部称雄漠北。公元646年，回纥联合唐朝灭薛延陀，唐天宝三年

（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了九姓乌古斯，建立了回纥汗国，自称骨咄禄毗伽厥可汗，唐朝先后册封其为奉义王、怀仁可汗。回纥汗国国土广阔，东接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包括了原后突厥汗国的版图。回纥汗国与唐朝保持友好的关系，回纥派兵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唐朝曾几次与回纥联姻。839年，回鹘汗国出现饥荒，又发生瘟疫，冬天又遭大雪，羊马大量死亡，而且祸不单行，汗国内乱，宰相谋反，被彰信可汗杀死。另一宰相勾结沙陀借兵反抗，彰信可汗被杀，汗国岌岌可危。840年，黠戛斯10万大军乘机攻入。回纥汗国亡，回鹘人分部西迁。

关于840年回鹘分几支西迁，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说法是三支，一支投吐蕃，迁往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后来成为"甘州回鹘"、"河西回鹘"；一支西奔葛逻禄，后来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还有一支迁到西州（高昌），成为"西州回鹘"，后来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另外一种意见是回鹘人西迁至阿尔泰山后，与葛逻禄人汇合，又分成两支，一支投吐蕃，一支到达安西，建立了安西回鹘汗国，最盛时辖境西至龟兹以西，南到于阗国，东到伊州和西州，北至天山以北地区。

安西回鹘汗国的可汗为庞特勤，约死于870年。之后，安西回鹘汗国瓦解，形成甘州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和喀喇汗国。

回鹘在漠北时期，主要信奉萨满教，但已受到佛教的影响，西迁至河西、高昌后，当地盛行佛教，大批回鹘人也接受了这一宗教，此外摩尼教也在回鹘人中流行（图110）。

回鹘人使用的文字，在漠北时期与突厥相同，也使用突厥文。回鹘人在公元840年西迁后，逐渐废弃了在漠北使用的突厥文，一种新的文字在回鹘人中间流行开来，后来人们将这种文字称为回鹘文。

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它以粟特文字母草体来拼写回鹘语。因时代早晚字母数量不同，一般由18~22个字母组成，通常使用一点或两点作标点符号，有时用四点表示段落。早期回鹘文是从左至右横写，后期，即通常所见的回鹘文文献为竖写，自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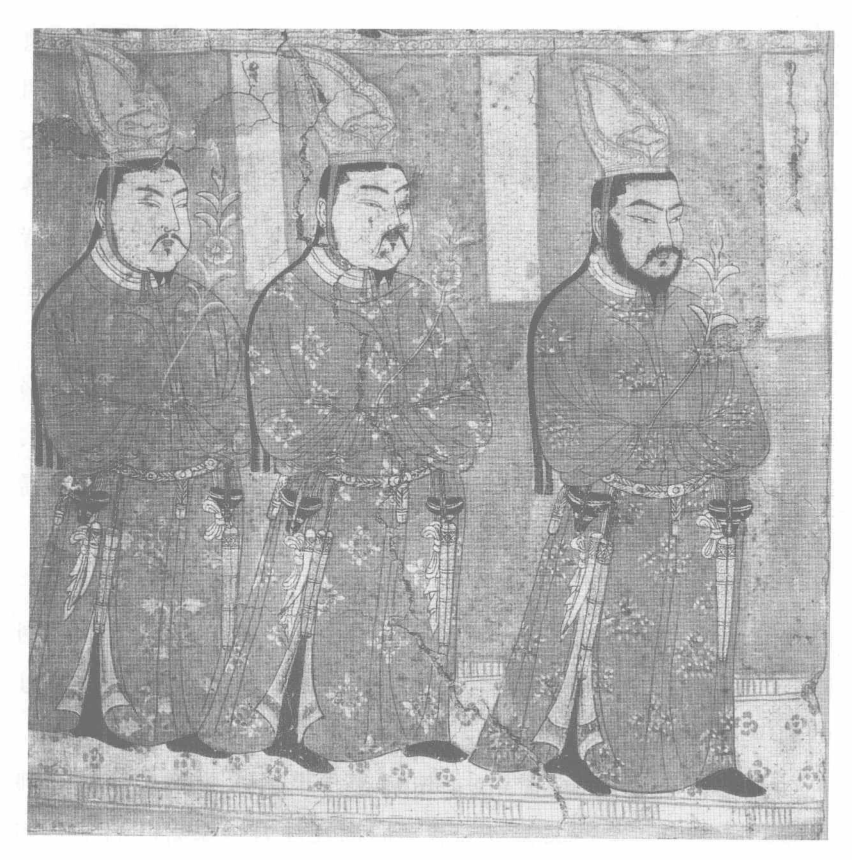


图110
有回鹘文题款的回鹘高昌王供养像

向右移行。回鹘文字体有写经体、楷书体、草书体和印刷体。这种文字最早何时使用已不可考，考古发现的8世纪用这种字母铸成的突骑施钱币说明，主要居住在七河流域的突骑施人早已使用这种文字了。

二、回鹘文文献

20世纪50年代在蒙古国乌兰浩木地方发现了一块碑铭，上面有8行回鹘文，记载布哈孜特勤王子生平武功。这是蒙古高原发现的第一块用回鹘文突厥语写成的碑铭，这说明回鹘人在西迁之前已在使用这种文字了[1]。

【1】耿世民:《回鹘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在9世纪前后已有大量回鹘文文献形成。回鹘人用这种文字记录、创作了大量作品，翻译了大量经典。许多借据、地契合同等社会经济文书都用此种文字写成。如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先生

在新疆发现了早期草书体回鹘文书信残文，约为9—10世纪的遗物，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文弼先生还发现了早期写经体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卷子装，残长270厘米、高29.5厘米，上有汉字篆文朱色方印11处，为高昌回鹘王国颁给吐鲁番地区摩尼教寺院的正式文书，其中规定了该寺院享受的种种特权，时代约为9—10世纪，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如1959年在新疆哈密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为早期写经体，梵夹装，共293页（586面），每页长44厘米、高22厘米，纸质厚硬，呈褐黄色，时代约为8—11世纪，现存新疆博物馆。据书中的跋文知，此书由新疆焉耆人圣月大师从印度语译成古代焉耆语，智护从焉耆语译成突厥语。现存新疆博物馆[1]。

【1】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66~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回鹘文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是中国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文字所不能比拟的。辽代创制契丹小字参考了回鹘文，成吉思汗下令创制蒙古文时采用了回鹘文字母。16世纪满洲崛起时又利用这种字母创制了满文，锡伯族用这种字母拼写的锡伯文一直沿用至今。

元代以前的回鹘文文献多以抄本形式流传，早期的回鹘文佛经多译自焉耆—龟兹文，有的抄本后面还注有抄录者的名字。如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个卷轴装写本《佛说天地八阳神经》，在其背后用突厥文写明“苦古乐抄写”[2]。

【2】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发明和早期传播》，7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虽然回鹘文在漠北时期已被使用，但逐渐推广却是840年回鹘西迁后的事，有个交替、渐进的过程。直到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回鹘文才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五节　藏文文献的出版

一、吐蕃王朝和藏文的创制

在雪域青藏高原居住的藏族，古代称吐蕃，主要从事农牧业。公元7世纪初期，藏族著名赞普松赞干布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统一了西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

(今拉萨)。为巩固吐蕃王朝，松赞干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措施：划分行政区域，健全职官制度，加强议事会盟制度，强化赞普权力，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创制藏文，发展文化，等等。

与此同时，松赞干布大力加强吐蕃同唐朝的友好往来，努力吸取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在松赞干布以后的百余年里，吐蕃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佛教兴盛，文化发达，与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得到发展。

8世纪中期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吐蕃趁唐朝西部军事力量空虚，占据唐朝的河西、陇右地区，并在唐朝叛将的引导下，一度占领长安，立金城公主的侄子李承宏为帝。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吐蕃军中疾病流行，加上唐军反攻，吐蕃军半月后即退出长安。9世纪中期，朗达玛为赞普，改变崇佛政策，开始压迫、毁灭佛教，大力恢复本教势力。当时封砌寺庙，僧人纷纷逃散。9世纪后半期，王室争位，贵族混战，奴隶起义，吐蕃王朝发生分裂，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吐蕃王朝灭亡，西藏长期处于内战局面。

藏族宗教信仰很有特色。7世纪前，在藏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是当地土生土长、崇信多神的原始宗教——本教。后来印度佛教、中原汉族地区佛教传入藏区后，与本教经过长期斗争、交融、吸收而逐渐形成藏传佛教。事实上藏传佛教也在不断地发展。佛教徒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为“前宏期”和“后宏期”。前宏期从7世纪至9世纪中期，而后遭到禁止。

在松赞干布时期以前“吐蕃尚无文字”，“其俗刻木结绳”[1]。松赞干布十分注重文化事业，重视与当时有先进文化的唐朝的友好往来。他先后两次派遣大臣赴唐朝请婚，迎娶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宗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唐朝皇帝赐予很多物品，其中有大量书籍，如儒学经书、佛教经典、占卜书、营造与工技书、医书等。这些典籍与技术的引进，对发展吐蕃的经济、文化起了积极作用。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纸、墨等生产技术，派遣

【1】《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贵族子弟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入蕃代写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十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8世纪初，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即位，也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请婚。唐朝以金城公主赐婚。金城公主入蕃时又携带大量物品和人员，其中也有多种书籍。金城公主才华出众，入蕃后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向唐朝求赐《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唐朝如请赐予。此后有《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传世，对吐蕃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次联姻进一步加强了唐朝与吐蕃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汉、藏文化的交流，同时直接影响着藏族书籍事业的发展。

根据过去的研究表明，藏文是公元7世纪吐蕃大臣通米桑布扎参照印度梵文设计的一套字母，在西藏地区一直使用到今天。原来松赞干布苦于藏族无文字，派通米桑布扎到印度学习。通米桑布扎历经印度很多地方，在印度南方向精通多种文字的婆罗门大师里津学习文字。他学成归藏后，依据梵文字母的体系，结合藏语实际情况，创制藏文成功，被藏族誉称“字圣”。然而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对通米桑布扎创制藏文的这种传统说法也有异议。但藏文创制很早，它的出现不仅发展了藏族文化，也推动了藏族历史的发展则是毫无疑问的。

藏文在历史上曾经过三次改革厘定，一般认为唐、宋时期的藏文为古藏文，以区别于元代以后的藏文。藏文是一种“音节—音素”文字，在记录藏语的一个词时，只有“基字”是表示音节的，其他的“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只代表不带元音的辅音音素。

藏族早就开始编撰、出版书籍。保存至现在的藏文文献十分丰富。在中国的古籍中，藏文书籍的数量仅次于汉文，居第二位。现存古藏文文献主要是敦煌发现的写卷，此外还有古代的金石铭刻，新疆若羌、米兰遗址出土的简牍等。其中以敦煌石室所出数量最多。敦煌珍贵古文献主要藏于英、法两国（图111）。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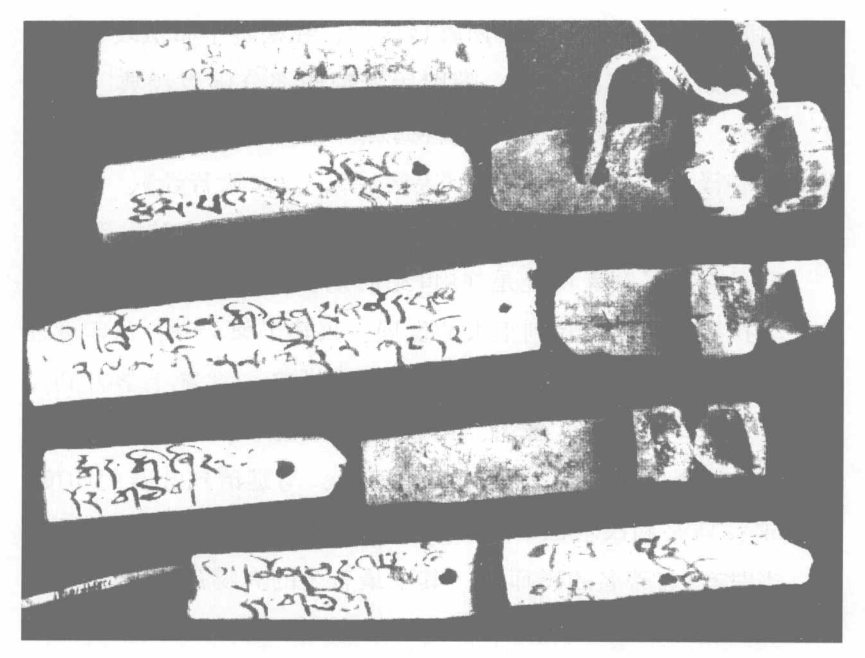


图111
藏文简牍

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藏文写卷在2 500—3 000卷之间，收藏在伦敦事物部图书馆的藏文写卷在2 000卷左右，种类繁多，价值巨大。国内北京、甘肃等地也有不少入藏[1]（图112）。

【1】《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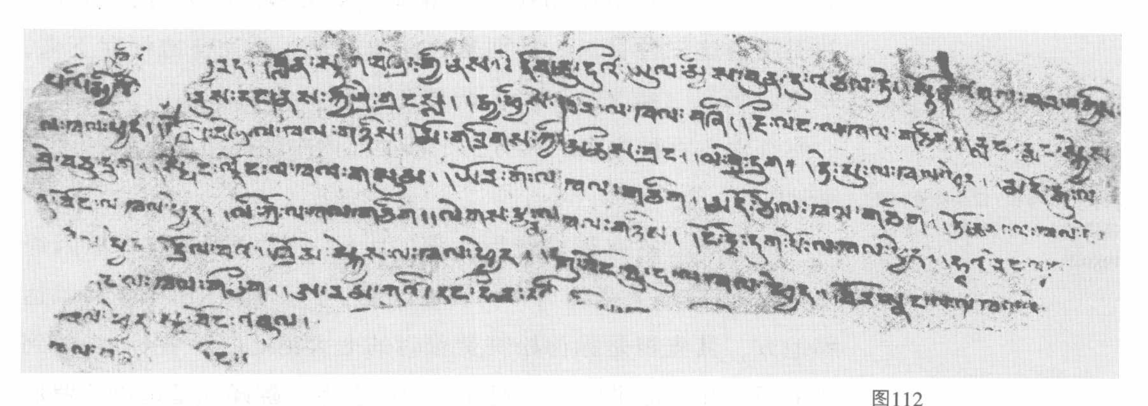


图112
若羌、米兰遗址出土藏文手卷

二、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和出版

藏族编撰、出版的书籍中以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和出版最具特色。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典籍丛书。佛教自7世纪初由汉族地

区、印度和尼泊尔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后，在松赞干布执政时，通米桑布扎始创西藏文字后，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将梵文、汉文、于阗文等文种的主要佛教经典译成藏文。据说开始译师相继翻译了《宝集顶经》、《宝箧经》、《大般若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21部。但这些最初的译本至今都没有被发现。

大规模开展翻译佛经是在8世纪后期，当时在赞普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桑耶寺，从印度迎请莲花生大师和静命大师，还选送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到印度、汉地去学习语文、佛法，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培养译经人才。这些留学人才学成回归吐蕃后，与延请到吐蕃的印度、尼泊尔、乌苌和汉地法师们合作创办译场，开始了长时间的译经。当时有9名著名的译师[1]。其中最著名的有噶瓦·贝孜，他翻译了几百种显密经典，还翻译了多种因明著作。所译经典收藏在桑耶寺附近的三所殿堂中。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按墀祖德赞的命令，编纂已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论目录，并以三所殿堂命名，分别称《庞塘目录》、《秦浦目录》、《登迦目录》。当时究竟译出了多少经典，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然而三大目录一直流传下来，在14世纪布顿大师编纂《藏文大藏经》时，还看到并引用过这三种目录。特别是《登迦目录》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被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目录之中。其中所收录的经典有六七百种之多，共分27个门类。内中明确指出有31种译自汉地[2]。

参加译经的有很多造诣高深的大师，其中翻译《贤愚因缘论》的管·法成大译师具有代表性。他于公元9世纪出生于后藏达那地方，其先祖是赤德松赞赞普时的七大臣之一。管·法成曾到敦煌译经并授徒讲经，又到甘州的修多寺，翻译《圣星母陀罗尼经》等，共译经典23种，在当时河西一带战乱频仍、社会不安定的环境中，他仍坚持静心译经，是难能可贵的。他精通藏、汉两种文字，讲经时善于用两种文字比较、诠释。他所译经典在翻译质量上、在史料价值上都是一流的[3]。

【1】[元]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译：《西藏王统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2】[元]布顿·仁钦珠著：《布顿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3】王尧：《吐蕃文化》，114~11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在反佛大臣韦达纳坚等人鼓动下，赞普朗达玛下令灭佛，封闭和拆毁寺院、佛像，强迫僧人还俗，杀害反抗的高级僧人，烧毁经书文物。因朗达玛灭佛，佛教的传播在吐蕃中断100余年。使佛教文献的出版陷入低谷。

20世纪初，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量藏文写卷中，数量最多的还是佛经。如《天地八阳神咒经》，上下皆残，长186厘米，宽27.7厘米，存120行，2 199个音节。《大乘无量寿经》，是一残卷，仅存10行，书法流利洒脱，字迹随意自然，如行云飞动，堪称当时有头字体的典范（图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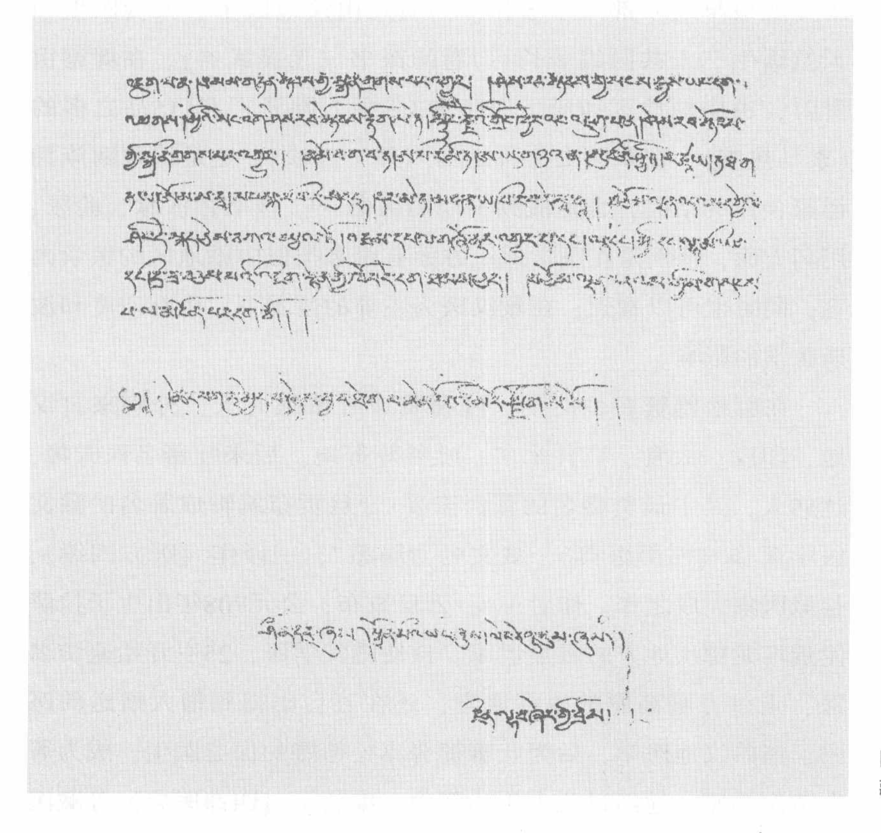


图113
藏文《大乘无量寿经》

三、医书的编纂出版

藏医有悠久的传统，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特殊的疗效。藏族的医学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展。吐蕃的医学家在

间互相征战吞并的情况，涉及17个部落邦国和地区的17位君长、23名辅臣，对研究吐蕃以前青藏高原历史、地理及邦国关系有重要价值。

吐蕃文献中还有其他相关民族的历史书。如《吐谷浑大事记年》，编号Vol.69，fol.84，共55行，记载吐蕃灭掉吐谷浑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在706—715年（一说634—643年）间发生的大事，涉及莫贺吐谷浑可汗、吐蕃赤邦公主、唐朝金城公主（一说文成公主）的活动，以及王室婚娶、会盟议事、蕃使朝觐、封赏臣民、征役赋税等事，记录了当时的吐谷浑历史和邻近的民族关系。

吐蕃时期制定律法，敦煌所出古藏文卷子中有法律文书。如《狩猎伤人赔偿律》为P.T.1071，长860厘米，宽26厘米，多达468行，卷末倒写“完毕”。另有P.T.1072残卷，长350厘米，宽26厘米，存189行，其中除个别字句外，与P.T.1071内容完全相同。律中对狩猎时各级有告身之官吏及平民百姓之间上伤上、上伤下、上伤民、平伤平、下伤上、下伤民、民伤上、民伤民等分别情节等级，都有严格明细的处置规定。此文书不仅可了解当时的法律，还可透视其社会生活和等级制度。

敦煌藏文写卷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诏书、盟会告牒、官吏述职状、驿递文书、过所文书、纳粮牒、赋税名牒、财产账等社会文书。

（二）吐蕃医学、占卜等著作

在敦煌石室发现的藏文写卷中，还保留着吐蕃时期的医学书籍的原貌。敦煌藏文写卷中有多种医书，其中有药方、针灸书、针灸图、兽医书等。

如《医疗杂方》编号P.T.1057（1）、Vol.56，fol.57。成书时间约为8、9世纪，是现存最早的藏族医学文献。P.T.1057（1）长450厘米，宽26.3厘米，共208行，记录五官、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常见疾病40种药方。Vol.56，fol.57残存42行，前35行是人体疾病医方，36行以下为兽医医方。前者出自府库，显现青藏高

式的版本。墀松德赞命译师噶瓦·贝孜将这些御医的医学著作翻译成藏文，汇编成《国王保健紫色经函》。

四、敦煌发现的藏文书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莫高窟16窟发现了藏经洞，即著名的敦煌石室（今编号17窟），内中储藏了大量典籍，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其中以藏文文献最多，多为手写卷子式，也有的类似蝴蝶装，还有经折装。敦煌石室的藏文文献被英、法劫走的就有5 000件以上，存于国内的有篋页8 946页，经卷366卷，木简6片。这些都是早期藏文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吐蕃历史社会文献

其中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有《吐蕃历史文书》，此书由3个主要卷子组成，此外还包含着一组时代相近、事实相关的几件卷子。主要是P.T.1286、P.T.1287、P.T.1288以及S.T.705号。

吐蕃历史文书中最重要的《赞普传记》，是《吐蕃历史文书》的主体，即传记篇。编号P.T.1287，长620厘米，宽26厘米，600余行，黄色纸。其中有赞普传记10篇，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文献。

另一种吐蕃历史文书是《吐蕃世系牒》，为吐蕃王朝的编年史。系残卷，编号P.T.1288和S.T.705。P.T.1288号长70厘米，宽25.5厘米，68行，黄色纸张，方形字体，字行紧密，音节标点通常用“:”，日期为朱笔。S.T.705号223行。书中以编年方式记录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其书写方法是开头数行为数年一段总记录，自狗年（650年）以下，一年为一单元记录，止于猪年（747年）。另一件写本编年史编号Or.8217（187），自羊年（743年）至龙年（764年）。两件有5年重出[1]。此书是了解吐蕃历史的最重要文书之一。

《小邦邦伯与家臣和赞普世系表》也是吐蕃历史文书的重要部分。编号P.T.1286，长92厘米，宽25厘米，84行，写在被轧光的黄色纸张上。记述吐蕃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邦国情况，它们之

【1】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首印，1992年增订本。

总结本民族治病、用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地治疗疾病的成果，特别是汉族地区医学成就，采用其中的验方、药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吐蕃的医药学，同时促进了吐蕃医学著作的编辑和流传。

吐蕃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从内地携带的中原医学著作以及医疗器械，“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和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件，配药法四部”等。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是《汉公主大医典》，是流传到藏族地区最早的书籍。更为重要的是《汉公主大医典》又经汉地和尚二人译成藏文，这是吐蕃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当时还由汉地医生、大食医生和天竺医生三人共同编著长达7卷的医书《无畏武器》。在墀德祖赞时，由中原地区和尚、医生和3名藏人翻译了有115品之多的《索马热咱》，在藏医史上称之为《月王药诊》，这是汉藏两族翻译家合作的结晶，也是藏族早期的医书[1]。该书在诊脉、验尿、用药方面，特别是在医学理论方面有很多类似中原地区的医学内容，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藏汉医为主导的情况下，也有印度和波斯医学的影响。

【1】《智者喜宴》第7品，68页；《智者喜宴》第17品，46页。转引自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在墀松德赞在位时期，吐蕃赞普有御医九人，分别来自汉地、印度、大食、克什米尔、吐谷浑等地。后来吐蕃名医云集，达59人，其中最负盛名的藏医玉妥·云旦贡布编辑成著名的藏文医学著作《四部医典》，藏文名“居悉”，一译作《医方四续》，是藏医集大成之作。作者玉妥·云旦贡布，公元708年出生于拉萨附近堆龙德庆地方的医学世家，自幼随父学医，25岁开始遍访名医，走过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还在五台山得到僧人赠送的医书，谙熟汉地医学，后为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保健医生，成为著名藏医学家。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著了《四部医典》等藏医著作30余部，形成了藏医基础理论。《四部医典》全书分四部，156品，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践，从病因、病理到诊断诊治，从药物到方剂，从卫生到保健乃至胚胎发育等均有详细论述，从中可看到汉地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2]。然而当时这些书籍没有正

【2】蔡景峰等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藏族医学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原特有的疗法和药物；后者语言接近安多方言，在医理和疗法上受中原医学的影响。现藏于法国。

另有《火灸疗法》（P.T.V.127，P.T.1044），P.T.V.127有184行，内容主要是灸疗，灸治范围甚广，对人体内外一百多种疾病的具体症状、灸疗穴位、操作方法以及需要灸治次数，都有详细说明。P.T.1044有58行，内容与上述医书相近。此外还有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文针灸图》等。

敦煌石室的藏文文献也有关于语文、占卜的书籍。如《十二铜钱占卜法》是一长卷，由多叶纸粘连而成，编号P.T.1055，首尾残缺，宽14厘米，长137厘米。

（三）译自中原地区和印度的典籍

古代藏族与中原汉族有广泛的文化往来，翻译了大量中原地区的经典著作，如《今文尚书》就是其中之一。该书也出自敦煌石室，编号P.T.986，卷长200厘米，宽31厘米，存200行，首部残缺，字迹清晰，行距紧凑，无横格线。内容是中国古代经书《尚书》的译本，存《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等篇。最末为"《尚书》第六卷完"。

又有《战国策》藏文译本，编号P.T.1291，共有4个片段，分别长30、24、26、38厘米，宽30厘米，存23+20+23+28，共94行，右部略有残损。内容是中国古籍《战国策》的译文，存《魏策》6篇。以上两种译著与汉文原著并非严格对应，有时采用简述大意的方法，译文生动流畅，应是藏族的手笔[1]。

在敦煌藏文写卷中有一种特殊的长卷，是用古藏文音译汉字的写本，编号Ch.9.Ⅱ.17。长440厘米，宽30厘米，正面290行，背面196行，全部用古藏文音译各种佛教文献。又有汉藏对音《千字文》本，编号P.T.1046（P.3419），原卷残，长60厘米，高24厘米，存53行，行13字。汉文竖写，字左侧注藏文对音。还有《大乘中宗见解》汉藏对音本，编号Ch.80.xi，卷首残，存128行，其中一半有藏文对音。卷末题"大乘中宗见解义别行本，吴法师"，知此为吴法师所抄。

【1】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

敦煌石室发现的古藏文书籍中还有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译著，共有五个编号：I.O.737A、I.O.737B、I.O.737C、I.O.737D，藏于英国印度事物部图书馆，P.T.983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这是最早的藏文译著抄本。《罗摩衍那》始创于公元前2世纪，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汉、藏文学都有一定影响。过去我国没有此书的汉文译本，现已经有了根据发现的藏文译本转译的汉文译本。

敦煌石室发现的藏文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成藏文的佛经。纸质的书籍形式多种多样，页面差别很大，也有的是折叠式。

《大宝积经》有多种，大小不一，但都是长条书式。编号P.T.89，有11叶，页面高8.2厘米，宽42厘米；编号P.T.90，有41叶，页面高16或17，宽47或50厘米；编号P.T.91，有11叶，页面高17厘米，宽65厘米。

数量最多的《十万般若波罗密多经》中，不少规格相近，如编号P.T.1299，为第一品，存76叶，全部至少100叶，页面高25，宽75厘米。从P.T.1300~P.T.1321共22个号都是《十万般若波罗密多经》不同的卷次，共1240多叶，页面皆高25厘米，宽75厘米。而从P.T.1322以后数卷，也是《十万般若波罗密多经》，叶面高20厘米，宽70厘米。

有的页面接近方形，如《天请问经》。有的是一长卷，如《百智慧论》。有少数是折叠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大量敦煌藏文写卷，如《无量寿大乘经》楷体写本（图114）。

五、藏文书籍的特殊装帧形式和流传

古代印度的佛经，开始只是师徒相承、口口相授，并无见诸文字。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佛教第四次结集时，才把经文和注疏纪录在贝多罗树叶上，因此便把这种记录在贝叶上的佛经简称为“贝叶经”。它的装帧，类似我国古代的竹简，用细绳一片片串成。

图114
敦煌出土藏文写卷

用贝叶制成一部经书，要经过采叶、水煮、晾干、磨光、裁割、打洞、划线、刻写、上色、装订等十几道工序。藏族的佛教来源之一是直接传自印度。藏文文献原来就是采用从印度传来的方法，写在贝叶上，一般用黑墨或红墨抄写。有时也用金粉抄写。

直到从中原地区传入造纸术后，便开始写在纸上，也是以黑墨或红墨抄写，有时也用金粉抄写。吐蕃时期的写本多是卷子式，在一张纸上横写，一纸写完再续粘一纸，有的长达几米。

后来为了书写和保存方便，出现了藏族特有的长条书式。长条书由很多规格相等的长方形纸页组成。这种装式大约起源于印度的“贝叶书”，即所谓“梵夹装”，后来藏族借鉴这种书籍装帧方式，称之为长条书。藏族的长条书自左向右横写，自上而下成篇(图115)。

当时藏文书籍都是写本，以宗教经典为主的藏文书籍主要产生于僧人，主要贮藏在寺庙。如果需要这些书籍，则需要重新抄写，成为复本流传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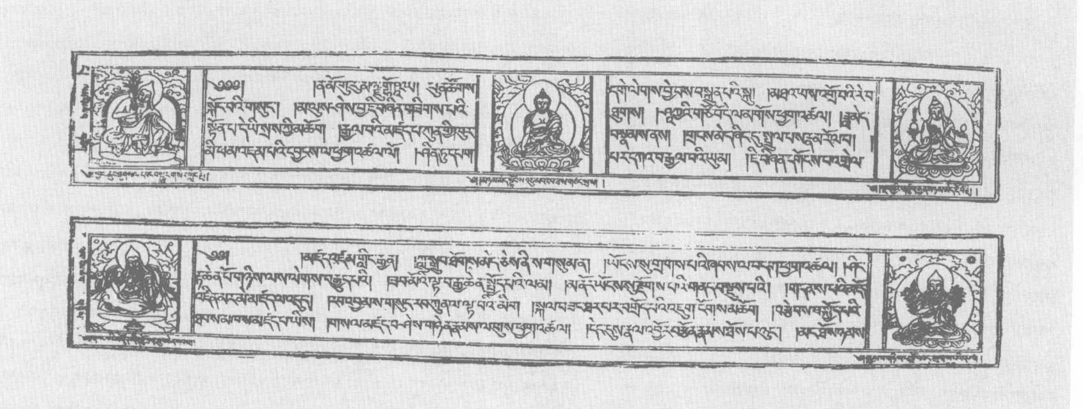


图115
藏文长条书

在朗达玛废灭佛教时，将译出的经书或投于水，或投于火，使藏文佛经遭到巨大浩劫，损失惨重。幸亏这时部分笃信佛教的僧人，事先将很多佛经藏于岩洞中，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使后来佛教重新弘扬时，仍保留有相当多的经典。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伏藏”的书。还有些僧人带着佛经逃往边远的地方[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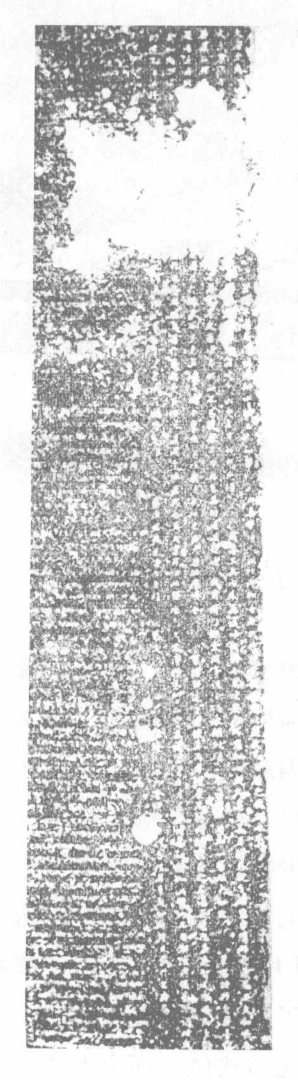
【1】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60~6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六、吐蕃的金石铭刻

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还有十分珍贵的碑文和钟铭，如《唐蕃会盟碑》、《达扎鲁恭纪功碑》、《第穆萨摩崖刻石》、《谐拉康碑》、《赤松德赞墓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楚布江浦建寺碑》、《桑耶寺钟》等。

唐长庆元年（821年），唐朝和吐蕃会盟于长安，翌年又会盟于逻些（今拉萨），三年在拉萨立《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和盟碑》。碑身高478厘米，宽95厘米，厚50厘米，上覆有石帽，碑四面有字。正面，西向，汉、藏文两体对照，左半藏文，横书，76列，右半汉文楷书6行，直书，存464字。两边文义相同。北面为吐蕃与盟官员17人名单，藏、汉文对照，上为藏文，40列。南面为唐廷与盟官员位次18人名单，也有藏语译音49列。东面为藏文盟词，78列。碑文赞美了汉、藏之间的友谊，追述了唐朝的历史，记录了会盟的经过。碑文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本身也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散文诗。此碑现树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千百年来一直受到藏汉人民的敬仰（图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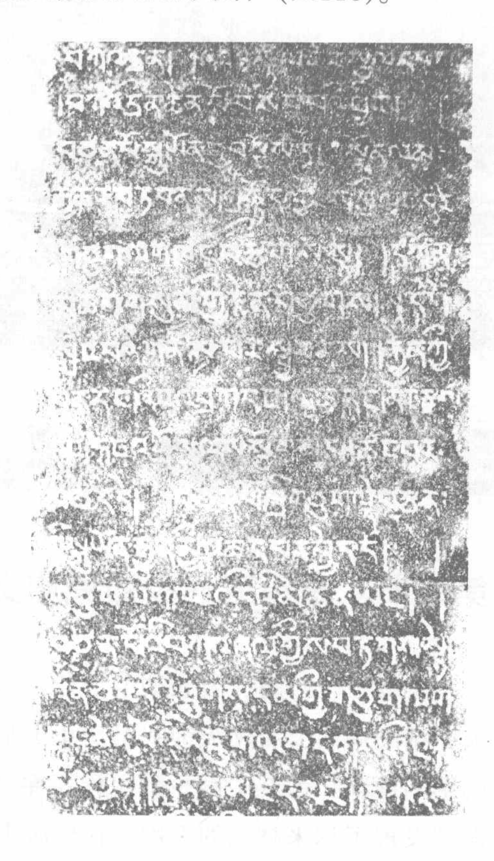


图116
汉、藏文唐蕃会盟碑

《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系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立于779年，位于桑耶寺大殿前壁，有藏文21列，内容是王室为支持佛教、保护寺庙所作的保证誓词。从中可以了解到吐蕃时期佛、本两教斗争的历史背景（图117）。



图117
桑耶寺

第六节　隋唐五代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特点

隋唐五代时期，内地结束了几百年的纷乱局面，重新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历史时期，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中国少数民族在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出版事业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在西北地区更多的少数民族有了文字，形成了很多文献，如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文献。在这一过程中操印欧语言的民族逐渐衰落，使用突厥族语言的民族崛起，其文字的使用，文献的形成也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如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先后式微，而突厥文、回鹘文兴起，特别是回鹘文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影响都很大。这一时期，由于回鹘人的到来，西域的突厥化已开始启动，回鹘文的文献逐渐增多。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更迭，民族的迁徙，宗教信仰的变化等原因，有多种不同民族语言文字共存，多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共存，互相碰撞、互相交融、互相影响，民族文化多元化现象十

分突出，反映在少数民族文献出版方面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形状相异的文字，不同内容的宗教，材质多样的载体，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献丰富多彩的特色。这一时期的民族文献大部分还是用于宗教活动，如经卷和与宗教相关的文件，其他是属于世俗文书类的内容。这一时期的文献都是抄本，这与同时期的汉文文献基本一致，中国内地的雕版印刷技术在这一时期尚未在民族文献中出现，纸张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已经较前多了，但仍没有普遍使用。

地处西南、势力很大的藏族在这一时期文化迅速发展，创造了文字，形成了大量文献，使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文字的地域扩大。藏族文献的繁荣不仅有汉文和藏文文献的记载，还有敦煌石室所出大量藏文文献可以证明。敦煌石室藏文文献的发现，使存世的古藏文文献变得十分丰富、十分重要。

中原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交流在这一时期更加密切，这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有明显的反映，如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中原地区典籍的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对照的词典，以及两种文字合璧的文献也层出不穷。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以汉文为自己的官方文字。如南方的南诏国，其统治者是乌蛮，境内民族众多，开始在唐朝的支持下建国，成为唐朝西南边疆防卫吐蕃的屏障，后与唐朝交恶。但总的来说，南诏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受汉族文化影响很深。南诏推行儒学，使用汉文。如南诏王阁罗凤时所立著名的《南诏德化碑》，就是以汉字镌刻的。又南诏王舜化贞授意绘制的《南诏图传》的款识和题记都是汉字。再如南诏王异牟寻与唐王朝使者会盟的誓文也是用汉字书写的。此外，南诏王给朝廷和剑南节度使的表奏、书信都是用汉字书写的。这时虽然已经开始出现用汉字改造的“白文”，但仍是个别现象。

第十六章　隋唐五代出版的地位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图书出版的重要转型时期。史馆的确立、监修制的最终形成、雕版印刷的发明、册页装的出现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图书编撰

隋唐五代时期是图书编撰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编撰的图书门类齐全、数量众多。其中，实录、法律、历书、书目、别集、总集、佛经、类书等尤其令人瞩目。实录如唐代的《高祖实录》、《玄宗实录》、《宪宗实录》、《文宗实录》等，五代的《庄宗实录》、《明宗实录》、《周宗实录》等；法律著作如唐代的《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垂拱式》、《开元式》等，五代的《大周续编敕》等；历书如唐代的《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五代的《调元历》、《钦天历》、《中正历》等；书目如隋代的《开皇四年四部目录》、《七林》、《历代三宝记》等，唐代的《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开元释教录》等；类书如隋代的《长洲玉镜》、《北堂书钞》等，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三教珠英》等。至于别集、总集编撰和佛典的翻译和编撰，数量更多。让我们就其图书编撰的特点，择要加

以总结。

第一，刘知几撰《史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史书编撰的众多问题，在史学史和图书编撰史上都是第一次。他高度评价史书的社会作用，“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刘知几认为史官是史书编撰的重要因素，他历数史官源流，提出“才”、“学”、“识”的“三长”标准。在编撰体例上，他就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还就叙事、选材、详略、标题、断限、语言、书法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史通》是对我国古代自先秦迄唐代史书编撰实践的总结和评论。虽然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仍然不愧为古代图书编撰史上的杰作，对于指导古代图书编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韩愈的“不平则鸣”、刘禹锡的“穷愁著书”思想，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一脉相承，指出了图书编撰的一个重要规律。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的图书编撰者面对痛苦的现实，忍无可忍，不能使自己保持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终于拿起横扫千军的铁笔，发泄自己的满腔激情。编撰者受到的撞击越厉害，其发出的声音就越响亮。

第三，隋唐五代图书编撰者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元稹因无嗣子继承文集之“悲”与诗歌广为流传之“喜”，白居易念念不忘整理自己的作品，张鹭生死未卜而心系文集编撰，张籍劝韩愈及时著书立说，等等，都反映了唐人的传世意识。然而，传世意识与精品意识是紧密相连的，只有传世意识而无精品意识，传世意识只是南柯一梦。实际上，隋唐五代时期，不少人既具传世意识，又具精品意识。例如唐太宗不以自己的权势胡乱编集，对于图书编撰一事决不滥竽充数，率尔成章。据《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

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这里，唐太宗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编撰别集，不蹈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等人的覆辙。白居易不“私于自是”而割舍那些“率然成章”者，杜牧毫不吝惜地烧掉那些不合格的作品，等等，都说明隋唐五代时期图书编撰家的精品意识，这种精品意识，对于今天来说，尤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第四，史馆的确立和监修制的最终形成，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馆的确立，使最高统治者独揽修史大权，为正史编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历代相沿，莫之或易，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修史制度。无论国泰民安的和平时期，或是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史馆的工作一如既往，全天候地照常工作。例如唐代历朝实录，一朝一朝的修下去，竟然修了十余部。五代时期金戈铁马，实录的编撰从未停止，竟然修了十七部之多。监修制是官方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它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种图书编撰的重要组织形式。直至今天，主编负责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第五，隋唐五代时期的著作权意识日益强烈。这主要表现在稿费的获取和著作权的保护两个方面。“润笔”一词始见于《隋书·郑译传》，这是我国古代“稿费”概念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隋唐五代著书获取稿费之例已是屡见不鲜。清钱泳《履园丛话·考索》云:

润笔之说，昉于晋、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长庆间。如韩昌黎为文必索润笔，故刘禹锡《祭退之文》云:“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李邕受遗巨万，皇甫湜索

缣九千，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

唐代维护著作权的例子也不少。唐代白岑为了维护《发背方》的著作权，至死不肯相让；张怀庆抄袭名人诗文，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第六，隋唐五代的一些图书编撰方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官修书的卷端署名，唐代规定“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每阅数官，惟题经进一人”。虽然这种规定有其不合理性，剥夺了众多执笔者的著作署名权，但历代一遵其例，直到清人仍然如此。又如总集附有作者小传，姚合编《极玄集》，于入选者之下详载其字、爵里和登科之年。金元好问《中州集》、清修《全唐诗》等均照此办理。唐代总集多附作品评论，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等于著者姓名之下各有品题，明顾起纶《国雅品》等后代总集也相沿不改。唐代别集仅录诗文，其他专著概不附入，如蔡允恭的《后梁春秋》、郑世翼的《交游传》等都没有收入别集。唐五代以后的别集大多如此。可见隋唐五代图书编撰方法影响是很大的。

第七，隋唐五代时期，于阗、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地的少数民族也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编撰了大量图书。其中藏文图书最多，内容多佛经、史书、医书、占卜之类。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图书出版

隋唐五代时期在图书出版方面取得很大成绩。隋代官方曾经组织过五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隋文帝时抄写佛经1 100多万卷。唐代官方曾经组织过六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第二次抄书活动招聘2 000名书法家抄了30余年，抄书之多，可想而知。唐代翻译佛经372部、2 159卷，佛经抄本难以数计。唐代利用雕版印刷技术，还刻印了大量佛经、历书、杂书等。五代在抄书的同时，首

次刻印儒家经典十二经、总集、类书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我们就其图书出版的特点，择要加以总结。

第一，图书出版方式和装订形式的划时代变革。传统的图书制作方式是人工抄写的。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从先秦到公元6世纪末莫不如此，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发明雕版印刷术的确切时间，但据种种条件推断，当不会晚于7世纪初。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印刷术发明者的姓名，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印刷术的发明权应当属于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书坊的个体劳动者。正是他们经过千百次的精心实验，用其智慧的双手发明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发明，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带来无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属于整个人类。从卷轴装到册页装的装订形式的革命，是伴随雕版印刷而来的，传统的装订形式是卷轴装，它有许多不便，尤其是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它远远不如单页印刷方便。为此唐人进行了大胆探索，先后采用旋风装、经折装等形式，唐代后期，终于发明了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为图书装订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册页装的出现，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第二，图书出版与校勘、编目相结合。隋唐五代时期，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都要在抄书之前进行校勘工作，在抄书之后进行编目工作。校勘、抄书、编目成为整个出版活动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环节。例如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根据牛弘的建议，广开献书之路，书积如山，首先组织萧该、刘绰、郑译、何妥等著名学者开展校书活动；第二步组织抄写已校之书；第三步编成《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奏上。这种做法对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三审定稿。例如唐修《尚书正义》，初审由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负责；二审由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等负责；三审由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贾公彦等二十多

位专家负责。《敦煌遗书》中，三审定稿之例尤多。例如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三月七日王思谦抄《妙法莲华经》，初审王思谦，二审仁敬，三审思忠；高宗上元二年（674年）九月二十五日萧敬抄《妙法莲华经》，初审为僧智彦，二审为僧符轨，三审为僧怀瓒。三审定稿就能把错误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完全避免错误。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出版社，仍然广泛推行三审定稿的制度。

第四，编撰、出版、发行一体化。隋唐五代时期，图书出版工作的分工还没有那么细密，编撰、出版、发行，三位一体，都是由一家包办而成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隋代几次大规模的出版活动都是由秘书省主持的。秘书省既是编校整理单位，又是抄写单位。抄好之后，如何分配，藏在什么地方，都由秘书省决定。例如隋代第二次大型出版活动，由先秘书省“总集编次”，接着由秘书省“召天下工书之士”抄补残缺，最后仍由秘书省决定如下收藏方法：“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收藏就是发行，就是流通，就是传播。犹如今日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图书卖给各个大型图书馆收藏，应当是出版社发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代第五次大型出版活动，先由秘书省将37万卷图书进行“诠次”整理，接着由秘书省抄写“五十副本”，最后仍由秘书省进行发行工作，将50副本“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等处。编辑、出版、发行一体化，减少了大量中间环节，对于保证图书质量、稳定书价等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仍然被广大出版社所采用。

第五，严格管理。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一）钦定选题和编撰者。官书的选题和编撰者均由皇帝圈定。例如《隋律》于隋开皇元年（591年）由隋文帝“钦定”，编撰者高颎、杨素、常明等亦由隋文帝指定。《初学记》于唐开元间由唐玄宗“钦定”选题，编撰者张说、徐坚、韦述等亦由唐玄宗指定。另外，隋唐的《区宇图志》、《江都集礼》、《长洲玉镜》、《艺文类聚》、《五经正义》、《氏族志》、《三教珠英》等的书名和编

撰者均由“钦定”。（二）颁发国家标准本。为了减少或者避免各类版本的错误，国家在一书出版之先，往往颁发国家标准本，各地不得擅自出版。唐初颜师古撰《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等《五经正义》都是国家标准本。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诏令法师玄琬监造《大藏经》一部，“方隅道俗，欲写藏经，皆就传本为楷准”，可见玄琬监造本就是《大藏经》的国家标准本，抄写者必须以此“为楷准”。历书关系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唐代官方每年都要颁发标准本120本，令各地“递相传写”。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颁发的《御注道德经》，也是一个国家标准本，“分示十道，令巡内传写，以付宫观”。唐文宗时镌刻的开成石经，也是一个官颁国家标准本，只是因为错误太多，才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五代时期刻印的监本诸经也是一个官方颁发的国家标准本，当时规定：“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需依所颁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三）严禁非法出版物。隋代规定，举凡私撰国史、图藏和伪书都属于非物出版物。王劭因为私修齐史，而激怒隋文帝，后因“览而悦之”，才免受处分。图谶一禁再禁，只要是与图谶有关的图书，“皆焚之”；被捡举揭发的人，罪至死刑。出版伪书者，一经发现，亦处以极刑，学者刘炫因为编造伪书《连山易》、《鲁史记》等，原判死刑，遇赦方免一死，最后开除工作籍，遣返原籍。唐代规定，举凡天书、天文、图谶、兵书、占卜、《化胡经》、相书、私史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荥阳郑虔因为私修国史而“贬谪十余年”。另外，唐代对于民间佛经的出版也很严格，凡是那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的经坊，一律予以取缔。唐代是一个胸怀大度的泱泱大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海纳百川的风度，为什么容纳不了上述非法出版物？因为这些非法出版物直接对国家政权构成威胁，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四）重视图书质量，实行优质优价政策。图书一经出版，必须接受严格检查。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十月，兰台侍郎李怀俨负责抄写四部群书，在进行最后检查时，“以书有污”，没有通过验收，因而受到降职处分。唐代图书实行优质优价政策，一般

图书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等高价，下等低价，而且书价不是一次性的，实行浮动政策，每十天就要重新评估一次。使出版者警钟长鸣，不敢稍有懈怠。（五）为了便于进行管理，唐代规定，包括图书在内的所有商品必须“物勒工名”，标明出版地和出版者。这样做，除了便于进行管理之外，也有“版权所有”、各负其责的意思。如果不标出版地和出版者，一旦有事，查起来就不容易，也会给那些非法之徒造成可乘之机。（六）制定税收制度，书商定期交税。

第六，隋唐五代时期，于阗、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地的少数民族也抄写了大量图书，在《敦煌遗书》中多有发现。就载体而言，这些图书多为纸质，也有木牍、羊皮书等；就装订而言，多卷轴装，也有经折装、梵夹装。

第三节　隋唐五代的图书流通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确立，读书风气的形成，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流通活动已初具规模。除了公藏之外，这个时期的私人藏书家越来越多，可考隋代藏书家有刘智海、陆爽、许善心、张文诩等人；可考唐代藏书家有李素立、李袭誉、颜师古、元行冲、吴兢、韦述、萧颖士、杜兼、李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段成式、皮日休、陆龟蒙等近百人；可考五代藏书家有张宪、王锴、朱遵度、朱昂、钱昭序等数十人。藏书家的大量出现，是隋唐五代时期图书广为流布的一个见证。让我们就隋唐五代时期图书流通的特点，择要予以总结。

第一，牛弘的广开献书之路表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的重要文献。从表面上看，牛弘谈的是藏书问题，其实讲的也是流通问题。流通的前提是藏书，没有藏书作为物质基础，就无从流通。牛弘所谈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五厄”，也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的“五厄”。牛弘建议的献书活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由下而上的大规模的图书流通活动，图书由民间流通到官方。牛弘

之前，还没有人对中国古代收藏史和流通史作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牛弘的广开献书之路表，都是中国古代文献史上的重要文献，它对隋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隋唐五代时期已经形成书业中心。书业中心的形成，既是图书出版繁荣的标志，也是图书流通繁荣的标志。长安、洛阳、成都、敦煌、扬州、绍兴等地是唐代书业中心。这些地方的书市已初具规模，书商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有些卖历书的书商，无视国法，不按国家颁发的标准本历书刻印，常常“争月之大小尽”。五代时期，开封、成都、杭州、金陵等地也是全国的书业中心。

第三，图书流通手段的多样化。归纳起来，图书流通手段有购买、献书、颁赐、诏藏、借阅等。其中，购买是一种最常见的图书流通手段，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实现图书流通。隋唐五代时期，官方多次大规模购书，以补充国家藏书的不足。献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图书流通。献书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比较而言，无偿的要多些，佛教信徒的施经就是一种无偿的献书活动。颁赐图书是封建帝王向臣下赠书，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流通，例如隋王劭撰《皇隋感应考》奏上，“上令宣示天下”[1]，“宣示天下”就是诏颁全国，其流通范围之大，可想而知。诏藏秘阁，即皇上诏令某一著作上缴秘阁收藏，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流通手段。例如隋郎茂撰《州郡图经》一百卷，奏上，隋炀帝“赐帛三百段，以书付秘府”[2]。又如曹宪为张揖《博雅》作注，隋炀帝亦“令藏于秘阁”[3]。通过借阅实现图书流通之例也屡见不鲜，例如隋代武强交津桥刘智海是个藏书家，刘焯和刘炫就曾到他家借读，“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4]。唐僧一行曾向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将归读之”[5]。总而言之，购买、献书、颁赐、诏藏、借阅等都是图书流通的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图书大行于世。

第四，儒家经典、史学名著、诗文名集等成为畅销书。所谓

【1】《隋书》卷69《王劭传》。

【2】《隋书》卷66《郎茂传》。

【3】《旧唐书》卷189上《曹宪传》。

【4】《隋书》卷75《刘焯传》。

【5】《旧唐书》卷191《一行传》。

“畅销书”，即流布较多的书。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确定“畅销书”：一是社会读书情况，即全社会大多数人在读什么书，畅销书就是人们读得最多的书；二是科举用书，即国家考试需要的书，是千千万万考生的必读书，也是畅销书；三是学校用书，学生是最大的读者群，课本一手一册，也是畅销书；四是根据历史文献的直接记载去判断，文献中所谓“大行于世”、“盛传于世(代)”、“盛行于代”、“大显于时”者，都是畅销书。有人说，“畅销书”应该是通过“销”售广泛流通的书，必须有钱货交易的过程。的确，社会上流通的每一图书，并非都是市场上直接用金钱购回的，可能从赠送、借阅等手段间接得到，没有为此书付出任何代价。应该承认，不管这部书曾有多少人递相传阅，但是归根到底，最早的传播者必定直接为该书的流通付出了应有的代价，难以回避从产到“销”的运作过程。因此，从广义上说，畅销书就是社会广为流通的书。隋唐五代时期，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等，史学名著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诗文名集如“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贯休等人的别集，《文选》、《才调集》等总集都大行于世。另外《老子》、《庄子》和佛经也受欢迎。

第五，对外图书流传也很活跃。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不少外国人来华留学或经商，也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中国图书远播海外。其中隋唐时期流入日本的图书就有1 568卷。流入朝鲜、印度等国的图书也不少。

第六，隋唐五代时期，于阗、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地的少数民族和唐朝的联系是密切的。图书是双向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用自己的文字翻译了不少唐代汉文著作。

附录一　隋唐五代出版大事记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　隋文帝下令“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并实施“计口出钱”抄写佛经的集资方案。

开皇三年（583年）　秘书监牛弘上广开献书之路表，隋文帝根据牛弘建议，遣使访书，并制定“每书一卷，赏绢一匹”的书价政策，隋代抄写佛经46部、132 086卷；整理故经3 853部。

开皇四年（584年）　牛弘等修成《开皇四年四部目录》。

开皇六年（586年）　法经撰《众经目录》。

开皇八年（588年）　为了攻打陈国，隋文帝散发诏令30万张。

开皇九年（589年）　姚察等修《开皇九年四部目录》。

开皇十三年（593年）　隋文帝诏令“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

开皇十四年（594年）　法经等撰《众经目录》7卷。

开皇十七年（597年）　许善心等修《七林》，费长房等撰《历代三宝记》15卷。

开皇二十年（600年）　王劭等修《开皇二十年书目》。

仁寿元年（601年）　陆法言撰《切韵》5卷。

炀帝大业初（605年）　秘阁藏书令抄50副本。

大业二年（606年）　建洛阳上林园译场，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永久性国立译场。柳䛒等编成《长洲玉镜》400卷。

大业二年（606年） 彦琮卒。生前翻译佛经23部、100卷左右。

大业九年（613年） 刘炫卒，生前著书数十种，为隋代之冠。

大业十一年（615年） 秘书省人员编制增至120人。

大业间 普诏天下编修志书，这是我国古代国家明令修志的最早记载。隋代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等。

大业末 秘书郎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174卷。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至武德九年（626年） 唐代官方第一次大规模抄书，数量多达12万卷。

武德七年（624年） 欧阳询等修《艺文类聚》100卷；诏修南北朝诸史，未果。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 玄奘到印度取经。

贞观二年（628年）至高宗显庆中 唐代官方第二次大规模抄书，聘用书手2 000人。

贞观三年（629年） 始移史馆于禁中，逐步完善并形成了监修制，诏令复修南北朝诸史。

贞观七年（633年） 颁颜师古等修《五经定本》于天下。

贞观十年（636年） 修成南北朝诸史。

贞观十一年（637年） 长孙无忌等修《大唐仪礼》100卷。

贞观十二年（638年） 修成《晋书》130卷和《氏族志》100卷。

贞观十五年（641年） 李泰等撰《括地志》。

贞观十五年（641年） 文成公主入藏时，唐朝赐予很多物品，其中有大量书籍，如儒学经书、佛教经典、占卜书、营造与工技书、医书等。

贞观十六年（642年） 高士廉等修《文思博要》1 200卷。

贞观十九年（645年） 玄奘取经回唐，带回舍利150粒、金银檀佛像七尊，经论520篋，657部。

贞观二十年（646年） 玄奘口述、辩机整理《大唐西域记》20卷。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 魏征等修成《隋书》。

永徽三年（652年） 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30卷，颁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

显庆三年（658年） 长孙无忌等修《永徽五礼》130卷，许敬宗等修《文馆词林》1 000卷。

显庆四年（659年） 李反等修《新修本草》，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药典。

麟德元年（664年） 玄奘去世。一生共译佛经75部、1 335卷。

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 释道宣卒。生前有《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著作。

总章元年（668年） 释道世编《法苑珠林》100卷。

咸亨二年（671年） 僧义净到印度取经。

武后天授二年（691年） 出现印纸，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古代最早印刷品之一。

证圣元年（695年） 义净回国，带回梵文佛经近400部，先后译经56部，并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长安二年（702年）至中宗景龙四年（709年） 刘知几撰《史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史评专著。

长安四年（704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 刻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至开元二十年（732年） 唐代官方第三次大规模抄书，时间长达17年。

开元九年（721年） 元行冲等撰《群书四部录》200卷。

开元十三年（725年） 诏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开元十八年（730年） 智昇编《开元释教录》20卷。

开元十九年（731年） 吐蕃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唐朝如请赐予。此后有《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传世。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 张九龄等撰《唐六典》。

开元间 编成我国古代第一部道教著作汇编《开元道藏》。徐坚等奉诏编（初学记）30卷。

开元、天宝间 殷潘等编《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

天宝（742—755年）年间 藏族著名医学家玉妥·云旦贡布编著《四部医典》。

天宝三载（744年）至十四载（755年） 集贤院抄书16 843卷。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之后 成都龙池坊卞家刻印《陀罗尼经咒》。

乾元二年（760年） 元结编《箧中集》。

唐代宗广德十年（775年） 陆羽撰《茶经》，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茶叶专著。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 释圆照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 杜佑撰《通典》200卷。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 释慧琳编撰《一切经音义》100卷。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 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

长庆元年（821年） 唐朝和吐蕃会盟于长安，翌年又会盟于拉萨，三年在拉萨立汉、藏文合璧的《唐蕃会盟碑》。

大和二年（828年） 按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的命令，编纂已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论目录，并以三所殿堂命名，分别称《庞塘目录》、《秦浦目录》、《登迦目录》。

唐太宗太和九年（835年） 四川、江苏等地刻印历书。准冯宿奏，敕诸道“不得私置历日版”。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 在都城长安建《开成石经》。

唐武宗会昌间 东都洛阳敬爱寺刻印佛经。

会昌三年（843年） 吐蕃赞普朗达玛下令灭佛，封闭和拆毁寺院，迫害僧人，烧毁经书文物。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 诏“废浮屠法”，毁寺院4 600所，令僧尼26万余人还俗。

唐宣宗大中元年（846年） 白居易去世，白居易生前自编别集十余次，在中国古籍编撰历史上是仅见的。

唐宣宗大中间（847—858年） 江西刻印《刘宏传》。

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之前 四川刻印《唐韵》和《玉篇》。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 王玠为二亲刻印《金刚经》。

唐僖宗乾符间（875—879年） 四川刻印历书。

中和二年（882年） 成都樊赏刻印历书。

中和三年（883年） 成都刻印阴阳、占梦、相宅、字书等杂书。

天复四年（907年）之前 四川过家刻印《金刚经》。

唐昭宗天复四年（907年） 前蜀陈詠自刻别集。

前蜀武成元年（908年） 任知玄在成都刻印《道德经广圣义》20卷。

乾德五年（923年） 昙域刻印贯休《禅月集》。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 国子监刻印《贞观政要》。

长兴三年（932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 国子监刻印儒家群经、《经典释文》等，历时四朝七帝，用时22年，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第一次雕版印刷。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年） 吴越僧延寿刻印《弥陀塔图》、《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大悲咒》等。

天福六年（940年）至开运二年（945年） 刘昫等修《旧唐书》。

南唐昇元四年（940年） 刻印《绮庄集》。

出帝开运四年（947年） 曹元忠刻印《观音像》、《文殊像》等。

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年） 曹元忠舍资、雷延美刻印《金刚经》。

后蜀广政十六年（953年） 毋昭裔刻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6年） 吴越王钱弘俶刻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84 000卷。

附录二　参考文献

一、史料类

【1】[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4】[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5】[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6】[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7】[唐]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0】[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1】[唐]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2】[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3】[唐]韩愈:《昌黎先生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

【1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

【15】[唐]白居易:《白居易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16】[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7】[唐]道世:《法苑珠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8】[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9】[唐]刘悚:《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20】[唐]张鷟:《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21】[唐]慧立、彦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2】[唐]刘禹锡:《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3】[唐]玄奘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4】[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5】[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6】[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7】[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8】[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0】[宋]王谠:《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1】[宋]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2】[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33】[宋]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4】[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5】[宋]洪迈:《容斋随笔》,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6】[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7】[宋]王溥:《五代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38】[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39】[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4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41】[清]赵翼:《陔余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4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3】[清]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44】[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5】[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6】[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7】[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48】[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49】[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50】[清]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51】[清]王士禛:《五代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52】[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53】商务印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二、文集类

【54】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55】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56】《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57】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58】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增订本。

【59】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60】黄征等:《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61】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

【6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63】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64】〔英〕贝利(Bailey):《于阗文文献》(六册),剑桥,1945-1967年;《于阗文佛教文献》,伦敦,1951年。

三、著作类

【65】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66】蔡景峰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67】郭沫若:《中国史稿》,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8】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9】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70】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71】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72】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73】万曼:《唐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74】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75】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76】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77】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
【7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7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80】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陈庆英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81】《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82】杨廷福:《玄奘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83】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84】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85】卿希泰等:《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86】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87】布顿·仁钦珠:《布顿佛教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88】王尧:《吐蕃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89】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90】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
【91】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92】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93】陆坚等:《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94】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95】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96】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97】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98】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99】陶秋英:《敦煌碎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0】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1】王勇:《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10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103】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
【104】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5】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6】许凌云:《刘知几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7】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108】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9】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0】周少川:《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1】周少川:《古籍目录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112】马佩:《玄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3】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4】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5】谢水顺等:《福建古代刻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6】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17】赵俊等:《刘知几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118】方亚光:《唐代对外开放初探》,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
【119】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
【120】何芳川:《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21】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22】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23】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4】范文澜:《唐代佛教·附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5】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126】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27】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28】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发明和早期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29】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0】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31】高永久:《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132】肖东发:《中国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3】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134】李斌城:《唐代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5】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6】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7】徐松、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138】李瑞良:《中国出版编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9】李致忠:《中国典籍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0】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41】张树栋等:《简明中华印刷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2】〔美〕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
【143】〔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44】〔德〕冯·勒·柯克:《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陈海涛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5】〔美〕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

后　记

《中国出版通史》终于出版了。我有幸忝列该书《隋唐五代卷》的撰写工作，先后参加了十多次编辑工作会议，结识了不少出版界的新老朋友，受益匪浅。

隋唐五代是中国出版史的重要时期之一。图书编撰之繁荣、写本之极盛、册页装之出现、雕版印刷之发明、监本群经之出版等，创造了一件件可圈可点的辉煌；牛弘、玄奘、陆德明、李善、刘知己、杜佑、白居易、冯道等留下了一笔笔极可宝贵的遗产……我常常遥望南天，浮想联翩。当我拿起笔杆开始写作的时候，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写作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各位编委的发言时刻响在耳边，给我增添了不少信心和力量，我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由于水平所限，书中当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第十五章《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的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史金波和国家图书馆黄润华研究馆员撰写。没有他们的鼎力襄助，《隋唐五代卷》是写不出来的，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曹　之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九日于武昌珞珈山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3 隋唐五代卷
作者=曹之著
页数=485
SS号=12211961
出版日期=2008.12